

红旗

HONGQI

1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一期 ★

目 录

詩詞十首毛澤東 (1)

- | | |
|--------------|-------------------|
| 七律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 七絕 为李进同志題所擬庐山仙人洞照 |
| 七律 到韶山 | 七律 和郭沫若同志 |
| 七律 登庐山 | 卜算子 咏梅 |
| 七絕 为女民兵題照 | 七律 冬云 |
| 七律 答友人 | 滿江紅 和郭沫若同志 |

“百万雄师过大江”郭沫若 (7)

——讀毛主席新发表的詩詞之一

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顾大椿 (11)

論我国社会主义銀行工作的几个問題段 云 (21)



☆ 一 月 四 日 出 版 ☆



詩 詞 十 首

毛 澤 東

七 律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一九四九年四月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七 律

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
爲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七 律

登廬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葱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



七 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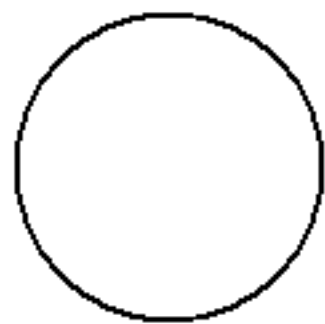
為女民兵題照 一九六一年二月

颯爽英姿五尺槍，曙光初照演兵場。
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

七 律

答友人 一九六一年

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
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裏盡朝暉。



七 絕

为李进同志題所攝庐山仙人洞照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峯。

七 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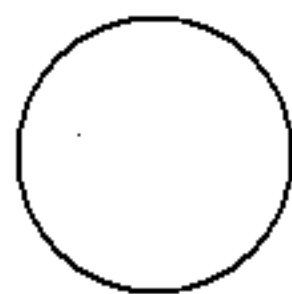
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附：郭沫若原詩

七 律 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慈悲對友刁。咒念金箍聞萬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教育及時堪贊賞，豬猶智慧勝愚曹。



卜 算 子

咏梅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讀陆游咏梅詞，反其意而用之。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
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
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附：陆游原詞 卜算子 咏梅

驛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風和雨。 无意苦爭
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七 律

冬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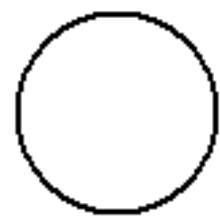
滿江紅

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附：郭沫若原詞 滿江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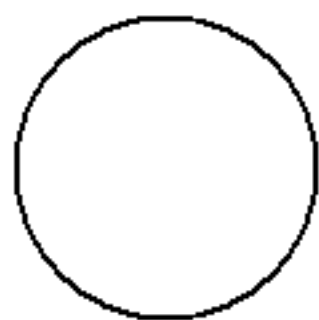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鷄一唱遍寰中，東方白。太陽出，冰山滴；真金在，豈銷鑠？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桀犬吠堯堪笑止，泥牛入海無消息。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



“百万雄师过大江”

——讀毛主席新发表的詩詞之一

郭沫若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絕接受和平協定的條款，使拖延了二十天的和平談判破裂了。

当时蒋介石还躲在奉化，在南京是由他的傀儡伪代总统李宗仁和伪行政院长何应钦等在支持残局。他们之所以敢于破坏和谈，拒絕向人民交出政权，他们是有所倚賴的。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援助，不用說是他們最殷切的盼望而认为可靠的期待。还有长江天塹，更加上所謂“千里江防”，冥頑的敌人滿以为还可以保护着他們苟安几个月。这样就能爭取到時間，接受更多的外援，重振旗鼓。这正是南京蔣朝廷在临到总崩潰前夜的一段殘梦。

然而，这一段殘梦是十分短促的。真是黃梁未熟，而二十二年的万恶統治便全盘崩潰了！

敌人沒有料到，人民解放軍是已經早有准备的。百万雄师，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起江阴，西迄九江的湖口，已决定于四月二十日夜，在五百余公里长的战綫上开始搶渡长

江。正式命令是在四月二十一日公布的。

这样一来，就在四月二十三日的那一天，百万雄师全部渡过了长江，包围了蔣匪帮盘踞了二十二年的南京城。

南京的解放是在二十三日的晚上，蔣匪帮伪“总统府”的日历只翻到四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何应钦等那一群猢猻們却已提前一天逃跑了。

二十二年的金陵春梦便从此結束。

主席的七律一首《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无疑就是在南京解放后的三两天之內做的。

主席在那一段时期內，毫不夸大地說，真是“一日二日万机”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教育、交通運輸，举凡有关人民政权的奠定工作，都必須加以考虑。在这样百忙之中，主席却写出了这样一首七律。这无疑是由于南京解放的重要性，使主席感到了衷心的喜悅。而这衷心的喜悅焕发了主席的葱郁的詩兴，便酝酿成了这样一首雄渾沉



着的新史詩。

这一首詩是紀念南京解放、庆祝革命胜利的万古不磨的丰碑。

詩的开头两句：“钟山風雨起蒼黃，百万雄师过大江”，就是紀实，就是說人民解放軍渡过长江，把南京解放了。

钟山就是紫金山，在南京市的东边。只說“钟山”也就代表了南京。“蒼黃”是变化翻复的意思。《墨子·所染篇》“墨子見染絲者而叹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变，其色亦变。”蒼黃这个辞便导源自这儿。由变化之意引伸为天翻地复。孔稚珪《北山移文》有云：“岂期終始參差，蒼黃翻复”，天是蒼色，地是黃色，故所謂“蒼黃翻复”也就是天翻地复。

“钟山風雨起蒼黃”，就是說南京城起了暴風驟雨，鬧得它天翻地复。为什么？就是因为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把蔣匪帮的巢穴扫蕩了。

“百万雄师过大江”是再雄偉也沒有的詩句。有人或許会說：“江韵和阳韵是隔韵的”。但这不成問題。江阳二韵，古人早就通用，今天更用不着拘泥了。今天是應該按照今天的字音做詩，要打破赵宋以来早就因字音变迁而不大适用的《韵本》的束縛。而且江阳通韵，在主席以前发表的《和柳亚子先生》的一首七律中，也早就用过了。不用說柳亚子先

生的原詩也正是江阳通用。

第三、四两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是从正面来歌頌南京解放。

諸葛亮曾与孙权論金陵形势，有“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話。钟阜就是钟山，像一条龙一样在南京之东蜿蜒。石城就是石头城，南京城的別名。南京城就像一只老虎，雄赳赳地坐在那儿。为什么把南京城比成老虎？这是从五行說导引出来的一种傳統說法，所謂“左青龙，右白虎”。紫金山在东边，故就其形势而言比之为龙。南京城在西边，故就其方向而言比之为虎。在諸葛亮以后，一般都把“虎踞龙蟠”四字代表金陵。“虎踞龙蟠”一作“虎踞龙盘”。庾信《哀江南》中有句云：“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黃旗紫气”，所說的就是以金陵为根据地的南朝。但“昔之虎踞龙盘”，今已成为人民的都市，以今比昔，換了人間。南京城的形势，在人民作了主人的今天，比古代的任何朝代都更加雄偉了。

“天翻地复慨而慷”，天翻地复即是“蒼黃翻复”，与第一句的“蒼黃”两相呼应。“慨而慷”是慷慨激昂的意思。古人用“慷慨”二字有相反的二义，一表激昂，一表悲抑。像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便是表示悲抑的例子。这也表示着慷慨二字可以倒用为慨慷。主席的“慨而慷”同样是倒用，但采取了积极的含义。解放了南京的人民解



放軍不用說一个个都是斗志昂揚，意气風发的。然而，不仅解放軍是这样，全中国人民都是这样，全世界进步的人民也都是这样。

我还記得，当南京解放的时候，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正分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开会——因为中国代表团和好些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得不到法国的签证，故只好使一个大会在两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我們是在布拉格参加大会的。四月二十四日的下午，正在开会的期間，南京解放的消息傳到了，我們在大会上临时宣布。于是全場哄动，各国的代表們欢喜若狂，高呼“毛澤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大家把中国代表們抬举起来向空中抛揚，狂欢了将近半小时光景。在那个会場里不也正是呈現出了“天翻地复慨而慷”的景象嗎？不一会巴黎的消息傳到了，巴黎的大会場上也同样呈現出了“天翻地复慨而慷”的景象。这正十分鮮明地表示着：南京解放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世界革命史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反动派之外，誰个能够不慷慨激昂呢？

第五、六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結晶地表現出了主席的革命的戰略思想，即“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拒絕了接受和平协定之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接着便向

各野战軍全体指揮員、战斗員和南方各游击区的人民解放軍，頒布了向全国进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这个命令的詩的表现，就是在这两句。

我国古代的兵法家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軍爭篇》中有“穷寇勿追”的話。《逸周书·武称解》也說“穷寇勿格”。这在中国一般奉为了格言。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都有一些好心腸的朋友，主張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这些也都是片面的“穷寇勿追”論者。但英明的毛主席是辯证地全面地看問題的，在穷寇应该穷追的时候就必須追，决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

“宜将剩勇追穷寇”，請注意那个“宜”字，这就是說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穷寇必追的。“不可沽名学霸王”，如果不追穷寇，便会像西楚霸王一样遭到失敗。

秦汉之交农民大起义中的两位領袖——西楚霸王項羽和刘邦，同时奉楚义帝之命，西向进攻秦二世。項羽从黄河北岸进兵救赵，把几十万秦兵吸引到了今天的河北省境内，把他們打敗了，歼灭了。刘邦則从黄河南岸进兵，因而沒有遇到什么抵抗，便进入了秦的首都咸阳，比項羽占了先。刘邦想占有关中，他派兵把守函谷关，有意拒絕項羽。这样就



引起了一段有名的插曲——鴻門宴。

項羽把秦兵收拾好了之后，攻破函谷关，也进入了咸阳。他手下有四十万大兵，屯集在新丰鴻門。当时刘邦只有十万人，屯兵灞上，相去四十里，兵力是远远不逮的。項羽本来想在第二天就用武力消灭刘邦，但他的叔父項伯却把消息透露了，要刘邦到鴻門去道歉。項伯还替刘邦作了解释，并劝項羽不要做“不义”的事。（《史記·項羽本紀》：“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第二天刘邦果然亲自到鴻門道歉，这时項羽的謀臣范增屢次暗示項羽，要他在宴席上把刘邦杀掉，然而他也不动。范增曾經說他“不忍”，那就是說向敌对者讲仁慈了。結果是让刘邦輕易地逃走了。

項羽放走了刘邦，他对于刘邦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当他分封諸将相的时候，他把刘邦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等于把刘邦封鎖在偏僻的山岳地带；而且还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司馬欣和董翳为王，以阻塞着刘邦东进的道路。但这些措施終竟无补于事。不久刘邦回师北上，把三位秦的降将消灭了，接着东出中原和項羽角决雌雄，終于使項羽軍敗垓下，在烏江自刎。

这就是沽名的楚霸王悲剧。为什么說他“沽名”？因为他也要行“仁义”。由于要行“仁义”，因而穷寇不追。由于穷寇不追，因而一敗塗地。

項羽是值得批判的一个历史人物。他是起义軍的一位領袖，但本是楚国的沒落貴族，有勇无謀。特别是在他破秦以后，殘忍嗜杀，一味破坏，失去了民心。这是他的失敗的根源。主席在詩里引用了他，正是批判了他，而且是用来作为宜追穷寇而不追的殷鉴。

第七、八两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是伸說穷寇必追的战略适应当时的形势而符合人民的願望。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唐人李賀的詩句，見所作《金銅仙人辞汉歌》。主席把这个成語用到这儿，意思是蔣匪帮作恶太长久了，內战內行，外战外行，殘民卖国，向帝国主义效忠者已經二十二年；自然界如果有意識，連自然界也会感觉着太难忍受了，不能让它得到喘息的机会，以便卷土重来。

人民对于南京解放的看法也认为是滄桑之变，即滄海变为桑田。这是很剧烈的变化，很彻底的变化，但也是经历了很长远的岁月的变化。人民是欢呼这项革命的偉大胜利的。普遍的欢呼正突露出人民的深切希望，希望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把滄海彻底变为桑田！

人民的要求看来就是这样：滄海的一角如果还依然存在，促进滄桑之变的人为努力便不能允許有半途而廢的一天。



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

顾大椿

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无产阶级担负着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建设共产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使命，可是，无产阶级的成员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这个使命，意识到要为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世界而奋斗到底的。这种思想只是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以后，才会形成起来。

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虽然改变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

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的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已经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自己的灭亡，总是企图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总是图谋复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首先是同工人阶级争夺思想阵地，传播反动的政治思想，用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毒害和腐蚀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从思想上为反革命复辟准备条件，开辟道路。

现代修正主义者适应反动阶级这一需要，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效劳，宣扬阶级合作，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崇拜工人自发论，片面宣传对个人的物质刺激，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斗志，企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阶级敌人和



平共处，在经济上逐渐向资本主义蜕变。在这一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任何对无产阶级思想的削弱，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工人阶级要在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中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学会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消除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思想影响，避免现代修正主义思想的侵蚀。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人队伍有了很大的增长，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特别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大量地参加到工人队伍中来，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他们虽然经过党的反复教育，经过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有少数人身上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习惯和残余思想。在工矿企业中，也还有极少数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新入厂矿的青年工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阶级觉悟，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亲身遭受过或者亲眼看到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对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就是老工人的子弟，一般也缺乏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感性知识。正像老工人所说，他们是“甜水里泡大的”。这些青年工人不甚了解旧社会的黑暗，不甚了解革命和建设的艰难，他们当中不少人的阶级观念还比较模糊。

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一般情况来看，需要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从我国工人队伍里老工人少、新工人多的这种特殊情况来看，也必须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

会主义教育。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和对工人群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全国解放以来，各厂矿企业结合每个时期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对工人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形势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巩固工农联盟的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等政治思想教育。并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还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集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农村广泛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城市厂矿企业中普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页。



逼进行了民主改革运动，改革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压迫和侮辱工人群众的不合理的制度，反对工贼、把头对工人群众的压迫。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工人群众，虽然把压在他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了，但还没有完全摆脱剥削阶级长期以来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旧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对他們的影响还相当大，他們对新社会和新事物的認識还不太清楚。因此，党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政治启蒙教育。各厂矿企业普遍組織工人群众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使工人群众懂得了劳动創造世界的道理，懂得了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懂得了劳动的偉大和光荣，开始树立了国家主人翁的責任感。結合民主改革运动，結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发动工人群众控訴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工人群众对帝国主义和旧社会的仇恨，清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帮助工人群众初步划清了新旧社会两种制度的界限，从而使工人群众进一步認識了自己的地位和責任，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經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九五二年，在我国开始有計划的經济建設时期的前夕，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保证国家建設事业的順利进行，击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盜窃国家财产、反盜窃国家經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参加了对贪污分子和不法

资本家的斗争。由于当时，有部分工人对于资本家所散布的“有肉才有湯，肉肥湯也香，工人是靠资本家养活的”謬論辨別不清，各厂矿企业对工人群众进行了“誰养活誰”的教育。通过学习討論，使工人懂得了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認識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进一步划清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在提高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大規模的經济建設提供了良好条件。

一九五七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的指引下，我国胜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經济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后，又在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在国际反共逆流和現代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发起了猖狂进攻，党领导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右派斗争。通过这次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大大增强了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观点，認識到被推翻了的阶级一有机会就企图复辟，認識到政治思想战綫上“誰战胜誰”的問題需要經過长期反复的斗争才能解决。結合反右派斗争，全国人民开展了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整風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工人群众又进行了“为誰劳动”的討論，通过这个討論，区别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树立了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接着，在厂矿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教育，使工人群众更加斗志昂揚，精神奋发，高举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紅旗，



闊步前进，为工人阶级战胜連續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困难，奠定了思想基础。

目前，与增产节约运动紧密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起来。这是一次重新教育人民的革命运动。它对于增强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观点，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于进一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避免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激发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这次教育运动，将会更加提高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促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偉大革命运动的开展，使厂矿企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更好地得到发展，对国际主义的义务也将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

我国厂矿企业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以毛澤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教育为綱来进行的。通过經常的或集中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工人群众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懂得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有懂得这些，才能懂得革命，才能懂得什么是政治、政党、政策，什么是爱国主义，什么是国际主义，等等。有了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分清誰是革命的敌人，誰是革命的朋友，才能了解两个阶级、两种制度、两个世界的对立

和发展，才能看清国内、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复杂现象。

在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要从阶级教育入手，使工人逐步掌握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是工人阶级的根本立场问题。要使工人在政治上頂得住風浪，在生活上經得起考驗，具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就需要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以群众的切身經驗来进行教育。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也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一些沒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总是企图利用他們自己认为有利的气候兴風作浪。他們极力模糊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識，說什么“工人也好，資方也好，現在都是吃飯、干活、拿工資嘛！”有的工人群众，也常常容易只注意生产斗争的一面，忽視阶级斗争的一面，看不清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織的情况。如有的工人认为：“地主沒有土地了，資本家沒有企业了，哪里还有阶级、阶级斗争？”所以，在加强对工人的阶级教育时，首先要摆事实，先要由近到远，摆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具体事实，把阶级敌人的丑恶面目揭露出来，使工人了解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有些企业由于这样做了，使过去对阶级斗争缺乏認識的人，也猛省过来，他們說：“不揭不知情，一揭吃一惊。”从活生生的事实中，認識到“阶级存在一天，就要挑起阶级斗争和生



产斗争的两副担子。”

摆事实要与讲道理结合起来。因为同一事实，还会有不同的看法，究竟哪一种看法和意见是正确的，哪一种看法和意见是错误的，不经过群众自己的议论，还不能明辨是非。要议论得好，关键在于充分发扬民主。要根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让大家对提出的问题充分发表不同的意见，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和风细雨，以理服人的方法，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①根据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指示，就可以使群众的议论愈议愈深，道理也就愈说愈透。

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群众切身的斗争经验来教育群众。在分析现实的阶级斗争情况，对比工人阶级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生活中，老工人自然会联系起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斗争经历。因此，在历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人群众总是反复采取回忆旧社会的苦，对比新社会的甜，通过忆苦、诉苦，用各个人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分析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根源，多数人就能够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明确革命的方

向。实践证明，回忆对比的方法，是激发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经常有效的方法。

工人群众忆苦，是以典型忆苦带动一般忆苦。只有受苦深、觉悟高、劳动好、联系群众好的老工人典型忆苦，才能“以苦引苦”，带动其他老工人诉苦。忆苦一深入，群众就会进一步挖苦根，思甜源，把过去旧社会工人的政治状况、生活状况、劳动状况、文化状况，拿来和今天新社会工人在这些方面的状况作对比。新旧对比愈鲜明，工人群众的爱憎也就愈分明；对帝国主义、对旧社会各种阶级敌人的仇恨愈深，对社会主义也就愈加热爱，愈加认识到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地位和责任。对青年工人来说，回忆对比的方法更能够使他们丰富阶级斗争的知识，激发他们的阶级感情。

最近一个时期，厂矿企业通过回忆对比，着重开展了家史、厂（矿）史、革命斗争历史的“三史”教育，用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育新一代工人。“三史”教育又使回忆对比有了新的发展。不少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工人一道忆苦。干部忆苦，既推动了群众讲家史的热潮，也使干部和群众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有些地方讲家史，从小组、车间的会上讲，到老工人的家庭会上讲。这种“家庭诉苦”，使苦诉得深，同时又教育了老工人的子女。有的地方还组织青年工人，去帮助老工人写家史，写家史的过程实际是青年工人进一步接受阶级教育的过程。有些青年工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



人說：“听一遍不如訪一遍，訪一遍不如写一遍。”在写家史中，还有弄不清楚的問題，他們就一面带着这些問題去訪苦、問苦，一面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有关階級斗争和階級分析的論述。这样，把“三史”教育和青年工人的思想实际紧密結合，也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工人階級的斗争实例紧密結合，使青年工人从实际上，也从理論上懂得了只有不忘记过去，才能珍惜和捍卫现在的革命成果；懂得了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在階級斗争中进行，必須在全面地、不断地社会主义革命中进行，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要把无产階級的“家譜”一代一代地續下去。

社会主义教育的另一个内容是，加强工人群众的集体主义教育。

资产階級世界观的核心就是損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无产階級与此相反，是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无产階級每个成員的命运、幸福和前途，是同集体、同整个階級的命运、幸福和前途分不开的，他們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是依存于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工人群众在国家和集体的关怀下，改善了生活，他們用“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无水小河干”这两句話，形象地說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階級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集体主义教育，就是使工人群众能够从階級观点、階級利益上，能够从无产階級的世界观、道德观上，来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懂得自己的斗争目的，不是为了單純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階級的解放。工人群众有了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他們

就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就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表现出忘我的劳动态度，表现出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給別人的英雄气概。

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坚强的組織性、紀律性，是工人階級固有的优良品德。这种优良品德是无产階級从事大生产的經濟地位决定的，是长期、殘酷的階級斗争中培育出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資料掌握在人民手中，生产目的是为了滿足全体人民的需要，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就使得工人階級集体主义精神更加发揚光大。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內，工人队伍总是要由小生产者来补充的，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习气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帶到工人队伍中来。列宁說过：“无产階級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鍛炼、教育、改造旧社会遺留給无产階級的出身于小资产階級的一切分子。”^①要使工人階級影响小生产者，不使小生产者影响工人階級，还需要通过劳动竞赛活动，加强集体主义教育，逐渐克服小生产者的自由散漫习气，把工人队伍的每一个成員都鍛炼成为有觉悟、有組織、有紀律的无产階級战士。目前厂矿企业开展的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落后的竞赛活动，既是以增产节约为目的的生产运动，又是提高工人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培育工人群众集体主义思想的教育运动。通过比、学、赶、帮的具体活动，地区之間、企业之間、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援，团结协作，先进帮助落后，落后

^① 《論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說的派別》。《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9頁。



追赶先进，就可以帮助工人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企业是一个既分工又协作的集体，整个国家也是一个大的集体；就可以帮助工人群众识大体，顾大局，自觉地使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工人群众集体主义思想的加强，促进比、学、赶、帮活动的开展，比、学、赶、帮活动的深入开展，又必然促使工人群众集体主义思想更加发扬。

要使工人群众逐步具有集体主义精神，还需要典型示范，树立活的榜样。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是不断地涌现出各个方面的模范人物。他们或者在对敌斗争中英勇不屈，或者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有出色的贡献。这些模范人物所以能够成为群众的骨干，带动群众前进，首先就因为他们具有集体主义的思想。用这些活的榜样教育工人，工人群众就会在这些人物的高尚行动的影响下力争先进。一九六三年，在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中，不少工人提出了“学习雷锋，比比自己”，用雷锋的思想、行动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进一步发扬了热爱集体的精神。在树立榜样中，既要推动群众向各种不同的模范人物学习，又要推动各个模范人物再向群众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树立榜样，还需要树立从落后转变为先进的榜样。这种榜样，对教育落后、推动中间有更大的启发作用。这种思想转变的榜样，对工人群众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更有促进的作用。

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是社会

主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育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传统。这种传统集中地反映了我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概，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革命的自觉性和革命的坚定性。这就需要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使广大工人群众进一步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养成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作风。

自力更生是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坚持的方针，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我们遵循这个方针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也必须遵循这个方针，不断取得胜利。要使工人群众懂得，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同革命一样，主要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来进行的。因此，工人阶级要发挥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充分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挖掘企业内部的各种潜力，依靠本国内部的积累，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够迅速发展现代化的国民经济，才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可靠地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增强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援，更好地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

要使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成为每个工人的自觉行动，就需要把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让广大工人群众学习老红军那种爬雪山、过草地的顽强斗争精神，学习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延安作风”，让广大



工人群众充分发扬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爱惜社会主义企业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更好地开展节省“一厘钱”的节约活动。在各个厂矿企业中，养成一种艰苦奋斗的风气，养成一种勤俭办一切事业的风气。有了这种好的风气，就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兴旺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人人爱集体、爱国家、爱社会主义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了这种好的风气，就能使企业成为生产上的先进集体，就能把企业变成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的堡垒，培养出一代一代的既有共产主义觉悟和高尚道德品质，又有专业技术的新人。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风气，是在不断地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成员，如果不同各种坏思想、坏习惯作斗争，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就不能形成这种风气。所以，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就是要使工人阶级新一代把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革命事业的传家宝，作为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步骤。资产阶级为它的思想意识寻找市场，往往是从生活方式上开始的。生活上的堕落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蜕变。要抵制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识别出用华丽外衣装潢起来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为那些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诱惑、腐蚀，就需要使工人阶级新一代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重要意义，把坚持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工人阶级传统，当作一个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

总括起来，加强对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

教育，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工人，使工人群众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方向，革命的集体主义思想，艰苦奋斗的作风。工人群众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在阶级斗争中就会掌握正确方向，在生产斗争中就会坚强有力，在科学实验中就会勇往直前。工人群众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在困难面前就会鼓干劲，想办法，顽强斗争，夺取胜利。

革命精神来自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教育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为了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应当组织工人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根本任务。只有坚持不懈地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工人群众，才能使工人群众紧密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更好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才能使工人群众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中，认清形势，识别方向。

四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为了有效地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必须正确处理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从生产出



发，圍繞着生产进行，以保证完成生产任务为目的。如果不緊密結合生产，厂矿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軟弱无力，不能解决问题。思想和政治是統帅，是灵魂。只要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經濟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①

社会主义的企业要搞好生产，必須做好人的工作。做人的工作，首先就要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做好了，人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他們的智慧和才能。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增强他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企业生产不断发展。厂矿企业如果没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单纯靠“物质刺激”去刺激工人，結果就一定会走向瓦解和涣散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开来。

第二，社会主义教育必須和革命实践相結合。社会主义教育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就会无的放矢，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工人阶级是一个战斗的阶级，社会主义教育正是为了給工人以战斗的武器。实践表明，越是在复杂的斗争中，工人群众也越是迫切需要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教育不能靜止地进行，必須結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在斗争中进行。为斗争而学习，在斗争中学习，这是工人群众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一个特点。为斗争而教育，在斗争中教育，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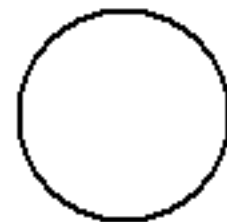
建国以来，我国厂矿企业经历了多次偉大革命斗争的群众运动，工人群众在斗争中充分發揮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又在斗争中得到了鍛炼，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毛澤东同志說：“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②我国工人阶级正是遵循着毛澤东同志的教导，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紧紧結合起来的，把实践和学习紧紧結合起来的。

第三，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要把理論教育和活的思想教育結合起来。党的路綫、方針、政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产物，是毛澤东思想的体现。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根本要求，不仅要使工人懂得这些普遍真理，还要使工人懂得这些普遍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不仅要懂得各个时期党的方針、政策，还要把党的方針、政策变为实际行动。因此，在教育中，要大抓活的思想。所謂抓活思想，就是要深入群众，調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思想傾向，掌握群众的思想規律，然后有的放矢，用党的方針、政策，去回答群众在现实斗争中提出来的問題，去解决群众思想上存在着的实际問題。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需要教材，但是不能只靠教材。教材上讲的道理只有和工人的思想实际相結合，才能为群众所掌握，才不会把大道理变成空道理，才能逐步提高群众的

① 《严重的教訓》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頁。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20頁。



觉悟水平。抓活思想，就要把教育工作和生产结合起来。既要在生产中了解每个人的思想、情绪、性格、特点，也要了解工人的思想状况与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关系，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在社会主义教育中，要把自上而下的启发教育和群众的自我教育结合起来，并且以群众的自我教育为主。群众自我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教育工作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教育要进行得深入，真正解决思想问题，不发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依靠工人群众的自觉性，是不行的。依靠工人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要着重依靠立场坚定、技术熟练的老工人和先进工人。充分发挥老工人的先进作用，用他们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去团结和教育新一代工人。同时通过教育增强老工人的责任感，使他们永远不停止前进，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依靠。

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凡是群众关心的国际国内重大政治问题，不同的认识问题，都应该交给群众去讨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使群众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识别香花和毒草。只有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正确方面的，是讲道理的，才能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好，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提高觉悟，增强团结

的目的。

依靠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还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厂矿企业的文化阵地和宣传工具，必须成为群众教育自己、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在思想领域内和资产阶级以及封建残余作斗争，是很复杂的。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会通过文学、艺术、宗教等，用更深刻、更精致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新一代工人又往往容易受它的感染。因此，进行群众自我教育，不仅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象化的方式，而且要使这些阵地和工具，成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传播新文化的场所。

在群众自我教育中，还应该注意发挥企业干部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嘴说千遍，不如带头实干”。企业干部的实际行动，对工人群众的影响是很大的。企业干部严格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要求自己，工人群众也就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受到具体的教育。

在思想领域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对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是整个社会主义时代的战略任务之一，它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不是十年八年能完成的事情，而是一整个历史时期的事情。我国工人阶级只有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永远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才能通过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才能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最终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論我国社会主义銀行工作的几个問題

段 云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銀行，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銀行的理論，結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經从原則上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須拥有国家銀行，把信貸集中于国家手中。一八七一年，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經驗的时候，曾經着重指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沒有接管和沒收法兰西銀行，他們当时“对法国銀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干犯的敬畏心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錯誤”^①。

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指出了掌握銀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說，大銀行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沒有大銀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②。十月革命过程中和十月革命以后，苏維埃政权把銀行这个工具，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从經濟上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在恢复經濟、克服困难和开始建設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一年，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苏联实行了著名的信用改革，使

社会主义国家銀行的职能更加扩大和完备起来。这次信用改革以后，苏联国家銀行作为全国性的簿記机关，作为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的統計机关，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我国在銀行問題上，不仅有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經驗，有苏联的經驗，而且还有我們自己的革命根据地銀行工作的經驗。在我国革命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以前，我們的革命根据地，很早就已經建立了人民自己的銀行，发行了独立自主的貨幣。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銀行，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支援人民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全国解放的时候，革命队伍是带着人民銀行进城的。进城以后，国家立即責成人民銀行，接管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銀行，并且有步骤地采取适当的方法，在不长的时期內，改造了私营的资本主义銀行。同时，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在农村普遍建立了群众性的信用合作組織。这样，

① 恩格斯：《法兰西內战》的导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0頁。

② 《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7頁。



中国人民銀行作为新中国的国家銀行，巩固地确立起来，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統一的、集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以后，适应經濟建設发展的需要，又先后設立了专业性的中国人民建設銀行和中国农业銀行，分別負責办理有关基本建設和农业方面的业务。这些专业銀行在办理信貨业务、制定信貨計劃时，同中国人民銀行密切联系。这样，就使我国社会主义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

建国十多年来，国家銀行在开国初期統

一 銀行有哪些职能，怎样充分实现这些职能？

資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創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大銀行就是这种前提条件之一。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必須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是，对待資本主义大銀行同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同，它不是被打碎，被简单地廢除，而是作为現成的机关夺取过来，利用它的形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正如列宁所說：“我們可以把它当作現成的机关从資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們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把資本主义丑化这个絕妙的机关的东西斬断”^①。

从資本主义銀行到社会主义銀行，銀行的形式保留着，經濟基础不同了，內容和本质根本变化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銀行建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家政权和生产資料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手中。在这里，沒有私人銀行，也沒有借貨資

一財經、稳定物价和恢复經濟当中，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和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当中，在对国民經济进行調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当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的銀行工作已經积累了不少經驗。可以預料，今后还将在实践当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經驗，进一步更好地发挥銀行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作用。

这里打算結合实践中的一些經驗，討論一下有关我国銀行的职能、銀行工作中的矛盾和怎样发挥銀行监督作用的問題。

本这样的經濟范畴，銀行不是剝削的工具。在这里，銀行資金的活動，不是依靠自发的作用，盲目地进行調节，而是根据国民經济計劃的要求，有組織有計劃地进行的。在这里，銀行不再是凶神恶煞似的大老板，它同各部門、各企业的关系是分工协作的关系，它是人民政府动員和分配資金的一种工具，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設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和为人民造福的一种工具。社会主义銀行在信貨、結算、現金出納和发行貨幣等方面的职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正如列宁所說：社会主义銀行“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了。^②

社会主义銀行具有哪些职能呢？从我国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項：

第一，組織机关、团体、軍隊、企业、事

^{①②} 《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7頁。



业单位和个人暂时闲置的资金，对工业、农业、商业发放短期贷款——它是全国的信贷中心；

第二，办理货币发行，实行现金管理，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它是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关和全国的现金出纳中心；

第三，办理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转账结算——它是全国的结算中心。

同以上三个职能相联系，银行的重要职能还包括：统一管理经营金银外汇；办理国际结算；代理国家财政金库；领导农村金融活动；以及通过信用活动，通过经济情况的分析和反映，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信贷监

督，等等。

以上这些职能，有的在资本主义银行中也存在着。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在许多银行分属于不同资本家和资本家集团的情况下，银行的职能还受着一定的限制。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银行国有化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系统，形成遍布城乡、规模巨大的银行网。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才能成为全国唯一的信贷中心、现金出纳中心和结算中心。这三个中心，是社会主义银行最重要的职能。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取消商业信用，保证银行成为信贷中心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是全国的信贷中心。为了实现这个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一切私人银行，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这是十分重要的，它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仅取消私人银行，仅仅有了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还不能使国家银行成为信贷中心。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彻底取消一切商业信用。

所谓商业信用，通俗的说法就是赊账，就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资本主义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并存，而银行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又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将信用集中于银行，必须用直接的银行信用代替商业信用，禁止任何单位用任何方式进行信用活动。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领导下的计划经

济，社会主义生产是统一计划指导下的生产。银行贷多少款给工厂商店，就等于在按期偿还的条件下，让这些工厂商店取得数量相当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为了有计划地使用资金，也就是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国家必须把信贷工作集中到银行这样的机构里来，才能使信贷的活动同生产的计划活动相适应。信贷工作的集中性和计划性，信贷资金使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假使允许相互拖欠这种自发的信用形式存在，假使一个企业为了购买商品，可以不向银行贷款，而直接从另一个企业赊购，变相地取得贷款，假使企业到处可以取得贷款，银行怎样能成为信贷中心呢？商业信用也是对资金和物资的一种分配形式，不过它是脱离计划、



脱离监督的盲目分配。无产阶级在实现了银行国有化以后，要使银行成为全国的信贷中心，必须坚决取消商业信用。

没收和改造私人银行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胜利地改造了私人银行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阶级敌人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对银行这样一个重要阵地会进行各种扰乱和破坏。对于这方面的阶级斗争，还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取消商业信用则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信贷的计划性同传统的习惯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尽管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它带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建设社会主义，人们都希望快一些，资金和物资不足，可能想去赊

购一些物资来用。对农业的支援，人们都希望多一些，看到自己这里有物资而公社和生产队资金不足，可能想去赊销一些，让他们先用货，后付款，或者先预付给一些货款，让他们先拿钱，后交货。有些国营企业，资金一时周转不灵，而贷款已经超过限额的时候，也可能想向其他企业赊些货，欠些钱，“通融一下”。所有这些，都会使商业信用重新出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充分地发挥它作为信贷中心的职能是不利的。因此，必须通过经常的思想教育，通过对各部门生产的不断协调，通过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同盲目的商业信用作斗争。当然，某些经过批准列入国家计划的赊销、预付和预购定金，仍然是允许的，这在实质上同无计划的商业信用是不同的。

严格实行现金管理，保证银行成为现金出纳中心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是全国的现金出纳中心。首先，国家银行作为唯一的货币发行机关，负责办理国家货币的发行。同时，国家为了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还责成银行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

国家现金管理的规定，主要内容有这样三条：第一，一切机关、团体、军队、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货币收入中，暂时闲置不用的部分，必须随时存入国家银行，本单位手头保存的现金，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这样一来，就用国家法令保证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暂时闲置的资金，集中于国家银行。第二，各单位提取和使用现金，必须严格限于国家规定的范围，企业间大宗的交易往

来，只能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结算，不能使用现金。只有对职工个人发放工资，向农村收购农副产品等必要支付现金的部分，才能使用现金。银行还受国家委托，按照国家计划对工资基金实行监督。这样一来，就使银行可以了解和监督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的现金支付，为现金出纳的计划化提供条件。第三，现金收付款额较大的单位，都应当按照国家批准的现金计划办事。各地区、各部门把现金收支计划同生产计划、商品流通计划紧密结合起来，以保证投放和回笼计划的实现。这样一来，就使国家银行能够通过现金收支计划，自觉地调节货币流通。所有这些都是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



民經濟計劃化为基础的，都是按照国家計劃和国家法令有組織地进行的。在資本主义社会，若干个壟断性的大銀行也集中着大量的現金活动，許多企业和单位也把現金存入銀行，但是，沒有一个銀行能够成为全国性的唯一的現金出納中心。在生产資料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全面实行現金管理和有計劃地調节貨幣流通，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現金的計劃管理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現金活动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的現金活动，在計劃管理的程度上，要有所区别。对于全民所有制的单位，可以要求他們严格执行；对于

集体所有制的单位，特别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就要具有适当的灵活性。至于居民个人，就只能按照自願的原則，动员他們参加儲蓄，而不能实行强制的現金管理办法。就是对于全民所有制的单位來說，要求它們把多余的現金随时存入銀行，把大宗交易由銀行实行轉賬結算，这两条比較容易，而要做到現金收支的計劃化，却不很容易。国民經济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某些不平衡的现象，生产和流通任何环节上的不平衡，都会程度不同地反映到現金收支上面来，必須自觉地主动地及时加以調节。結合市場的安排，結合整个經济工作，从各方面不断加强現金收支的計劃性，是各地区各部門一項重要的任务。

严格执行結算紀律，保证銀行成为結算中心

社会主义国家銀行是全国的結算中心。它統一組織和經办国民經济各部門各单位之間的轉賬結算。一切机关、团体、軍隊、企业、事业单位之間的經济往来，除了按照国家規定允許使用現金的部分以外，都必須通过国家銀行，办理轉賬結算。国家銀行按照双方訂立的合同，进行监督，保证及时付款，錢貨两清，保证在物資轉移的同时，完成資金的轉移。大宗交易几乎全部通过銀行办理轉賬結算，这样就使銀行能够全面地了解物資流动的方向和数量，了解資金流动的方向和目的，了解企业的經济活动和财务狀況，使国家有可能通过銀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同时，由国家銀行集中地办理轉

賬結算，还可以减少流通中的現金，可以保护交易双方正当的权益，維護結算紀律。我国已經建立了全国性的結算网，目前通过銀行收付的經济往来，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通过轉賬結算的，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部分使用現金。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在資本主义条件下，銀行也办理轉賬結算，但是它的結算业务很不稳定，在有些情况下，提存用現的现象会突然增加，它不可能像社会主义銀行这样有全国規模的統一的結算网，它的結算业务不可能像社会主义銀行这样全面广泛。

社会主义的計劃經济，为国家銀行集中办理結算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要使每



一笔經濟往来都做到錢貨两清，互不拖欠，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問題。必須防止某些单位在国家計劃以外，增加基本建設訂貨，增加机器設備和建筑材料訂貨，以免資金来源沒有保证，到期无法付款，形成拖欠。必須进一步改善企业的經營管理，保证执行合同規定的义务。还必须对供貨单位与购貨单位之間，有关貨物的規格、质量和作价方面的某些爭議，及时給予恰当的处理。在这里，強調按計劃办事，按合同办事，指定或設置經濟仲裁机关，按照結算紀律，对某些单位实行經濟制裁，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社会主义銀行作为信貸中心、現金出納中心和結算中心，这三方面的职能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只

有把一切信用活动集中于国家銀行，用銀行的直接信用代替商业信用，才便于現金管理和有計劃地調节貨幣流通，才便于全面地办理轉賬結算。只有实行严格的現金管理，把国民經济各部門暫時閑置的資金，集中在銀行手里，并且由銀行集中办理轉賬結算，才能使銀行有更多的資金可以运用，更好地發揮銀行作为信貸中心的作用。銀行的各种职能，圍繞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有計劃地動員和分配暫時閑置的資金，并且使国家能够通过銀行这个“公共簿記”机关，全面地及时地了解 and 監督国民經济各部門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銀行的这些职能和作用，是其他机构其他手段所不能代替的。

二 銀行工作中有哪些矛盾，怎样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資本主义銀行的活动，促进和刺激了資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資本主义各种固有的对抗性矛盾。資本主义的信用，一方面加强了生产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又加强了資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使社会財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在資本主义社会，金融資本的各个集团之間，金融資本同产业資本之間，存在着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些矛盾，在資本主义制度下面，根本不可能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銳，越来越深刻。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建立了，少数壟断者私有的銀行收归全民所有了，資本主义銀行原有的矛盾也随着消

除了。在这里，全国統一的社会主义銀行，代替了分屬於各个金融資本家和金融資本集团的資本主义銀行；金融部門同产业部門的相互协作相互支持，代替了金融資本同产业資本的相互斗争相互傾軋；有計劃的信用活动，代替了无政府状态的自发的信用活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銀行工作中是否沒有任何矛盾了呢？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还存在着階級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另一方面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往往发生需要与可能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反映在国家財政上，同时也反映在銀行信貸上。由于信貸活动和



信貸資金管理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說，銀行信貸工作中处理需要与可能的矛盾，更为复杂一些。在社会主义生产建設的发展中，国民經济各部門需要多少資金，銀行可能供应多少資金，如何正确地处理

需要与可能之間的矛盾，用有限的資金，合理地滿足各方面的需要，以利于国民經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以利于多快好省方針的实现，这是社会主义銀行工作中的根本問題。

資金需要与可能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两个方面：

銀行同企业的矛盾和銀行同財政的矛盾

在我国銀行和企业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銀行信貸同企业的經济活动，都要按照国家的統一計劃办事，都为着社会主义經济的发展而工作。因此，从根本上說，銀行同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利害是相通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上，銀行和企业也有着一些矛盾。一个經济部門，一个企业单位，总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資金，来扩大生产，扩大流通。在財政投資不能滿足要求的时候，个别单位就可能要把自有的流动資金和从銀行借入的資金，挪用于基本建設或者其他非周轉性的开支，然后又向銀行要求增加貸款。个别企业在供、产、銷不銜接、成本过高、产品积压、資金周轉不灵的时候，也可能要銀行在計劃以外增加貸款。这些企业都是全民所有的，都担負着国家計劃規定的一定的生产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企业的同志往往认为“反正国家銀行不能眼看着我們无法进行生产，不給予貸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貸款給他們，就要过多地占用国家的資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国家資金供应的可能，影响信貸收支的平衡和正常的貨幣流通。这是在現

实生活中有时会碰到的一个問題。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財政和銀行是国家动員和分配資金的两个渠道、两种形式。根据資金运用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用途，国家將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綜合加以安排，应由財政撥的財政撥，应由銀行貸的銀行貸。这样做，对資金的合理使用和節約使用，有很大的好处。

銀行同財政都是为生产建設事业的发展服务的，像上面所說，銀行同企业一样，它們的目标是一致的，任务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分工的不同，在銀行同財政的工作关系上，也有着一些矛盾。財政和信貸两个渠道，一般說，財政收支，計劃的彈性較小，財政一收一支都是不返还的，比較容易控制；銀行信貸，計劃的彈性較大，信貸有存有取，有貸有还，都是要返还的，不容易控制。財政是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各級預算，逐級負責，如果发生支大于收的情况，大家容易注意；銀行信貸則比財政更集中，更需要全国的統一調度，有些地方对于信貸收支往往不像对于財政預算那么关心，信貸发生支大于收，



不像財政那樣容易引起注意。由于以上一些原因，用錢單位從財政拿不到錢，往往要去找銀行，容易把一些本來應當由財政開支的錢，轉過來擠占銀行的貸款，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常常發生一些矛盾。此外，銀行信貸資金的來源，除了銀行自己吸收的存款和按照流通需要發行的適量的貨幣以外，還需要由國家財政撥付一部分信貸資金，或者由財政在銀行保留一定數量的結余存款。在信貸資金撥付多少的問題上，在財政結余是否動用的問題上，財政和銀行也存在著一定的矛盾。

銀行同企業的矛盾，銀行同財政的矛盾，都反映了國家資金需要與可能之間的矛盾。銀行工作的許多章程、規則、制度，主要都是為了正確處理這些矛盾而製定的。

社會主義銀行工作有這樣一些矛盾，并

不是一件奇怪的事。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對立統一的規律是宇宙的普遍規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不過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不同。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一書中指出：“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存在著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於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就有必要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幹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並且懂得採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①

處理銀行同企業的關係，必須堅持信貸的三原則

處理銀行同企業的關係，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堅持信貸的三項原則，即：（一）按計劃發放和使用的原則，（二）有物資保證的原則，（三）按期歸還的原則。這三條原則，看起來是簡單的幾句話，卻有著豐富的內容和重大的意義。

按計劃發放和使用貸款，這是社會主義信貸區別於資本主義信貸的重要特點。企業需要多少貸款，國家可能供應多少貸款，要由國家計劃來規定。就是說，需要與可能的矛盾，統一於計劃之中，由計劃來調節。銀行按計劃發放貸款，使用單位按計劃使用貸款，實際上是有計劃地使用人力物力，從而

最大限度地節約人力物力。銀行對企業所提出的貸款需要，計劃內的，應當積極支持；計劃外的，必須嚴格控制。在實際工作中，任何不重視計劃，不堅持計劃，或者強調困難，不按期編報計劃等做法，都是不對的。信貸計劃在執行當中，有時由於情況變化和其他原因，不能不有所變動。因此計劃本身要有適當的機動，銀行要直接掌握一部分預備指標，各地區、各部門也要酌留一部分周轉指標，作為機動。基層單位在計劃以外，遇有臨時需要，可以報請追加。信貸計劃既

^①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頁。



要有严肃性，又要有灵活性。当然，这种灵活只能是制度以内的灵活，不能在制度以外，任意去灵活。

貸款必須具有直接的物資保证，这是社会主义信貸的另一个特点。銀行貸款是用于企业临时性和季节性的周轉需要的。企业必須把貸款用来购买計劃規定的原料、材料，购买物資，才能够在产品制成和物資銷售以后，归还銀行貸款。这就是：取得貸款，购买物資；卖了物資，归还貸款。如此周轉不息，資金的运动同物資的运动相适应。如果貸款不用于购买物資，而用于其他方面，那么，这笔貸款就会被消耗，就会无法按期归还，保持正常周轉。所謂物資保证，不是說可以用随便什么物資作保证，而是要按計劃购买物資，也就是要按計劃使用貸款。有物資保证的原則同按計劃貸放和使用的原則，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

貸款必須按期归还，这是一切信貸活动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原則。“欠債还錢”这个規矩，在資本主义社会为資產階級利益服务，为維護資本主义私有制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人民利益服务，为維護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按期归还这件事，看起来似乎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在資本主义社会，生产是无政府状态的，信用活动是盲目的自发的，因此，借了錢不能按期归还的現象，必然会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流通是按計劃进行的，信用活动也是按計劃进行的，这就使償还原則的实现有了客观的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个原則，要保证貸款能够按期归

还，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还要經過主观上的努力。

从一个企业來說，貸到款項不仅要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資，而且要完成生产計劃和銷售計劃，完成成本計劃和利潤計劃，要取得預期的銷貨进款，才能有錢上繳稅收和利潤，有錢归还銀行貸款。从整个国民經济計劃的安排和执行來說，必須使供、产、銷相互銜接，使各部門各企业的經济活动协调地进行，必須及时調整可能出現的某些不平衡現象。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在供、产、銷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不协调，其結果都可能影响銀行貸款的按期归还。良好的經營管理和恰当的計劃安排，是实现償还原則的基础。反过来，坚持償还原則，对于促进經營管理和改进計劃安排，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认为銀行和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貸款还不还，迟还或者早还，反正“肉烂在鍋里”的思想是錯誤的。

不按期归还銀行貸款，这在經济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国家計劃以外，多占用一部分資金和物資，使这些資金和物資不能正常周轉，因而减少增加生产的可能性；它意味着占用一部分可以投入建設的資金和物資，影响建設的速度；它意味着减少一部分可以投入市場的商品，影响市場的供应和貨幣的回籠。不管主观上是否意識到这一点，客观上必然产生这样的結果。貸款必須按期归还，这是銀行信貸的基本紀律。不能按期归还的，銀行不貸款；超过归还期限的，銀行有权扣收貸款，有权促使企业处理积



压，归还貸款。国家所以把这种权力赋予銀行，是为了促使企业兢兢业业，认真加强經濟核算，不断改善經營管理。

計划性、物資保证性和偿还性，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坚持这三項原則，是

正确处理銀行同企业关系的基本准則。坚持这三項原則，对生产和流通來說，既有促进，又有制約，既有服务，又有监督。而制約和监督，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更好地服务。

处理銀行同財政的关系必須坚持分口管理、綜合平衡的原則

既要分口管理，又要綜合平衡，这个原則是人們所熟知的，問題在于怎样分口管理，怎样綜合平衡，具体的政策界限是什么。

分口管理是綜合平衡的基础。实践的經驗证明，分口管理的基本界限是：无偿的归財政，有償的归銀行，长期占用的归財政，短期周轉的归銀行，桥归桥，路归路。信貸資金和財政資金所以必須分口管理，是因为銀行信貸和財政收支不同。財政收支是无偿的，收进来和支出去，都不再归还（只有公債是例外）。銀行信貸是有償的，存款要提取，貸款要归还，而且存款和貸款都有一定的利息。所有一切非偿还性开支，只能使用財政資金，按財政制度办事；所有长期占用的資金，也只能由財政撥款解决，决不能挪用銀行貸款。有償和无偿，长期和短期，这是分口管理的基本界限。国家规定，銀行貸款不准用于財政性开支，不准用于基本建設，不准用于弥补企业亏损，不准用于发放工資，不准用于繳納利潤，不准用于职工福利和“四項費用”（企业技术措施費、新产品試制費、劳动保护費、零星固定資產购置費），等等。如果这些規定执行不坚决，口子把得不严，結果就会把有償变成无偿，把短期变成长期，就会变相地扩大財政开支，把本来平衡的資金計划，在实际上变成不平衡。

而且正因为这种不平衡具有着隱蔽的形式，往往不容易为人们所察觉和重視，因而更加需要注意防止。

綜合平衡的問題，实际上主要是国家財政撥出多少企业自有資金，撥出多少銀行信貸基金，以及如何恰当处理上年財政結余的問題。

企业自有流动資金是企业常年占用最低需要的流动資金，是一年到头都要占用的資金。这部分資金应当由国家財政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上，撥給企业使用。企业自有資金撥多了，影响国家其他方面的开支；企业自有資金撥得不足，势必增加对借入資金的需要，多占用銀行貸款。而多占用的銀行貸款，因为要常年占用，又势必不能按期归还。这样对于銀行信貸的偿还原則的实现，就会发生不利的影響。

銀行信貸資金的来源，主要依靠吸收机关、团体、企业等各方面的存款，依靠吸收城乡居民的儲蓄，以及商品流通所必要的正常范围以內的貨幣发行；同时銀行也需要有一部分自有的信貸基金，这部分信貸基金要靠国家財政撥款和銀行本身的积累来形成。社会主义国家銀行一般是发放短期的临时周轉性的貸款，但是，也有一部分貸款实际上被长期占用着。比如，一部分用于商业最低



周轉庫存的貸款，一部分用于購買耕牛、車船等設備性質的農業貸款等。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光憑自己的資金來源是不能滿足所有貸款的需要的。社會主義銀行不能簡單地量入為出，它必須適應生產和流通擴大的需要，適應國家通過信貸方式監督資金活動的需要。銀行每年安排信貸計劃的時候，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之間，常常有一個差額，這個差額需要由國家財政撥款來補足，這是財政與信貸平衡的一個重要條件。

各級財政的上年結余，按照財政體制的規定，各級政府是有權動用的。但是這些結余存在銀行，一般說已經由銀行作為信貸資金貸放出去了。財政動用上年結余，除了物資庫存多、信貸收入大於支出的情況以外，一般說，在計算國家財政增撥銀行信貸資金的時候，要考慮這個因素，給予必要的安排，以保證信貸收支的平衡，保證不因此而增加貨幣發行。

撥給企業自有資金、撥給銀行信貸基金和恰當地處理財政上年結余，歸根到底都圍繞着一個問題，即國家如何分配資金的問題。國家資金中，多少用於基本建設、多少用於生產和流通。這是一個有關國家建設方針的重大問題，是一個有關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重大問題。基本建設是擴大再生產的主要途徑，不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大規模的基本建設，要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是不可能的。本來有條件搞得快的事情搞得慢了，有可能做到的事情沒有做到，這是不對的。反過來，國家財政資金除了考慮基本建設的需要以

外，同時還要考慮流動資金的需要。這是因為，企業有了廠房和機器，還需要購買原料、材料和燃料，需要支付工資，這方面也應當由國家財政拿一定的錢，不能完全依靠向銀行借款；國家銀行辦理存放款業務，也應當有一定的自有的資金。一句話，國家固定資產同流動資金有一定的比例關係，生產規模、商品流轉規模同流動資金有一定的比例關係。流動資金過多了，是浪費；過少了，也不行。

資金是物資的反映。物資分配的原則應當是：生產和基建通盤考慮，統籌安排，保證了生產，再安排基建，保證了簡單再生產，再安排擴大再生產。資金的分配，基本上也應當按照這樣的原則辦事。即是，生產流通所必需的流動資金和基本建設所必需的投資，應當統籌兼顧，統一安排。需要增撥的企業自有流動資金，需要增撥的銀行信貸基金，必須在年初列入計劃和預算，上年結余是否動用，動用多少，也應當有妥善的安排。年度預算可能不完全準確，這一年這方面安排得少一點，下一年應當多一點；反過來，這一年安排得多一點，下一年少一點也可以。當然應當避免過大的起伏。

我們決不是說，銀行可以完全依賴財政，可以不注意組織存款和儲蓄，不注意貸款的嚴格控制和合理使用。也不是說，財政結余根本不能動用。銀行必須積極地組織存款，組織儲蓄，節約地運用資金，必須加強信貸管理，促進企業和企業主管部門切實改善經營，協調計劃，清理倉庫，對不合理的資金占用加以壓縮。資金既然是物資的反映，財政有結余，就說明國家增加了一部分周轉庫存和物資儲備。這些物資以流動資金的形



式，占用着国家的资金。动用一部分上年结余，也就意味着把积存未用的物资，拿出一部分来用于建设。只要不影响商品物资的正常周转和国家必要的后备，就应当动用这些结余。听任流动资金过多的占用，让物资积存过多，不去适当地安排使用，同样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总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财政和银行必须既统一，又分工，既综合，又分口。必须是分口管理基础上的综合平衡，综合平衡指导下的分口管理。

银行同企业的矛盾，银行同财政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矛盾不能掩盖，它是客观存在的。银行、企业、财政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他们的目标是统一的，他

们互相促进，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他们之间为了坚持计划，坚持制度，为了发展生产，扩大流通，有时发生的某种争议，也就是相互制约的表现形式。只要这种争议是从工作出发的，只要是实事求是的，讲道理的，而又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么，这种争议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银行、财政、企业和所有各经济部门，大家有着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任务，一切争议都可以通过协商而达到一致，一切矛盾都可以得到正确的处理。处理解决这些矛盾，正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更好地协同一致，以便把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推动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

三 为什么说银行是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怎样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银行已经具有了“公共簿记”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形式，它在内容上是私有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银行就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成为全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私人银行。规模巨大、遍布城乡而又集中统一的国家银行，成为全国唯一的信贷中心、结算中心、现金出纳中心和货币发行机关。全国一切信用活动、交易结算、现金收支都集中在国家银行来办理。在银行的账簿上，反映着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各单位的生产、采购、销售、储备等方面的经济活动。

实现计划管理，把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各方面的经济活动能够合拍地有节奏地协调地进行，需要有許多监督经济活动的工具，需要有各种观察经济情况的“仪表”。银行就是一种重要的监督工具，一种重要的“仪表”。银行这个“仪表”是通过资金活动，即价值形式来反映情况的。它的特点是：灵敏，及时，比较全面，比较准确。有关货币、信贷、现金出纳的一些数字，可以按日得到报告。生产和消费的消长，市场供求的变化，可以从银行货币流通量和其他有关的报表中，立竿见影地反映出来。银行不仅反映信贷资金活动的情况，而且由于它办理全国

四



的交易結算，管理全国的現金，代理財政金庫，所以也反映全国絕大部分資金和物資的运动，反映財政收入和支出的情况。銀行的数字比較准确，是因为錢过了手，才能登賬。企业經營是好是坏，可以从銀行的信貸表上是否按期归还貸款、是否多占用資金等等材料反映出来。企业是否执行了国家的劳动計劃，可以从銀行的工資基金报表上是否超支了工資的材料中反映出来。当然，銀行这个“仪表”也有它的局限性，它只是通过价值形态来反映問題，实物形态和活劳动形态不能从这里直接反映出来。銀行不能反映問題的一切方面，往往也不能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問題，但是至少可以从这里发现問題，提出問題，帮助人們去研究和解决問題。

有了銀行这样的“仪表”，还要大家重視它，善于运用它。运用銀行来了解和監督經濟生活的重要性，列宁早就指出过了。他說：“只有实行銀行国有化，才能使国家知道几百万以至几十亿卢布往来流动的去向，以及这种流动是怎样发生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才能真正地而不是在口头上做好对全部經濟生活的監督，做好对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監督，才能做到‘調节經濟生活’”^①。在經濟生活中，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也給予生产以重大的影响。生产是本，是源，但抓住分配，抓住銀行这个环节，可以追本溯源，給生产以强有力的推动。銀行是各級党政机关领导經濟工作的一个亲近助手和參謀机构，情况的变化，征候的出現，可以从銀行这里及时地察觉出来。各級领导机关要加强对銀行的政治领导，领导和監督当

地銀行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有关方針和政策，保证总行下达的各项計劃的实现和規章制度的执行。在我国，已經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强大的銀行网，城市和乡村，凡是有相当的經濟活动的地方，都有銀行的分支机构，几十万人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里，观察、登記和計算，他們的作用是应当充分发挥的。

当然，从銀行本身來說，为了做好工作，更好地发挥自已的作用，为国民經济的发展服务，也必须使自己站在各部門、各企业事业单位之中，設身处地，考虑問題，而不能只是站在它們之外，指手划脚。銀行監督，必須从确实解决問題的原則出发，必須注意实事求是，很好地傾听有关方面的意見。監督者自己要受監督。銀行也必须接受別人的監督，吸收一切合理的意見，同各部門一起，互相幫助，互相鞭策，不断地改进工作，提高工作质量。

毛主席告訴我們：“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学习”^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充分运用銀行，正确发挥銀行的作用，还是一个有待深入学习的課題。通过十几年的实践，我們的銀行工作已經积累了若干經驗，但还必须繼續学习，研究和討論已有的經驗。这是需要各部門、各方面的有关同志共同研究、共同探討的。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初步看法，作为大家研究銀行問題的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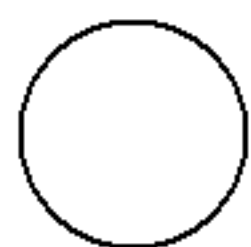
①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1頁。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71頁。



红旗

HONGQI



2-3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二、三期合刊 ★

目 录

毛澤东主席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談話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馬人民的爱国

正义斗争.....(2)

毛澤东主席就最近日本反美大示威发表談話

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偉大的爱国斗争.....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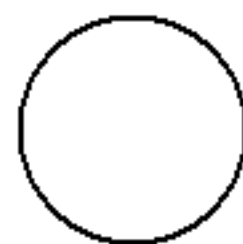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杂志編輯部 (6)

历史的回顾 (7)

經驗和教訓 (10)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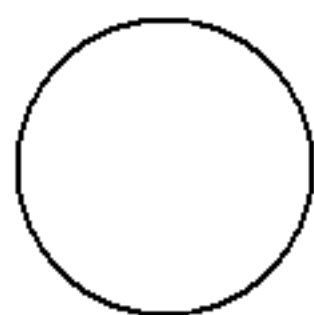
駁所謂“反苏”	(17)
駁所謂“爭夺領導权”	(19)
駁所謂“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	(22)
駁所謂“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24)
目前的公开論战	(27)
維護和加強团結的道路	(31)

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重讀《論共产党員的修养》	赵 汉 (33)
論我国农业的集約經營問題	赵天福 (46)
提倡現代剧	何 明 (58)
現代剧与艺术趣味	王朝聞 (61)
把美国侵略者从巴拿馬赶出去	沙 丁 (65)
战后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貨币斗争	項 冲 (71)

☆ 二 月 四 日 出 版 ☆





毛澤东主席

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談話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馬人民的 爱国正义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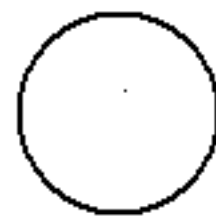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澤东同志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就巴拿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斗争，对《人民日报》記者发表談話如下：

目前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偉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們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鮮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



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毛澤东主席

就最近日本反美大示威发表談話

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

偉大的爱国斗争

毛澤东主席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晚接見正在我国訪問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貿易促进会理事长鈴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駐京記者高野好久。

接見时，毛澤东主席就最近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正义斗争发表談話如下：

“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偉大的爱国运动。我謹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規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潛艇进駐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軍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領土冲绳，要求廢除日美‘安全条約’



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地方滚出去！”

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接见时在座的有康生、廖承志和吴冷西。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七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没有受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威胁。在国际范围内，在一些党的内部，都存在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

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是摆在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共产党一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 and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苏共领导自从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以后，一直表白他们也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最近期间，他们特别起劲地叫喊“团结”。这使人想起了九十年前恩格斯说过的话。恩格斯说，“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分裂的罪魁”。“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喊团结”。（《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三页。）

苏共领导在标榜“团结”的同时，企图把“分裂主义”的帽子戴在中国共产党头上。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说，“中国领导人不仅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且破坏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践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粗暴地违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在这以后，苏联



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一直谴责中国共产党人是“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究竟是誰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誰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誰踐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誰粗暴地違反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呢？一句话，究竟誰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分裂主义者呢？

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能够找到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道路，才能够克服分裂的危险。

历史的回顾

为了弄清楚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正确地进行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不妨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中，貫穿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貫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一国范围内是这样，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在长期的斗争中，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論上闡明了无产阶级团结的真諦，并且以他們的实际行动树立了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光辉范例。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創立了最初的国际工人組織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这个同盟所写的綱領《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并且系統地、透彻地闡明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說，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基础。

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国际无产阶级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联合各国工人运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六四年創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在第一国际存在的整个时期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同巴枯宁派、普魯东派、布朗基派、拉薩尔派以及其他派别，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其中，同分裂主义者巴枯宁派的斗争特别激烈。

巴枯宁派从一开始就攻击馬克思的学說，指責馬克思想“使自己特殊的綱領、自己个人的学說在国际中占統治地位”。实际上，正是他們企图强迫国际接受他們的宗派信条，以巴枯宁的机会主义綱領代替国际的綱領。他們施展一系列阴谋，不擇手段地拼湊自己的“多数”，进行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对于巴枯宁派分裂第一国际的公开挑战，采取了原则上毫不妥协的态度。一八七二年，在馬克思亲自参加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坚持分裂主义的巴枯宁派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恩格斯曾經說过，如果馬克思主义者在海牙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采取无原则的調和态度，那就必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造成严重的后果。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



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四页。）

第一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反对了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一八七六年第一国际宣布结束以后，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着这些政党的建立和发展，希望它们能够在科学的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工人政党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关怀。他们曾经多次尖锐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谋求所谓“团结”而同机会主义妥协的腐败风气。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原则，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哥达纲领》。马克思指出，合并是“用太高的代价换来的”，“这个纲领完全要不得，它会使党遭到瓦解”。（《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恩格斯指出，这是“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派的投降”。他说：“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四十二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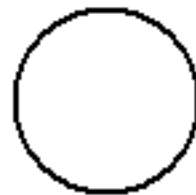
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的时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的著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一十四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活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这是“糟蹋党和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给德国党的领导人的《通告信》中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四十三、三百六十三、三百六十二页。）

一八八九年，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第二国际成立了。第二国际处在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共产党宣言》成为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把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变成合法主义，使得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泛滥起来。

因此，在第二国际的整个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分成了两大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派。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特别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恩格斯说，对于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



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百八十二頁。）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以后，这些“跳蚤”們就出来公开地、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义，并且逐渐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

偉大的列宁，在恩格斯之后，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卓越的革命家，肩負起捍卫馬克思主义、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重担。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們叫喊馬克思主义已經“不完备”和“过时了”的时候，列宁庄严地宣告：“我們完全站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理論，才能把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列宁：《我們的綱領》，《列宁全集》第四卷，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頁。）

列宁首先为在俄国建立一个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党，列宁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部的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派別，进行了不調和的斗争。

在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內，正如第二国际其他党一样，存在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革命派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維克，机会主义派就是孟什維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維克，为了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純洁和統一，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同孟什維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在一九一二年把坚持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孟什維克清除出党。

所有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派別，都用最恶毒的語言咒罵列宁。他們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分裂主义的罪名加到列宁头上。当时，托洛茨基糾合所有反对列宁的派別，打着“非派別性”的旗号，放肆地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咒罵列宁是“篡夺者”和“分裂者”。列宁回答說：标榜“非派別性”的托洛茨基，恰恰是“最坏的派別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恰恰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列宁：《論高喊統一而实际破坏統一的行为》，《“八月”联盟的瓦解》，《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二十六、一百五十四頁。）

列宁明确地表示：“統一，这是偉大的事业和偉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馬克思主义者的統一，而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馬克思主义的人的統一。”（列宁：《統一》，《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百二十六頁。）

列宁反对孟什維克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孟什維主义，就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形式和变种，并且受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領袖們的支持。

列宁在反对孟什維克的同时，也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并且出席了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會議和哥本哈根會議，同他們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他们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造成国际无产阶级最严重的分裂。正像卢森堡所说：修正主义者把“从前的自豪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在战场上变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自相残杀！’”。（罗莎·卢森堡：《演讲论文集》第二卷，一九五一年柏林版，第五百三十四页。）

那时，在第二国际中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党，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正是这个党，首先站在德国帝国主义方面，成为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祸首。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列宁挺身而出，为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而坚决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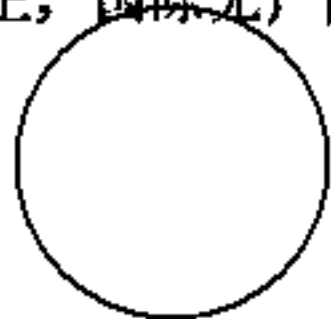
列宁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发表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中，宣布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且严厉地谴责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们，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

针对着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由同资产阶级秘密联盟变成公开联盟，针对着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业已造成的不可挽回的分裂局势，列宁指出，“现在，不坚决同机会主义决裂，不向群众说明机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可能实现工人的真正国际主义的团结”。（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十五页。）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坚决地支持欧洲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决裂，勇敢地号召建立第三国际，代替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以便重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了。第三国际继承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經驗和教訓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这种或那种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裂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也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巩固和加强起来的。



恩格斯曾經說過，“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以彼此进行生死斗争的各种不同党派的形式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百一十五页。）

事实正是这样，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这些本来是统一的事物，都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每一次国际范围内反对机会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都把国际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都使国际工人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巩固和扩大的团结。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就是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

团结，经过斗争甚至分裂，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

不论在国际范围内，或者在一个国家中，哪里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盛行起来，那里的无产阶级队伍就必然产生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每一次分裂，总是由于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反对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引起的。

什么是分裂主义呢？

分裂主义就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谁要是反对和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谁要是坚持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为资产阶级改良党，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分裂主义就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谁要是实行违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根本利益的纲领和路线，谁就是分裂主义者。

列宁说过：“哪里大多数觉悟工人在明确的决议指导下团结起来了，那里就有统一的意见和行动”，而机会主义者“就其最无耻地违背大多数工人意志这一点来说，恰恰就是分裂主义”。（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百三十三、三百三十五页。）

分裂主义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分裂无产阶级的团结，为资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就是要分裂无产阶级。他们分裂无产阶级的最恶毒的手法，就是在无产阶级队伍内购买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正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追求的不是



团结无产阶级去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在帝国主义最害怕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时候，出来分裂国际工人运动，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

在共产主义队伍中，谁要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闹分裂，向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闹分裂，向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闹分裂，那么，即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多数地位，甚至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也还是分裂主义者。

在第二国际时期，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处于多数地位，而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分裂主义者显然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派，而不是列宁的革命派。

一九〇四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虽然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仍然是分裂主义者。当时，列宁指出：“中央机构（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与党决裂”，“中央机构已自外于党。谁拥护中央机构，谁拥护党？中间立场是没有的”。（列宁：《给布尔什维克苏黎世小组的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四十五、四十六页。）

总之，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分裂主义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的表现。可以说，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修正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最可恶的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还表明，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坚持团结的斗争是同坚持原则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团结，是阶级的团结，革命的团结，反对共同敌人的团结，为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而斗争的团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国际无产阶级有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

只有坚持原则，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团结。放弃原则，同机会主义者同流合污，这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像列宁所说的，“意味着无产阶级同本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味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分裂，意味着走狗的统一和革命者的分裂”。（列宁：《法国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三十四页。）

列宁还指出，受资产阶级贿赂和扶植的机会主义流派，“在没有被‘消灭’即被推翻以前，在它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影响没有被清除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正像资产阶级在未被推翻以前不会死亡一样”。因此，“要同机会主义流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同上）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挑战，绝不能作原则的让步，只有同他们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极其宝贵的遗训，也是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近年来的事实表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们提出了一条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硬要把这样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强加于各国兄弟党，代替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两次兄弟党会议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抵抗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谁就受到苏共领导的打击。

正是苏共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一手制造了目前的严重的分裂危险。

苏共领导根本不是致力于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把一个好好的社会主义阵营搞得个乱糟糟。

他们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他们任意损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力图从各个方面控制兄弟国家。

他们假借所谓“国际分工”的名义，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苏共领导推行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的、经济的以至军事的压力。

苏共领导公开地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悍然地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了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

苏共领导违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片面地决定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三百四十三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贸易方面对中国实行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他们挑起中苏边境事件，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赫鲁晓夫甚至不止一次地对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表示，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党分子是他的“好朋友”。他赞扬中国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说什么这是“有足够的勇气”的行动。

所有这些恶化国家关系的严重步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苏共领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采取了这种骇人听闻的极端手段。苏共领导居然还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试问：你们的这些行为，难道有一丝一毫国际主义的气味吗？

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同样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方面。

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假借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力图按照他们的意志改变其他兄弟党的领导。直到最近，他们仍然坚持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作为恢复团结的条件，作为“每个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原则”。^①

苏共领导违反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无视兄弟党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把兄弟党关系变成“父子党”关系。赫鲁晓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党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②他沉醉于这种封建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苏共领导根本不把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放在眼里，从来就习惯于独断专行，发号施令。他们任意撕毁兄弟党的共同协议，擅自对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强迫兄弟党接受既成事实。

苏共领导破坏兄弟党通过内部协商解决分歧的原则，首先利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接着又利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

苏共领导把兄弟党当作他们的外交棋盘上的小卒。赫鲁晓夫反复无常，朝三暮四，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但硬要兄弟党跟着他的调子转来转去，不知所从，不知所向。

苏共领导在许多共产党内部煽风点火，支持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者攻击党的领导，或者篡夺领导地位，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些兄弟党内制造分裂。正是由于苏共领导的这种分裂主义政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出现了组织上的分裂。

苏共领导还把兄弟党的联合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变成为推行修正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工具体，违反杂志创刊会议的协议，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

苏共领导还把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力图改变国际民主组织的正确路线，在这些组织中制造分裂。

^① 苏联《真理报》1963年12月6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② 赫鲁晓夫1962年4月20日同美国《展望》杂志发行人考耳斯的谈话，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苏共领导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他们把本来应当对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矛头，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

苏共领导一心一意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把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当作最可靠的朋友，而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当作敌人。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叛徒铁托集团以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合伙反对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

当苏共领导自以为从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抓到一根似乎是救命草的时候，自以为处境顺利的时候，他们就得意忘形，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妄想拿兄弟党、兄弟国家当作他们同美帝国主义做政治买卖的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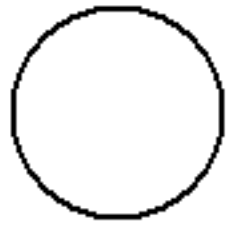
当苏共领导的错误政策碰壁的时候，当他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们又恼羞成怒，大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罪羊。

从以上一系列的事实，可以看到，苏共领导违反苏联人民的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违反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走上了彻底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

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苏共领导用自己的修正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来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抗，用自己的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来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相对抗。这样，苏共领导就同历史上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一样，使自己成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制造者，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制造者，也成为许多兄弟党内部的分裂制造者。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比之历史上和当代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知道，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出现在列宁缔造的、世界上最有威望的苏联共产党，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多少年来，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苏联共产党，都把苏联看成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和斗争的榜样。苏共领导正是利用这种情况，利用列宁的党的威望，利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本质，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同时，他们又惯于使用两面手法，实际上干的是分裂、分裂，口头上却叫喊“团结”、“团结”。这种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时期内，起着迷惑人们的作用。有不少人，就是由于对苏共的传统信任，由于不明事情的真相，没有能够及时识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正因为苏共领导掌握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权，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是历史上任何机会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所无法比拟的。



可以說，苏共領導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人們已經看到，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大大地助长了修正主义在世界範圍內更加泛濫，給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帮了大忙。

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資產階級因素泛濫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詐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反过来，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理論和政策，又为国内泛濫起来的資本主义势力服务，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起着麻痹世界人民革命意志、阻撓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作用。

事实上，苏共領導已經博得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热烈贊揚和喝采。

美帝国主义特別夸奖赫魯曉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他們說，“看来很清楚，赫魯曉夫要同西方求得和緩的願望是很真誠的，以致他願意冒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的危險来实现这一点。”^① 他們說，“赫魯曉夫已經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斯大林时代的統一集团。这也許是赫魯曉夫作出的最大貢獻——不是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貢獻，而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貢獻。”^② “我們应当感謝他錯誤地处理他同中国人的关系。……我們也应当感謝他突然提出許多非常唐突的倡議，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混乱。”^③

他們认定，赫魯曉夫是“西方可以期望与之打交道的最好的苏联总理，西方目前一定要設法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削弱他的地位的任何行动”。^④ “美国政府現在相信，在赫魯曉夫同赤色中国的爭端中，美国应当給赫魯曉夫以最大限度的支持”。^⑤

在給苏共領導捧場的啦啦队中，还有在政治上早已破产了的托洛茨基分子。在对待斯大林、对待美帝国主义、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問題上，托洛茨基分子是积极支持苏共領導的。他們說，“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尤其是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造成的形势，极有利于在各个工人国家內恢复我們的运动。”^⑥ “我們对此已准备了二十五年以上，現在我們必須参与进去，大力地行动起来。”^⑦ 他們宣布，“对于赫魯曉夫派实行非斯大林化、反对更保守的流派的斗争，我們要給予批判性的支持”。^⑧

① 美国《民族》周刊 1963 年 2 月 9 日文章：《为外交提供了机会——集团出現了裂縫》。

② 美国《新聞周刊》1962 年 3 月 26 日文章：《莫斯科和北京：裂痕有多寬？》。

③ 《美国新聞与世界报道》1963 年 9 月 30 日文章：《随着簽訂禁試条約——赫魯曉夫已經改变了行徑嗎？》。

④ 英国《泰晤士报》1962 年 1 月 17 日报道：《美国认为共产党的团結已成过去》。

⑤ 美国《新聞周刊》1963 年 7 月 1 日报道。

⑥ 托派的所謂“第四国际”重新統一代表大会 1963 年 6 月的決議：《国际形势和我們的任务》。

⑦ 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 1956 年 4 月 13 日至 15 日通过的決議：《俄国革命新阶段和斯大林主义危机》。

⑧ 托派的所謂“第四国际”国际書記处 1961 年 12 月 5 日通过的決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看！所有革命的敌人都在热心地替苏共领导撑腰。这是因为，在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問題上，在对待世界革命的問題上，他們同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語言。这是因为，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綫，适应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需要。

正如列宁所說，資产階級懂得，“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別活动家来維護資产階級，比資产者亲自出馬还好”。（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零三頁。）現在，帝国主义老爷們正是怀着滿意的心情，让苏共领导来为他們破坏无产階級世界革命事业鳴鑼开道。

苏共领导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危險，但是他們却企图嫁禍于人，誹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什么“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捏造了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

在这里，我們认为有必要把苏共领导对我們的一些主要的誹謗，逐一加以駁斥。

駁所謂“反苏”

苏共领导把一切抵抗和批評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人，都叫做“反苏”。这是一个很吓人的罪名。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偉大列宁締造的党，这还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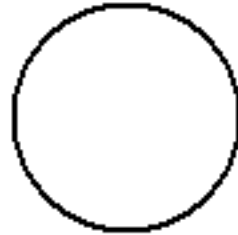
但是，我們劝苏共领导不要装腔作势，“反苏”的罪名無論如何也加不到我們身上。

我們还劝苏共领导不要自我陶醉，“反苏”的罪名無論如何也封不住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嘴。

我們中国共产党人，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偉大的苏联人民、苏維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一直怀着衷心的尊敬和真誠的爱戴。这是因为苏联人民，在列宁的党的领导下，点燃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火炬，开創了国际无产階級革命的新紀元，并且在以后的年代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最前列。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在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最偉大的贡献，对各国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給了国际主义的支援。

斯大林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經說过，“兄弟党的代表对我們党的勇敢和成就表示敬佩，給予我們党以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称号。他們以此表示，希望这支‘突击队’的成就能改善在資本主义压迫下受折磨的各国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們党沒有辜負这种希望”。（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斯大林說列宁締造的苏联共产党沒有辜負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說得很正确。这个党贏得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世界兄弟党的敬佩和支持，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大反斯大林，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能不能说他们没有辜负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希望呢？这就不能这样说了。

中共中央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着共同的要求。这些共同的要求是：

第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第三，“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实行社会主义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相互支持”；

第五，“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第六，“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

第七，“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中共中央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实现这些要求，是“对本国人民应尽的义务，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恰恰背弃了这些要求，辜负了兄弟党的希望，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这不但违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违反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

真正反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那么黑暗，那么可怕，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宣布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为资本主义势力在苏联泛滥大开方便之门，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追求美苏合作，对美帝国主义那样百般奉承，那样卑躬屈膝，给伟大的苏联丢脸，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败坏了苏维埃国家的声誉，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反对和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玷污了列宁党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传统，这不是反苏又是什么呢？



总之，正是苏共领导的所作所为，使伟大的苏联和苏共蒙受了奇耻大辱，使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这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反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自然不能不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严正的批评。我们反对的仅仅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正是为了维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怎么谈得上是什么“反苏”呢？

维护苏联和反对苏联的分水岭，在于是否真正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于是否真正维护苏共、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严肃批评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正是维护苏联；反之，苏共领导实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才是真正的反对苏联；追随和屈从这种错误路线，并不是真正维护苏联，而只能是帮助苏共领导损害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列宁在二十世纪初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态度。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但是，当列宁一旦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不应当“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体面的东西作为仿效的榜样”。他还说，“如果我们还想忠于马克思的精神和帮助俄国社会主义者担负起现代工人运动的任务，我们就应当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德国领袖们的错误。”（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沃伊诺夫（安·瓦·卢那察尔斯基）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十九、一百五十页。）

遵照列宁的精神，我们正告苏共领导，如果你们不纠正自己的修正主义的错误，那末，为了苏联共产党、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和团结，我们将继续“毫无顾虑地和坦率地”批评你们。

駁所謂“爭奪領導權”

苏共领导把我们批评和反对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说成是要“争夺领导权”。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苏共领导，你们说我们要“争夺领导权”，究竟是向谁争夺呢？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呢？难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凌驾所有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就在你们手里吗？

看来，苏共领导确实是把自己当作凌驾全世界兄弟党之上的当然领导者。按照苏共领导的逻辑，他们的纲领、决议、声明，都是金科玉律。赫鲁晓夫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不管怎样错误百出，荒谬绝伦，都是圣旨。所有兄弟党只能俯首听命，恪守不渝，而绝对不



准許批評和反对。这是十足的霸道，十足的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但是，我們必須告訴蘇共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是封建集團。所有兄弟黨，不論大黨小黨，新黨老黨，掌握政權的黨或者沒有掌握政權的黨，都是獨立自主、一律平等的。沒有任何一次兄弟黨國際會議，也沒有任何一個各國兄弟黨一致通過的協議，規定兄弟黨之間有上級黨和下級黨、領導黨和被領導黨、老子黨和兒子黨的區別，規定蘇共領導是兄弟黨的太上皇。

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歷史上來看，由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這個或者那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曾經走在運動的前列。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英國的工聯運動和法國的工人政治鬥爭，曾先後處於各國無產階級運動的前列。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恩格斯說過：“現在德國工人是處於無產階級鬥爭的前列”。恩格斯還說，對於德國工人來說，“事變究竟容許他們把這種光榮地位佔據多久，這是不能預先斷言的”。“但是，首先必須維護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容許產生任何愛國沙文主義，並且歡迎無產階級運動中任何民族的新進展”。（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序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六百二十八、六百二十九頁。）

二十世紀初，俄國工人處於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前列，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說過：“革命無產階級國際中的領導權暫時（自然是在一個短時期內）轉到俄國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十九世紀各個不同的時期中曾先後掌握在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手中一樣。”（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二百七十七頁。）

恩格斯所說的“前列”，列寧所說的“領導權”，決不意味着走在國際工人運動前列的這個黨可以對其他兄弟黨發號施令，決不意味着其他兄弟黨必須服從於這個黨。當德國社會民主黨處於運動前列的時候，恩格斯說過：“它沒有權利代表歐洲無產階級講話，特別是沒有權利講錯誤的話”。（《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第三百二十二頁。）當俄國布爾什維克黨處於運動前列的時候，列寧說過：“必須預計到其他国家發展的一切階段，決不要從莫斯科發號施令”。（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黨綱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四十九頁。）

就是恩格斯和列寧所說的這種前列的地位，也不是長期固定不變的，而是隨着條件的變化而轉移的。這種轉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黨的主觀願望來決定，而是由歷史形成的各種條件來決定的。如果條件變化了，另外的黨就可能走在運動的前列。如果一個處於前列地位的黨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儘管它是最大的、最有影響的，那就必然喪失前列的地位。過去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曾經存在过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实行集中领导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历史性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各国共产党成长起来以后，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后，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就成为不必要也不可能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关于提議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既然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国际形势已經变得更其复杂，那末，要由某个国际中心来解决每个个别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問題，是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的。”历史表明，这个决定是符合实际的、正确的。

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誰有权领导誰的問題。兄弟党之間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对于共同有关的問題，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途徑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这些准则，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都有明确的规定。

苏共领导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自居，把其他所有兄弟党都当作是被领导者，这是完全违反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的。

当然，由于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每个兄弟党所处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已經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党就不同于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赋予已經胜利、特别是先取得胜利的党支援其他兄弟党的更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絕不是赋予它支配其他兄弟党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締造的党，也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設社会主义的党。按理，苏联共产党应当继承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传统，肩負起支援其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更大的义务，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

正是考虑到历史形成的这些条件，中国共产党衷心地希望苏联共产党肩負起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曾經強調指出，社会主义陣营以苏联为首。因为当时苏共领导虽然犯了一些錯誤，但是他們毕竟最后接受了各国兄弟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宣言。我們提出的社会主义陣营以苏联为首的意见，也写入这个宣言中了。

我們认为，这种为首的地位，同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則并不矛盾。这并不意味着苏共有权支配其他兄弟党，而仅仅意味着苏共負有更大的責任和义务。

但是，苏共领导对于这个“为首”的地位，并不滿意。赫魯曉夫本人曾經多次对这一点大发牢騷。他說：“‘为首’在物质上能給我們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給我們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給我們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义上能給我們带来什么东西呢？給不了什么！”^①他

^① 赫魯曉夫1960年2月4日在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还说，“我們要这个‘为首’有什么用呢？让这个‘为首’见鬼去吧！”^①

苏共领导嘴里說不要“为首”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要求凌駕一切兄弟党之上的特权。他們不是要求自己在奉行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和履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义务方面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而是要求所有兄弟党服从他們的指揮棒，跟着他們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

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以后，他們当然也就丧失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首”的地位。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話，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問題，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問題，不是究竟誰领导誰的問題，而是究竟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还是屈服于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問題。苏共领导誣蔑我們“爭夺领导权”，实际上是他們坚持要我們和所有其他兄弟党服从他們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领导。

駁所謂“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

一九六〇年以来，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慣用的一个論据，就是所謂“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紀律”。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我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問題上的爭論。

一九六〇年六月，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用突然襲击的手法，散发了一个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并且糾合多数企图压服中国共产党。他們的这个企图沒有得逞。但是，在这次会談以后，苏共领导就提出在兄弟党的关系中少数必須服从多数的論点，他們強調有几十个党的代表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要中国共产党“尊重”布加勒斯特会談中“一致表示的意見和意志”。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中，駁斥了这个錯誤的論点。中共中央指出，“对待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則問題，究竟誰对誰錯，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根据多数或少数来判断的。真理終究是真理。一时的多数，終究不能把錯誤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終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錯誤。”

但是，苏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的信件中又重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数服从多数的謬論，并且引用列宁在《杜馬七人团》一文中的一段話，指責中国共产党“不尊重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見，实际上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团結”。

出席一九六〇年兄弟党莫斯科會議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會議上进一步駁斥了苏共領

^① 赫魯曉夫 1960 年 6 月 24 日在布加勒斯特十二國兄弟党代表会談中的发言。



导的这种谬论。中共代表团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在一个党内应当遵守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但在各个兄弟党之间则不能实行这个原则。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在这里既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更没有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对于兄弟党共同有关的问题，只能根据协商的原则，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协议。

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中央的信件中提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显然根本否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中共代表团问道：“苏共中央究竟是根据什么一种超党的党章提出这样一种组织原则来的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曾经通过这样一种超党的党章呢？”

中共代表团接着揭露了苏共中央的信件在引用列宁《杜马七人团》一文中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问题的一段话的时候，竟然故意删去了原文中“俄国”一词，企图把一个党内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搬到兄弟党关系方面。

中共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即使在一个党的内部，虽然在组织上必须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能说，在思想认识问题上的正确和错误，在任何时候都能根据多数和少数来加以判断。正是在列宁的这篇《杜马七人团》的文章里，列宁严厉地抨击了当时杜马党团中的七个取消主义者利用一票的多数压制少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卑劣行为。列宁指出，七个取消主义者虽然占多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大多数的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策略，因而他们一切有关统一的叫喊都不过是十足虚伪的。列宁说，‘七个无党性分子要吃掉六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还要把这叫做统一。’列宁还说，恰恰是杜马党团中的六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是符合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只有那七个代表‘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

中共代表团还说，列宁的话表明，“甚至在一个党的一个小组里面，多数也不永远都是正确的，相反，有时多数也必须‘放弃压制政策’，才能保持团结一致。何况是在兄弟党之间？苏共中央的同志这样连文义都没有弄清楚，就急急忙忙地引用列宁的话，并且特意删去了一个重要的字，可是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详细地引用中共代表团一九六〇年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几段发言，为的是说明，苏共领导攻击我们“抗拒多数的意志”的谬论，早就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正是由于中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这种谬论，关于兄弟党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被写入一九六〇年声明中。

苏共领导直到现在仍然喋喋不休地叫嚷“少数服从多数”，这只能表明他们要否定各国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地位，取消兄弟党之间协商一致的原则。他们企图在“多数”的幌子



下，挟持一些兄弟党顺从他们的意志，并且利用这种虚假的声势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苏共领导这样做，本身就是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是违反宣言和声明的。

今天，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如果要说国际纪律，那不是别的，只能是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我们已经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破坏了这种必须遵守的准则。

如果苏共领导一定要分什么“多数”、“少数”，那么，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苏共领导，我们并不承认你们是多数。你们所依恃的“多数”是虚假的。真正的多数并不在你们那一边。难道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是少数吗？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严重地脱离群众，难道能够把不赞成你们的错误路线的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算在你们的所谓“多数”之中吗？

根本的问题在于，谁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谁反映他们的革命意志。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谈到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的时候说道：“虽然只是李卜克内西和吕勒两个人对一百零八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万人，代表被剥削的群众、大多数的人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而那一百零八个人只是代表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一小撮善于拍马的资产阶级走狗罢了。”（列宁：《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百零二页。）

今天，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包括那些暂时还没有觉悟但终究会觉悟起来的人们，都是要革命的。真正居于多数的，是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背叛他们根本利益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

駁所謂“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

苏共领导在苏共中央公开信中诽谤我们说，“中共领导策划和支持美国、巴西、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共产党的各种变节者的反党集团去进行反党活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现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苏共领导强制推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

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接受了苏共领导强加给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或者由于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苏共领导的鼓励，把本国革命运动引入歧途，使本国革命事业遭到损失。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追随苏共领导之后，摇旗呐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起着消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他们自己党内的广泛不满，不能不引起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抵制和反对。

这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在他们自己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实行分裂主义的政策。他们



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對於黨內的路綫分歧，對於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不允許進行正常的討論，而且採取非法手段，排斥、打擊以至開除堅持原則的共產黨人。這就不可避免地使這些黨內兩條路綫的鬥爭帶有特別尖銳的形式。

從根本上說，這些共產黨黨內鬥爭的性質，是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綫同選擇修正主義路綫之間的鬥爭，是要把共產黨建設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無產階級革命黨同把共產黨變為資產階級僕從、社會民主黨變種之間的鬥爭。

蘇共領導在蘇共中央公開信中，歪曲了美國、巴西、意大利、比利時、澳大利亞和印度等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真相。他們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咒罵那些受到這些國家的黨的修正主義集團排斥和打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蘇共領導這樣顛倒黑白，難道能夠掩飾和改變這些共產黨黨內鬥爭的真相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就拿比利時共產黨的黨內鬥爭來說吧。

比利時共產黨的內部分歧，由來已久。隨着這個黨原來的領導集團越來越深地陷入修正主義的泥坑，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黨內的鬥爭越來越激烈。

比利時共產黨的修正主義集團，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亂事件期間，竟然發表聲明，譴責蘇聯幫助匈牙利勞動人民平息叛亂。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反對剛果人民武裝反抗比利時殖民主義者的血腥鎮壓，贊成美帝國主義利用聯合國干涉和鎮壓剛果民族獨立運動。他們還不知羞耻地夸耀自己率先向聯合國發出呼聲，“要求迅速地、全部地執行聯合國的決議”。^①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贊揚鐵托集團的修正主義綱領“包含有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②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肆意詆毀一九六〇年聲明，說這個聲明的內容是混亂的，“每二十行字，就有一句違反這個聲明總路綫的句子”。^③

這個修正主義集團，還在一九六〇年底和一九六一年初比利時工人大罷工期間，指責工人反抗軍警鎮壓是什麼“輕率的、不負責任的行動”^④，瓦解工人的鬥爭意志。

對於這個修正主義集團一連串的反叛比利時工人階級利益、反叛國際無產階級利益的行為，以格里巴同志為首的比利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理所當然地要進行嚴肅的鬥爭。他們揭露和批判了黨內修正主義集團的錯誤，堅決地抵制和反對它的修正主義路綫。

由此可見，比利時共產黨內的鬥爭，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這兩條路綫的鬥爭。

① 埃·伯內爾就剛果問題答《人道報》記者問，載1960年7月26日比共《紅旗報》。

② 《紅旗報》1958年4月22日評論：《比利時共產黨與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

③ 讓·布魯姆1961年12月3日在布魯塞爾地區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轉引自《紅旗報》1962年2月22日格里巴的文章。

④ 讓·布魯姆：《爭取迅速獲得全勝：共產黨提出的兩項建議》，載1960年12月29日《紅旗報》。



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是怎样对待党内斗争的呢？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政策，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和排斥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的共产党人。在比利时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拒绝听取格里巴等同志的意见，并且不顾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就非法地宣布，从党内开除格里巴等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以格里巴同志为首的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革命路线，坚决反对比共原来的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为重建比利时共产党而斗争，这难道不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吗？

苏共领导公然支持和鼓励比共修正主义集团，打击和排斥比利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只能暴露他们自己正是兄弟党内分裂的制造者。

至于说到印度共产党，那里发生的事情，具有更加严重的性质。

我们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发表的《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的文章里，根据大量事实，指出以丹吉为首的叛徒集团，已经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他们篡夺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正在按照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意志，把印度共产党改造成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尼赫鲁政府的僕从。

从那时以来，印度共产党的情况又有了什么变化呢？

全世界都看到，丹吉集团继续走着叛徒的道路。他们继续鼓吹阶级合作，鼓吹通过尼赫鲁政府“实现”印度的“社会主义”。他们积极支持尼赫鲁政府的庞大的扩军备战预算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他们破坏一九六三年八月在孟买发生的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反对尼赫鲁政府横征暴敛政策的大罢工。他们阻挠在加尔各答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要求释放被捕共产党员的群众大会。他们继续进行猖狂的反华活动，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他们追随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随着叛徒面目的暴露，丹吉之流越来越遭到印度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的反对和抵制。越来越多的印度共产党人清楚地看到，丹吉之流是印度共产党和印度民族的祸害。他们正在为重振印度共产党的光荣的战斗的革命传统而斗争。他们是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真正代表和希望。

苏共领导大肆喧嚷中国共产党支持“变节者”和“叛徒”，但是，支持像丹吉之流这样货真价实的变节者和叛徒的，不是别人，正是苏共领导。

苏共领导把许多国家内敢于同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共产党人一律咒骂为什么“变节者”、“叛徒”、“反党分子”。但是，这些共产党人究竟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无非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要有一个革命党和一条革命路线。难道苏共领导真的以为，咒骂就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吓倒，就可以使他们放弃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不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吗？这种如意算盘，是绝对办不到的。



古往今来，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这样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看起来好像很渺小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得到群众的拥护，他们最终总会胜利的。列宁和第三国际就是这样。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伯恩斯坦、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就是这样。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的。

共产党人是干革命的，如果不革命，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共产党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是天经地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坚决支持革命者，支持反对修正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样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隐蔽自己的立场。我们支持世界上所有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同修正主义者还有来往，为什么偏偏不能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往呢？苏共领导把我们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成是搞分裂主义，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我们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

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真理，敢于斗争，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革命气概。以格里巴等同志为代表的比利时共产党人，以阿马佐纳斯、格腊布伊斯等同志为代表的巴西共产党人，以希尔等同志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人，以库马拉西里、桑穆加塔桑等同志为代表的锡兰共产党人，以及印度、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党内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英勇的战士。他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坚持建设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革命党，坚持符合本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理应博得一切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的尊敬、同情和支持。

总之，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者，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他们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

目前的公开论战

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归根到底，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要修正主义的论战，就是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要大国沙文主义的论战，就是要团结还是要分裂的论战。这种涉及根本原则问题的争论，早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就已经开始，在一段相



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兄弟党的内部会谈中进行，在两年多以前采取了公开的形式。

大家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苏共领导首先挑起来的，并且是苏共领导要坚持进行的。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当时，出席苏共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同志在致词中反对苏共领导的这种做法，指出这绝不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但是，苏共领导是怎样回答我们的呢？他们说，他们发动公开论战“作得完全正确”^①，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②

后来，一九六二年一月间，越南劳动党建议“各党应当停止在广播电台和报刊上互相攻击”。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但是，苏共领导实际上拒绝了对停止公开论战承担肯定的义务。苏共领导不但一直没有停止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公开攻击，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接连举行的欧洲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策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攻击，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对攻击者作公开的答覆。

一九六三年三月间，尽管对于兄弟党的攻击我们还没有答复完，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在报刊上作公开的答覆，但保留公开答覆的权利，为的是给已经商定将要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但是，苏共领导竟然在中苏两党会谈前夕，进一步采取发表声明和通过决议的方式，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七月十四日，当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时候，苏共中央就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甚至采取了蛊惑人心的手法，使用了种种谩骂的语言，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这样，苏共领导进一步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公开论战。

从七月十五日起，苏共领导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从政府声明、领导人讲话、各种集会到发表文章，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从中央报刊到地方报刊，从广播电台到电视节目，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以诽谤和攻击。根据对苏联中央一级二十六家报刊的统计，从七月十五日至十月底，一共发表了一千一百一十九篇编辑部文章、社论、短评、署名文章、读者来信、漫画等等，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至于苏联地方报刊，根据对加盟共和国十五种机关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在同一期间，也发了七百二十八篇反华材料。

对于这些反华宣传材料，凡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其中苏共中央公开信则先后全文发表了两次，并且用十几种外国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供关心这场公开论战的人了解

① 赫鲁晓夫1961年10月27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 苏联《真理报》1962年2月21日编辑部文章：《我们时代的旗帜》。



苏共领导的观点。只是由于苏方的反华文章数量极大，而且大都千篇一律，我們报纸的篇幅有限，不能全部发表。我們的出版机关已經把这些文章统统收集起来，編成专册，陸續出版。

苏联方面已經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按照兄弟党一律平等的原則，中国方面有权利发表相当的答辯文章和材料。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牵涉的問題比較多，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七、八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許多重大事件，因此，我們《人民日报》和《紅旗》杂志的編輯部，經過認真的研究之后，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陸續发表評論。到目前为止，我們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評論，連本篇在內，才发表了七篇。

对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們还没有評論完。至于苏联中央一級报刊和地方报刊发表的大量反华文章，我們还没有答辯。

赫魯曉夫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回答新聞記者的时候，曾經提出停止公开論战。但是，在那一天以后，苏联报刊仍然繼續发表攻击中国的文章。

最近，苏共领导又一次提出停止公开論战，并且說，公开論战“給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重大的損害”。我們要問苏共领导，过去，你們說，公开論战是“为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①，是“唯一正确的、真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立場”^②，你們一会儿这么說，一会儿那么說，究竟是要的什么花招呢？

我們还要問苏共领导，你們发表了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我們才不过发表了不到十篇的答辯文章，而且連对苏共中央的一封公开信还没有答辯完，就被要求停止答辯，这难道是符合兄弟党关系的平等原則的嗎？你們說了那么久，說了那么多，我們才开始說了一点，你們就不耐煩了，就受不住了，就不願意听了，这难道是合乎民主討論的原則的嗎？

我們还要問苏共领导，你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声明中曾經說，如果中国人繼續論战，“那么，他們应当非常清楚，他們在这条道路上将遭到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最坚决的回击”。苏共领导說这样的大話，不是明目張胆的恫吓和威胁嗎？难道你們真的相信，只要你們命令一下，別人就会俯首貼耳，只要你們大喝一声，別人就会渾身发抖嗎？老实說，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們一直在等待着，很想領教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最坚决的回击”。

同志們，朋友們，你們錯了，完完全全的錯了。

公开論战既然已經开始，就得按規矩进行。如果你們认为，你們已經說得够了，那末，你們应当也給对方足够的答辯机会。如果你們认为，你們还有许多話要說，那就請吧，請說个够吧。但是，同样的，你們說够了以后，仍然应当让对方也說够。一句話，应当机会均等嘛。你們不是也說兄弟党是平等的嗎？为什么你們要什么时候攻击兄弟党，就发动公开論战，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61年第16期編輯部文章：《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的胜利》。

② 苏联《真理报》1962年2月21日編輯部文章：《我們时代的旗帜》。



你們要什么时候停止論战，就剝夺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答辯的权利呢？

苏共领导悍然挑起公开論战，扩大公开論战，坚持公开論战，現在又叫喊停止公开論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看来，事件的发展，出乎公开論战发动者的意料。苏共领导原先以为对自己有利的公开論战，正走向他們意願的反面。苏共领导手里沒有真理，他們在攻击別人的时候，只能依靠造謠污蔑，歪曲事实，顛倒是非，一旦論战展开，要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他們站立的基础动摇了，他們害怕了。

列宁曾經說过，对于修正主义者來說，“最不愉快、最不乐意和最不能接受的，莫过于弄清理論上、綱領上、策略上和組織上的主要意見分歧了”。（列宁：《再論社会主义国际局和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十八頁。）

苏共领导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对于公开論战的立場是众所周知的。我們一开始就认为，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应当通过內部协商来解决。公开論战，不是我們挑起的，也不是我們願意要的。

既然公开論战已經开始，而且苏共领导也說过，公开論战是“按列宁的方式行事”^①，那么，論战就应当在民主討論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并且要进行到水落石出。

更重要的是，既然苏共领导公然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公然撕毁宣言和声明，那么，他們就不能指望我們不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不保卫宣言和声明的革命原則。既然論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是大非問題，那么，就必须把这些大是大非問題彻底弄清楚。这也是郑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問題的实质在于：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的分歧。停止公开論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重大的原則分歧。相反地，通过公开論战，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才有可能辯明真相，分清是非，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論战的，怕論战的不是科学。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論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問題，促使他們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問題和世界革命問題。經過这场大論战，人們終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馬克思列宁主义。經過这场大論战，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将被調动起来，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将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受到鍛炼，更加成熟地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① 苏联《真理报》1961年11月4日社論：《列宁主义的党的历史性代表大会》。



維護和加强团結的道路

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給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威胁。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場，也就是分裂主义的立場。不管苏共領導怎样大声叫喊“团結”，怎样咒罵別人是“分裂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只要他們坚持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么，他們实际上是搞假团結，真分裂。

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我們的这个立場，是維護和加强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結的唯一正确的立場。

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陣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基础。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結才能建立起来。离开这个基础，就根本談不上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結。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而斗争，也就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而斗争。坚持原則同坚持团結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苏共領導真要团結，而不是假要团結，那么，他們就必须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学說，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說，特别是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而絕不允許用階級合作或者階級投降代替階級斗争，絕不允許用社会改良主义或者社会和平主义代替无产階級革命，絕不允許用这种或者那种借口取消无产階級专政。

如果苏共領導真要团結，而不是假要团結，那么，他們就必须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而絕不允許用自己一个党的綱領代替兄弟党一致協議的共同綱領。

如果苏共領導真要团結，而不是假要团結，那么，他們就必须划清敌我界限，就必须联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联合全世界无产階級，联合所有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反对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絕不允許顛倒敌我关系，认敌为友，以友为敌；絕不允許从美苏两大国主宰世界的幻想出发，联合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叛徒铁托集团，反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各国革命人民。

如果苏共領導真要团結，而不是假要团結，那么，他們就必须忠实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严格遵守宣言和声明所規定的兄弟国家、兄弟党关系的准則，絕不允許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政策，来代替这些准則。这就是說：

必须遵守相互联合的原則，絕不允許糾合一些兄弟党打击其他兄弟党，进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的活动；

必须遵守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則，絕不允許以援助为名，行控制之实，借口“国际



分工”，損害兄弟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反对兄弟国家自力更生建設社会主义；

必須遵守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則，絕不允許把自己放在其他兄弟党之上，把自己一党的綱領、路綫、決議強加給其他兄弟党，絕不允許干涉兄弟党的內部事務，借口所謂“反对个人迷信”，进行顛复活动，絕不允許把兄弟党当作自己的附屬品，把兄弟国家当作自己的附屬国；

必須遵守协商一致的原則，絕不允許挾持所謂“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一党的錯誤路綫，絕不允許利用自己的或者別国的党代表大会，通过決議、声明、领导人講話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別的兄弟党，甚至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总之，苏共領導如果真的要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那就必須彻底拋棄他們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綫。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和現代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才能够得到維護和加强。这是維護和加强团結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当前的世界形勢，整个說来是大好的形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經取得了輝煌的胜利，根本改变了国际階級力量的对比。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逆流的襲击，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合乎規律的現象。它虽然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某些兄弟党带来暫时的困难，但是，修正主义者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引起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一件好事。

毫无疑问，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葆其美妙的青春，磅礴于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强大，更加团結；国际无产階級事业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必将获得更加輝煌的胜利。現代修正主义是一定要彻底破产的。

我們願意奉劝苏共領導冷靜地想一想，你們坚持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究竟会給你們自己带来什么結果。我們願意再一次真誠地向苏共領導呼吁，希望你们能够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来，回到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則的基础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則的基础上来，以便在原則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加强社会主义陣营团結，加强中苏团結。

尽管我們同苏共領導存在着严重分歧，我們对于在列宁和斯大林教导下成长起来的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滿怀着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始終不渝地維護中苏团結，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

全世界共产党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团結起来！



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重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趙 漢

一九六二年八月，《紅旗》杂志重新发表了刘少奇同志在三十年代所作的著名讲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刘少奇同志在这篇著作中，論证了共產黨員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必須同时改造自己的原理，透彻地闡明了有关共產黨員修養的一系列問題。刘少奇同志的这篇著作，系統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进行党性修養的經驗，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說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少奇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指出，共產黨員应当在两种不同的境遇中鍛炼自己：一是“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鍛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養”；二是“要在順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鍛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養。”* 他說：“革命实践的鍛炼和修養，无产階級意識的鍛炼和修養，对于每一个黨員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他要求我們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更要加紧无产階級意識的修養，始終保持純洁的无产階級的革命性。現在，我們党領導全国的政权已經十四年多

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溫这篇著作，重溫刘少奇同志的这些指示，使我們感到分外的亲切。

做一个好的共產黨員 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党为中国人民革命而斗争的历史，是一部在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不屈不撓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我們共产党人，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前，主要地就是在那种異常艰苦的、有时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实践中鍛炼自己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压在我国人民头上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旧中国的反动統治階級，既继承了国内几千年封建专制統治的衣鉢，又从国外輸入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統治的經驗。他們瘋狂地迫害和摧殘革命力量，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同时动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員了一切反动的宣傳工具，恶毒地誣蔑和中伤我們的党，千方百計地欺騙群众，企图割断我們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無論在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或者在国民党統治区的白色恐怖下，我們共产党人长年累月都在經受着困难的考驗。长期的战争环境，敌人的軍警、特务、法庭、监狱和刑場，极度清苦的生活条件等等，都要求我們用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毅力来認真对待。沒有革命的決心、不肯为革命牺牲的人，不敢来加入我們的党。有些人，即使一时被革命浪潮卷进了党，到了斗争最尖銳、环境最困难的关头，如果不能站稳脚跟，也必然要被革命的浪潮重新冲刷出去。

在旧中国，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力量之間的斗争极其尖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犬牙交错，形势极其复杂，变化极其剧烈。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革命，不但要求我們共产党人要具备革命坚决、斗争勇敢的品质，而且要学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学会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条件下正确地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問題。刘少奇同志指出：“如果我們不能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武器，我們就不能正确地認識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問題，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場的危險，甚至可能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只有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悉心調查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且在革命的实践中认真地

探討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才能够在曲折复杂、变化多端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綫，在一切重大問題上站稳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場。

所以，在革命胜利以前，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是很不容易的。他必須在同强大凶恶的敌人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加紧修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和革命能力。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在革命实践中锤炼自己，沒有坚强的党性，沒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就会落伍，就会被革命淘汰掉，就根本不配被称为共产党员。一个党，如果不是由这样具有坚强的党性的党员組成的，就不可能团结群众和打倒敌人，就不可能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那么，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就容易起来了呢？是不是就可以不必再加紧进行党性修养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

的确，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來說，执政无非是意味着掌握国家机器压迫劳动人民，意味着可以公开地、合法地、为所欲为地营求他們这一政治集团及其后台老板的私利。因此，在那样的执政党中做一个党员，就可以升官发财、貪脏枉法，干一切对自己有利可图的事情。

我們无产阶级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根本相反。我們的党是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劳动群众反对一切剝削和奴役制度的工具。我們党所謀求的，根本不是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



說，在革命胜利以前，我們党的任务主要是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以夺取政权；那么，在取得政权以后，我們党在继续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产生阶级的根源的同时，还担负着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责任。

毛澤东同志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及时地提醒我們：“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在取得胜利以后，我們党的担子是比过去更重、更艰巨了，我們党对党员的要求也比过去更高、更严了。如果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执政党中做一个党员比执政以前“更加容易”了，那显然是不正确的。

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谆谆地教导我們：“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們，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們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②刘少奇同志也告訴我們，必須在成功和胜利的条件下保持严重的警惕。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经受不住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就会“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

他原有的革命性。”

毛澤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指出的这些危险，正是我們在胜利面前所必须经历的新的考验。

过去，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是被压迫者，这种被压迫的地位逼着我們要革命。现在胜利了。我們到底是把已有的胜利看成是新的起点而把革命进行到底，直到消灭一切阶级、一切剥削、以至解放全人类呢？还是陶醉于既得的成就，停顿下来，放棄革命的任务，松懈革命的斗志呢？当阶级敌人騎在我們头上的时候，我們是能够把阶级的壁垒分得清清楚楚的，我們沒有向敌人屈服过。现在，阶级斗争仍然在我們的周围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曲折复杂了，更加隐蔽了。我們是继续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牢牢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认真地考察和思索阶级斗争的各种现象，并且以自己的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呢？还是为和平的环境所麻痹，模糊阶级界限，丧失共产党员应有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征服呢？

过去，如果我們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不取得群众的支持，我們就不但不能战胜敌人，而且根本不可能使自己有立足存身之地。当我們取得政权以后，我們是继续诚心诚意地当人民的勤务员，竭尽全力来巩固和扩大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9、1440页。

② 同上，第1439页。



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呢？还是因为自己是执政党的党员就以功臣自居，以特权自许，同群众疏远起来呢？残酷的战争环境，使我们习惯于过艰苦的生活，习惯于进行紧张的战斗和劳动。现在环境安定了，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是继续发扬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呢？还是因为环境好了，就怕吃苦了，想享福了，好逸恶劳了，使自己的革命意志一步一步地衰退下去呢？

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革命力量处在相对的劣势。只有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在斗争中不断地壮大自己和削弱敌人。现在革命力量空前强大了，我们的工作条件比过去有利得多了。我们是继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使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呢？还是因为胜利就骄傲起来，不谦虚，不谨慎，不向群众学习，不认真做好调查研究，不注意到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主张，主观主义地处理问题呢？

这些都是经常摆在我们面前的关口，看我们过得去过不去。如果在胜利的条件下不能继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不起这些新的考验，显然是很难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由此可见，在取得政权以后，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同样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在胜利的条件下，必须继续进行党性修养，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才配得上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

共产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 加强党性修养更为重要

共产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必须继续加强党性修养，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所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它肩负着巩固和加强国内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历史任务，也肩负着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积极参加国内和国外的阶级斗争。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基本上是党员头脑中的阶级斗争，它是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密切地联系着的。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各个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那么，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来侵蚀我们。我们进行党性修养，也就是反侵蚀，在反侵蚀的斗争中，不断地发扬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刘少奇同志说得好：“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回什么事呢？我认为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是决不甘心死亡的，他们总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复辟。他们同



过去一样，总是把斗争锋芒集中在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共产党身上。在极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热诚拥护共产党的情况下，在革命的人民已经在党的领导下高度地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在党的领导地位已经巩固的情况下，他们除了企图从外部来推翻党对政权的领导以外，同时还采取所谓“和平演变”的战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演变”上面。他们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溶化我们，使我们资产阶级化。他们想不动声色地偷天换日，使无产阶级政党从内部变质，实际上变为资产阶级政党；从而使党领导下的政权变质，实际上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一直到使整个社会制度变质，使资本主义复辟。南斯拉夫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并不是就注定不会遭到任何波折了。领导无产阶级取得这一胜利的党，在它的面前仍然摆着两种可能的前途：如果它始终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那么，它就能够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如果它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接受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就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的党，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就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而言，也摆着两种可能的前途：如果它是由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领导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整个社会就将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如果它是由修正主义的党领导的，真正的革命力量

遭到了压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借尸还魂，革命就会失败。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只有自然而然地建成共产主义的前途而根本没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有意地掩饰这一点，就是欺骗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无产阶级终究是要革命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终究是要革命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终究要取得最后胜利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没有排除过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一发展阶段上（不论在取得政权以前或者在取得政权以后）有遭受挫折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异常尖锐和异常严重的问题。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警惕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崭新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在这场斗争中，阶级敌人的首要进攻目标，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党，是我们共产党员。每一个敢于正视阶级斗争的革命者，都应当敢于正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都应当向自己郑重地提出加紧党性修养的任务。

新党员、老党员都应当 加强党性修养

刘少奇同志指出：“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环境



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这就是说，不论是新党员还是老党员，都应当加紧进行自己的党性修养。

老党员是我们党的骨干。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身上。他们不仅在工作中担负的责任往往比新党员更重，而且有义务以身作则，做出好榜样来影响和教育新党员，帮助新党员健康地成长。因此，老党员应当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更高的自觉性来进行党性修养。

老的一代开创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新的—代手里究竟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要看新的一代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敌对阶级把他们的希望放在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蜕化上面，把腐蚀革命后代作为他们的战略任务。我们党则把培养革命后代当作自己的战略任务。每一个新党员，特别是年轻的新党员，都应当觉悟到这一点，刻苦地进行党性修养。

从新党员和老党员的具体情况来看，也都有着认真地进行党性修养的必要。

刘少奇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了从比较幼稚的革命者成长为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者所必须经历的道路。他指出：由于这些同志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的残余；又由于他们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

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因此，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必须经过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

对于在革命胜利以后参加我们党的新党员来说，决不能以为自己在入党以前就从各个方面受到过党的教育和新社会的影响，并且进行过必要的思想改造，具备了一定的无产阶级觉悟，就可以忽视自己的党性修养了。

这是因为：第一，新党员中不少同志毕竟是在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在旧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在整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列宁曾经指出：“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起就染上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①我们决不可以低估这种思想在毒化人民群众方面所起的极坏的影响。我们决不能认为，共产党员一入党，就会马上把这种坏影响清除掉。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疑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但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

^①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0—261页。



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①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脫胎出來的。因此，它不僅一般地帶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而且還不可避免地帶有封建宗法制度殘余的影響。幾千年的剝削制度留下來的大量的惡濁東西，沒有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是打掃不乾淨的。因此，不僅生長在舊社會的人必須認真地同他從舊社會中帶來的惡濁東西做鬥爭，就是在今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生長起來的人，也必須認真地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這種惡濁東西的殘余的影響作鬥爭。

第三，在新黨員中有許多年輕人，他們是在全國勝利以後長大的。這是他們的幸福。但是，老的一輩所親身受到的階級壓迫的痛苦，他們幾乎沒有受到過。老的一輩所親身經歷過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他們也很少經歷過。固然，在他們的身邊仍然存在著階級鬥爭，但是，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曲折、複雜的，有時是隱蔽的，他們往往不容易察覺到。要使他們像老的革命一代那樣具有強烈的階級感情和鮮明的階級立場，顯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他們必須投入階級鬥爭的實踐中，經歷長期的鍛煉，才能辦到。

因此，一個革命者在入黨以前經過初步的思想改造，具備了一定的無產階級覺悟，並不能成為他們入黨以後放鬆黨性鍛煉的借口。一切真心想革命的人，從來都只把入黨當作更加自覺地接受黨的教育和改造自己的思想的一個起點。如果有人把入黨當作思想

改造的終結，恰恰證明他還沒有起碼的無產階級的覺悟。

有人認為，進行黨性修養主要只是新黨員的事情；入黨較久或者很久的老黨員，已經經歷了多次鬥爭的考驗，取得了比較豐富的經驗，可以不必再像新黨員那樣鄭重其事地進行黨性修養了。這種觀點對不對呢？

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這是因為：第一，我國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以後，立即不停頓地轉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不但要徹底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一切舊制度，而且要徹底消滅遺留在人們頭腦中的、由這種舊制度所產生、為這種舊制度服務的一切舊思想、舊習慣，也就是說，要在人們的心理上最後地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一切殘余。這是一次極為深刻的革命。

對於社會主義革命，我們黨的許多老黨員，是有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的。他們在黨的長期教育下，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能夠認真地加強黨性鍛煉，逐步建立起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立場和世界觀，樹立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到底的思想。他們有堅強的革命意志，立場明確，鬥爭勇敢，絕不動搖。但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對於他們，終究是一件新的事業，有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經過不斷的努力，才能得到解決。因此，他們還需要在實踐鬥爭中繼續加強鍛煉，不斷地積累和豐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

^① 《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頁。



主义建设的经验。

在我们党内，也有一部分同志，虽然有革命要求，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们的思想上是抽象的、模糊的，而他们思想中所残留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则常常会影响他们。存在着这种思想状况的同志，常常对新发生的问题认识不清，在革命的大风浪中甚至会表现出暂时的动摇。这些同志的好处是有自我改造的自觉性，当党指出他们的错误时，能够迅速地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站稳立场。还有一小部分同志，虽然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由于过去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较深，始终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总是受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以后，他们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表现出惊惶失措，左右摇摆，甚至站在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待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只有在经过党的教育、批判和帮助以后，才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为党工作。以上这两种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的。

此外，在我们党内，还有少数人，在参加革命前，受过很深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参加革命以后，实际上不愿意接受党的改造，坚持原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且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是坚决的，因而还可以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

有益的工作。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革命发展到真的要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会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就会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人是完全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准备的，他们只是党的同路人。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有爱国心，还反对帝国主义，也还有一种模模糊糊要社会主义的倾向，因而党在对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也还要争取他们改过自新。只要他们认真改正错误，也还可以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工作；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就迟早免不了要同党分手，而成为蜕化变质分子。

由此可见，经历了长期的民主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党员，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并不是都能够一样顺利地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考验的。因此，我们老党员，在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各自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自己提出加强党性锻炼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修养的问题，绝不能产生自满情绪，绝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丧失革命警惕性。

第二，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许多老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负了领导的职务，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会向我们捧场拍马、阿谀奉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的某些同志，又可能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恶习，以致严重脱离群众，给党的事业带来损



失。我們共產黨員，無論職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都應該把自己看成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都必須密切聯繫群眾，關心群眾生活，和群眾同甘共苦。那種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的做法，是國民黨作風。我們黨向來反對這種國民黨作風，不容許國民黨作風在我們隊伍中存在。我們共產黨員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是黨和人民分配給我們一份責任，叫我們挑起一副担子，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為黨和人民服務。我們挑起了這副担子，應該謙虛謹慎，兢兢業業地工作，才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把這種關係搞顛倒了，把自己的位置擺錯了，那他就不能稱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老黨員必須加強党性鍛煉，繼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作風，嚴格防止沾染上國民黨作風。在任何條件下，在任何時間，都要保持住無產階級的本色，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終身不懈地奮鬥。

第三，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在複雜的國內和國際階級鬥爭的條件下進行的。階級敵人正在想盡各種辦法來腐蝕、溶化共產黨人。他們特別把注意力放在缺乏階級鬥爭鍛煉的年輕的一代上面。一個經歷過長期革命鬥爭風雨的老黨員，不僅有繼續在新的鬥爭環境中改造自己的任務，還擔負着培養繼承革命事業的新的新一代的任務。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任務。要把我們的年輕一代培養成為堅強戰士，必須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我們黨的革命

傳統，不是抽象的東西，它主要是通過老黨員在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實際行動表現出來。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許多老黨員，在黨的教育下，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在對敵鬥爭中，他們英勇頑強，鬥爭堅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在對待原則問題時，敢于和善于堅持黨的立場，同一切違反黨的利益的現象作鬥爭；在工作中，艱苦奮鬥，廉潔奉公，謙虛謹慎，任勞任怨，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密切聯繫人民群眾；在個人生活上，勤儉朴素，安于清苦，嚴格地要求自己，不給組織上以任何的額外負擔。我們黨的這些革命傳統，是使我國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在革命勝利以後，老黨員有責任以身作則，繼續保持和發揚黨的這些革命傳統，繼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廣泛地宣傳和推行黨的革命傳統，並且採取循循善誘的態度，把革命經驗和革命傳統傳授給年輕人。這樣，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會不斷地取得新的勝利，我們黨的年輕一代，就會從老黨員的模範行為中受到感染、影響和教育，逐漸地在潛移默化中接受黨的革命傳統，逐漸地把自己鍛煉成為具有無產階級政治方向、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建設社會主義本領的革命接班人，而我們老黨員也才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而不愧為一個老的革命戰士。

總之，我們許多老黨員經過長期的革命鬥爭，確實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但是，一個老黨員，經歷過較多的考驗，並不等於他



就注定能够经得起一切考验了。老的考验过去了，新的考验又出现了。新的考验也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马马虎虎是通不过去的。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抓紧自我改造的时候，就可以比较自觉地发现和解决自己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进步也比较快。如果放松了思想改造，表面上好像平静无事，实际上，思想上的毛病却在逐渐发展，进步就一定很慢，或者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倒退。对老党员来说，特别要防止那种认为改造得“差不多了”，“什么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的想法，防止在党性修养方面自满起来，疲踏起来，漫不经心起来。因为，每当我们不能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去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时刻，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趁虚而入和蔓延滋长的时刻。我们既然立志革命一辈子，就要时时刻刻用党性原则来严格要求自己。党龄长、资格老，对自己要求应该更高。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们应该借用这几句话来鞭策自己，勉励自己。

在参加革命实践和学习 革命理论中加强党性修养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锻炼和修养呢？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著作中，论证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的关系，论证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的关系。他说：“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又说：“我们共产党

员不能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互相割裂开来。”这就是说，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

参加革命实践和学习革命理论，是我们共产党人进行修养的两个最基本的方法，缺一不可。

群众的革命实践，归结起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斗争的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我们才有可能改造客观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主观世界。因此，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又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本身就是有阶级性的，决不能离开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这个道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还是动摇的？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应当依靠谁、团结谁、向谁作斗争？我们是否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对于一切符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现象，我们是不是全力支持？对于一切危害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现象，我们能不能敏锐地识破它的阶级本质，勇敢地进行斗争？我们置身于群众之中，是在努力扩大和加强无产阶级的影响和阵地，还是糊里糊涂地在帮助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扩大它们的影响和阵地？当我们自己



的头脑中出现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是揭露它还是把它掩盖起来，是向它作斗争还是让它来支配自己的行动？我们是自觉地增强无产阶级的党性，还是有意无意地去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很明显，只有在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中，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参加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是我们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少奇同志指出：“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人们的本身，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是在社会的人们和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进步的。”人们用自己的劳动来改造自然，而恰恰在这个改造自然的劳动中，创造了和改造着人们自己。

当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时候，生产斗争总是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通过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生产斗争的知识，懂得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性，而且可以加强我们同劳动人民的联系，加强我们的阶级意识。大家都知道，人的思想意识，是由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所以，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农群众，同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无论在思想、感情、政治观点、道德观点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互相对立的，而进行集体劳动的人，同个体劳动者在思想、感情、政治观

点、道德观点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在社会主义时期，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经常同工农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斗争，才能够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才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工农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才有资格做他们的政治上的代表。

我们又为什么要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和修养呢？

我国已经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在许多方面还是落后的，是同我们国家的需要和所处的地位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广泛地深入开展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尽快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使我们能够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独立地解决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问题。我们是执政党的党员，应当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可能地有关科学知识的修养，在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起模范作用。我们分布在农业战线、工业战线、国防战线和科学技术战线上的广大党员，都应该参加一切可能和需要参加的科学实验活动。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同非党的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一道，总结科学实验的成果，并且有领导有计划地推广那些确实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研究成果。我们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有目的地引导广大群众参加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积极向群众传播科学知识，使广大群众认识到这个革命运动对于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有极大的好处，而乐于积极参加，使



广大群众自己掌握这种发展生产力的强大手段。

对共产党员来说，参加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和加强党性锻炼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我们认识和掌握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有助于培养和加深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严格的科学态度，学会运用科学方法来对待一切事物。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是对立的，同各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对立的。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愈深刻，我们头脑中的唯心主义的残余就会愈少。从这个意义来看，积极参加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对于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具有重大的作用。

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都有一个树立科学态度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直接运用到我们每一项实际工作中去，更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所必须具备的党性。毛泽东同志一再地指示我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①，“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②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性是同严格的科学性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用调查研究 and 典型试验的科学方法进行各项实际工作的革命运动，是改造我们的学风，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得以经常地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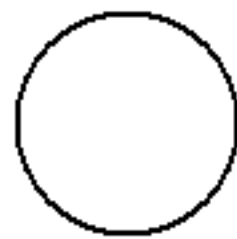
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员，不但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且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每一个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中，什么是我们的行动的指南呢？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什么是我们的理论武器呢？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共产党人进行修养的过程，必然同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深入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过程。

学习马克思主义太重要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没有灵魂，没有理想，没有方向，没有武装。为了革命，为了做一个好的革命者，我们必须认真地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请教，认真地向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请教。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经常任务，而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更是一项迫切的战斗任务。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着极其尖锐的斗争。现代修正主义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1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是帝国主义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适应国际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本国资产阶级的需要，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为了识破现代修正主义的假面具，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我们应当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百战百胜的武器，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讲的话，把现代革命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的话，同老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讲的话，进行仔细的对照、比较和认真的思索、研究，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参加革命实践和学习革命理论，是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革命能力，不断地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的重要方法。但是，无论参加革命实践或者学习革命理论，都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才能够真正接触思想，在锻炼和修养中取得好的效果。刘少奇同志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很值得引起深思的现象：几个共产党员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同样地受到党的教育和训练，但是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对于这种实际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每个党员的思想改造贵在自觉。每一个人的头脑内部的矛盾，归根到底，要通过内在的自觉的思想斗争来解决。

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自觉，必须把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实践同进行党性修养紧紧地联系起来。在学习中，我们不能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要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实践中，又要时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检验自己的工作，总结自己的工作，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只有采取这种自觉的态度，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在学习和实践中产生真正深刻的变化。

修养要靠个人的自觉，同时，也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党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组织生活，同志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这样一种推动我们进行锻炼和修养，使我们不断地增强党性、及时地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的伟大的集体力量。这种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对党员进行监督的制度，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好传统。我们大家都应该珍惜它，维护它，发扬它，通过集体的努力，使我们在这样一种有高度原则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空气中，互相关心，互相规劝，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 and 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我们党对党员的要求也更加高、更加严格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在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中自觉地改造自己，认真地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这篇著作，身体力行，加紧进行锻炼和修养，为永远保持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努力。



論我國農業的集約經營問題

· 趙 天 福 ·

在農業生產上，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是農業擴大再生產的兩種方法。在社會主義農業的發展過程中，農業的集約經營，是農業擴大再生產的根本路綫。在我国的具體條件下，農業集約經營的路綫更加具有重要的意義。

什麼是農業的集約經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在經濟學上，我們把集約耕作理解為資本在同一土地上的集中，而不是在并存各個土地上的分散”^①。列寧在《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這一著作中，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明。他指出：“農業集約化的過程，即以牲畜、機器、改良種子和改良耕作方法等方式投入每個單位耕地面積上的資本的增長”^②。他還把單位耕地面積上投放的勞動力數量、肥料、農具、機器和牲畜的價值作為反映農業集約化程度的指標。馬克思和列寧在這裡所說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業的集約經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同樣存在農業的集約經營問題，只是投放在土地上的投資，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那樣作為榨取利潤的“資本”，而是作為國

家和集體為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而追加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農業集約經營的實質，就是借助於活勞動和特別是物化勞動的追加，借助於科學技術的應用，使一定面積的土地獲得最充分的利用的問題。農業集約經營意味著不斷擴張自然界利用的深度和廣度。它的任務是在不斷降低單位產品勞動消耗的同時，從每一畝既經利用的土地上，首先是耕地上，獲得不斷增長的農產品總量。

從農業生產發展的歷史看來，農業生產是不斷朝着集約化的方向發展的。在農業生產發展的歷史上，隨着農業生產條件的不斷改善，隨着農業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業集約經營的水平也在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朝着集約化的方向發展，這是由土地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特點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在農業生產中，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資料，而這種生產資料作為一種自然體是不能用人力增加的。人們可以改造自然，可以把不能利用的土地變成可以利用的土地，但是不能創造出新的土地。因此，農業用地面積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2頁。

② 《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頁。



的扩大，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这一特点，就决定了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归根到底必须依靠集约化的方法。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又一个特点是，它在合理使用的条件下不仅不会变坏，不会磨损，而且会变得更好，生产能力更高。马克思指出：“丰度虽然是土地的客观属性，但在经济方面常常包含一种对农业化学发展状态和农业力学发展状态的关系，并且要跟随这种发展状态而变化”^①。这就是说，土地的自然肥力虽然是土地的一种固有属性，但是，土地的经济肥力，即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的总和，却是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不断增长的。因此，土地面积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土地的生产能力却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②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这一特点，就为依靠集约化的方法来实现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

农业集约化发展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由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列宁曾经指出：“在理论上，把任何数量的资本投入任何数量的土地都是可以设想的，自然，‘这要取决于’现有的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等等，全部问题正在于这一个国家在这一个时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③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个体农民为了增加产量，不得不在有限资金的条件下，从有限的土地面积中，依靠集约经营的方法提高农业产量。但是，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狭

小，经济力量薄弱，生产技术落后，因而对土地大量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不可能的。小农经济充其量只能依靠不惜浪费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和牲畜的力气与体质的可怜办法，在十分有限的程度内实行集约经营。列宁在驳斥“小农经济稳固论”时写道：“小耕作业是靠种种掠夺式的方法来支持的，如浪费农民的劳动和有生力量，浪费牲口力气和体质，浪费土地的生产力。”^④由此可见，小农经济是不利于农业集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经济、技术和文化条件的进步，为农业集约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者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越地位，不断地采用新的技术来提高农业集约化的水平。最近二十年来，在有利于集约经营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经营者，愈益把集约化当作获取超额利润和保持优越地位的主要方法。但是，应当指出，资本主义农业集约化的发展，不仅要以千百万中小农户的破产作为代价，而且也只能在有利于追求利润的目的的范围内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和

-
-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1页。
 - ②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16页。
 - ③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1页。
 - ④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7页。



资本主义制度所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与城乡对立，却又使农业的集约化经常遭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土地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者，不得不为租用土地或购买土地付出高额地租或地价。这就使可以用于农业生产上的大量资本流入地主的手中。土地私有制还使农业经营者不愿对土地进行提高土地肥力所必需的长期性的固定资本的投资，因为，这种投资一经固着在土地上，在租约期满不能从生产中全部回收投资效益时，就要无偿地落入地主的口袋里。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农产品价格下跌，生产资料却仍然在垄断财团的控制下保持着很高的价格，而地租、税金又仍须按租约和政府的规定如数交纳，这样，就迫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者，在“生产过剩”和资金困难的压力下，不仅必须缩减耕地面积，也往往必须削减单位面积上的投资。例如，美国一九三〇年化肥的总消费量曾达到八二二点二万吨，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侵袭下，到一九三三年竟下降到四九〇点八万吨。一九五八年以后，美国农场的净收入减少，化肥的消费量几乎没有增加。由此可见，即使在物质技术条件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却远不能充分发挥这些物质技术条件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作用。

不仅如此，资本家为了利润，还经常利用各种“科学”技术对土地的肥力进行掠夺，使自然资源遭受到难以挽回的破坏。美国的农业科学家们不只一次悲叹地指出，美国数亿英亩遭受严重水土流失的耕地，正在片面

地施用化肥追求利润的目的下加速其毁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不仅是劫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并且是劫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限定时间内增进土地丰度的方法的每一种进步，结果都成为丰度永久源泉的破坏上的进步”^①。

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需在不断使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说过：“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②在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中，提高社会主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道路，就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就是借助在先进科学技术不断利用的基础上加强农业集约经营。社会主义制度为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已经掌握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企业手里，生产的不再是为了私人的利润，而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土地成为全体人民子孙万代赖以生存、发展的宝贵财富。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农业集约化的发展才真正具有了无限广阔的前途。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9页。

^② 《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第388页。



二

按照集約化的路綫发展农业，这对于我国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广大富饒的土地上，虽然有广大的可垦荒地可以开垦，但是，大部分荒地开垦起来还需要經過长期的勘察設計工作和龐大的基本建設工作。有些荒地虽然能够开垦，但是为了农、林、牧的正确結合，还需要有計劃地留作发展牧业和林业的基地。从另一方面看，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精耕細作傳統的国家，但是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还是十分粗放，单位面积产量还是很低的；就是已經精耕細作的地区，也还只是在比較落后的技术条件下，依靠手工劳动进行生产，因而单位面积产量也仍然較低。这就是說，我国全部已耕土地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在适当开荒的同时，通过集約化的方法来提高我国原有农业用地，特别是提高原有耕地上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此外，更重要的是，我国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为实行农业集約經營，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創造了优越的条件。我国有几亿勤劳勇敢和具有无穷智慧的劳动人民，有数千年农业生产的宝贵經驗和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資源，如果再加上利用各种可能的先进农业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約化水平，就会使我国現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土地肥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得到迅速的增长。

因此，建国以来，党和政府虽然根据农

业增产和改进农业生产布局的要求，也十分重視荒地的开垦事业，但就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方針來說，則一貫坚持通过集約經營来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根据这个方針，全国农民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支援下，在大力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为提高农业集約化水平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斗争，其中包括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兴修水利，推广良种，扩大复种、間作、混作和套作面积，防治病虫害，进行工具改革，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实行农、林、牧結合等等卓有成效的农业集約化措施。为了打破“增产到頂”、“地力有限”等阻碍农业集約化的保守观点和探索集約耕作的經驗，党和政府还提倡各地农民和农村干部建立“試驗田”、“丰产田”等集約化耕作的样板。与此同时，国家还实行了增产不增稅、增产不增购或增产少增购等有利于农业集約經營的农业稅稅收政策和农产品收购政策。

由于党和政府积极帮助农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从工业、商业、財政等各方面支援农业，我国农业的集約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以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为例：全国耕地的复种指数，一九五二年为一三〇点九，一九五七年增加为一四〇点六。耕地的灌溉面积，一九四九年为二点四亿亩，一九五七年增加为五点二亿亩。粮食作物的良种推广面积，一九五二年不足粮田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五，一九五七年已經达到百分之五十五点二。棉花良种的推广面积，同期內扩大了将近一倍，一九五七年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三点



九的棉田实现了良种化。每百亩耕地面积上平均的大牲畜头数，一九四九年有四点一头，一九五七年增加到五头。每百亩耕地面积上平均的猪的头数，同期内由三点九头，增加到八点二头。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方面，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化肥的年供应量增长了五点一倍，农药增长了八点九倍，农药械增长了近一点六倍，双轮带犁增长了九十四倍，排灌动力机械的马力数增长了十九倍。国家每年供应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期内增长了一点三倍。

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在保证我国农业总产量的稳步增产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二五，但粮食的总产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一，棉花的总产量则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九，农业总产值则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点一。这就证明了，我国建国以来所实行的农业增产的路线是十分正确的。

我国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农业集约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有利条件，为我国农业实现以现代化技术操作为主的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前提。在全国农业集体化以后，党和政府总结了各地的农业增产经验，研究分析了我国进一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各种有利条件，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了全国各地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方面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各种集约化措施。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

下和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我国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现代化生产资料的供应都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增长。例如，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年中有效的灌溉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亿多亩，排灌设备增加了八倍左右，拖拉机增加了两倍左右，“农业八字宪法”在广泛的实践中更加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使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进一步得到了提高。特别是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在物质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人才方面，积极地、尽可能地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党的这一伟大号召对于推动我国农业集约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全党全民对农业大力支援的大好形势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时很好地总结和运用农业集约经营的经验，充分发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就一定能够以快速的步伐前进，我国农业集约化的



水平，就一定能够很快地提高。在今后不需要很长的时期内，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目标。

三

根据我国十多年来农业集约经营的经验，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为了使我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进一步迅速提高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今后在农业集约经营方面，必须注意全面地讲究经济效果。

社会主义农业集约经营的经济效果，包括着单位面积土地利用的效果和单位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时间与活劳动时间）消耗的效果这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效果的大小，用单位面积产量来衡量。单位面积产量高，土地利用的效果就大，单位面积产量低，土地利用的效果就小。后者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单位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产量多，或单位产品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较少，则劳动生产率高；单位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产量少，或单位产品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较多，则劳动生产率低。向一定面积的土地上追加投资，只要所采取的措施在农业技术上是合理的，它总能不同程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是，它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则要取决于追加投资的耗费与增产幅度的对比关系。如果增产的比例大于追加投资的比例，则不仅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如果增产的比例等于或小于追加投资的比例，则虽然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而劳动

生产率不一定就能提高，甚至还会降低。

从农业集约化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是不断提高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一定面积的土地追加投资，不仅会带来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必然会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消耗。那种认为对一定面积的土地继续追加投资，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土地报酬递减律”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为了促进农业的集约经营，必须同这种反动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同时应该看到，在农业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可能大幅度地提高。在技术条件还没有很大改变的情况下，对一定面积的土地过多的追加投资，虽然能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不一定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是否应当向土地追加投资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具有重大的国民经济意义。片面地强调劳动生产率而忽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其结果必然导致在生产上不能发挥劳动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潜力，降低农业增产的速度。

但是，在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也决不应把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看作是无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能降低生产成本，就不能进一步满足提高集约化水平对于资金和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也就不利于单位面积产量的进一步提高。



那种不考虑劳动生产率，不计成本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在对土地追加投资时，必须根据国家 and 企业的需要与可能，对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的效果加以统一考虑，力争做到使两方面的效果都能得到必要的提高。

在考虑投资的经济效果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投资关系会存在矛盾。有些投资措施，例如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增施化学肥料等，相对的有利于减少活劳动的投放，甚至能够绝对的减少活劳动的消耗，但需要投放较多的物化劳动，即生产资料；有些投资措施，例如增施农家肥料，增加田间管理用工，增加简易农田基本建设等，相对的有利于减少物化劳动的投放，但需要投放较多的活劳动。在处理这种矛盾时，应当根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供应情况。在劳动力相对不足而生产资料或资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应当把能够减少活劳动更多增加物化劳动的投资措施放在主要地位。在生产资料或资金相对不足而活劳动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采用能够相对减少物化劳动更多增加活劳动的投资措施。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物质技术条件的加强，在农业生产的投资中，物化劳动的投放将日益居于主要地位。但是我国目前，生产资料，特别是需要用现金购买的生产资料，还受着资金积累和工业发展水平的限制，相对的不能满足需要，而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却十分富裕。因此，在选择追加投资的方法时，应当更多地注意相对地减少生

产资料的支出，用相对宽裕的活劳动来代替一部分相对不足的物化劳动。这样，不仅能够更快地促进当前农业集约化水平的提高，而且能够充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在考虑追加投资的经济效果时，还存在着长远效果和当前效果的矛盾。例如，在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区，把资金和劳动力更多的投放在当前农业生产上，有利于当前的增产，但不利于具有长远经济效果的水土保持工作的进行。反之，把资金和劳动力更多地使用在水土保持工作上，从长远来看虽然经济效果很大，但是影响了当前的增产效果。在处理这种矛盾时，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可能使用的劳动力和资金，在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上进行统筹安排，使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互相结合起来。

在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时，还应当考虑投资的多少和收效的大、小与快、慢问题。大型的或高标准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生产后，增产增收的效果较大，但是投资较多，技术条件要求较高，建设时期也较长。小型的或简易的农田基本建设，投入生产后，往往增产、增收的效果较小，但是它具有投资少、技术条件要求低、而建设时期又较短的优点。在处理这种矛盾时，应当根据资金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和国家对于增产需要的迫切程度来考虑。在我国目前时期，资金和技术的力量都尚有限制，而国家对于农业增产的要求又很迫切，因此，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时，应当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一般的要



首先選擇投資少、收效快的措施。這種措施，在生產上雖然發揮的增產增收作用可能較小，但是，一方面，它投資少，易于興辦，便于發揮群眾的力量，普遍開展；另一方面，它能較快地投入生產，較早的發揮增產、增收的效果。當然，在優先進行小型農田基本建設工作時，對於大型的農田水利建設工作，也不應該忽視，而應該根據生產發展需要和資金、技術力量的情況，分別緩急，有計劃地進行安排。

由此可見，農業集約經營並不是簡單地對土地追加活勞動和生產資料。它必須既考慮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又考慮提高勞動生產率；既考慮活勞動的消耗，又考慮生產資料的支出；既考慮當前經濟效果，又考慮長遠經濟效果；既考慮投資收效的大小，又考慮投資收效的快慢。只有全面考慮這些要求，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安排追加投資的方式和方法，才能正確有效地進行農業的集約經營。

黨和政府根據農業集約經營必須全面講究經濟效果的要求，不斷強調在農業生產建設中必須加強勤儉辦場、勤儉辦社的思想，必須在發揮革命幹勁的同時，加強科學的經濟核算思想。對於農業生產上的每一筆投資，每一項措施，都要求既算增產賬，也算消耗賬；既算節約勞動力的賬，也算節約現金開支的賬；既算勞動生產率和每個勞動日增產增收的賬，也算每個勞動力利用率和每個勞動力全年增產、增收的賬；既算當年增產、增收的賬，也算長期增產、增收的賬；

既算增產增收效果大小的賬，也算投資多少與收效快慢的賬。我國農民在黨和政府的指導與幫助下，根據切身體會，已經逐步提高對核算投資效果的重要性的認識，逐步提高了經濟核算的工作方法。今後在鼓足沖天幹勁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經濟核算思想，將肯定會使我國農業集約化的發展取得更加巨大的成就。

四

為了使我國農業的集約經營獲得最大可能的經濟效果，不斷提高農業集約化水平，必須採取經濟有效的有利於農業集約經營的措施和提高農業集約化水平的途徑。在我國當前時期，需要特別重視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開展農業企業的多種經營。

農業生產有強烈的季節性。在生產過程中經常出現勞動過程的間斷。這種間斷“不是勞動過程由勞動力自身的自然限制引起的中斷……，而是由生產物及其形成過程的性質引起”^①。因此，農業生產在一個季節里對於勞動力 and 生產資料需要很多，在另一個季節里則需要很少。如果按某一種作物生產的農閑季節來配備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就會遠遠不能滿足農忙季節的需要，嚴重地影響農業生產；如果按其農忙季節來配備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就會在農閑季節造成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很大浪費，嚴重地影響勞動力利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81頁。



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决这种矛盾的有效办法，就是在进行农业集約經營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开展农业企业的多种經營，把各种需要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但在時間上不一致的副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正确地結合起来，做到使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合理地充分地使用，使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农业集約經營。

多种經營不只是克服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差别，均衡有效地利用劳动力、生产工具和設備的良好方法，也是提高土地利用效果的有效方法。土地利用效果的大小，不只是表现于企业平均每一亩耕地上的农作物产量，而且还往往表现于企业所拥有的每一亩农业用地的各种农副产品总量上。任何单一的生产活动，都不能使企业土地利用的效果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只有把农、林、牧、副、漁各种生产活动同时开展起来，才能使一定面积的土地上生产出最大可能的产品数量。

多种經營又是改善土地肥力的一种經濟有效的方法。例如，进行农、牧結合就能够最經濟地供給土地以丰富的有机肥料。

多种經營还有许多其他好处，如使农业企业中原来許多沒有多大使用价值的农副产品，轉化成为非常有用的产品，使农业企业能够更多更及时地获得現金收入等等。

由此可见，只有开展多种經營，才能使对一定面积的土地不断追加劳动力和生产資料在經濟上成为可能，才能为农业集約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开辟道路。

但是，应当指出，并非任何样式的多种經營都是正确的。首先，在我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就全国一般地区來說，多种經營必

須优先保证粮食的增产；就棉花和各种經濟作物的商品产区來說，必須保证这些作物产量的增产。不根据国家計劃的需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和資金，去开展次要的多种經營活动，当然是不正确的。其次，农业企业的多种經營必須以农业、畜牧业互相結合为基础。因为，农业和畜牧业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基本部門，只有充分发挥它們之間的相互促进作用，农业集約化才能有真正巩固的基础。最后，开展多种經營活动必須精打細算，讲求实效，根据劳动力、資金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避免脱离实际、不分緩急、百业俱兴、同时上馬的分散人力、物力、財力的錯誤作法。

第二，采用现实可能的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

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追加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經濟效果，同采用什么样的农业技术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落后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对土地大量的追加劳动力和資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一定是經濟效果較低的。因此，不断地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就成为农业集約經營的必要条件。

我国农业生产的实践經驗证明，在我国現有的生产条件下，农业的增产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要我們加强农业技术措施和不断采用现实可能的先进农业技术措施，我国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就可以大大提高。許多事实說明，許多地方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經濟条件和其他地方差不多，但是，单位面积产量却大大高于其他地方。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十分重視具体的农业技术措施的加强，并在现实



可能的条件下，积极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如果其他地方也像这些地方一样，注意加强农业技术措施和积极采用现实可能的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那末，我国农业的增产潜力，就可以在现有的生产条件下，更好地发掘出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就能够保持稳产和高产。

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方面，我国农、林、牧、副、渔各个生产部门，已经积累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先进经验。在农业增产措施方面，毛泽东同志所总结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这方面的最突出的代表。“农业八字宪法”的每一项措施，都是实行农业集约经营、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措施时，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科学地加以运用，只有这样，农业集约化的经济效果才能够得到最大可能的提高。

为了使各种先进技术措施的追加投资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一、多种技术措施正确地结合。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动物、植物等有生命的东西，它们的成长发育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孤立地采取部分技术措施，保证其部分条件，而忽略其他必要条件，就会使投资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无论农、林、牧、副、渔任何一个生产部门，在追加投资时，都要求根据其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特点，采取有利于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综合技术措施。“农业八字宪法”的主要精神之一，就是揭示了在农作物栽培的技术措施上，必须“土、肥、水、

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统筹兼顾。这就要求在安排劳动力和资金的追加投放时，必须对各种技术措施的要求都给以适当的保证。

二、掌握各项技术措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合理限度。从农业生产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农业技术措施的应用是没有限度的。但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各项农业技术措施又分别具有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限度。超越了这种限度，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就不合理。例如，密植这一措施，在有关农业技术措施的充分配合下，在农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可以适当地提高密植程度。但是，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一定的劳动力和资金的条件下，过分密植，就可能达不到增产的要求。即使可以增产，但在经济上也可能失去实际意义。因此，在运用各种农业技术措施时，必须掌握其在现实条件下的合理限度，做到合理深耕，合理密植，合理用水，合理施肥等等。

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确定应当采取的重点技术措施。各种技术措施对农业的增产意义，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是大不相同的。在对各种技术措施追加投资时，应当首先保证经济效果最大的技术措施的需要，然后照顾到其他措施。例如，在易涝或易旱的地区，水利措施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雨量充沛、生长期较长的地区，增施肥料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底层土壤好、表层土壤差的地区，深耕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水、肥、土条件较好、生长期长的地区，密植、套种、复种等措施具有突出的经济效果，等等。因



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抓住关键性的技术措施优先投资，这是保证农业集约经营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原则之一。

第三，逐步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建立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使一定面积的土地经济有效地容纳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就必须不断提高各种技术措施应用的技术限度和经济限度。这在我国现有的农业技术基础上是不容易普遍办到的。为此必须实现整个农业技术条件的根本改造，为我国的农业建立新的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包括着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等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各个方面。从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终要求来看，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是主要环节和主要标志。因为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手段——劳动工具——的现代化。它的作用不仅是直接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而且也是实现水利化和化学化的必要条件。没有机械化生产工具的直接应用和机械化所解放出来的大批劳动力，要在我国实现水利化固然是难以设想的；就是要实现高度的农业化学化，如施用化肥，化学除草，化学防治病虫害等，也是困难的。因此，只有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才能有利于促进“四化”的全面实现，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总量。

当然，要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经济效果，也必须要有水利化和化学化的配合。只有根据国家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使它们发展的步调尽可能地协调起来，才能

在农业生产上保证“农业八字宪法”的各项措施综合贯彻，收到相得益彰的成效。

但是，由于我国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投放在农业技术改造上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有限的，而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又大不相同，“四化”的各个方面在这些不同地区所表现的经济效果又大有差异，因此，在实现农业“四化”的步骤上，也应当因地制宜，有所区别。

在地形复杂和精耕细作水平较高的地区，在适宜于这里的农业机器尚未解决之前，在集中力量解决农业机械器的同时，化学化，主要是化肥化，宜于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些地区使用化肥的优点是：

一、它能直接大幅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根据我国的经验，在目前农村施用农家肥料的一般水平的基础上，一斤化肥（硫酸）可以增产粮食（水稻、玉米）四斤左右。在一定限度内，在单位面积上继续增施化肥，可以继续按同等效果起到直接增产的作用。

二、它能显著节约劳动消耗。在目前施肥水平条件下，我国农村积肥、送粪、施肥的用工，一般占全年用工总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如果进一步提高施肥水平，用工量所占的比例还要大大增加。如果在增施有机肥料的同时，增施部分化肥，就能够节约大量的劳动消耗。

三、它的使用技术容易掌握，便于推广普及，收到实效。

有些同志认为，施用化肥会造成对土壤肥力的掠夺，会使土壤盐碱化。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农业经



营家为了追求利润，竭力掠夺土地肥力，就片面地使用化学肥料。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将不会单纯地使用化学肥料，目前更谈不到单纯使用化学肥料。此外，使用化学肥料不仅使籽粒增加，而且能够促使植物的茎叶繁茂，这样，就会进一步为增加土地的有机质提供有利的条件。在有机质和化学肥料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土壤的肥力不仅不会遭到破坏，而且必然会不断地提高。

在我国广大的水田地区和易旱易涝地区，水旱灾害是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虽然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抗旱抗涝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我国对于水旱灾害的控制能力仍然很低，每年仍然有几千万亩到数亿亩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我国水利建设的经验证明，在这些地区如果能够很好地做到及时排灌，化水害为水利，就不仅可以大大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且可以有效地克服经常旱、涝失调和“靠天吃饭”的局面。因此，水利化在这里具有保产和增产的双重经济效果。水利一向被视为农业生产的命脉。这就决定了在这些地区，必须把水利化作为农业技术改造的先行。

这些地区一般又都拥有丰富的地上水或地下水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且具有长期同旱涝灾害进行斗争的宝贵经验。目前我国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和机器排灌的物质技术问题又已经获得基本解决。所有这些有利因素，将会使得今后在这里投资于水利建设，发展现代化的机器排灌事业，能够收到更加显著的经济效果。

在地势平缓、人少地多、劳动力和畜力

比较紧张的粗放农业地区，田间作业的机械化是当前提高农业集约化经济效果的主要关键。因为第一，这些地区土地连片，作物单纯，作业地块较大，便于我国当前可以大量提供的农业机械（主要是大型拖拉机和其牵引农具）发挥效率，有利于降低机器作业的成本。其次，由于劳动力不足，这里原有的耕作基础比较粗放，使用大型农业机具能够满足当地农民对于作业质量的要求。第三，在这里使用机器提高田间作业的劳动效率，可以节省出当地十分缺乏的人力和畜力，进一步提高精耕细作水平和扩大耕地面积，从而可以显著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总产量。因此，在这些地区，优先发展田间作业的机械化，就会收到更大的经济效果。

至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中城市郊区和集中的商品粮、棉基地，国家可以集中力量重点扶持，这些地区的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可以在全国先走一步，以便为将来在全国大规模推行“四化”积累经验。

应当强调指出，我国农业集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决不是一些生产安排和技术措施的经济效果问题。没有不断巩固发展的集体经济，不善于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任何在计算上具有经济效果的出资方式，都会在实际上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因此，在考虑我国农业集约化的问题时，任何时候都应当把巩固发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提高农民群众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



提倡现代剧

何明

在我们国家里，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深入，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戏剧，也开始了一个革命的变革。这个变革的主要内容是：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现代剧，要起而争夺历史赋予自己在舞台上的主要地位。这是舞台上一个革命。

由于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在前一时期的舞台上，仍然是表演帝王将相、丫环小姐的旧剧占居主要地位。这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不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变了，时代变了，观众变了；戏剧的状况也必须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

基础，为现代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现代剧的产生和发展，又必然反过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顽强地起作用，所以，现代剧对于旧剧的舞台地位要取而代之，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看来，“取而代之”的条件已经基本上成熟了：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代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

都掌握了大量观众，广大的戏曲工作者，也积极地为推陈出新作出了很好的成绩，创造了許多宝贵的经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万事万物都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的，戏剧当然也不会例外。当着现代剧要起而取代旧剧的主要舞台地位的时候，当着广大观众欢迎现代剧、广大戏曲工作者决心当促进派的时候，也出现了它的对立面——摇头派。

非难和否定现代剧的人，可以为自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从戏剧必须为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基本观点来看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剧，要让它占居舞台的主要地位，因为它是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历史上一切文艺作品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新内容。所以，不论历史上有多么优秀、多么丰富的遗产，也不能代替我们今天的创造。这是不是“题材决定论”？不是。因为，谁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断言，以历史为题材的剧就一定不好，以现代生活为题材的剧就一定好；问题是，第一要看政治内容，第二要看艺术水平。不过，说到这里，还只是说到问题的一半。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一半：好的历史剧可以古为今用，但是，究竟不能起到直接推动当前革命运动的作用；历史剧题材的局限性是不能不承认的。

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代剧，是以今天的现实生活为题材，以今天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作为艺术的创造源泉，它是直接推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武器。它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和鼓舞人们



正确对待和积极参加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它所塑造的体现着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形象，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在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方面起着重大作用。旧剧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吗？充满着封建观点的旧剧，不用说对于人们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改编出来的旧剧（这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应该把它摆到适当的地位），虽然会给人以历史知识和智慧上的启发，但也难以起到直接推动当前革命运动的作用。例如，能够让观众从改编的《将相和》，或新编的《武则天》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学到共产主义道德吗？显然，这是做不到的。

我们不能让古人带有社会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如果硬要机械地以古喻今，那就会走上把古人现代化的道路。结果既歪曲了历史，又歪曲了现在。只有当现代剧在舞台上占居了主要地位的时候，两相对照，今昔对比，好的历史剧才能在教育人民方面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提倡现代剧，这是整个戏剧改革的主流；而改编传统的历史剧，只能是支流。否则，老是在老主题、老故事、老框子里打圈子，结果，必然使艺术停滞不前，脱离时代精神，脱离人民的火热斗争。这对于艺术的发展，也是很不利。

艺术性太差——现代剧的艺术性是不是太差？各个阶级都有各自特殊的审美观点；我们希望那些用艺术性太差来非难和否定现代剧的人，不要用陈旧的审美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戏剧，不要总是在习惯势力的支配下随便下判断。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进步。”我们今天的现代剧，创造了许多感人的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反映了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概括了生活的矛盾和斗争，有着深刻的革命的主题，在戏剧史上写下最辉煌的一页。这种戏剧是有相当高的艺术性的；这种革命的艺术经验，是历史上一切戏剧还没有提供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许多现代剧已经十全十美了；而是说，不应当用旧的艺术标准去衡量它。我们并不否认，有些现代剧，就其艺术性来说，可能还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例如在表演技巧上，在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上，可能还不及某些传统剧目成熟。但问题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熟悉戏剧史的人都知道，优秀的传统剧目，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完美的艺术性，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期的许多人的加工过程。人们有什么理由对现代剧的艺术性横加指责呢？一个革命者，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直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现代剧，难道不应该采取热情地关心、爱护和促进的态度，使它迅速地艺术上成熟起来吗？

关于艺术性，还有一个问题：有人对以旧剧形式演新内容的现代剧，特别反感。他可以给你举出若干条所谓形式和内容不协调的例子来，作为非难现代剧的根据。其实，这里头包含着他们的不少偏见。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某些以旧剧形式演新内容的现代剧，确实还多少存在着一些形式和内容不够协调的缺点。但是，这里还是作为一个革命



者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采取积极的促进的态度，帮助有关方面总结经验，更好地利用、改造旧形式，使形式和内容逐渐协调起来呢？还是采取消极地站在一旁，冷言冷语，或者漠加反对的态度呢？

一般说来，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内容起着主导的作用。我们相信，体现着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现代剧，是能够成功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的。一方面由于反映新内容的需要，在形式上必然会有新的探索、突破和革新。另一方面在打破了旧形式的束缚后，将会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形式。有一些古老的剧种，由于表现新人物、新生活的需要，已经在开始创造新的表演技巧和程式。事实证明，那些经常演现代剧的许多剧种，不但可以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也可以创造新形式。这样，就既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能改进自己的不足，在艺术实践中，放出新的光彩。我们希望，在广大戏曲工作者积极创作现代剧、许多剧种已经获得了较成功地演现代剧经验的时候，真正关心它的艺术性的人们，应该是努力帮助有关方面总结这些经验，使之更加完美，而不是消极指责，一味摇头。

列宁说过：“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富有推动力量，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无论是新的或旧的形式……。”^①

列宁这段话不是针对戏剧改革说的，但

它的基本精神，对于戏剧改革也是适用的。我们可以说：以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为内容的现代剧，以及以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为内容的现代剧，既然它的内容“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富有推动力量”，那么，它当然也能够成功地改造、利用和征服一切旧形式。

在我们国家里，有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现实基础，有非常丰富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经验，又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强有力的指导，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剧，将会比较迅速地改造和征服新形式；也能迅速地改造和征服旧形式。

这样，我们的现代剧就能取得并且巩固自己在舞台上的主要地位；而取得和巩固了这种地位，它就会在思想战线上发挥巨大而又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

这样，我们的各个剧种，我们的各种戏剧形式，也会健康地、蓬勃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各种戏剧表演者，也会在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社会主义事业、为戏曲的百花齐放，做出更好的贡献。

演革命戏，演现代戏，也是一个革命。在这个革命面前，我们要反对那种抱残守缺、迷信过去的保守态度；应该满怀信心地提倡现代剧，满腔热情地热爱现代剧。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现代剧一定会以革命的内容和革命的风格，在社会主义的舞台上，占居主要的地位，开放灿烂的花朵。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4—85页。



现代剧与艺术趣味

· 王朝闻 ·

在当前的艺术活动里，在对待反映革命内容的新戏剧上，出现了一种对立的现象：那些用无产阶级观点来认识现实，既集中地表现了当代观众的新要求，也适应了当代观众的新要求，既是很好的教育工具，也是很好的欣赏对象的现代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为党所重视；和这同时，却也有一些人对于这些尽管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却只有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够产生，在质量上显示了飞跃进步的现代剧不感兴趣。

人们的艺术趣味不能也不应要求完全一致，革命者的艺术趣味在基本倾向一致的前提下，是会有个人差异的；但是当自己的艺术趣味和广大群众的艺术趣味对立时，却有必要找出，造成这种对立的原因是什么。

某一个戏的演出能不能引得起观众的兴趣，有作品本身的原因；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太差，当然引不起观众的兴趣。就观众的主观方面来说，如果他的审美标准、审美要求陈旧，那么，多么成熟的新戏也很难引起他的爱好。戏剧欣赏是一种复杂现象：由于个人具体条件的差异，同一阶级的观众对于同一戏剧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同一观众在

不同时期欣赏基本上稳定了的同一戏剧的演出，这一次和另一次的具体感受也很有出入。但是，不管这一切现象如何复杂，作为一定阶级成员的个人，艺术趣味的基本倾向，却总是要受他的审美标准和要求所支配，和他对实际生活的态度密切联系，归根到底是为他的世界观所决定。

投身于生活激流的革命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在热烈欢迎思想性、革命性较强的，反映了火热斗争的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不拒绝欣赏虽然娱乐性较强但内容健康的戏剧。而那些缺乏充沛的革命热情，对当前的革命斗争不感兴趣的人，却不愿接近思想性、革命性较强的艺术作品，对戏剧中那些尖锐的斗争生活不感兴趣，反而怪它单调，乏味。这样，他们就很难深入体验例如赵大大（《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双双（《李双双》）、王连生（《汾水长流》）的内心感情，对他们的爱憎产生共鸣；同时，也不会深刻理解陈喜（《霓虹灯下的哨兵》）、喜旺（《李双双》）、林育生（《年青的一代》）以至姚母（《千万不要忘记》）的言行的社会意义。

新戏《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李双双》，《朝阳沟》，《年青的一代》，《汾水长



流》，《远方青年》，《千万不要忘记》等，由于它们具有强烈的革命内容，对观众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为广大观众所欢迎。但是能不能说，这些新戏受到欢迎的原因，仅仅在于它们只有教育作用，而没有审美作用？仅仅在于它们揭示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尖锐矛盾，向观众提出和回答了青年人以至成年人应当怎样生活的问题，再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袭和反对它的腐蚀与溶化的斗争，可是缺乏艺术魅力？——不，不能这样说。尽管新戏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艺术形象的完整性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是，只要对艺术趣味这一概念不作狭隘的解释，不把宅和喜剧性以至噱头等同起来，那么，不能不承认广大观众热烈欢迎的这些新戏，它的战斗性和艺术性是密切结合着的，它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工具，同时也是很有艺术魅力，堪称有趣的欣赏对象。

这些新戏在思想上艺术上的特点和成就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基本上一致的：它们在革命观点指导之下，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发展着的现实，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物、新品质、新思想、新风尚；而且这种反映，就其主题、题材、形式、风格而论，也是多样化的，其严正的政论性的思想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戏剧形式是统一着的；它既有较高的概括性而区别于生活本身，也有具体、多样的性格和冲突而区别于政论。譬

如在《千万不要忘记》里，戏开场不久就出现的关于工入干部家属应当不应当捡煤核的争执，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着手，展开地揭示了不同观点的尖锐对立，获得了严肃的思想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李双双》里的两个主角之间的许多引入发笑也引入深思的冲突，更加显得戏剧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的和谐一致。因为它引导观众进入角色的灵魂深处，不仅打动观众的感官，而且打动观众的心灵，它对观众说来，既是有益的，又是有趣的。

如果有人还是认为这样的新戏没有趣味，责任不在新戏本身；新戏也决不会迁就他那旧的趣味标准和要求，而改变自己应有的革命的健康的倾向。

艺术的变革过程，这一种艺术的兴起、发展和另一种艺术的衰落，就某种意义来说，不能不受一定阶级一定时代的艺术趣味所支配；同时，集中体现了一定阶级一定时代的趣味的艺术作品，又不可避免地要反作用于艺术欣赏，广泛影响人们艺术趣味的变革。这是艺术与欣赏的辩证关系。戏剧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反映了群众的欣赏需要，也体现着这种关系。

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立面的斗争：新趣味要代替旧趣味，旧趣味却在竭力保持和发挥它的影响。虽然任何违背先进阶级艺术趣味的趣味，都不可能阻止艺术不可避免的变革，但是，它在一定时期却



能起到妨碍新艺术发展的不良作用。为了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社会主义的艺术不能迎合少数人落后的艺术趣味。

当然，艺术趣味、艺术爱好应该有它广大的空间，应该承认个人的、地方的差异；人们的艺术爱好应该广泛些、多样些。反对不健康的旧趣味，绝不意味着主张趣味的狭隘和单调。但是，趣味应该是广泛的，又应当是健康的，应当是与时代的风尚、革命的气氛、人民群众的喜爱相一致的。只要不是仅对于革命事业而且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有责任感的人，当他觉察到他自己和广大群众对新戏的态度相对立的时候，至少不会把艺术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割裂开来，甚至武断地认为群众不会欣赏艺术，自己才能够对它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他也不会拜倒在形式上其实并不是十分完善，就其根本性的内容说来应当受到批判，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不相适应的，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戏剧之前，而夸大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戏剧的那些不难克服的缺点，抹煞它在思想上艺术上已经分明显示着的空前的成就；他不会以为只有旧戏才是真正有趣的欣赏对象，而对某些具有腐蚀作用的旧戏根本丧失警惕。

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看不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厌恶资产阶级趣味的赵大大，和陶醉在资产阶级香风里，嫌赵大大脸黑、古板、不灵活的陈喜，两人之间的冲突既是趣

味标准的冲突，也不只是趣味标准的冲突。在这种冲突里，揭示了两人已经大不相同的生活态度，表现了两人大有差别的思想感情。和坚持革命传统的赵大大不同，被资产阶级香风所薰醉了的陈喜，不仅改变了原有的趣味标准，也改变着原有对生活的态度。美与善的标准密切联系着，所以旧时代的评论者也承认：“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必然会堕落。”（狄德罗）而且这一戏剧表明：趣味不仅是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它还会反过来影响是非善恶的标准。陈喜与春妮之间的冲突，不是很明显地表现了趣味与思想意识之间的密切关系吗？

艺术趣味也是人们的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独立于其他意识之外。人们的艺术趣味的基本倾向，归根到底是他的思想感情的一种曲折的表现，是他对生活的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广大群众对新戏剧所以有兴趣，是因为从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生活，看到了自己的声音笑貌，看到了自己的理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艺术趣味，也是和他们生活上的低级趣味相一致的。

人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需要改造，人们的非无产阶级的艺术趣味也得随着世界观的变化而起变化。但是，趣味与思想的关系表现得比较曲折，有些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能够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在文艺欣赏上却有时候暴露出不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旧



趣味。这种现象，一方面因为人们的艺术趣味和他的欣赏经验密切联系，因而它往往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习惯势力而作用于他的审美判断。另一方面也与思想改造的程度有关。艺术趣味的变革，涉及到人的意识的深处，涉及到人的情感领域的改造。这方面的改造是困难的，但它是可能的。新的趣味可以培养，一定要培养。正因为艺术趣味和其他意识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我们既不当简单地排斥各种可以欣赏的戏剧，也不应当忽视妨碍思想改造的非无产阶级的艺术趣味的改造。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个人的爱好可以容许，但是必须和过去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的艺术趣味决裂，腐蚀战斗意志的旧趣味必须经过彻底的改造。不能认为沉醉于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歌颂对象的戏剧的人，其思想感情是得到了彻底改造的。

对于包括在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斗争中

起着很好的作用的新戏在内的新事物不感兴趣，不能认为这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要是容许、姑息自己的旧趣味，对思想改造有极大的危险。作为旧思想情感表现的旧趣味，显然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着人们思想感情的彻底改造，这在艺术活动中往往表现为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在理智上认为应当欢迎的戏剧，却对它缺乏由衷的爱，明知不应当欢迎的戏剧，却又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它）。怎样克服这样的矛盾，不是很值得进一步考虑和力求解决的问题吗？

在《千万不要忘记》里，有几句台词读来很有启发。受了岳母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青年工人丁少纯打野鸭子卖钱的行为，他的父亲老工人丁海宽是这样论断的：“他要真是打野鸭子卖钱，这可不是小事呀，一个工人，通过邪门歪道去弄钱，那就是一种堕落！卖野鸭子，就算它是不违法的，卖来卖去也会把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卖掉！”在艺术活动里，如果不警惕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艺术趣味的侵袭，也可能像打野鸭子卖钱的丁少纯那样，不是促进革命热情更昂扬，而是促使革命意志趋于衰颓。



把美国侵略者从巴拿馬赶出去

沙 丁

震动寰宇的第一声春雷

近一个月来，长期遭受美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爱国斗争。这是一九六四年震动寰宇的第一声春雷，它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志，并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風暴将有更大的兴起。

一月九日，巴拿馬人民为了抗議美帝国主义践踏巴拿馬国家主权的专横行为，坚持在美国霸占的运河区升起自己的国旗，遭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残暴镇压。美国侵略军用坦克、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巴拿馬人民疯狂射击，造成了死伤三百多人的大惨案。帝国主义的这一血腥暴行，激起了巴拿馬举国一致的愤怒和反抗，激起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严正抗議。

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为了表达他们对巴拿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声援和支持，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伸張正

义、反对侵略的示威运动。他们一致谴责美帝国主义蹂躏巴拿馬国家主权、血腥屠杀巴拿馬和平人民的罪行，坚决表示“要巴拿馬，不要美国佬！”“美国侵略者必须从巴拿馬滚出去！”哥斯达黎加“热带之声”电台强调指出：“在巴拿馬发生的罪行证明，如果人民力量不加以遏制，美帝国主义在采取镇压和野蛮行动方面是没有止境的。”烏拉圭左派解放阵线的成员组织——“东方革命运动”也发表声明说：“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应该保持警惕，加紧进行斗争，千方百计地一刻不停地反对美国殖民主义剥削，直到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全面彻底的解放为止。”

一月十二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热烈赞扬了巴拿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并宣布：“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毛泽东主席的谈话集中表达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支持巴拿馬人民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从十三日起，中国人民反美斗争的怒火燃遍了全国所有的大中城市和许多边远小城，参加反美示威运动的达一千六百万人以上。



在坚决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全球运动中，美帝国主义陷于空前狼狽和孤立的境地。他们惊呼：巴拿馬人民的反美斗争风暴使美国政府在推行侵略计划方面“遭到了一个新的挫折”，而且，在世界舆论战线上“遭到了惨败”。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报纸更是忧心忡忡地哀叹道：“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没有万灵药可以医治它的痼疾”；“现在，争取进步联盟——以美国政府名义作出的一大堆关于将有较好生活的冠冕堂皇的诺言——已经失败”。

运河区——美国侵略者的 扩张基地

为了摆脱自己“普遍受到批评”的困境，美帝国主义一面继续叫嚷巴拿馬运河区是“美国的土地”，美国“有公认的义务有效和安全地管理运河”，蛮横地对巴拿馬人民进行军事威胁；一面又花言巧语地施展骗术，说什么“美国力求遵循善邻政策”，希望“通过和平”来解决运河区问题，企图用谎言掩盖自己的罪责，欺骗世界人民。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一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声明中，不但无耻地说什么美国霸占巴拿馬运河是为了“国际商业的需要”，美国“同巴拿馬共和国的利益并不是不一致的”，而且反咬一口，诬蔑巴拿馬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暴民的袭击”，美国侵略军对巴拿馬人民的血腥屠杀是为了“抵抗侵略”。这真是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

十日所视，十手所指，美帝国主义对巴

拿馬人民犯下的侵略罪行，是绝对抵赖不了的。举世皆知，横贯巴拿馬地峡的巴拿馬运河区，从来就是巴拿馬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只是在美国侵略者的“大棒”政策的胁迫下，才沦为美帝国主义在国外的“国中之国”。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美帝国主义就已经积极策划，要在位于中美洲蜂腰地带的巴拿馬开凿一条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运河，以使用它作为对外扩张、首先是向中南美洲扩张的基地。通过一连串的阴谋活动，美帝国主义终于排除了英、法两国，在一九〇三年夺得了独自开凿巴拿馬运河的权利，并把一项奴役性的美巴条约强加给巴拿馬人民。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美国在巴拿馬地峡取得了一条十六公里宽地区的永久占领、使用和控制权，以及其他一系列特权。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宣称：“运河必须绝对处于我们的军事控制之下。”

美帝国主义对巴拿馬运河区的霸占，绝不像约翰逊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什么“国际商业的需要”，而完全是一种最粗暴地侵犯巴拿馬领土、损害巴拿馬国家主权的强盗行为，完全是出于美帝国主义奴役拉丁美洲和世界人民的需要。美帝国主义从它准备开凿巴拿馬运河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用它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

巴拿馬运河的通航，使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港口的航程缩短了万余公里。这对美帝国主义来说，首先在军事战略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通过这条“关键性的交通要



道和捷徑”，美国軍艦就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迅速調動，这大大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侵略和控制，便利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擴張，为美国同西欧帝国主义国家在各地、首先是在拉丁美洲爭奪霸权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美国著名軍事評論員鮑德溫承认，美国侵朝战争时的許多供应品，都是从美国南海岸和东海岸的港口經過这条运河运去的；对南越战争的供应，很大部分也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去的；在“古巴危机”发生时，数以千計的美国海軍陆战队同样是从西海岸通过这条运河送到加勒比地区的。因此，他強調說，“在美国控制下的巴拿馬运河，作为美国的‘后勤生命綫’具有巨大的积极的战略价值”。美国陸軍部长万斯一月十四日向新聞記者发表談話时，也強調美国在巴拿馬运河区的軍事安排对美国政府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美帝国主义还在“保卫运河”的幌子下，积极扩展它在巴拿馬的軍事基地，并在运河区訓練大批“反游击战部队”，用来进攻古巴和鎮压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一九六二年四月，美国派往危地馬拉鎮压当地人民爱国斗争的四百名“突击队员”，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去年六月，美国又宣布把設在运河区的“加勒比司令部”扩大为“美国南方司令部”，并建立了一支命名为“救火队”的特种部队，以便加强对拉丁美洲人民革命运动的軍事鎮压。目前，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拿馬国土上，美国共駐扎了上万名美国軍

队，建立了三十六个軍事基地，并用各种名目開設了許多訓練反革命雇佣軍人的学校。巴拿馬已經成为美帝国主义在国外建立的准备用来鎮压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基地之一，而首先遭受到美帝国主义軍事鎮压的，則是和平的巴拿馬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

美国强盜的巧取豪夺

美帝国主义还利用巴拿馬运河对巴拿馬人民进行經濟侵略，巧取豪夺。据估計，美国西海岸海运交通的百分之四十都是通过这条运河；美国从拉丁美洲各国掠夺来的大量农产品和矿业原料，美国同远东的大部分貿易，以及从加拿大西部运往美国的木材的百分之七十，也都要通过这里，这就使美国壟断資本大大縮短了貨运時間和节省了貨运費用，加强了竞争能力。数十年来，美帝国主义还一直独吞着經營这条运河的絕大部分收益，到一九五九年止，美国仅从通行稅中得到的利益已达二十五亿美元之多。現在，美国仍然独吞着运河收入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每年从經營运河中得到的收益高达一亿美元，而它每年付給巴拿馬的所謂“租金”，經過几次修改，仅只一百九十三万多美元。

美帝国主义利用运河和运河区对巴拿馬人民进行着敲骨吸髓的殘酷剝削。它不仅壟断了运河区的铁路和港口，包攬了巴拿馬的国内貨运，从中获取巨額利潤，而且还利用运河区免税的特权，大量傾銷剩余商品，禁



止巴拿馬的商品在运河区銷售，肆意摧殘巴拿馬民族經濟的发展。美国每年向巴拿馬輸出商品和劳务近一亿美元，而巴拿馬向美国的出口每年仅約一千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壟断的香蕉。美国还在巴拿馬開設了一百六十儿家大公司（截至一九六一年，美国在巴拿馬的私人直接投資为四亿六千八百万美元），搜刮巴拿馬的原料，剝削巴拿馬劳动人民。据統計，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期間，这些美国壟断公司就在巴拿馬攫取了三亿三千二百万美元的利潤。

巴拿馬人民的血汗养肥了美帝国主义，而巴拿馬人民自己却年复一年地过着极端貧困的生活。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的十二万巴拿馬工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到种种欺压，經常有五分之一的工作者失业，就业者的工資不及从事最简单工作的美国人收入的十分之一。在运河和运河区的管理机构中，百分之九十的高薪职位也都是由美国人壟断的。这些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国人，在运河区过着驕奢淫逸的生活，作威作福，无恶不作。在巴拿馬农村，被称为“綠色魔鬼”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分公司，霸占着巴拿馬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八的橡胶种植园，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巴拿馬农民却缺少土地，生活极为悲慘。据《拉丁美洲經濟概况》一九六一年的調查，巴拿馬人民在貧病交迫的情况下，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九点八。

巴拿馬人民千辛万苦地用自己的双手开凿了巴拿馬运河。据历史記載，由于劳动条

件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他們当中有六、七万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被称为“死亡的河岸”兩側的青山和黄土中，差不多每一公尺就留下了一具巴拿馬人的尸骨。但是，这条用巴拿馬人民的血汗和尸骨建成的运河，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霸占，却成为絞杀巴拿馬人民的绳索。美国侵略者通过巴拿馬运河和运河区，把巴拿馬人民的血汗抽干吸淨。正如巴拿馬一个社会活动家所說的：“这条航道本来应该成为通向光明的道路，可是現在却成了我国心臟的血淋淋的創伤。美国这样恬不知耻地支配着巴拿馬人民的财产和这样使用运河，不如把巴拿馬国徽上所題的高尚格言‘造福世界’换成‘造福美国佬’，这样说更确切一些。”

美帝国主义狂妄地把它对巴拿馬的殖民統治視为“永久性权利”，不仅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对巴拿馬实行种种控制，而且直接干預巴拿馬的内政，甚至不断通过政变推翻它不满意的政权。在这次巴拿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展开后，美帝国主义的喉舌美联社又在公开鼓动用軍事政变推翻現任政府，这家通訊社在报道美国陆軍把“小股军队調至运河边界”时，別有用心地說：“許多巴拿馬人担心三千人的国民警卫队（巴拿馬的陆軍）嘗試推翻恰里（总统）和抑制反美运动”。这不能不引起巴拿馬人民的警惕。

美帝国主义在巴拿馬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这个一貫以“自由”“平等”自我标榜的强盜头子，完全是以最殘酷的殖民手段来对待它的“邻邦”的。这一点，就速英、法等老



牌殖民主义者也难以隐讳，他们趁机攻击说，美国正在巴拿马“作为可恶的殖民主义者倒行逆施”。甚至美国的参议员也不得不被迫承认：“我们就像老式殖民者一样”，“我们正在得到报应”。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残暴的殖民统治，哪里就有爱国的正义斗争。从美帝国主义霸占巴拿马运河区的那一天起，巴拿马人民就一直在为收回运河区的主权、废除美巴不平等条约和赶走美国占领者而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三六年，巴拿马人民进行了英勇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第一次修改了美巴条约，并规定美国利用运河区以外的土地必须取得巴拿马政府的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四七年，巴拿马人民掀起了一系列反对美国在巴拿马强占军事基地的强大示威运动，巴拿马国民议会因此否决了美国续租基地的协定，从而迫使美国陆续撤出战时强租的一部分基地。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巴拿马人民的斗争，首都和各地人民举行了强大的反美示威游行。一九五七年，巴拿马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收回运河。接着，巴拿马大学生联合会也发表声明，强调收回运河是巴拿马人民不可改变的目标。一九五八年五月，巴拿马首都学生和市民又掀起了历时五个多

月的要求收回运河区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美国佬”的口号，并在运河区升起了五十幅巴拿马国旗。在这次斗争中，有十八名学生惨遭杀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巴拿马人民又先后发动了两次强大的要求收回运河区的反美爱国斗争，运河区的美国警察竟开枪射击示威群众，使一百多人受伤。这一暴行激起了巴拿马人民更大的愤怒，示威的群众袭击了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和一些美国企业。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期间，巴拿马人民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续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

进入一九六四年，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次斗争的规模之大，参加的阶层之广，群众斗争情绪之高昂，都是巴拿马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美国军队开枪屠杀巴拿马人民的暴行发生后，声势浩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立即席卷了巴拿马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激愤的爱国群众振臂高呼“美国佬滚回去”、“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没有主权毋宁死”等口号，他们不顾美国军队的血腥镇压，袭击了美国大使馆，火焚了美国新闻处的办公室。十二日在巴拿马城为被杀害的爱国人民举行葬礼时，有十万人，即全国人口百分之十的人参加，这是巴拿马人民又一次抗议美国侵略、维护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大示威。巴拿马政府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的推动和支持下，已经宣布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要求签订新的运河条约，并彻底审查美巴关系；国内十六个政党也一致声



明支持政府的这一决定。

胜利属于敢于斗争的人民

英勇的巴拿马人民从六十多年的长期斗争中，愈来愈觉醒，愈来愈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美帝国主义是巴拿马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特别是这一次美帝国主义屠杀巴拿马人民的罪行，更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穷凶极恶的侵略本性，彻底揭穿了它的和平伪装。就在美国军队对巴拿马人民挥舞屠刀的前一天，美国总统约翰逊还扬言什么美国必须成为拉丁美洲国家“更好的邻邦”，但是事实证明，约翰逊的这种动听的言词，只不过是他用来欺世盗名的谎言，它丝毫也掩盖不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现在，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是巴拿马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的英勇斗争，给予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它再一次证明了：正义的斗争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巴拿马虽然是一个长期遭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只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小国，但是，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既没有在美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屈服，也没有为敌人的小恩小惠所诱骗而落入圈套。他们对敌人不

抱幻想，始终坚持斗争。这种不畏强暴、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还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尽管它用核武器把自己全身披挂起来，张牙舞爪地在全世界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但是，它永远也阻挡不了全世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

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得到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积极支持。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他们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完全能够而且必须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互相鼓舞，互相支持。

目前，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正在继续进行。尽管巴拿马人民今后的斗争还会经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整个国际形势对巴拿马人民的斗争是空前有利的。我们深信，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团结一致的巴拿马人民，通过自己的英勇斗争，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洗刷掉六十年来的屈辱，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巴拿马运河区。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勇的巴拿马人民！



战后美帝国主义与其他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货币斗争

项 冲

帝国主义在对外扩张中，通常是把货币作为扼杀竞争对手、扩大剥削范围的有力武器。因此，在它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通常是包含着争夺金融霸权的斗争。

早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就曾注意到英国和平主义者布莱斯佛德的这一说法：“金融和外交互相效劳，在现代世界里，它们是相互需要的。……如果某一个大国或者大国集团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能保持哪怕是只有几年的垄断地位，并且能有意識地加以利用，以达到政治的目的，那它终于会使俄国、中国、土耳其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听从自己的意志。”^①

一九一七年，列宁又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力量，“取决于银行的多少”。列宁还引用一家美国亿万富翁的报纸说过的这样一句话：“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要想称霸世界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我们要建立银行，我们将要称霸世界。”列宁认为，“美国这个高傲自大恬不知耻的亿万富翁

说出来的这句厚颜无耻的话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资产阶级撒谎家的千百篇文章所包含的真理超过一千倍^②。

为了夺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霸权，帝国主义总是要以它的经济、政治实力作为后盾，千方百计地使本国的货币居于领导地位，而把其他国家的货币作为自己的附属物。对帝国主义来说，如果其他国家的货币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与本国货币建立固定的联系，并把黄金外汇集中存放在本国，作为其他国家在市场上按照这一固定比例进行公开买卖的储备基金，那么，它就能够在其势力范围内形成一个金融中心和确立它的金融霸权。当然，这个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如何有利于本国商品和资本的输出生，以及国外原料输入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也必须把有利于自己的比例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这样进行商品和资本的输出生才不会因外国货币贬值而受到损失，搜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32页。

^②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3页。



刮原料也不会因本国货币贬值而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同时，外国的黄金外汇储备集中存放本国以后，又便于本国垄断资本利用所谓“国际银行家”的地位，作为对外扩张、对内剥削的资本周转之用。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国际金融领域内的货币斗争，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销售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的一个重要手段，成为它们之间不断重新分割世界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特别是资本主义货币制度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货币斗争。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之间正常的金融关系遭到空前的破坏，金本位制彻底崩溃，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制度从根本上丧失了稳定性。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持国内货币的稳定，挽救货币制度的危机，以便在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中巩固自己的阵地，便不能不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其对外金融领域内，采取停止支付外债、宣布货币贬值、实行外汇限制等干预性的措施。但是，这一切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作法，不但没有能够使它们摆脱自己的困境，反而使它们之间的斗争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盘和剥削范围。狭路相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更加尖锐起来，它们更加广泛地利用货币作为相互厮杀的工具。它们不仅像过去那样把殖民地、附属国的货币作为本国

货币的附属物，而且还在日趋狭小的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竭力争夺本国货币的领导权。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危机，也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而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金融领域内，进一步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干预性措施，但是，不论是由较强大的一方强加于较弱小的一方，还是由较弱小的一方利用这些措施来摆脱对手的压榨和扼杀，其结果都必然使它们之间的货币斗争比战前进一步加剧。

二

战后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美帝国主义为一方，力图巩固和扩大它的霸权地位；以其他帝国主义为另一方，则始终不甘心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并且力求摆脱这种控制。这一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领域内，也有强烈的反映。

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发了横财，大大扩大了生产能力和出口贸易。战后初期，它利用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一度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竞争舞台，以及英、法两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机会，拼命向外进行经济扩张，从而出现了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储备。一九三八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有一百四十五亿九千二百万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比重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一，到一九四八年，便上升到二百四十三亿九千九百万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七十点三。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此期间却对美国出现了巨额支付赤字，形成当时所谓的严重的



“美元荒”和黄金大量流向美国的局面。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八年十年間，英国和英镑区国家以及西欧大陆国家的黄金储备，从九十五亿一千一百万美元下降到五十七亿零七百万美元，所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比重，从百分之三十六点六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四。当时，在美国以外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国内生产破坏，预算赤字激增，再加上国际收支逆差的影响，普遍发生严重的货币贬值现象。它们的政府面临这种形势，便不能不加紧推行外汇限制等措施，企图通过人为的力量求得国际收支的平衡和币值的稳定。结果它们的货币就降为不能“自由兑换”为外国货币的“软币”，而无法与可以“自由兑换”的“硬币”——美元那样相比拟。

这种经济实力的变化，大大有利于热衷于争夺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它力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内建立一个庞大的美元集团，作为它在全世界建立空前未有的大帝国的配合手段。而要实现这样一个狂妄的计划，美国垄断资本除要采取政治、军事和经济其他方面的措施外，在金融领域内还必须：一方面，巩固美元的对外价值，维持美元的“自由兑换”，以便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对外价值与美元维持在一个固定比价上，并且使美元与黄金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储备，从而为美国向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扩张，以及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国内及其所控制的货币集团内进一步采取外汇限制等措施，来防止对方经济势力的渗入，美帝国主义又必须

拼命干预它们的对外金融政策和外汇限制制度，以便同它们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防止第一次大战后“连最富有的、控制所有国家的美国也无法做买卖”的史实重演。

美帝国主义的这一狂妄计划，实质上不过是过去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内，建立自己的货币集团的翻版。但是，为了避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扩大推行这一计划时，不能不采取更为隐蔽、更为狡猾的手法。

首先，美帝国主义挟持其雄厚的黄金储备，把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政府或中央银行进行买卖的黄金价格（指不兑现纸币流通条件下，用货币来购买黄金的“价格”），压到“垄断低价”的水平。所谓“低价”，是指美元对黄金的比价（即对外价值）始终维持在一九三四年所规定的每一盎司纯金折合三十五美元这个“官价”上，而美元的对内价值，也就是美元实际代表的含金量，由于通货膨胀的关系，到了一九四八年只有一九三九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八（一九六三年更下跌至百分之四十四）。这样，美元的对外价值就被人为地抬高，而黄金价格则被人为地压低，形成美元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长期背离的现象。

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美元荒”，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因此，这种压低黄金价格的作法，实际上是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按“低价”向美国变售黄金，以抵补巨额美元赤字。这样，美帝国主义就可以在获得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的同时，趁机向其战时的同盟国按“低价”搜刮黄金，并使它们的“美元荒”由



于金价偏低而难以减轻，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奴役性的“马歇尔计划”或其他各种“援助”，从而进一步受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美帝国主义的黄金“低价”政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政府干预的方法，人为地稳定美元的对外价值，使对内不断贬值的美元，在一定的对外范围内可以按固定比价折换成黄金。当时，美帝国主义曾狂妄地以美元与黄金同样成为世界货币自居；而其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本身币值的不稳定，对外汇率很多与美元相联系，也都把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内除了英镑以外的唯一重要的储备货币。这样，就使美帝国主义控制了其他国家的货币，在国际金融领域内成为一个最大的国际剥削者。

其次，为了使美国的商品输出和投资利润的汇回不受各国外汇限制等的束缚，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还打着“汇兑自由化”和“稳定汇价”、“避免货币对外贬值的竞争”等幌子，压迫其他国家取消外汇限制制度，并且把它们的货币的对外汇价在有利于美国的比例上相对稳定下来。

虽然美帝国主义在表面上并没有公开把它的“盟国”的货币强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但是在实际上，却力图通过各种威胁利诱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迫使其他国家所接受的各种“援助”，都附有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外汇限制等条件。一九四五年英国接受美国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大借款，曾在一九四七年被迫实行五个星期的英镑“自由兑换”（最后因为在“自由兑换”期内黄金和美

元损失过多，而不得不全面恢复限制），便是一个显著的实例。而更重要的是，战后初期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名义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向各会员国提供短期贷款为诱饵，迫使它们接受消除外汇限制、货币对外汇价应以一定黄金成色和重量的美元表示，以及一定幅度上的汇率变动必须取得“基金”同意等等丧失国家主权的条款。

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措施，当然要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可是在当时，西德和日本是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西德马克和日元的币制改革都是根据美国政府的方案实行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国内发生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急剧恶化，法郎和里拉曾经多次贬值，也很难与美元的势力相抗衡。因此，对美元具有一定还击力量的，只有英国的英镑。尽管英国的力量在战后已进一步趋于衰落，可是在国际金融领域内，它还有广大的英镑区作为后盾，英镑还是英镑区国家以及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储备货币，在上一个世纪把“全世界网罗了起来”的英国海外银行网，也还有很大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货币斗争，自然以美元和英镑之间的斗争最为突出。

英国在英镑区范围内全面实行的外汇限制制度，是加强英帝国主义对英联邦国家的剥削和防止美国经济力量渗透的一个有力支柱，而对美帝国主义来说，它却是向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扩张的一个严重障碍。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通过贷款、“援助”和各种国际组织的压力，千方百计地想迫使英国开放英镑区和恢复英镑对外“自由兑换”，以便为控



制整个英镑区国家和英国本土开辟道路。英帝国主义对此虽然一直采取阳奉阴违、有意拖延的手法，但一九四九年英镑对美元贬值百分之三十点五，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三十五个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大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未始不是屈服于美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

可是另一方面，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也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不时给予反击。例如，英国的英镑区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建立的货币集团，如法郎区等，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范围，始终没有轻易放手。又如在黄金价格问题上，英国、比利时和英镑区的若干国家，由于拥有大量黄金产量（英镑区国家黄金产量占资本主义世界百分之七十以上），也曾为提高金价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控制斗争，最后迫使美国作出让步，允许它们用另一种形式在自由市场上按高价出售黄金。至于在取消外汇限制以及与美元规定固定比价等问题上，许多国家更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于不顾，如法国和意大利，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还未规定它的固定汇价。由此可见，尽管美帝国主义不留情地想把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置于美元的控制之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是不甘心于被控制的地位，而力求摆脱美元的魔掌。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随着它们之间“资本”和“实力”对比的变化，日益趋于尖锐化。

三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更加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

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西德、意大利、日本三个战败国，在美国扶植下已经复活起来；法国的力量不断有所发展，逐步与美国分庭抗礼；英国虽然日趋削弱，但也不甘受美国摆布。这就使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初期所建立起来的优势，开始发生动摇。

这种不利于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金融领域内。一九五〇年侵朝战争发生后，美国的国际收支开始发生逆差，黄金开始外流。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美国经济危机时期，也出现了同样情况。一九五六年以后，美国趁英法侵略埃及的机会，大量向西欧倾销石油及棉花等，这虽使美国的国际收支一度发生好转，但是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七年中，美国的黄金流出共有十七亿美元之多，加上对外短期债务的增加额，每年逆差年率平均达十二亿美元左右。同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储备增加三十七亿美元，美元储备增加六十四亿美元。战后初期普遍出现的“美元荒”，到五十年代基本上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

一九五八年以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内所进行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由于美帝国主义不断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结果使以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外流为表现形式的美元危机愈来愈严重。这种美元危机与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同时爆发或交替爆发，使美帝国主义用尽各种方法也挽回不了美元一天天烂下去的局面。另一方面，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特别是以法国——西德为轴心的共同市场六国，则随着政治、



经济力量的迅速增长，国际收支情况大大改善，黄金大量流入，它们的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五年内，美国的黄金流出共达六十八亿美元，加上对外短期债务的增加额，国际收支平均逆差年率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十二亿美元左右猛增至三十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美国以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储备增加了八十七亿美元。如果以黄金、外汇储备合并计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该期内共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亿美元，而且大部分集中在西欧各国，其中法国增加三十四亿美元，意大利增加二十二亿美元，西德增加十七亿美元，英国、荷兰、比利时各次之。

到了一九六三年，美元危机这个不治之症，陷入比前几年更加严重的地步，美国该年上半年国际收支逆差年率达四十二亿美元，超过一九六〇年逆差最高峰三十九亿美元的数字。截至六月底止，美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计一百七十亿六千四百万美元，其中黄金储备为一百五十八亿二千九百万美元，只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比重的百分之三十八；相反地，西欧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为三百零六亿六千一百万美元，其中黄金储备为一百九十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已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比重的百分之四十五。从黄金储备的比重来看，美国已远远低于战前的水平，而西欧各国已远远超过战前的水平。

在力量对比发生如此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元作为武器控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货币的种种手法，现在已被竞争的对手反过来用作反控制斗争的

王牌了。从下列各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种趋向：

第一，美国政府虽然仍在勉强维持战后初期所推行的黄金“低价”政策，但是这个垄断“低价”目前不仅不能达到对其他国家巧取豪夺的目的，相反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却可以利用它作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

由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已转为顺差，除了从美国流入大量黄金外，还有了由于美国短期债务的增加而形成的美元储备，于是，战后初期的“美元荒”，到目前已变为“美元过剩”。这样，它们就可以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反控制斗争过程中，利用多余的美元存款随时按“低价”向美国政府挤兑黄金，迫使美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一九六二年，戴高乐政府在美国黄金外流的时候，向美国挤兑一亿多美元的黄金，给美帝国主义以很大的压力，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从美帝国主义方面来说，现阶段竭力维持“低价”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为了避免摇摇欲坠的美元对外公开贬值，从而可能导致“美元作为国际通货的结束以及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美国退出目前世界性作用的开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国联邦准备局理事会主席马丁在匹兹堡的演说）。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一九六三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演说中，就曾大声疾呼，在“保卫美元”的时候，“谁都不应把谨慎和怯懦、缺少决心和周密行动混为一谈”。这个美国垄断集团利益的维护者表示，“决心用尽一



切方法保卫美元在目前固定的汇价上自由兑换”，也就是“把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保持在当前三十五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上”。但是，在国际收支发生经常性逆差和黄金不断外流的条件下，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像战后初期那样，可以借助于这种“低价”向其他国家搜刮更多的黄金了，它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乃是如何设法避免外国政府随时用它们所掌握的大量美元存款来挤兑黄金的问题。为此，美国政府近几年来不得不暗中要求西欧各国中央银行“谅解”，同意在必要时停止以美元存款向美国兑换黄金。一九六二年，美国政府更进一步请求西欧各国与美国拼凑资金成立“黄金总库”，以便联合力量使伦敦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稳定在每一盎司三十五美元左右。最近约翰逊在国情咨文里，也向他的“盟国”发出呼吁，要求它们在“保持目前美元的黄金价值”方面同美国“合作”。固然，在一定条件下，为了防止美元对外贬值而可能引起资本主义货币制度的进一步动摇和国际金融关系的进一步混乱，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会给美元以各种形式的暂时支持，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暂时的共同利益而互相勾结，是不可能根本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而且，就在勾结的过程中，必然孕育着更尖锐的、更大范围的斗争。

第二，由于美元危机正在不断加深，美元公开对外贬值的传说始终无法平息，一度以世界货币自居的美元，在各国货币对它维持固定的比价以及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方面，都已经愈来愈对它不利。

早在一九六〇年以前，西欧有些国家已经酝酿着使本国货币与黄金相联系而不与风

雨飘摇的美元维持固定的比价。其后，这些国家更要求把积存的美元存款（即美国政府的对外短期债务）附有黄金保值条款，这就是说，要求存放在美国的美元存款，应以目前的美元法定含金量作为担保，使美元在对外公开贬值（即黄金“价格”的提高）的时候，积存款项不致受到损失。一九六二年英国财政大臣莫德林提出的世界货币制度“改革”方案，更建议逆差国家对顺差国家的短期债务，应由一个国际机构以一定的含金量作为保证。莫德林所谓的逆差国家，主要是指美国而言。所有这些要求和建议，实质上都是其他国家对美元的公开不信任，这对美帝国主义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可是，这与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要求各国稳定币值并把它们的对外汇率依附于美元的情况相对比，已成为对美元的莫大讽刺。同时，这也是对美国统治集团要求“保卫美元”的呼吁的重大打击。

到目前为止，美元和英镑确实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最重要的两个储备货币，而且美元作为储备的范围还远比英镑广泛（在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和英镑区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约一百六十亿美元，其中以美元存款形式存储的即达一百三十亿美元）。但是，在美国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极不稳定的条件下，这种以美元存款形式存放在美国的各国外汇储备，一有风吹草动，随时有被兑换为其他国家的货币或者申请兑换为黄金的可能，这对于黄金储备日益不足的美国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与年俱增，外国政府所积存的美元储备必然愈益



增多，美国本国的黄金储备必然愈益减少，对外短期债务必然愈益上升，从而使美元在国际上的信用更加动摇。在很大程度上，这又使美国本国的短期资金大量向外国逃避（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美国国内短期资金流出年率平均每年达十六亿美元之巨），结果是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将更加扩大，形成美国对外金融领域内的一个不可克服的“恶性循环”。为此，美国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御用学者，纷纷建议扩大美国操纵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让美国的“盟国”在国际金融“合作”的幌子下，多分担一些资金和义务。由此可见，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在美帝国主义不断趋于削弱的情况下，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第三，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企图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所谓货币“自由兑换”，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后，西欧各国纷纷实行；但是它已不再是美国原先期望的那样，作为美国控制其“盟国”货币的手段，相反地，它已成为对美元统治地位的“重大的挑战”。

一九五八年西欧各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在它们的经济力量逐步恢复和走向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实行的，而不是美帝国主义施加压力的结果。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当它们的经济力量已经开始上升的时候，它们的一部分垄断集团就酝酿着货币的“自由兑换”，以便趁机提高自己货币的威信和争夺世界金融霸权。一九五四年英国、西德两国逐步放松外汇限制和恢复伦敦黄金自由市场，便是它们与美元争霸的先声。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它们恢复“自由兑换”的条件已经大致成熟，同时西欧共同市场的形成也必然

要导致六国内部首先实行“自由兑换”，所以在该年年底的短短几天内，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等许多西欧国家，差不多同时实行了全部的或有条件的“自由兑换”。

当然，这种“自由兑换”和金本位制度下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为黄金以保证货币对内价值的相对稳定，具有原则性的不同。战后，每当资本主义国家国际收支恶化、外汇行市极不稳定的时候，它们就不得不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来限制外汇的自由买卖；一旦它们的经济实力有所恢复，则又设法取消外汇限制，并在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基础上恢复不同程度的“自由兑换”，借以加强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和竞争能力。从限制兑换到“自由兑换”，是当前垄断资本通过国家的力量捍卫本身的利益和对外实行经济扩张而采取的相互交替的形式。一九五八年西欧各国的“自由兑换”的浪潮，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力量对比有利于它们的条件下，相互间争夺金融霸权以及与美元争夺货币领导权的表现。如果说，在金本位制度下的自由兑换，在客观上还起了一些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话，那么，帝国主义国家在现阶段所实行的“自由兑换”，正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下，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以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向其弱小的伙伴进行经济渗透的新形式。

由于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已经可以“自由兑换”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美元已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上最主要的“硬币”，英镑、西德马克、法国法郎等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逐步与美元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近二三年来，每当美元危机爆发的



时候，国际金融市場上往往形成抛售美元购入其他国家货币的浪潮，从而使美元对外价值发生动摇。美国政府面临这种窘境，近年来不得不向西欧各国、加拿大和国际清算銀行訂立許多双边备用貸款协定（双方都按本国货币出借），在西欧金融市場上发行外币国庫債券，向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借入外币的备用貸款，以便在必要时抛售借入的外币购入美元，来減輕国际金融市場上抛售美元或以美元搶购黄金的压力。最近美国政府为了限制美国私人資本不断外流，还准备对美国居民购买外国在美国发行的有价证券增加稅收。在实质上，这是一种变相的外汇限制措施。凡此种种，可見一向以“汇兌自由化”为幌子来压制其他国家取消外汇限制的美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却反过来在西欧各国“自由兌換”的货币面前屈辱让步，連自己也不得不考虑采用外汇限制的办法来“保卫”美元了。这一切都說明，战后初期的美元优势已經喪失，美帝国主义以美元称霸于世界的幻想已經破碎。

虽然，到目前为止，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建立的由它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組織中，还拥有最多的份額，还能操纵“基金”的表决权，但是这种情况也已发生了某些变化。近几年来，由于美元和英镑交替爆发危机，“基金”的资金既不足以对付发生危机的国家大量周轉的需要，又不足以适应資本主义世界貿易增长的需要，因此，在美国的倡議下，“基金”要求各會員国继一九五八年以后再次增資。当时西欧六国虽勉强同意，但坚持新摊派的資金不应再由“基金”集中掌握，而应另行成立一个“巴黎俱乐部”（即十国多

边貸款协定），提供备用貸款六十亿美元作为“基金”的后备力量。然而这个“协定”的表决权，根据該协定的規定，实际上已落入共同市場六国之手，使美国在国际金融組織中喪失了部分的領導权。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美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打算在資本主义世界建立一个龐大的美元集团，从而有利于建立一个空前的大帝国的計劃，曾几何时，已經走到了它的反面而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了。

四

尽管目前美元的地位已經大大相对削弱，但是，美帝国主义迄今仍是現代最大的国际剝削者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美元还是資本主义世界最有力量的货币。美国除了拥有資本主义世界百分之三十八的黄金儲备外，还有包括加拿大、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等国的“美元区”作为实力后盾，日元等货币也仍然以美元作为基本儲备而屈从于美元的势力，資本主义世界最大商业銀行的前几名也都屬美国所有。因此，以美元为一方、以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为另一方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目前不是削弱而是加深了。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随着当前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重新分化和組合，出現了一些新的动向。

当前資本主义货币斗争中的一个动向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以货币集团形式展开的斗争，将随着国家壟断資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暫時联合而进一步加剧。

早在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机发生以后，資本主义世界已分裂为美元、英镑、法郎等



許多货币集团。战后，在民族解放运动洪流的冲击下，比利时法郎区和荷盾区已经趋于瓦解，英镑区与法郎区的内部联系也大大削弱。但是，到目前为止，英镑区国家的黄金外汇，还有很大部分集中于伦敦，这种储备折换成为英镑存款以后，仍然不能自由兑换为美元。法郎区内的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及其外汇储备，也仍然与法国法郎维持联系。英法两国对于货币区内的贸易，目前还各占它们的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和百分之二十左右，形成与美元区相抗衡的一股势力。

在帝国主义的剥削范围日益狭小的情况下，货币集团成员国的构成，也从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逐步转向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自从西欧六国共同市场成立以后，六国在共同市场范围内放松贸易壁垒的同时，必然要求在金融领域内逐步采取“统一”的措施。到现在为止，六国已经成立了共同对外经济扩张的金融机构，内部的投资、信贷和证券交易，也已实行了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并且还酝酿着成立六国的共同外汇储备，“协调”六国之间的对外金融政策以及限制外国资本，其中特别是美国资本在共同市场内部渗透，以便为成立六国货币联盟甚至“统一”六国的货币创造条件。当然，目前共同市场各国之间的矛盾百出，步调不一，同时又遭受到新的通货膨胀浪潮的压力，所谓“统一”的货币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它们之间联合起来反击美元势力的渗入和争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权，对美帝国主义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除

此以外，六国货币也有共同打击英镑及英镑区的一面。英国对外短期债务本来已远远超过它的黄金外汇储备，现在被排斥在共同市场以外，更不是六国的对手。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在国际金融领域内的反映。

现阶段帝国主义货币斗争的另一个动向是：美元和英镑暂时相互勾结以与共同市场六国货币相对垒。

毫无疑问，从战后初期到现在，美元和英镑之间，围绕着黄金价格和英镑区问题两个方面，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由于两国政府竞相提高国内利率，以便多方吸引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入，彼此在利率政策上更不可能协调一致。自从英国要加入共同市场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打算宣布英镑对外贬值以便刺激出口之说，曾经甚嚣尘上。如果在一定条件下英国政府当真这样做的话，那么由英镑贬值所可能引起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竞相对外贬值，将使美帝国主义在争夺销售市场方面再次受到重大打击。这和一九四九年美国压迫英国实行英镑对外贬值，借以对英镑区进行掠夺的情况相比，景况已完全不同。

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由于美元和英镑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两个基本储备货币，一方的加强固然可以削弱另一方，一方发生危机也可以影响另一方。近年来，这两个主要储备货币交替发生危机，而西德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瑞士法郎等行市始终坚挺。为了相互支持而不致于同归于尽，美英帝国主义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联合起来和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一九六一年在维



也納举行的国际金融會議上，为了爭奪对国际货币基金組織的控制权，就以美英为一方，西欧六国为另一方，形成了相互对壘的局面。英国打入共同市場的企图失败以后，美英双方又相互開設了价值五亿美元的双边貸款协定，以便其中一方发生危机时，由另一方用本国貨幣給以支持。最近，作为美国壟断資本喉舌的布魯金斯研究所，曾提出一份关于美国国际收支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建議，美元与英鎊联合成立一个更大范围的貨幣集团，使美元与英鎊之間維持固定汇率，美英两国的資本市場融而为一，英鎊区国家存放在英国的英鎊存款，可以对美元“自由兌換”。这个建議固然有挖英鎊区牆脚的一面，但美国企图联合英鎊来压制六国貨幣“联盟”的抬头，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六国來說，它們始終认为美英两国国内的通貨膨脹，是美元和英鎊不断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它們表示沒有长期支持美元和英鎊的义务，也沒有必要把自己貨幣的对外汇价长期与价值不稳定的美元相联系。过去法国、荷兰、西德的財政金融当局，曾迭次对美国政府所实行的赤字預算政策加以“訓誡”。在美国要求大家出錢“保卫美元”时，法国财政部长曾強調，这只有—定的限度，因为这些貨幣儲备是法国人劳动的果实，必須注意合理使用。目前，六国的壟断資本，其中尤其是法国壟断資本，总是力图設法在已經形成的西欧共同市場范圍內，最終成立一个以法国法郎和西德馬克为中心的“区域性”的西欧貨幣集团，来摆脱美元的控制和美元与英鎊的影响。总起来說，尽管美元与英鎊之間还会随着美英帝国主义之間矛

盾的加剧而不断发生新的斗争，美元与西德馬克之間也会随着国际形势的風云变幻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勾結，但是目前在帝国主义陣营內，貨幣金融領域朝这个方向的重新組合已經初步形成。

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間貨幣斗争空前尖銳的局势下，各国壟断資本家和他們的御用学者，为了挽救貨幣制度的危机，曾提出形形色色“改革”世界貨幣制度的方案。过去在每年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組織年会中，都曾圍繞着“改革”方案发生过激烈的斗争。这些壟断資本家和御用学者們，把过去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为了避免世界貨幣制度瀕于崩溃的暂时相互支持，美化为“国际金融合作”，并且还企图在这个幌子下，提出关于黄金价格、外汇儲备、外汇汇率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不会改变，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相互爭奪、相互厮杀不可調和，因而它們之間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真正的合作。

由上可見，战后帝国主义各国之間貨幣斗争的日益尖銳化，是它們之間不断重新分割世界的反映，是資本主义总危机和資本主义貨幣制度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結果。与此同时，貨幣斗争的尖銳化又反过来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間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目前，貨幣斗争的形式，已經从外汇限制轉換到“自由兌換”，从国与国之間轉換到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間，因而一个国家的貨幣危机将比以前更加易于影响到其他国家，更加容易震撼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貨幣制度和其他經濟領域。完全可以預料，这方面的斗争，今后将随着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的加深和資本主义貨幣制度危机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红旗

HONGQI

4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四期 ★

目 录

人民公社在前进..... 陶 铸 (1)

——广东农村人民公社五年经验的基本总结

花县真正变成了“花县” 张汉青 (13)

“四个第一”的辩证法..... 郭力军 (18)

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 关 锋 (26)

学会“一分为二”的方法..... 卢国英 (29)

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 游 麟 刘俊望 (34)

☆ 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



人民公社在前进

——广东农村人民公社五年經驗的基本总结

陶 鑄

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五亿多人口的农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实行了一次偉大的社会变革，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人民公社。五年来，广东省人民公社和全国各地人民公社一样，以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在发展农业生产，战胜自然灾害，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陣地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它經受住了严峻的考驗，日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依靠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我国的农业問題必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国人民公社的偉大实践，以及在这个实践中逐步完善的政策，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宝庫增添了嶄新的篇章。

众所周知，农业問題，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問題。如何正确地处理农业同工业以及其他經濟部門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經濟問題。

对于資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和其他經濟部門的关系，馬克思曾經作过很多的論述。他說：“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須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者在他們自身的消費額以上，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①又說：“实际上，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一切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然基础，从而也是一切資本发展的自然基础。……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尤其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②这就是說，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資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必須以农业的发展为条件。可是，在以資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社会里，工业和农业之間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一般地說，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这是資本主义国家国民經济各部門間的比例遭到破坏、发生危机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

那末，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这一規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起作用呢？它不但起作用，而且显得更为重要。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列宁曾經指出：“我們的国际环境既已改善，一切政治問題就都集中到一个方面，即无论如何要提高农业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会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③国民經济有計劃按比例发展的規律，是社会主义社会

^①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頁。

^②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4--1025頁。

^③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6頁。



的一个经济规律，而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正是其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这种比例关系，使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互相适应，使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地向前发展。同时，还应当看到，一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建设，都是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侵略威胁的条件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增加对世界各国人民正义事业的援助，都必须坚决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而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没有发达的工业固然不行，没有巩固的农业基础同样是不行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忽视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不认真地解决农业问题，要建立强大的工业是办不到的；即使工业在某些方面一时有了比较高的发展水平，而农业却裹足不前甚至越来越糟，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也必然会遭到破坏，使经济建设遭到巨大困难，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无法前进。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向来是十分重视农业的，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或建国以后，都一直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最重要位置上，正确地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同志一再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而孤立地进行，必须处理好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①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以发展农业作为出发点，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贯彻实行这个方针，就可以使我国农业生产得到更快的发展，迅速地做到满足城乡人民对农副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保证农业的发展同工业的发展相适应，给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和资金，开辟广阔的市场，促进工业更快地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强有力地支援农业，为农业的技术改造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创造条件。这样，有了强大的农业作为基础，又有发达的工业作为主导，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够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确切地表达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和工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内部联系，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社会主义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使农业真正发挥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的作用，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呢？毫无疑问，维持小农经济的状况是不可能的；同样，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道路，更是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实现农业集体化，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走的共同道路。我们党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坚定不移地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党提出的改造农业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我国在彻底实现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就不停顿地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经过几种不同阶段的灵活的过渡形式（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使得全国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农业的合作化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我国的粮食和棉花等生产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而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新高涨的局面。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大大加强了，从而开始为我国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物质条件。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这就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们普遍要求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多种经营，迅速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这样，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一种比较小规模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局限性、它所存在的矛盾就很明显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互助协作同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小的矛盾，要求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同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单一的矛盾，农业生产合作社相互间生产上需要适当协作同社与社间分散经营的矛盾，如此等等，都要求突破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狭小的范围。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很多地方的农民群众自动地合并和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还进一步组织了联社，这些联社已经初步具备了人民公社的特点，实际上是人民公社的雏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地迅速开展起来，大规模的、多种经营——特别是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便成为我国农村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个情况表明，人民公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有了人民公社，就可以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且有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就找到了使集体所有制农业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具体途径，引导我国的农村将来能够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

二

人民公社诞生以来的五年，是我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五年。广东的情况也完全是如此。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农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改善了，人民



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五年内，广东遭受到两次特大自然灾害：一九五九年大水，一九六三年大旱。但是，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两次巨大灾害都被战胜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九六三年虽然遭到了六十年未有的大旱，连续八、九个月未下过透雨，但粮食生产却获得了丰收，全省比一九六二年增产十一亿斤。在这一年，广东有十六个县、市的水稻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亩产八百斤的指标。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甘蔗、黄麻都比一九六二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以上，生猪存栏数比一九六二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

为什么会出現这样的奇迹呢？这是因为，五年来充分发挥了人民公社优越性，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第一，兴建了大批的农田水利工程，部分地区开始实行机械化和电气化，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据统计，全省现有大、中、小型蓄水工程九万零五百一十五宗，总蓄水能力达三百亿公方，除用于发电和防洪外，可用于灌溉的蓄水库，容水量达一百四十亿公方。其中大型水库二十二个，中型水库一百七十三个，除一个大型、十八个中型水库是一九五七年前兴建的外，其余全是公社化以后兴建的。全省现有大、中、小型引水工程十二万宗，设计引水量一千九百秒公方，其中大、中型工程三十六宗，全是公社化后兴建的。全省现有电动排灌设备二十四万六千七百匹马力，全是公社化以后兴建的；机械排灌设备十三万五千九百匹马力，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是公社化后发展起来的。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有了这些水利设施，农业生产的面貌就大大改观了。全省三千几百万亩水田，解放初期多数是“望天田”，有保证的灌溉面积（抗旱能力在六十天以上）不到一千万亩；一九五七年也还只有一千四百万亩；到了一九六三年，有保证的灌溉面积就增加到二千四百万亩。如果将现有水利工程全部配套，并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全省有保证的灌溉面积将达到三千万亩左右。也就是说，到那时约百分之九十的水田都可以保证得到灌溉。

这几年，除了水利排灌方面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和机械化以外，在耕作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推行机械化，拖拉机和其新式农具都有了相当数量的增长。

第二，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推行了农业耕作技术改革。通过农业耕作技术改革发展农业生产，本来是广大农民的普遍要求，可是在过去个体经济的时候却很难办到。个体经济是极脆弱的，没有条件也不敢冒技术改革的危险；而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受到人力、物力的限制，不可能大规模地进行。人民公社成立以后，随着集体力量的加强和农田水利条件的改善，各地普遍地积极地进行了各种农业技术改革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很多县、公社都有了一定数量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比较普遍地设立了农业科学试验站，它们在合理密植、培育和推广良种、改良土壤、改革耕作制度、改进耕作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拿培育和推广水稻良种来说，公社化后各地都抓得很紧，效果十分显著。全省有不少县，从县、公社、大队一直到生产队，都建立了种子员和种子田制度，选育和推广良种已成为群众



性的行动。广东原来早稻品种缺点较多，经过几年来的选育和推广，现在全省大部分地区，早稻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良种化，有效地提高了早稻的产量，改变了以往水稻产量“早四晚六”（即一亩双季稻全年产量早造占四成，晚造占六成）的情况，而成为“早五晚五”了，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选育和推广晚造良种，提高晚造产量。推广良种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过去推广一个新品种要经过四、五年时间，现在两三年就可以了。水稻的合理密植，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各地就曾经提倡过，可是不能广泛推广。公社化后，由于公社的积极领导和推动，由于农业科学试验站的试验和示范，逐步找到了适合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品种的密植规格，水稻的合理密植业已成为群众的习惯，现在全省基本上都实行合理密植了。

第三，在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下，更好地做到了综合利用资源，合理地利用人力和地力，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这是农业逐步摆脱由于小规模经营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局限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全省有许多公社都对所属各生产队的生产作了合理安排：商品粮产区的，集中力量生产粮食，结合发展畜牧业；经济作物区的，除粮食生产外，适当多种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靠近城镇的则多种蔬菜和饲养群鹅群鸭，并安排剩余劳动力经营短途运输等临时副业。国家也根据各生产队的生产安排，相应地调整了他们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任务。这样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充分挖掘生产潜力，就迅速地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社与社之间有许多“插花地”，妨碍土地的合理利用，妨碍大规模地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推行机械化、电气化。当时许多地方也曾希望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社与社间意见难于一致，一直没有办到。公社成立后，统一调整了耕地，这些矛盾便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

第四，在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发扬共产主义互助协作精神，积极地扶助穷队发展生产，使大家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原来生产条件较好、收入较高的富裕队更富裕了，原来生产条件较差、收入较低的穷队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跟了上来。广东省在公社化初期，穷队超过四分之一，五年来穷队数量已减少了百分之三、四十，目前大约只占六分之一。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穷队数量已经所剩无几。例如花县新华公社，原有富裕生产队一百二十九个，公社成立五年来，由于进一步改善了生产条件，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连年增产增收；而在最近三年，全部都增产增收。在扶助穷队方面，五年来，该公社除从各方面对穷队加强领导外，还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积极组织队与队间的协作，并且从公共积累中提取五十九万元（占全部积累的百分之十左右）支援穷队，帮助解决生产上的困难。现在大部分穷队都搞好了生产，开始变得富裕起来；全社原有九十八个穷队，九十六个已改变了面貌。该公社东镜大队共有六百多户，过去是十年九旱，水稻亩产全年最高不超过三百斤。近几年来，公社着重帮助该队解决水利问题，接着又采取平整土地、精耕细作、改良品种、开展多种经营等项措施，生产便年年上升。五年间水稻总产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六



三年实现了“亩产千斤大队”的计划。这个大队在一九五七年还要国家供应五十万斤稻谷，到一九六二年却向国家交售稻谷一百二十三万斤。每个社员集体分配的收入，一九六二年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二点七倍；过去有七八成农户超支，现在九成以上有盈余，全大队社员在信用社的存款达二万七千多元。由于集体收入增加，又有家庭副业作为补充，社员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社员分配的口粮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一倍。公社化以来，社员还新修了二百多间房子，购买了一百三十九辆自行车（三分之一的青壮年社员有了自行车）。东镜大队社员群众的翻身史，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公社的力量。

第五，改善了一般社员的物质生活，促进了农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公社化五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广大社员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南海县一个材料，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该县处在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带，生产条件一般还算不错，农民的生活，在广东来说也是不低的。但是，在公社化前，水利问题并未根本解决，涝灾相当频繁，一部分高田则经常受旱，生产仍然不稳定。公社化后，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经过五年的努力，在全县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电动排灌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条件，加上积极地推广良种和改革耕作技术等，使农业生产获得大幅度增长。全县稻谷总产量一九五七年为二亿九千五百万斤，一九六三年增至五亿零三百万斤，增长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三年，一年之间增长稻谷一亿一千四百万斤，全县五十二万亩耕地，平均每亩增产二百斤以上。经济作物的恢复和发展也很快。副业方面，猪、鸡、鸭、鹅的饲养量都有很大发展。由于生产的发展，集体收入大大增加了，社员集体分配的金额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几近一倍。口粮水平该县一向是比较高的，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也增长近百分之二十。社员的购买力也大为提高，社会商品零售额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公社化后，南海县农民的生活能够在原来全省比较高的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广大农民自然是很满意的。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民公社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它的诞生，必然会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引起一次新的革命。农民的命运日益由人民公社所创立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联结在一起了，他们依靠集体的思想更加牢固了，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更加巩固起来了。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不得食的原则。同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取了公积金和公益金，广泛地开展了生产协作活动，扶助穷队和困难户发展生产；对于少数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对于困难户，从劳动和生活的安排上，给予必要的适当的照顾，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样，就使得全公社范围的所有生产队有可能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广大社员有可能普遍过着有保障的日趋富裕的生活，从而避免小农经济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现象。所有这些，加上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加强了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就不能不在人们的意识上产生强烈的影响。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大大加强了。现在，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的任务，已经成为公社各级领导和广大社员自觉的行动；踊跃参加民兵，协同解放



軍保卫边防，也普遍被广大男女青年视为神圣的职责。这几年来在反对美蒋特务窜扰沿海的斗争中，各地民兵都英勇地投入了战斗，立下了可歌可泣的功勋。大家依靠集体、关心集体，日益成为社会风尚。集体与集体、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精神，也一天天地发扬起来了。农民在长期的小私有制度下养成的心理和习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正在迅速地被改造着。这对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五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初步显示了它的无比的优越性，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断言，如果不是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要做好上述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困难的；还可以断言，在今后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人民公社必将进一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创造更加辉煌的成就。

三

人民公社是我国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不能不经历一个逐步完善起来的过程。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和基本方针，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明确的规定。决议指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目前仍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指出将来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同年十二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明确指出：现阶段人民公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详细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随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继续总结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队为基础的问题，多次强调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且针对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就使得人民公社的政策和制度等，都更加完善起来。五年来，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就是按照党中央这一系列的决定，及时地克服了实际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人民公社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在现阶段，它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属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范畴，因而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样，继续实行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经营管理方面的某些行之有效而现在仍然适用的制度和办法，例如生产责任制度、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等，也继承了下来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在我国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切积极的、合理的因素，我们当然要继承和发扬，而不能采取否定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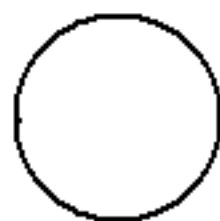
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的组织，比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它具有许多新的内容，它的组织规模扩大了，同时集体化程度也提高了。人民公社的组织，有的地方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有的地方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这就是说，在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规模的生产大队之上，增加了公社一级所有制，而在生产大队之下的生产队，又作为一级所有制，并且是基本的所有制单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点，它所实行的比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完善的体制，使得集体经济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前雄厚得多了，领导力量大大加强了，这样就突破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局限性，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内统一规划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便于筹集资金，安排劳动力，组织协作，举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无法办到的事情。

拿广东几年来的农田水利建设来说，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例如湛江专区，原是自然条件很差，自然灾害频仍的地方，五年来，这个地区的农民奋发图强，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其中蓄水一亿方以上的大型水库八个，蓄水一千万方以上的中型水库四十个，灌溉万亩以上的引水工程二十五宗，总灌溉面积增长了一倍以上；如果把全部工程配套，全区农田灌溉问题便可以基本上得到解决。兴建这些水利工程的总工程费（包括人工费和材料费，下同）共约六亿元，其中国家（包括专区、县）投资一亿八千万，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余百分之七十左右大都是公社用组织各队协作、社员劳动的办法解决的。又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商品粮集中产区，由于地处珠江下游，经常受涝，近四年来共建成装机容量十八万一千瓩的电动排灌网，基本上解决了近六百万亩耕地的排灌问题。兴建这项排灌网的总工程费约为一亿五千万，其中中央和省投资六千余万元，其余都是各有关专区、县和公社自筹解决的。兴建较大的水利工程，有的地区受益大，有的地区受益小，并且还要淹没和占用一部分耕地，需要进行统一规划。如果没有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如果不是在公社范围内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协作，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这种矛盾就难于解决。至于实行农业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推行技术改革，综合利用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扶助穷队发展生产，等等，也是因为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才取得了显著成绩的。

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内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公社内部队与队、队与社之间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和各生产队生产发展的状况的。我国农业的机械化还处于开始的阶段，农业生产目前还是以人力和畜力操作为主，生产队还是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就使得直接组织生产的单位与基本核算单位统一起来，有利于调动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各生产队在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在各生产队的发展水平尚未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能够做到承认差别，避免平均主义。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由于实行社一级核算，由社统一分配产品，而直接组织生产的生产队，只是包产单位而不是核算单位，这就产生了分配和生产未能很好统一的不合理现象，并由此产生了队与队之间的分配不能够很好地照顾差别的问题，影响生产队和社员的积极性。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生产队曾经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办法（“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即超产



奖励；“四固定”即固定土地、劳力、农具、耕畜），但是合理照顾队与队之间的差别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公社成立以后的前一段时间，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加以解决。后来党中央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是总结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社化初期的实践经验，既解决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就存在的问题，又解决了人民公社在前进中新产生的问题，从而使集体经济完全走上正轨，日益健康地发展起来。广东有少数公社的一些生产大队，前几年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效果较好，群众要求继续实行下去，经过领导批准，一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原来的制度。这几年来，绝大多数公社把生产队作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对于发展集体生产和壮大集体经济，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目前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普遍较前雄厚了，公共积累增加了，增添了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有的还购置了抽水机等新式农业机械。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多数人民公社要继续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大力充实和壮大生产队集体经济上面。这是打基础的工作，绝对不容忽视。

人民公社的大队和公社两级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目前还是部分所有制，但是这两级的部分所有制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公社一级所有制的作用，在上面谈到的公社化五年来的伟大成就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现在根据广东的经验，讲一下生产大队一级所有制的作用。目前的生产大队规模一般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成立后，它仍然是一级所有制，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级组织，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支部所在的单位，它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生产队的规模比较小，一个公社所属的生产队很多，像广东这样地方，如果没有生产大队，公社是很难进行领导的；同时，生产队由于力量所限，也需要有大队一级经常加强领导，给予具体帮助，有些必不可少的队与队间的生产协作活动，几个队联合举办的企业和事业，也需要由大队统一组织。目前生产大队和公社这两级已经拥有一定的公共积累，有了一定的队营或社营经济。这两个部分的经济目前虽然还不多，但是它们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从长远来看，它们是具有伟大前途的。随着人民公社各级经济的充实和发展，在适当的时候，生产大队和公社这两级的积累也应当逐步有所增加，社营和队营经济也会逐步地发展起来。当然，公社和大队这两级所有的经济目前还不可能过多地发展，特别是不能用削弱生产队经济的方法去发展公社和大队这两级的经济。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这些关系，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就能迅速地发展，各级的集体经济也将会相应地增长。

现阶段多数人民公社实行的三级所有制，充分地发挥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的作用，使全公社范围的统一领导问题和充分发挥直接组织生产单位的积极性问题，都恰当地解决了，这是完全适合当前我们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将来，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水平水平的提高，公社和大队这两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条件具备时，人民公社将会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再经过一个时期，进一步改为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必将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根据广东各地实践的情况看来，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大加强了国家对于集体經濟的政治领导和經濟领导。人民公社的社一級干部和部分大队的主要干部，既是集体經濟組織的干部，又是国家干部，这就更加有利于加强党和国家对于集体經濟的领导，使基层政权直接組織和领导生产，更好地发挥政权领导集体經濟的作用。人民公社兼备了基层政权和集体經濟組織的职能，这就既不同于人民公社化以前的基层政权机构，也不同于作为单纯經濟組織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它既要管政治，又要管經濟；既要发挥基层政权的政治动员作用，又要直接組織和领导生产；既要关心国家任务的完成，又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安排。这样，党的政策就能够更好地贯彻到群众中去；同时在集体經濟内部也便于全面规划，统一安排。有了人民公社，在集体經濟和国家关系方面，可以使集体經濟的利益更好地和国家计划结合起来，有利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經濟。国家对公社举办的农田基本建設和其他事业进行投資，则有利于促进公社逐步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

人民公社这个新的社会組織形式的出现，是我国农业继合作化后的又一个飞跃。我們的广大公社社員，正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創造自己的历史。广大农民群众創造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組織形式，經過了五年的实践，又总结了經驗，使人民公社制度日臻完善。这就进一步地掌握了人民公社发展的規律，因而也就必然会进一步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陣地也必将进一步加强起来。

四

我国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是一部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前一个时期組織互助組、合作社是如此，后一个时期組織人民公社同样是如此。人民公社誕生以来的五年，是充滿着阶级斗争的过程，也是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和改造农民的过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它初步显示的巨大优越性，它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得到了农村中广大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他們踊跃带头参加人民公社，坚决维护集体經濟利益。他們热情地歌颂人民公社，把公社看做是自己永远摆脱貧困落后的康庄大道。可是，对于被推翻了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富农来说，人民公社化运动意味着他們重过寄生生活的企图更进一步被粉碎了，他們不甘心于失败，他們中有的人采取各种办法从事破坏活动，破坏集体生产，造謠惑众，进行封建宗族活动，腐蝕和打击干部，甚至篡夺领导，企图复辟。在富裕中农中少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也采取种种損公肥私的办法，削弱和瓦解集体經濟，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客观存在，既无法避免，也无法調和。正如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无数生动的事实证明，这个論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我国农民具有很高的革命性，他们是我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他们又积极地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我国胜利地实行了土地改革，接着又顺利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和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党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下中农，是我国工人阶级最坚定、最可靠的同盟军。我国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我们党继续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现在有了强大的人民公社这一武器，就能够更好地加强农村的无产阶级专政，制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滋长，在今后长时期内继续进行的“谁战胜谁”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在组织上和制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证。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我国农业生产必将得到越来越迅速的发展，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也必将越来越巩固。不仅如此，有了人民公社制度，还可以引导我国农村将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和前进方向。

当然，广大农民群众走上集体化的道路还为时尚短，他们从以往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所带来的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决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彻底改造过来的。实现合作化以后，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情况有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可是，在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程度的两重性。特别在富裕中农中，是经常产生资本主义倾向的，这种倾向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严重。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同贫农、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之间，是经常存在着斗争的。必须经过很长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彻底克服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从小生产者所带来的落后倾向。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列宁说过：“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①毛泽东同志在我国解放初期就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③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证明，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上述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大家知道，仅有先进的社会制度，而没有人的革命化，还是不行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民公社，无疑是极为优越的，但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政治思想状态；否则，即使是好的制度，也不能发挥其优越性。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强调政治第一，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我们在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中，都把对农民的政治工作放在首要

①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5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2页。

③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53、321页。



的地位，从而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地批判和克服了农民中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今后我们仍然必须这样做，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当作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长期的战略任务，直到过渡时期结束，阶级最后消灭为止。

目前，我们正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的目的，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和改造农民，提高广大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强大的贫农、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改进干部思想作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阴谋，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这次运动中，必须坚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农民群众的方针，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对于少数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上中农，必须进行教育和批评，克服他们的动摇性。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对他们实行专政，监督他们老老实实地在劳动中进行改造，把他们的绝大多数改造成新人。对于他们当中一切真正愿意改造的人，都应当给以鼓励；但是，对于他们当中那些抗拒改造的人，必须加强管理教育，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必须坚决斗争，严肃处理。我们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日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加强，对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监督、教育和改造的政策。至于对地主、富农的子女，他们生长在剥削阶级的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但是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年纪较轻，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不是剥削分子，不能把他们同地主、富农分子一样看待，对于他们主要是加强教育和改造工作，清除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争取他们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由于我们采取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凡是进行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地方，都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贫农、下中农阶级队伍进一步加强了；广大干部提高了革命觉悟，改进了思想作风，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和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了。农村中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重新教育人的运动。胜利地开展这个运动，并且把这项工作长久地坚持下去，可以大大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这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国正面临着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人民公社日益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五年来的实践，生动地证明了人民公社的强大生命力；今后实际生活的发展，将会更有力地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奋勇前进！



花县真正变成了“花县”

張 汉 青

曾經听人說过，广东的花县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在它的老县城的北面，有一座菊花山。其实，这座菊花山，名字好听，却是滿山乱石，寸草不长，哪里能見到綽約动人的傲霜黄花呢；大概是因为山上的岩石，状似菊花，于是人們叫它菊花山吧。

花县，顾名思义，該是一个繁花錦綉，芬芳馥郁的富庶之乡。可是在解放以前，这里却是一幅田园荒蕪，民不聊生的寂寞凄涼的图画！当时的花县，不是旱，就是涝，全年水稻产量每亩不到三百斤，是省內有名的缺粮县。“天晴三日車头响，大雨一朝水浸禾。放下禾镰无米煮，一家大小泪漣漣”，就是当时花县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有許多人，因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出外謀生，甚至漂洋过海，流落異国。这里有个統計数字，着实惊人：原籍花县而現在人在国外的共有八万多人。俗語說：“穷家难舍，熟土难离。”解放前那么多花县人被迫远走他乡，顛沛流离，不正好說明花县这个地方实在穷困得难以生存下去么。

解放以后，花县的历史翻开了嶄新的一頁。在原来荒涼貧瘠的土地上，綻开了翻身之花。花县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封建統治，接着又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生产逐渐发展，人民生活

也日見改善。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年底实现公社化以来，五年中間，花县的面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公社之花紅似火，真个是鮮花处处，姹紫嫣紅，到处出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县”了。今天的花县，已經跃居全省先进县份的行列，为省內很多人所知曉。

半年多以前，我曾經到花县去过。那时全省农民的抗旱斗争正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已經六七个月未下过透雨了。人們曾經想尽一切办法，把秧苗插下去，又想尽一切办法，引水灌溉禾苗，真是一棵禾苗十滴汗啊。眼看禾苗要孕穗了，天依然不下雨，驕阳似火，風吹在臉上滾燙滾燙的。可是我們走在花县的田野上，除了看見极少数田块較高地方的禾苗被烈日烤得枯焦以外，到处都是一片葱綠，那样整齐，那样生气勃勃。同行的一位同志滿怀高兴地說：“你們說什么最美？这么大片的整齐的禾苗，最美了。人們常說錦綉河山，花县农民在大旱之年‘綉’的这些禾苗，真正为祖国河山增色不少！”

是啊，花县人究竟靠了什么法宝，使得这大旱之年，能够旱天不早地呢？

这半年来，我又几次到花县去。所見所聞，完全回答了这个问题。一句話：因为有了人民公社。



花县的水利条件原是很差的。东北部地势高，常年闹旱，西南部上地低洼，容易内涝。广大农民群众长期以来就期望着改变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农业生产能够稳定保收。可是要做到这样，多么不容易啊！在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以后，花县人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开始了改造自然的进军，兴修了一批水利，计有较大的水库一个，小型引水工程一宗，还有一批山塘、水井。这些水利工程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距离根本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还很远。全县三十多万亩水田，在一九五七年以前，水利条件较好的不到十万亩，因旱涝灾害频繁，每年都有三万多亩稻田有种无收。当时，就有几十个农业社想修筑县东南部的流溪河引水工程，解决东部地区的干旱。可是由于农业社力量还不够强大，加上单位多，有些问题不好解决，没有很好地修筑起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县建立起六个人民公社。原来分散的农业社，联合起来了，人们深深感觉到人民公社的巨大力量了。长期蕴藏在群众心里的征服大自然的愿望，使他们那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干劲更大了，信心更足了。于是，在一九五八年冬天，一项规模巨大的改造河山的工程开始了。各公社共组织了四万个劳动力，迎着朔风，冒着严寒，奋战了三个月，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把这项横贯全县东西的大型引水工程修筑起来。长达三十多米的大坝，把流溪河拦腰截断，流溪河的水位升高了，清清的河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渠道，流到干旱的田里，解决了将近十三万亩稻田的灌溉。这项工程，东西穿过几十座山头，跨过十多条溪流，共修建大坝、船闸、水闸等

大小建筑物一千三百多座。这是花县人民引以自豪的一桩大事。每个公社社员，只要谈起流溪河引水工程，就会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一股豪情和喜悦，溢于言表。

人民公社改造自然的战斗，当然不止这一项。公社化后，每年冬春，都有几万个劳动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兴修水利，修水库，筑山塘，建堤围，挖水井，还在西南部低洼地区兴建了一批电动排灌站。所有这些，就是一个普通的公社社员，也会如数家珍一般地、一桩桩地向你叙述。除流溪河引水工程外，像受益三万五千亩的芙蓉潭水库，受益二万亩的洪秀全水库和福源水水库，受益一万亩的集益水库和新庄水库，四十四座电动排灌站（装机容量八千瓩），长达八十多公里的防洪堤围等等，都是在人民公社的年代里诞生的。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奋斗，全县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排灌网，使有保证的灌溉面积达到全部稻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社员再不愁早年没有水灌溉了。公社化后水利条件的大变样，使得社员深深地认识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无限地热爱人民公社。

我在新华公社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是团结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曾相的事。从这个人的亲身经历，可以说明花县水利面貌的变化。在互助合作运动开展前的单干时期，大家耕种的都是没有灌溉保证的所谓“望天田”，要是碰上旱灾，简直毫无办法。曾相一家劳动力少，抗旱时，只有他一个人车水，因力气不够，只好背上一块大石头，站到脚踏水车上，去车水，以增加身体的重量。等到勉强灌满了两亩地，背脊也磨破了皮。办起农业社以后，修了一些水利，合作社人手也较多，磨



破背脊的罪可以不受了，可是碰上旱年，車水也要車得脚底起泡，而庄稼还不能完全保住。现在，有了人民公社，水利条件大变样了，他们队大部分耕地，都可以自流灌溉。由于公社可以在更大范围内统一领导，过去长期存在的用水矛盾也得到解决了。新华公社东镜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黄巨平，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东镜离水源最远，慢说过去未修流溪河引水渠道，就算有渠道，放水也轮不到我们，遇到干旱也只好眼巴巴看着禾苗被晒干，晒死。如今不同了，大旱年也有水流到东镜来。没有人民公社，哪能办得到！”这个老汉的一席话，饱含昔日的辛酸，也充满今天的欢乐。至于洪水和涝灾，对于花县来说，也昔时今日，大不相同了。碰上一般大洪水，能够保卫人、畜和村庄的安全，并使农作物正常生长。

由于水利问题解决了，这就改善了最重要的一个生产条件，为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创造了新的条件。这几年，花县各人民公社在水利条件改善的同时，抓紧了推广良种、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合理排灌等措施，农业生产年年上升。一九六三年早造虽然遭到六十年未遇的大旱，但稻谷产量比上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五。许多社员都说：“要是在解放前，碰上这种大灾害，连命都保不住，现在照样吃三餐干饭，人民公社真是铁饭碗！”全县稻谷生产，连同高级社时期的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内，到一九六三年为止，连续七年十四造获得增产。全年稻谷平均亩产量从一九五六年的三百九十二斤增至一九六三年的八百六十七斤，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一；总产量从一亿四千五百三十七万斤增至三亿

零三百五十一万斤，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九。由于水利有了保证，近几年来水稻产量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十三点五，一九六三年又比一九六二年增产百分之十七点三。这个县在解放初期根本没有能力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自然灾害严重的年头还要国家供应粮食，合作化时期向国家交售的粮食也很少，而一九六三年度交售给国家的稻谷共有一亿一千万斤。花县是一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三十多万亩稻田的小县，能够向国家提供这样多商品粮食，这是公社化前所无法办到的。副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猪、鸡、鹅、鸭的饲养量，五年间增长一倍以上。全县农副业总产值，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由于生产迅速发展，社员的集体分配收入在五年间增长一倍；社员的购买力大大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额五年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自行车、缝纫机、暖水瓶、坐钟等商品，更是几倍、几十倍地增长。

有人说：“真没有想到，鸡窝里飞出了凤凰。”这话是指花县的变化来说的。花县五年来的变化，确实是惊人的。但是，这些奇迹的出现，不是靠大自然的帮忙，而是靠党的领导，靠人民公社的力量，靠广大社员要求彻底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志气和毅力。

这几年，大自然不仅没有能够帮什么忙，反而带来了两次严重灾害。一九五九年六月发生一场大水灾，一连下了五天大雨，低洼的地方都受淹了。咆哮的洪水，冲决了一些堤围，冲垮了部分房屋，吞噬了大片庄稼。但是，它摧毁不了广大社员的坚强意志。在人民公



社的统一领导下，各方协作，互相支援，花县农民克服了洪水带来的巨大困难，及时地把受洪水威胁的人家转移到安全地带，洪水过后又千方百计排除积水，抢救禾苗，力争减少损失。没有受灾的地方则大力开展增产运动。结果，全县大多数地方早造仍然获得增产。到了晚造，虽然又碰上旱灾，但全县公社社员热烈响应中共广东省委提出的向大自然夺回因洪水损失的粮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灾增产运动，又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这一年，全县稻谷生产比上年仍然增产百分之六点五。

一九六三年的特大旱灾，同样没有使花县的社员屈服。几年来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在抗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次抗旱斗争中，人民公社加强了领导，合理安排用水，并且组织队与队、社与社间的支援和协作，从而大大地加强了抗旱的力量。赤坭公社西边村电动排灌站，负责灌溉五个大队的一万多亩稻田，最远的相距七八公里，由于公社统一领导，合理安排，使上下游的大队都有水抗旱。花东公社李溪等十二个旱情较轻的大队，组织一部分人力帮助联安等旱情严重的大队打水井二百五十多口，还帮助整田抢插，使联安等大队按时完成插秧计划。新华公社在旱情严重发展、水库蓄水放下的紧要关头，公社党委当机立断，按照互相帮助、等价交换的原则，发动三千多人抢建巴江河的“西水东调”工程，挖了一条长达十多华里的渠道，运用三级动力接力，一级一级地把水抽上来，迫使河水流到高出巴江河面十五米的官溪、九潭、三华等严重干旱地区，挽救了一万多亩正在孕穗的禾苗免于枯死。社员们十分感动，

纷纷说：“梦想不到河水能倒流”。

说到人民公社统一领导的优越性，炭步公社党委书记汤宝佳同志对我讲的两件事，在我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社化前，一九五六年，花县撤销了区，小乡并大乡，当时炭步区分为炭步、石湖、大窝三个大乡。那年早造，炭步乡一带突然下了一场滂沱暴雨，内涝成灾。若按地势来说，应当设法让水从大窝乡排出去。可是，他们在单造田（只在下半年雨水较少时才插秧的稻田）里养上了鱼，无论如何不肯把田里的鱼捉起来，让洪水通过该处排出去，结果炭步乡有三千四百多亩禾苗受淹，严重减产。汤宝佳同志说，要是现在发生了这种事，那是很容易协商解决的。接着他又举了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春骆村和鸣湖两个大队修筑大堤围的例子，为了使堤围早日修好，公社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动员了其他大队派人支援，只花了一个月零七天就修好了；如果单靠这两个大队自己的力量，三年也修不起来。汤宝佳同志说：“要是没有公社，想办这么一件‘小事’，也不知要费多少唇舌，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呢。”

作为大规模的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的经济实力比高级社要雄厚得多。这是花县在公社化后能够兴修大批水利，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兴办的工业企业来说，就有农具厂、农药厂、石灰厂、种苗场、煤炭厂、建筑材料厂等，五年来共提供了一千九百多万元的积累。其中将近百分之七十用于农田基本建设、购买拖拉机、抗灾、支援穷队、举办公共福利事业等。五年来全县农田



水利建設投資（人工費不在內）共達一千一百九十四萬元，其中由社、隊自籌的占一半左右。一九六三年購買抗旱工具的資金，絕大部分也是由各社、隊自己解決的，大大減輕了國家的負擔。目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正在日益充實和發展。集體積累增加了，物質基礎逐漸雄厚了。根據花東公社高溪大隊第四（代表中等的）、第七（代表好的）兩個生產隊的典型調查，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生產連年上升，收入逐年增加，歷年純收入平均增長百分之四十以上。第四隊在三年間購置了耕牛兩頭，谷籬一百二十担，抽水機一部；第七隊購置了耕牛七頭，谷籬四十担，抽水機一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越發展，它所發揮的作用也必將越來越大。

在花縣，隨着征服自然的偉大勝利，花縣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大大改觀了，一批一批新的農民被培養出來了。廣大社員衷心地熱愛黨，高舉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旗幟。他們依靠集體的思想更加牢固了。雖然農村的一些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階級敵人不甘心滅亡，曾經想盡花樣破壞人民公社，有少數富裕中農也企圖用各種損公肥私的辦法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廣大貧農、下中農堅定不移地維護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人民公社的旗幟越舉越高。

我曾經訪問過新華公社東鏡大隊。這是一個近兩年才摘掉“窮隊”帽子的大隊。“有女不嫁東鏡村”，這是解放前遠近人們所熟知的一句話。解放前這裏的自然條件極差，十年九旱，產量很低。公社化以前，這裏的生產面貌還未顯著改變，因此，群眾信心不大，有些人說：“要改變東鏡面貌除非太陽從

兩邊出來”。公社化後，在公社支援下，修好了水利，從此面貌大變。一九六三年早造的稻穀產量，就相當於高級社時全年產量的兩倍左右。社員從集體分配的收入，在縣內也名列前茅。太陽依舊每天從東方升起，但東鏡的社員卻完全換了一付面容，個個都迎著人民公社的太陽在歡笑。他們現在的說法是：“人民公社像太陽，照亮了東鏡的人心，也照亮了東鏡的前途。”

常言道：花香千里引人來。這幾年，花縣的人民公社吸引了來自國內外的許多“賞花者”。這件事，且不說它。在中共花縣縣委，有一個幹部告訴我另外兩件事：其一是解放前因生活沒有保障而到南海、中山、廣州尋找活路的人，這幾年陸續回來了一大批；其二是過去有些類似東鏡那樣特別困難的地區，女子想盡辦法嫁出去，別處的女子又不肯嫁進來。現在不同了，不要說本縣的女子高高兴兴地嫁過來，就是毗鄰的從化、南海、清遠等縣的女子，也心甘情願地嫁到花縣了。他說得那麼興高采烈，使聽的人也笑將起來。

是的，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哪一個時期，哪一個朝代，能夠像公社化以來這樣，創造了這麼多的奇蹟！但是，這還僅僅是五個年頭。現在，花縣的人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毛澤東同志說：“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一付奴隸相嗎？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①花縣二十多萬公社社員，完全做了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正在繼續前進。

① 《介紹一個合作社》。《紅旗》1958年第1期。



“四个第一”的辩证法

· 郭力军 ·

革命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按照这个规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就是说，每一个事物内部都有矛盾。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做革命工作，特别是做领导工作，观察和处理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正确解决矛盾。不过有的人是自觉地这样做，有的人则不自觉地。只有把唯物辩证法自觉地应用于实际工作，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或做得好上加好。

林彪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人民解放军的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明确新的历史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和正确处理这四个关系的“四个第一”的思想。

“四个第一”的思想就是：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中，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在处理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政治工作中，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在思想工作中，把抓活思想放在第一位。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军队建设的方向。

林彪同志提出的这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的思想，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精辟地阐明和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矛盾规律的学说，来揭露、分析和解决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中的矛盾，从而使工作做得更加出色、更加成效卓著。

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中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如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工作内部的矛盾，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矛盾，兄弟单位之间的矛盾，军民之间的矛盾，等等。这就是说，军队工作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四个第一”不是军队工作中各种矛盾的现象罗列，而是正确处理其中的四个重要的矛盾。这四个矛盾就是：人和武器的矛盾，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矛盾，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矛盾，思想工作中抓活思想和进行书本教育的矛盾。这些矛盾，一个套一个，一环



扣一环，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人和武器的关系，是矛盾统一的关系。首先，人对武器有依赖关系，没有武器是不能最后战胜敌人的；人的作用必须通过武器、借助于武器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但武器是要人去制造、去使用的；人是活的，武器是死的；没有人去使用或使用不当，再好的武器也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说，在人和武器的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毛泽东同志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他又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

人的因素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在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固然适用，在科学技术大大发展的现代，也仍然适用。技术越发展、越进步，对人的要求也就越高，人的作用也就越显得重要。远程武器和核武器的出现，对战争的进程当然会有重大的影响，但决不可能改变战争胜负的基本规律。战争的最后结局，归根到底要看人的作用，要看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看谁能过得硬。“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物质条件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人，是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精神，是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不论是在军队工作或地方各项工作中，凡是重视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坚持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善于把苦干和巧干结合起来、把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都能充分发挥物质条件的作用，克服物质条件方面的各种困难，在工作中取得显著的成效。反之，物质条件再好，如果缺乏正确的领导，见物不见人，不能充分调动人的革命积极性和发扬人的革命精神，或者没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工作就没有生气，打不开局面，做不出显著的成绩，甚至把事情办坏，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所以说，无论是军队在处理人和武器的关系中，或者是地方各个工作部门在处理人和物的关系中，都必须把人的因素摆在第一位。

正因为人的因素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所以做人的工作就是军队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的工作。政治工作主要的就是做人的工作，即做人的革命化的工作。政治是统帅，是灵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59页。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页。



魂。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生命线。解放军的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本质，它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威力的来源，就在于它有党的领导，有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军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领导和保证军队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要是没有或者削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军队的建设和作战就会根本没有或者迷失方向，军队的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本质就根本不可能，或者要受到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就失去了最根本的保证。所以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乃是军队工作中的首要的工作。

政治工作不但是军队的生命线，也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觉悟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了，一切工作的胜利就有了根本的保证。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① 思想工作 and 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

由此可见，无论是解放军数十年来建军和作战的经验，或地方工作同志领导生产建设和阶级斗争的经验，都证明：在处理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关系中，必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

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提高人的因素、政治思想因素在战争和一切革命及建设工作中的作用，并通过人而充分发挥武器在战争中和其他物质条件在各项工作中的作用。唯其如此，所以政治工作又必须以思想工作为主要内容，以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为基本任务。在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下，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水平如何，就决定工作的水平和结果如何。正确的思想，是工作成功的条件；不正确的思想，是工作失败的根源。从来没有思想错误而能有正确的行动和成功的实践。战争是如此，一切革命和建设的工作也都是如此。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说，要抓思想工作，要把思想动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来抓。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同志亲手写的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就是要在我们的军队中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九六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精神，是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在军队建设新时期的继续和创造性的发展。

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全体人员的无产阶级觉悟，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只要这

^①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一点做得好，其他各种工作也就可以做好了。

做好思想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政治工作必须以思想工作为主。换句话说，在处理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把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

思想工作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是进行书本教育和抓活的思想两个方面。学习书本理论，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于改造和提高人的思想，对于做好工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轻视书本，不认真地读书是不对的，但重要的是抓活的思想，进行书本教育要同实际相结合。军队有什么问题，中央有什么政策，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如何，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所没有的。我们必须以实际为中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领会这些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军队的每个时期所存在的问题。思想工作要反映实际，要按实际情况去进行工作，这是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中透彻地说明了这些问题。我们做思想工作，主要是做好活的思想工作，要善于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回答各种现实问题，必须学会及时掌握群众生活的脉搏，掌握群众思想变化的规律，从实际出发去进行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泛泛地去做，不能停留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停留在书本理论教育上，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上，而必须深入地、具体地做到每个人的现实思想上。否则就不能起到它应起的作用。

应该这样说：把思想工作深入地、具体地做到每一个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每个人的现实思想问题，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开花结果，这才是检验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否做到了家、是否真正发挥了它应当发挥的威力的根本标准。政治思想工作如果不去抓或抓不住活的思想，不落实到解决人们的活的思想、现实思想问题上来，那是不会有效果的。

这样一来，从人和武器的矛盾出发，便引伸出其他三个矛盾，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的矛盾，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矛盾，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 and 进行书本教育的矛盾。从人的因素第一出发，又引伸出其他“三个第一”，即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样一来，“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便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的体系，成了军队长期以来政治工作经验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和系统化，它反映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最一般的规律，反映了军队政治工作本身固有的辩证法。

从解放军正确处理军队工作中上述四个关系，紧紧掌握“四个第一”的思想的范例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关系复杂的事物，当它内部存在许多矛盾的时候，不但要找出其中重要的矛



盾，而且要分清每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对于实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林彪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指示和军队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正确地指出了军队政治工作中必须经常注意掌握的四个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分清了各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把做人的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和抓活的思想放在第一位。这样一来，军队政治工作的本质一下子就被抓住了，它的最一般的规律就揭示得更加清楚了，因而，它的方向就更加明确了，方法也更加对头了。这就保证了我们军队坚定地沿着革命化和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前进。

军委和林彪同志分析和解决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方法，概括地说来，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的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亦即具体分析具体情况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性，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的精神，军委和林彪同志在分析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时，完全是采取客观地、全面地和深入地看问题的科学方法。其所以是客观地看问题，就是从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像出发。其所以是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在分析各个矛盾的特殊性时，关照了矛盾的总体、矛盾的相互联系，而不是孤零零地提出和解决其中的一个矛盾。其所以是深入地看问题，就是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并且是按照事物本身固有的内部联系，从一个问题推论到另一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从一层本质深入到另一层本质、再一层本质、又一层本质。这种层层剥皮、层层深入的分析方法，表现了活生生的辩证法。

人和武器这个矛盾的提出及其正确解决（“人的因素第一”），对于军队建设工作无疑地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它还没有回答究竟应当怎样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这个问题，还没有进一步回答军队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涉及到另外一个矛盾，即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提出及其正确解决（“政治工作第一”），就接触到了怎样发挥人的因素的作用这个问题，做人的工作即政治工作在军队工作中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也还没有回答应当怎样加强政治工作的问题，还不知道应当从哪里着手去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00—301页。



加强政治工作。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揭示政治工作本身的矛盾。因此，又指出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事务性工作的矛盾，并提出“思想工作第一”作为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这样一来，就揭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本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但是，如果就到此为止，问题仍然存在：到底应当如何加强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又应当从哪儿突破口子呢？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揭露思想工作本身的矛盾。因此，最后，就进一步指出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 and 进行书本教育的矛盾，并提出“活的思想第一”作为正确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这样一来，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不但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而且有了更加落实的办法。

不难看出，这种层层深入、一贯到底的分析方法，对于充分暴露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规定工作的方针、方法，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既唯物又辩证的方法；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是怎样的，就怎样去认识它，而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与那种随便想到几个什么问题，随便加以推论，随便得出什么结论，就拿去指导工作的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用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去认识问题和指导工作，是没有不犯错误的。

解放军在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中贯彻“四个第一”的思想，是党和毛泽东同志对军队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军队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的结果，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在军队建设新时期的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它使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和非常战斗化的军队。

“四个第一”的思想，不但是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方向，对于全国各项工作来说，都具有普遍意义。现在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学习解放军这种无产阶级化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一贯重视政治工作、坚决贯彻“四个第一”的经验。这是一个伟大的学习运动，它将把全国各个战线上的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把人们的革命精神更加发扬起来，迎接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的新高潮。

有些人认为，要是主张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因素第一，就是不承认物质因素的决定作用，就是违反了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误解或曲解。

辩证唯物主义当然承认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承认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原理。但它并不停留在这点上，它不是把意识对物质的关系简单地、消极地理解为仅仅是一种依赖关系，而是在承认这种依赖关系的前提下，同时承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在辩证唯物主义看



来，不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也可以变成物质。列宁說：“人的意識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創造客观世界。”^①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只有在非常有限的範圍內，即哪是第一性和哪是第二性这个意义上，才是絕對的。列宁又說：“这种对立不应当是‘无限的’、夸大的、形而上学的，这是不容爭辯的……。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作絕對的对立，那就是极大的錯誤。”^②对于人們的实践活动來說，第一性的东西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一等重要的东西，而第二性的东西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第二等重要的东西。

客观物质条件，当然是重要的。但客观物质条件是要人去利用的，人不去利用它或不善于利用它，再好的客观条件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意义上說，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是最重要的。如果根本否认客观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不承认它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基础，认为战争或其他一切事业成败的可能性都决定于人們的主观願望和意志，那就大錯特錯了。这在認識上会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上則会导致冒險主义。反之，如果看不到意識的反作用，不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变客观可能性为现实性的决定因素，那也同样是錯誤的。这在認識上会导致机械論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則会导致右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我們的“四个第一”与这两种錯誤思想沒有任何相同之点，它的理論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我們从来不低估、当然更不否认武器及其他物质条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爭取战争胜利的客观物质基础。但要把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决定性的东西是人們的主观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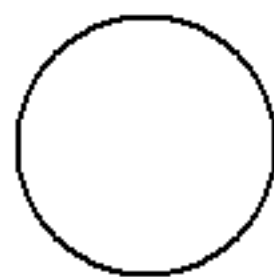
毛澤东同志說：“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錯誤，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針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他又說：“指导战争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內，能动地爭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揮員活动的舞台，必須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許可之上，然而他們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④毛澤东同志的这些話，既說明了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各有其不同的重要性，又突出地強調了主观因素对于实现客观可能性的决定作用，是辩证地解决物质和意識的关系問題的典范。

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一个共同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机械地和片面地理解物质和意識的关

① 《黑格尔“邏輯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頁。

② 《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8頁。

③④ 《論持久战》。《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476、468頁。



系，只看到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而看不到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主观能动的方面，就由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旧唯物主义的这个缺点，使它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不能彻底战胜唯心主义，终于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更高级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

在出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再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以之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就只能是一种哲学上的反动。那些坚决反对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而认定“战争中的‘强’与‘弱’，应当看作是物质因素，而不是精神因素”的人，他们的错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就在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他们的这种“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无非是那早已破产的“唯武器论”的翻版，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战争问题上的反映。毛泽东同志说：“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①他又说：“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②

资产阶级“唯武器论”的思想，见物不见人的思想，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很唯物的，其实完全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于社会历史的领域，不理解“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特点，共同命运。

非常明显，反对见物不见人、反对“唯武器论”和“技术决定论”等思想的斗争，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中正确解决四个关系问题，坚决贯彻“四个第一”的思想，正是由于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结果，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把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在全国一切工作中坚决贯彻“四个第一”，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3—1134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③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31页。



哲学研究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

关 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它是在千百万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吸取营养而不断得到发展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必须密切联系当前革命斗争中活学活用，“有的放矢”，运用它的基本原理说明和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这样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有生气勃勃的哲学宣传工作和哲学研究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永远是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科学，它绝不构造“结束真理”的形而上学体系，它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它充分意识到认识（包括哲学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必须为实践服务，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不断地向前发展；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哲学，能够永远保持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正因为这样，所以，它能够永远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伟大的生命力，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活的哲学。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却也有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或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他们

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同实践的联系，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脱离时代精神的死的哲学。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哲学工作队伍也不可避免地要一分为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死的哲学，并且在战斗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生命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战斗而得到保持和发扬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这样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当着把自己死死地关在书斋里，当着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革命实践脱离的时候，就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变成死的教条。这样，尽管把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背得烂熟，却不可能做出什么理论上的贡献。

哲学工作者应当怎样进行工作，才能在理论上做出贡献呢？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科学地解决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84页。



了文学艺术的源和流的问题，对文学艺术的源和流作了最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哲学，对于哲学研究工作，也是完全适用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书本上的东西，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所以继承文学遗产虽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因此，“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入，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①

哲学工作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毫无疑问，也应该这样。

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同样存在着哲学原料的矿藏，这是哲学的唯一源泉。书本上的哲学知识，是流而不是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革命实践。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的指南，是我们哲学工作者开掘哲学原料的矿藏、加以冶炼和制造成品的

锐利工具。我们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的哲学结论，来代替对于活生生的、新冒出来的事物的研究。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则只能是我们哲学上“推陈出新”的思想资料、知识资料。因此，我们哲学工作者也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掌握原始材料，然后进入创作过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分析它、概括它，写出为当前革命斗争服务的哲学作品。对于哲学史工作者来说，固然在专业上有分工，但是也应该密切联系革命实践，立足于当代。这样，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才能提供为解决当前革命实践问题所需要的、经过分析和批判的思想资料、知识资料，才能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写出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史。

我们哲学工作者，切不可把哲学的源和流的关系，弄颠倒了。

如果把哲学研究工作同哲学原料的矿藏分开，也就是割断了哲学同革命实践的联系，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把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死的哲学。

哲学家的头脑，好比加工工厂。如果脱离实践，脱离哲学原料的矿藏，一味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那就如同工厂生产上没有原料而开空车一样。生产上没有原料开空车，绝不可能造出什么成品，而只能磨损机器。哲学研究工作没有原料而开空车，就不会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2页。



出什么有益的东西来，并且会把自己的脑筋变死，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

哲学工作者固然应该认真读书。但是，应该如毛泽东同志教导的那样，要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读书，读书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掌握武器，用以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①他又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活学活用，用来说明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学习历史和其他文化知识也必须活学活用，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助于说明当前革命中的实际问题。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去读书，就会使人变得聪明。如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圣贤书”，就会使人变成书呆子，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知識就学不到，而在自己脑筋里把它们变成一堆死的东西。

把哲学工作同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割断了联系，就是违背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陷入了唯心主义。如果那样，要做通俗化的工作，也决不可能做好，因为：第一，不懂得群众的語言，写出来的东西人家看不懂；第二，不

了解广大群众在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写出来的东西和当前革命实践不对口径，人家不感兴趣；第三，学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一通俗化就要走样子。如果那样，要做研究工作，就只能从概念到概念，不着边际地发空論，凭空地去发明范畴、創造規律，写出害人害事的“死哲学”。

走出书斋，面向当前革命斗争，到实际工作中抓活哲学，这是哲学工作的一个根本方向问题。

在我们国家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正在深入展开。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发扬。新入新事、新道德、新风尚和新经验，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出现。广大干部和群众意气风发，做着史无前例的事业，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书本上没有的新东西。它为活跃我们的哲学宣传工作和哲学研究工作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要担負者——广大干部和群众，一方面迫切地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用以解决他们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一方面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崭新的哲学原料，提供了哲学研究工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首先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学习他们的生动语言，从而写出通俗化的哲学作品，把哲学交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且总结和概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①②}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817页。



义建设的新经验，说明新事物、新问题，丰富马列主义哲学。就是说，我们应该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按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认识论原则，进行哲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

在我们国家里，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文化战线上是一片蓬蓬勃勃的气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踏步前进，必然引起哲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大踏步前进。这是一个普及和发展马列主义哲学的大好时代。问题是，我们哲学工作者不要脱离自己的时代，辜负自己的时代；而要

面向当前的革命斗争，密切联系实际。这样就能写出好的作品，为自己的时代服务，扩大马列主义哲学的阵地，发展马列主义哲学。

第一，我们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第二，我们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哲学原料；第三，从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在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正确方向下，从事哲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有了这样三条，哲学工作者只要面向当前革命斗争，就一定能够做出可观的成绩来。

学会“一分为二”的方法

卢 国 英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①。“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②

这是列宁在论述辩证法时的十分精彩、十分重要的话。这些话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最根本的东西。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极其深刻地透彻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

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③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40页。

②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7页。

③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2页。



的問題》中，又強調指出：“我們必須學會全面地看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毛澤東同志這些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這就是要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掌握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兩點論”，來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來觀察和處理問題呢？這是因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本身都是一分為二的。所謂一分為二，就是每個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兩方面，這兩方面既統一又鬥爭。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真理和錯誤、革新和守舊、先進和落后、成績和缺點等等，一方面與另一方面是相互聯繫而又相互對立的。世界上找不出沒有矛盾的事物。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充滿着矛盾。

恩格斯曾經說過：“所謂客觀辯證法是支配着整個自然界的，而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在整個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着的由於對立而產生的運動的反映而已”^①。既然客觀事物存在着矛盾，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這就要求我們在觀察事物和分析問題的時候，必須採取一分為二的辯證方法，努力去認識和把握客觀事物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聯繫。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所以具有無比威力，就在於它是客觀辯證法的真實反映，揭示了客觀事物的根本規律。我們只有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觀察事物，才能對事

物獲得正確的認識。

如果不用一分為二的方法，而採取“一點論”的方法來看問題，那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學否認統一的事物中存在着兩個互相聯繫而又互相對立的部分，它總是孤立地把事物的某一方面推崇為絕對，把片面當作全面。用這種思想方法來看問題，就是只了解一方，而不了解另一方；只見局部，不見全體；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正像人們常說的瞎子摸象的故事一樣，瞎子摸到了象腿，就說象像個柱子；摸到象耳朵，就說象像把蒲扇。按照形而上學的方法看問題，就必然歪曲地反映客觀實際，必然導致主觀和客觀相分裂的主觀主義。

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來分析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善於發現和揭露工作中的矛盾，把握對立面，既要看到這一面，又要看到那一面，既要看到先進，又要看到落后，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等等；並分析這兩方面的情况，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我們的工作和一切事物一樣，都是可以分析的。只有成績而無缺點，或者只有缺點而無成績，對於革命工作說來，都是沒有的。用一分為二的方法來分析我們工作的时候，特別要注意的是：當我們工作取得成績、處於先進狀態的時候，要善於發現薄弱環節和不足的地方；當我們的工作存在着很多缺點、處於落后狀態的時候，固然要嚴肅地對待缺點，克服缺

^①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4頁。



点，但还要善于看到积极因素。要做到这些，只有用革命的辩证法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才能使我们的头脑经常保持清醒，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前进。

事实证明，那些比学赶帮搞得好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一分为二，既看到自己的成绩，又看到自己的缺点，同先进单位作比较，发现差距，向先进学习，采取有力的措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改变了自己的落后状态。

很多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事例也表明，只要对自己的工作不满足于现状，看到天外还有天，也总可以发现薄弱环节，也需要向人家学习。就工业交通系统来说，上海是一个先进的地区，但是，上海工业交通系统的同志并没有觉得他们的工作尽善尽美、白璧无瑕，他们以清醒的头脑，既正确地估计了自己的成绩，又寻找出自己不如别人的许多薄弱环节。上海的工厂企业也派出大批职工分赴外地“取经”，力争更上一层楼，先进更先进。

一切事物，包括我们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的工作等等，都是由矛盾着的对立面构成的，总是作为矛盾的过程而向前发展的。不仅各单位之间，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有单位之间的对立面，而且本单位内部也有这种对立面。先进单位中有落后因素和薄弱环节，在落后单位中有积极因素和成绩。正因为这样，我们对本地本单位和别地

别单位的工作，都要作具体分析。

我们说先进中有落后和落后中有先进，并不是把先进单位中的先进方面和落后因素方面等同起来，也不是把落后单位中的落后方面和先进因素方面等同起来。客观事物的矛盾两方面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它们有主次之分。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我们说这个单位是先进单位，就是因为这个单位和其他单位相比较，它的好思想、好经验、好方法、好作风占了主要的地位；我们说这个单位是落后单位，就是这个单位和其他单位相比较，它的好思想、好经验、好方法、好作风不那么突出，或者是落后的东西占了主要地位。如果按照形而上学的折衷主义观点，把先进单位中的先进方面和落后因素方面同等看待，把落后单位中的落后方面和先进因素方面同等看待，那就没有什么先进单位和落后单位的区别了。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所要求的，是在把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的时候，必须认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主次关系，而不能把它们看作半斤八两，并列起来。

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要求在分清矛盾双方的主次关系的同时，还要求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着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矛盾双方的不断转化来实现的。例如，先进和落后、成绩和缺点、好事和坏事，这些矛盾着



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向相反的方面轉化。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先进了,有了很大成績,就沾沾自喜、驕傲自滿、固步自封起来,那就会給工作造成重大損失,使先进轉化为落后。如果我們的工作处于落后状态,但能正視它,重視它,揭露它,分析原因,吸取教訓,那末,落后就会轉化为先进。这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結果。”^①

認識事物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轉化,这对于我們实际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澤东同志指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我們看問題,最忌絕對化,最忌把事情看死。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分析我們的工作,就不仅要看到这方面和那方面,看到这两方面哪是主要的,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自觉地运用矛盾轉化的規律,不使好的方面轉化为坏的方面,而使坏的方面轉化为好的方面。如果我們的工作居于先进地位,那当然是好事,但同时应当看到工作中的缺点和薄弱环节,看到在一定条件下先进有轉化为落后的可能。所以,我們就要認真巩固成績,克服缺点,要在薄弱环节方面加強工作,特別要兢兢业业、勤勤懇懇、謙虛謹慎,防止产生驕傲自滿的情緒,哪怕它是萌芽性的东西,一旦暴露出来,就

要坚决地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这样,就可以防止先进轉化为落后,而使先进更先进,使我們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如果我們的工作居于落后地位,那当然是坏事。但同时我們应当看到工作中的积极因素和成績,看到在一定条件下落后有轉化为先进的可能。所以,就不应当悲观失望、自卑自餒,而要树立信心、鼓足勇气,寻找并創造由落后轉化为先进的有利条件,发揚工作中的积极因素,发揚苦干巧干的革命精神,用一切办法,一步一步地消灭落后状态,使之轉化为先进。

事物为什么会相互轉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呢?这是因为矛盾着的两方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的緣故。事物內部矛盾着的两方,互相联系、相互統一,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存于一个統一体中;同时它們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彼此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絕對的,无条件的;而統一相对的,有条件的。

去年,上海的协昌、第一、惠工和远东四家縫紉机厂你追我赶、我学你帮的竞赛,是說明这个問題的一个很生动的实例。过去評比产品质量时,协昌和第一两厂常常領先,而惠工和远东两厂則常常处于落后状态。一九六三年一开始,常处末位的远东厂职工,打破自卑思想,派人去协昌等厂取“經”,在技术上作了許多改进,結果,在一九六三年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

② 《實踐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第280—281頁。



第一季度评比中，这个厂的产品质量跃进到第一位。远东厂的成绩给惠工厂职工很大的震动，工厂领导检查了自满情绪，发动职工寻找质量差的原因，解决了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第二季度评比时，惠工厂也从第一季度的第四名一跃而得到第一名。原来一直比较先进的第一厂的职工，看见两个兄弟厂双双赶到前面，大为震惊。于是全厂排比寻找差距，奋起追赶。在第三季度评比时，第一厂就从上半年的两次第三名，上升到第二名。曾经是最先进的协昌厂，在这种形势下，也急起直追，派出大批职工出去学习，针对本厂产品的主要缺点，猛攻薄弱环节，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上海四家缝纫机厂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竞赛，也就是说它们互相统一而又互相斗争，使它们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不断互相转化，原来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解决了，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又产生新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展开了新的斗争。结果，就使这四个厂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推动了生产的大大发展。事物就是这样由矛盾着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而推动发展的。

我们任何单位的工作，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既然存在着矛盾，就不能不正视它，认识它，就用不着害怕它，缩手缩脚。矛盾的存在，这不是坏事，揭露矛盾，有意识地运用对立面，促进矛盾的斗争，这就能推动我们工作的发展。

在我们工作中，那些因为有了成绩而骄

傲自满的人，其错误就在于他们眼界狭小、目空一切，不知天高地厚，只看到自己成绩的狭隘天地，看不到别的新天地；只看到别单位的落后，看不到自己还存有落后因素和薄弱环节，因而用形而上学的绳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他们的这种思想方法，实质上是否定事物的对立统一和斗争，进而否定矛盾的两方又统一又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要学会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必须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进行斗争。形而上学是一种很坏的方法，它使人们对事物不能有正确的认识，阻碍我们工作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僵化。这种方法，“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①。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方法时曾经说道：“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形而上学的方法实质上就是主观主义的方法。我们应当进行思想方法上的革命，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自觉地运用辩证方法，清除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等坏东西，使那些还受形而上学思想统治的人们解放出来。

①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0页。



正确认识和處理宗教問題

游 驥 刘 俊 望

宗教早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已产生。从那时起，它一直在精神上毒害着千百万劳动人民。在阶级社会里，它一直是剥削阶级麻醉、欺騙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在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历史上一些先进的人们，曾經看到宗教的危害性，不断地同宗教进行过斗争。但是，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他們不可能正确地認識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規律，因而也无法找到解决宗教問題的正确途徑。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完全認識了宗教問題，找到了解决宗教問題的正确途徑。正确地認識和处理宗教問題，关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关系到劳动人民的团结，因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形态，同其他社会意識形态一样，不是什么孤立自在的东西，它表现为千百万人的思想信仰，而信仰宗教的人们要在社会上进行宗教活动。宗教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尤其是对于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所作的荒誕无稽的解释，起着麻醉劳动人民的思想，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的作用，而且，它是剥削阶级用来統治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这样，宗教問題就不能不涉及到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对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宗教問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問題。

毛澤东同志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說，对于我們分析宗教問題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宗教問題中，同样具有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

反动阶级利用宗教维护其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发生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我国近代条件下，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宗教维护其反动利益，同人民大众发生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主要的社会矛盾在宗教方面的反映。这样性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

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識形态，“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①。就这个意义說，宗教是屬於思想領域內的問題。宗教这一意識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頁。



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存在，它主要表现在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残存的反动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继续利用宗教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复辟。

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由于信仰宗教，同其他劳动人民发生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宗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有神论同无神论的矛盾在劳动人民内部的反映。这一矛盾是大量的，在宗教存在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始终存在的。政治上爱国的、具有民主色彩的宗教职业者和那些实际上以传播宗教为其职业性活动的上层教徒（以下简称这些人为宗教界人士），在政治思想和传播宗教方面，同工人阶级有矛盾，同其他劳动人民也有矛盾。这种矛盾，在我国条件下，一般说来，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我国过渡时期主要的社会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宗教方面的反映。

在实际生活中，反映在宗教问题上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宗教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它们的不同性质，正确地加以处理。

根据以上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既要同一切可能团结的教徒结成爱国的统一战线，坚决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阶级敌人作斗争，肃清国内外反动阶级敌人在宗教中的势力和影响；又要正确地处理宗教这一意识形态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矛盾，逐渐削弱宗教在人民群众

中的影响，逐渐促进宗教的消亡。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宗教问题上的首要任务是：把一切可能团结的教徒（包括宗教职业者中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到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来，并且同国内外反动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肃清他们在宗教中的势力和影响。

一切反动阶级，当他们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总是要竭力扶植和发展宗教，利用宗教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从精神上解除劳动人民的武装，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①当他们的反动统治被人民群众推翻之后，他们一定要竭力利用宗教的势力和影响，涣散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并且以宗教作掩护，进行种种破坏活动，阴谋复辟。全国解放前，我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主要是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是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的工具；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主要是被国内反动阶级所控制的，是他们维护其反动统治的工具。全国解放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第208页。



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雖然已被中國人民大眾所推翻，但是，他們在宗教中的勢力並沒有隨之完全消除，他們仍然力圖在宗教這一陣地上同人民較量。潛藏在宗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常常替帝國主義搜集情報，製造謠言，甚至組織暴亂和進行其他的現行反革命活動；他們散布敵視新中國、反對共產黨、誣蔑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言論；他們利用宗教詐騙錢財、奸污婦女、傷害人命、擾亂社會秩序和生產秩序。他們的這種反革命活動，嚴重地損害着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我國經驗證明，工人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仍然必須同盤據在宗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之一。

應當看到，反動階級敵人是披着宗教外衣進行破壞活動的，其中有的人在某些宗教的某些組織中還居于當權地位，從精神上控制着教徒群眾，並通過這種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部分教徒的政治生活。因此，有些教徒容易被他們所蒙蔽，難以識破他們的反動政治面目，而且他們可能利用部分教徒的宗教感情，在一定時期欺騙這部分教徒跟着他們走。為了最廣泛地團結廣大教徒群眾，孤立和打擊敵人，我們在每一次具體的鬥爭中，都必須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思想信仰問題同政治問題區別開來；把落后分子同反革命分子區別開來；把教徒進行正當的宗教活動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進行反動

活動區別開來；把一般的宗教組織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動組織區別開來。

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動階級敵人進行鬥爭，需要在各方面進行細致的工作，其中最根本的工作是發動廣大群眾，特別是教徒群眾，把一切可能團結的宗教徒團結在黨的周圍，同他們結成愛國的統一戰綫。而要把廣大教徒群眾充分發動起來，又必須在鬥爭中抓住敵人的反革命活動、違法犯罪活動的具體事實，有領導地在群眾中進行揭發、控訴，剝掉反動階級敵人的宗教外衣，把他們的丑惡面目充分暴露出來，教育群眾，提高群眾的覺悟水平。

在我們的幾個主要宗教中，特別是在伊斯蘭教和喇嘛教中，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套極其野蠻、極其殘酷的封建壓迫和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以後，在廣大教徒群眾的要求下，結合社會改革運動，中國共產黨堅決地領導廣大教徒群眾進行鬥爭，廢除了宗教內的封建壓迫和封建剝削制度。這對於肅清反動階級在宗教中的勢力和影響，團結廣大教徒群眾參加革命和建設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無產階級政黨在革命和建設中，應當同一切可能團結的宗教徒結成愛國的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的建立，是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清楚地看到，宗教徒是一支社會力量。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勞動人民，團結了他們，就可以發揮他們在革命和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壯大革命和建設的力量。同時，廣大的勞動人民中的教徒，也只有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



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加予他们的压迫和剥削，才能逐渐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求得彻底的解放。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教徒建立爱国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人们思想信仰的不同，并不排斥人们在一定政治基础上的合作。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就同一切爱国的教徒结成了爱国的统一战线。参加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的，首先是劳动人民中的教徒。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同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的世界观虽然根本不同，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中的教徒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劳动人民中的教徒可以和其他劳动人民群众一道，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周围。在我国，宗教界人士一般说来具有不同程度的爱国思想，其中一部分人还有一定的进步的民主的要求，因此，也有可能把他们团结到爱国的统一战线中来。

党同教徒结成的爱国的统一战线，是我国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同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第一个联盟——劳动人民联盟的组成部分；同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的联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的组成部分。劳动人民中的教徒，是党同教徒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是这个统一战线的

基础。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联盟，是这个统一战线中辅助的但也是重要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不可忽视的，并且是互相促进的。宗教界人士在劳动人民教徒中有一定的影响，因而争取了宗教界爱国人士，有利于团结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然而，归根到底，只有在团结劳动人民中的教徒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把宗教界爱国人士团结到爱国的统一战线中来。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教徒建立爱国的统一战线，首先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提出适当的政治目标，作为共同的政治基础。党同教徒的联盟是政治上的联盟，它必须以一定的政治目标作为基础，而不能以世界观作为基础。很明显，如果以宗教的世界观作为基础，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决不能接受的，劳动人民中的非教徒也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作为基础，这就意味着要求教徒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作为合作的条件，而这是统一战线本身所不可能提出也不需要提出的要求。

在我国，党同教徒建立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要求，同时适当照顾到教徒的觉悟程度而提出来的。总的说来，这种政治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反帝、爱国、守法、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为了巩固和加强党同教徒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必须根据上述两种联盟的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不断地对教徒进行反帝、爱国、守法、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符合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于劳动人民中的教徒，我们应该首先看到他们是劳动人民，具有参加革命和建设的迫切要求；同时又要看到他们是教徒，容易通过宗教在政治上接受宗教界上层分子的消极影响以至国内外反动派的思想毒素，从而妨碍他们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因此，对劳动人民中的教徒，应该耐心地、反复地、不断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逐步提高他们的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使他们在这种实践中教育自己，分清敌我界限，逐步脱离宗教界上层分子的消极影响，以至国内外反动派的政治影响，同其他劳动人民一道巩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欧洲同志们的经验，他们认为必须以谨慎的同志态度对待参加天主教联盟的工人，他们不是厌恶这些工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偏见而把他们推开，而是顽强地、机智地、耐心地利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每个行动来启发他们，使他们在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靠近。”^①

宗教界爱国人士虽然能够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深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的影响，有些人划不清敌我界限；他们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同程

度地存在着怀疑、抵触和不满的情绪；他们力图扩大宗教的势力，力图通过宗教的纽带加深他们在劳动人民教徒中的影响。根据这种情况，党对宗教界爱国人士，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不断地推动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逐步使他们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政治影响，帮助他们跟上形势的发展。如果认为党同宗教界爱国人士在政治思想上可以“和平共处”，认为仅仅依靠某种协定而不经过一定的斗争就可以实现同他们的团结，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不可能同宗教界爱国人士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和巩固上述爱国的统一战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还必须对于人们的宗教信仰采取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即：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信仰这种宗教或者信仰别种宗教，在同一宗教中信仰这种教派或者信仰别种教派，过去信仰宗教现在不信仰宗教，过去不信仰宗教现在信仰宗教，都是自由的。宗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人们对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不能理解和不可抗拒而求助于神秘力量的表现。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信仰宗教的人必然会不断增加，宗教必然会逐渐消亡。但是，在宗教消亡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有一些人信仰宗教，也是必然的。对于不信教的人和放弃宗教信仰的人，不能强迫

^① 《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7页。



他們信教；對於信教的人，也不能強制他們放棄宗教信仰。信仰宗教的人，有進行正當宗教活動的自由；但是，決不能因為進行這種活動妨害國家、社會、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其他權利，更不能利用宗教進行反革命和違法活動。事實證明，只有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才能在人民內部正確處理宗教徒同國家之間、宗教徒同非教徒之間以及不同宗教或者教派的教徒之間的关系，增強人民內部的團結。

三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在宗教問題上的另一個任務是：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地對宗教徒加強思想教育，以逐步消除產生宗教的根源，逐步削弱宗教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促進宗教消亡。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宗教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客觀世界，妨礙人們進行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從而阻礙社會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同宗教的唯心主義世界觀是根本對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要按照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世界，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把人們從自然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必然要遭到來自宗教方面的阻撓，不可避免地要同宗教這一意識形態進行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主張同宗教徒在一定的政治基礎上建立愛國的統一戰綫，一貫

採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這絲毫也不意味着對宗教可以採取中立的態度，可以在思想領域內同宗教“和平共處”，可以對群眾遭受宗教的束縛置之不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最徹底的無神論者，是同一切宗教對立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就說過：“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綫。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綫，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① 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機會主義者曾經在這個問題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不必過問。列寧堅決反對過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他說：“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並不是私人的事情。我們的黨是覺悟的先進戰士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對信仰宗教這種不覺悟、無知和蒙昧的表現置之不理”^②，“無產階級專政應當堅持不懈地使勞動群眾實際上從宗教偏見中解放出來”^③。

認識到必須同宗教作鬥爭，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必須善於同宗教作鬥爭。列寧說：“我們應當同宗

① 《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0頁。

② 《社會主義和宗教》。《列寧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4頁。

③ 《俄共（布）黨綱草案》。《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8頁。



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①。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宗教作斗争，应当服从党的基本任务，服从“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②同时，还应当紧密结合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知识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

从根本上来讲，积极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对于宗教的消亡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促进宗教消亡的根本途径。因为要促进宗教的消亡，首先要消除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压迫。只有消灭了阶级和剥削，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了人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宗教才有可能消亡。毛泽东同志指出，群众的宗教迷信观念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結果。”^③因此，党首先应当领导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在我国，随着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正在逐步消除，宗教徒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正在提高，许多宗教徒已经或者正在摆脱宗教的束缚和影响。

然而，这并不是说，宗教在群众中的影

响，会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自行消失。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促进宗教的消亡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但是，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的提高，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政党，对人民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知识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对于促使人们摆脱宗教偏见，促使宗教消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客观上还存在产生宗教的根源的时候，人们是否信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在产生宗教的根源消除以后，由于人们的意识往往落后于物质条件的变化，宗教并不会立即消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于摆脱宗教偏见，更具有决定的意义。

应当看到，经常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知识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忽视这种工作，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让宗教迷信思想泛滥成灾，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当然，过分夸大这种宣传教育的作用，认为单纯依靠宣传教育就能彻底解决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也是不对的。

①② 《論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9、380、382页。

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页。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这种宣传教育工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我们党把这种宣传教育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密切结合起来，启发群众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自觉地、自愿地破除宗教迷信观念。在进行这种教育时，尽可能地作到谨慎，耐心，细致，照顾群众的觉悟程度，避免简单粗暴的作法。我国的实践证明，这样进行宣传教育的结果，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人民内部的教徒同非教徒的团结，不是挫伤了而是提高了教徒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不是阻碍了而是有助于党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基本任务的实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从来就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或者其他变相的强制方法，同宗教作斗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①用强制人们不信教的办法，是不能使宗教消亡的。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宗教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只有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并通过人们的自觉，才能改变。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说过：“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②事实上，用行政命令等强制方法同宗教作斗争，不但不会收到效果，反而会引起宗教徒的不满，挫伤他们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同时，还可能被反动阶级敌人所利用，煽起宗教徒的护教情绪和宗教狂热。这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

人们摆脱宗教的束缚，都是不利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同宗教作斗争，决不意味着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把促使宗教消亡的斗争置之度外，采取坐待宗教消亡、甚至听任宗教势力扩张的放任自流态度。我国的经验证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宗教不可避免地要逐渐削弱，这是总的趋势。然而，就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宗教的削弱也不是直线下降的。在总的下降趋势中，还会有一定的起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认识和掌握宗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运用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积极进行工作，加强无神论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使人民群众自觉地放弃宗教迷信观念。

* * *

宗教问题的彻底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宗教问题上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任务。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阶级斗争必然要在宗教方面表现出来。在思想领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同宗教的斗争，也是长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正确认识党在宗教问题上的任务，正确地处理宗教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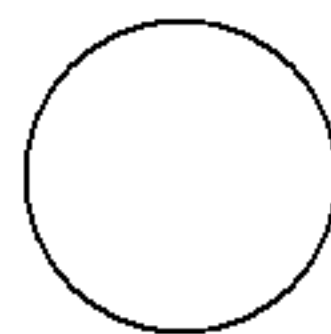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35页。



红旗

HONGQI



5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五期 ★

目 录

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党校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维·乔·威尔科克斯 (1)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本刊评论员 (14)

做好工业企业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李 野 (21)

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车间党支部张 高 (23)

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和讨论东方明 (29)

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杨 均 (34)

南斯拉夫有着怎样的“创作自由”?牧 惠 (39)

不可救药的“肌肉僵化”症洪 谷 (46)

爬不出死胡同秋 阳 (47)

美元·链条·朋友淳 林 (48)

☆ 三月十七日出版 ☆



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 党校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

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维·乔·威尔科克斯

同志们：

今天能到这里向同志们讲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光荣。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而且是由我担任总书记的新西兰共产党的光荣。新西兰共产党正在资本主义世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通过正确的政策和实践，为今后向社会主义的新西兰前进准备道路。你们将会看到，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也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正努力从其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中消除这些错误。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我们本国的条件。对于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说，另外的道路是没有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走上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党的纲领是从新西兰的条件出发的，同时也运用了列宁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伟大十月革命以前和以后我们运动中的世界范围的经验。

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世界性运动最近的两个文件：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一个党声明。修正主义者胡说什么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用不着经过世界性的集体考虑，而只要根据苏共领导的请求，就应该整段整段地抹煞或者片面地修改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八十一个党声明，我们拒绝听从这种胡说。修正主义者说什么为了挽救在南斯拉夫仍然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应该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弄回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队伍，而他们用不着放弃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活动，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修正主义的概念。修正主义者说，自从一九六〇年以来已经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在我们的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现在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我们也拒绝接受这种思想。

不！我们坚定不移地根据我们的认识，在我们所在的资本主义世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我们由于这样做，在新西兰国内和在别的国家中，树立了不少敌人，但是我们也找



到了許多朋友。今后我們还会获得更多的朋友，而敌人将会后退，并最后被馬克思主义的正确原則的攻势所击败。

同志們，

正如八十一个党声明所說，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的衰落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今天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形势不仅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新的問題。新的困难在我們的世界性运动中，同时也在每一个共产党的內部，引起了尖銳的矛盾和斗争。任何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当因此而泄气。如果没有困难，没有矛盾和斗争，我們就不能前进。如果我們不認識这一点，那么首先就会停滞下来，然后就会后退。如果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还像牛吃草的时候那样安詳自在，希望用不着我們的帮助，時間就会解决問題，那是沒有用处的。不，我們必須战斗。無論誰企图把馬克思列宁主义阉割得最后变成资产阶级的理論，我們都必須反对。新西兰共产党去年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決議中認識到了这一点。我們正在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进行斗争。在我們的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今天采取这个立場的人一定会取得胜利，現代修正主义将被击败。

今天出現了这样的看法：由于社会主义世界力量强大，前进的道路已經变得很平坦，大体上只須依靠社会主义世界就能贏得社会主义，而用不着依靠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的有組織的战斗。由于这样来看問題，作为各国內部变革的动力的阶级斗争就越来越不被重視，而阶级合作思想在国内政策和国际事务中都在增长。这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現，列宁所反对的也正是这种修正主义。它的基本思想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所提出的思想是相同的。現代修正主义者可能用不同的語言来表达它，他們可能用关于“新时代”的言論来加以掩盖，但內容还是老一套。

帝国主义世界正在出現新的矛盾。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欢迎和利用这些矛盾。但是，修正主义者是不是主張这样作呢？不。他們要不是說看不到什么新的矛盾，就是故意加以抹煞。他們把衰落中的帝国主义看成是磐石一块，因而企图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整体来同它打交道。帝国主义的法国正在向美帝国主义的霸主地位进行着規模虽小而意义重大的挑战，在修正主义者看来，这不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不是一件有助于我們的运动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进展的事情。不！在他們看来，这是一件坏事，应该給予主要的打击。結果是，他們把法国帝国主义看成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要我們集中力量反对它。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这种主張实际上起了什么作用呢？他們是在帮助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美帝国主义保持它目前在帝国主义陣营中的統治地位而不受到挑战。

从帝国主义內部的分化日益增长这个問題上，可以明显地看出現代修正主义实际上起的是什麼作用。由于修正主义者錯誤地把帝国主义当作磐石一块来同它打交道（對他們來說，



这实际上就是同美帝国主义者的头子打交道)，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保护美帝国主义及其利益，而反对其他帝国主义。我们的捷克同志之所以攻击中国在现阶段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一点吗？当然是的。我们要问，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什么时候起是这样行动的？难道斯大林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出，帝国主义阵营将会再次出现重大分歧，我们应当欢迎这些分歧，并且为了反帝斗争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而利用这些分歧吗？谁对呢？是那些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整体，实际上同帝国主义妥协，幻想它会和平地趋于衰弱和死亡的修正主义者对呢，还是斯大林对？当然是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确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同今天修正主义者的错误比起来，他犯的只是小小的、不重要的错误。一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是斯大林，不是修正主义者。

同志们，

我简单地谈了一下我们的世界性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在怎样试图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把它变成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词句外衣的资产阶级理论。如果他们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并且为此还偶而继续提出一些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事。研究一下考茨基就能看到，在他已经从马克思主义阵营投向资产阶级阵营后，正是这样作的。列宁当时揭露了这种狡猾的手法，我们也必须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手法。修正主义者大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只要可能，每三个字就要提到伟大的列宁，但是，当必须把他们的言词付诸实践的时候，这些修正主义者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不见了！

在对待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上，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说法，似乎民族解放斗争正在接近收场，似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根本不对。成亿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或者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帝国主义仍然是决定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压倒一切的因素。修正主义者拒绝正视日益增长的新殖民主义危险，因为这样作会使他们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的冲突，而他们假装相信帝国主义正在温文尔雅地消失。他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经济援助”同帝国主义进行和平竞赛。他们在印度就是这样作的。苏共领导硬是不肯把印度看成是一个越来越处于美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在尼赫鲁和国大党领导下仍然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印度国大党今天的政策是反动的，它帮助帝国主义，阻碍印度获得真正的独立，导致印度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贫困化。但是，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却讨好尼赫鲁，给他提供援助，这种援助被直接用来反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硬说中印发生边界争端是中国的过错；尽管没有一个亚洲或东南亚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非社会主义国家）相信修正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这样说。实际上这不是别的，而是在帮助美帝国主义打进印度，是在加强当代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是在加强拥有大量原子武器并且每天都在威胁世界



和平的一个国家。

修正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世界和平，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在加强那个在目前和将来都构成主要危险的势力——无论是就世界战争来说，还是就局部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来说都是如此（进行这些局部性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推进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加强美帝国主义用援助和武装部队对亚洲、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动政权的支持）。

这是行动中的修正主义。

不仅如此，在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地方（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修正主义者是否关心争取解放的力量的胜利呢？不，他们所操心的主要是寻找一条同帝国主义者合作的和平道路。最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对于我们新西兰党有些什么影响？

长期以来，许多同志以为这个问题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认为国外修正主义的发展不会妨碍我们去贯彻历届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政策（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这些同志以为这个问题可以让别人去解决，我们虽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可以站在斗争之外。

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义务意味着，我们必须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战线上，在我们的世界性运动中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这一点很快地也变得明显起来：修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使我们在新西兰推行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受到了阻碍，增加了困难。

我刚才谈到了有人把帝国主义当作磐石一块来同它打交道，而忽视帝国主义内部分歧的增长。我也谈到了这个概念怎样使某些人认为，人民中国不应该承认帝国主义的法国，因为法国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想要向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进行挑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新西兰采取了根本不同的政策。我们不仅欢迎法国承认人民中国，而且并不认为法国帝国主义由于打算在太平洋试验核武器（从而蔑视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就立刻变成了最反动的势力，变成了沿太平洋沿岸各国在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主要打击对象。可是，沿太平洋地区的某些在修正主义领导下的党却正在这样做。这些党正在转移反对今天世界上最反动的势力美帝国主义的火力。这些党要求抗议法国进行核试验，但是却不开展有效的运动来争取全面停止核武器的一切试验、制造和储存以及销毁现有的核武器，实际上只有这样做才是防止核战争的唯一有效的保证。这些党认为中国政府关于采取这种行动的呼吁时机不成熟。显然，这些党正在开始接受美国关于只许有两个核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建议，而且还装作相信这是世界和平的可靠基础。



我們的党說，是的，我們应当抗議法国在太平洋上我国的大門口进行核試驗，但是我們也必須說清楚，主要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它在我国的大門口也試驗和改进过原子武器。

我們在抗議法国进行核試驗时，应当把这种抗議同要求停止一切核試驗和銷毀全部核儲存联系起来。修正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这样，目前在新西兰国内以及在太平洋沿岸各国党之間的統一行动受到了修正主义的破坏。

对于南太平洋各国，以及太平洋沿岸各国來說，馬来西亚問題是当前的迫切問題。我們新西兰的政府同澳大利亚政府一样，已經承担了义务，如果接到要求，就得援助英帝国主义的傀儡拉赫曼的武装部队。我們面临着随时都有被卷入同我們北方的邻邦印度尼西亚发生战争的危險。但是，修正主义者是不是承认这是一个迫切的危險呢？不，他們关心的只是集中火力对付法国帝国主义。他們沒有認識到，这个問題所关系到的是，英帝国主义同目前居于統治地位的美帝国主义正在重新进行更加公开的冲突。美国不願意让英国在馬来西亚真正获得成功，它要自己的帝国主义势力在那里占据主要地位。因此，美国最近派了罗伯特·肯尼迪进行活动，同苏加諾进行会談，等等。美国的行动并不是真正为了維持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和平，而是想抑制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当然也想扩大自己的利益。幸运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認識到可以利用这些分歧，但是修正主义者却看不出这种局势有可資利用的任何可能性。

新西兰現在的形势如何呢？我們的政府已經保证，如果接到要求就用武装部队援助新出籠的馬来西亚；但是它也清楚地表明，它不希望被要求来这样做。原因是明显的：英帝国主义已經不再能支配新西兰的外交政策了。新的因素，即美帝国主义在我們地区中的影响，出現了。結果是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和不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們的党当然能够利用本国統治階級内部所出現的这种分歧。我們的党能够利用这种形势，依靠不仅激起工人階級的反对，而且也激起資產階級某些部分的反对，来保证不派军队到馬来西亚去。太平洋各国的修正主义者能够看到这一点嗎？不，他們不能，因為他們只把帝国主义看成磐石一块。对于他們來說，在这个“新时代”，帝国主义内部的分歧是不存在的，要不就是不重要的。

对于我們新西兰來說，一个根本問題是對待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确战略和策略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修正主义者采取的是什么立場呢？他們把社会民主主义在我們这样的国家里以工人階級群众为基础这一点，同工人階級群众的思想意識混为一談。事实上他們开始这样来爭辯：如果一个工党，其黨員中的压倒多数是工人，那么，它的政策就必定具有工人階級的观点，或者至少它会采取正确的政策，而用不着进行一場意識形态的斗争来爭取工人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和認識到有一个共产党的必要性。事实上，他們硬要抹煞这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曾經領導劳动人民和他們的同盟軍取得政权和建立社



会主义社会。只有在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进行了坚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的地方，才做到了这一点。现代修正主义者断言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情况已经同过去不同，现在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了，只要在这里和那里作某些微小的补充，就可以有办法通过议会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了。事实上他们是说，我们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期望依靠工党加上少数共产党党员的协助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导致了对有关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正确概念的否定，而且，事实上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共产党内一度出现的白劳德路线，曾经建议采取组织步骤来取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有效的共产党组织。许多今天的修正主义者当时曾经反对过白劳德路线，现在他们却走上了白劳德的道路。他们至多把工党当作一个两个阶级的政党，但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两个阶级的党。他们拒绝向列宁学习，列宁曾斩钉截铁地指出，社会民主党，工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新西兰共产党不以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主义。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必要同各个阶层的工人，包括那些受工党影响最深和支持工党的工人，在当前的斗争问题上合作和团结。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进行这种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也必须继续不断地进行思想工作，把工人争取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使工人懂得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永远不能领导工人到达社会主义，而只会加强资本主义的束缚。我们同这些阶层采取统一行动，但是在思想上我们却不同他们统一。相反，我们有力地指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还指出为什么必须加强共产党和扩大它的影响，才能有效地领导争取社会主义的新西兰的斗争。

换句话说，同社会民主党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是既有团结，也有斗争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左倾宗派主义者，说我们不懂得世界形势已经改变。他们说我们不懂得，正像帝国主义的本性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也变了。照他们这样说来，列宁已经过时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头子们，特别是考茨基，当他们一旦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到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们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时强大的帝国主义世界的新条件），就很快地从修正马克思主义转到完全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切方面，很快地变成了我们所理解的社会民主党人。大约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一六年期间，他们大多数人都落水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还抓住马克思主义不放。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者，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除非他们迅速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来，他们也将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变为完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个方面的人。他们将变成我们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工党头子那样的热心的社会民主党人。

今天某些欧洲的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已经非常接近这个地步了。对修正主义



者来说，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間是沒有中間道路的。

这样看来，在有着社会民主主义傳統的国家內的这些共产党，事实上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呢？至多不过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左翼，是资产阶级用来多少延长一下自己的阶级特权地位和对群众的剝削的一个有用的工具而已。在帝国主义衰落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这个时代，它們呆在帝国主义的强大据点里帮助帝国主义多活几天。

在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問題上的錯誤思想，对工会运动（列宁曾把工会称为工人斗争的群众机关）的政策和活动立即产生了影响。

新西兰曾經被列宁称为第二国际的天堂。早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当时的自由党—工党政府就通过立法，在我国創立了所謂工人资本主义和所謂福利国家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現了工人和资本家通过政府的立法在劳资关系方面进行阶级合作的思想。对于多数工人来说，劳资調解和仲裁机关成了提出增加工資、改善条件等要求的唯一途徑。統治阶级成功地散布了这种思想：在任何劳资糾紛中，如果工人和雇主达不成協議，工人总是可以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所指定的人来作出公平的裁决。不言而喻，这种所謂的裁决总是有阶级性的，也就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裁决。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工人的头脑里保留了一些强烈的幻想，如“由资产阶级国家作出公平的裁决”。这种幻想一直到現在仍为多数工会所接受。但是，最近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加深已經开始更直接地影响到新西兰的經濟。虽然我国的生活水平仍然可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高的，但是工人、小农、小商人的生活水平同十年或十五年以前比較起来是降低了，而且还在繼續下降。国际壟断资本对新西兰的滲入日益加强，加上我国經濟依赖于农牧业产品的出口价格（在今天的世界市場上，价格是不稳定的），这意味着物价上漲，生活費用上升，而收入却没有增加。在工会运动中，这种情况已經促使产生一种更富有斗争性的政策，开始出现争取打破阶级合作窠臼的全国性运动，和更广泛地使用罢工武器来对付雇主阶级。去年参加罢工的工人是許多年来最多的一年。对于我们党在工会运动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展更进步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现在的条件变得更有利了。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修正主义的思想，我們就不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上层同帝国主义合作，等待帝国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被賽垮，这必然导致在我們的国内事务中接受阶级和平的思想，而不是接受阶级斗争的思想。

因此（让我擱下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問題），无怪乎当我们坚持說今天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是在亚洲、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时候，这些修正主义者說我們的主張違反我們世界性运动的总路綫。我們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进行双边会談的时候，苏斯洛夫就是这样对我们說的。从什么时候起，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下一次的突破、社会主义的另一个



进展将在帝国主义强大的地方发生呢？实际上，革命运动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取得进一步成功，将大大帮助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帮助我们粉碎我国工人头脑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堡垒。

在实际生活中，苏斯洛夫、赫鲁晓夫以及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我们说的是这样：找帝国主义强大的地方去突破。这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这意味着他们离开革命。无怪乎他们要同帝国主义调和。

现在回过头来谈社会民主主义。列宁在很多年以前就概述了在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队伍中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原因。他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由于对自己的新殖民帝国的超额剥削，能够用给他们稍高的生活水平和有钱人的残汤剩饭的办法，来收买本国的部分工人。他们能够用阿谀奉承、名誉地位和直截了当的贿赂来收买工人领袖。他们可以这样做而根本不影响自己的利润。事实上，阶级斗争的削弱，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散布阶级合作和阶级和平的理论，对他们总是大有好处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中制造出来的。

在帝国主义衰落的现阶段，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在工人中的政治表现，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如果列宁是正确的话（我们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预期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理论也会没落吗？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修正主义者不同意。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衰落的时代，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存在，但是也像帝国主义一样在发生变化。他们现在说，由于帝国主义的虚弱，可以使它接受和平政策，而且使它不进行挣扎就文雅地死去。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工党，将会成为这样的政党，我们不仅可以在某些有限的问题上为了群众的利益而同它们联合和合作，而且在在我们本国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也可以同它们团结。

这完全是胡说！随着帝国主义世界内部斗争的加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都将变成越来越恶毒的资本主义僕从。必须把支持它的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观点，支持共产党。显然，帝国主义的没落很自然地会产生同列宁在帝国主义上升的日子里所看到的现象相反的东西，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工人阶级队伍的控制正在缩小。新西兰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工人群众已经不再期望工党解决他们的问题，更不期望工党领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而在过去的年代里，工人群众是这样想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还能控制工人，只是因为工人对它还抱有一点希望，希望社会民主党也许会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稍为好一点。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希望也消失了，许多工人支持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去了。分析一下新西兰上两次大选的结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使工人脱离一切资产阶级理论，接受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支持马



克思列宁主义。仅仅由于工人仍然构成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而錯誤地号召在一切方面，包括意識形态方面同它团結，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但修正主义者恰好是在这样做。不！只有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只在当前問題上、在行动中、在斗争中同它团結，从而提高工人的認識，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工人将通过自己的經驗認識到，除非工人进行斗争，今天的資本家将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不会作任何退让；認識到，没有一个資本家会不經過斗争就把政权交給劳动人民及其同盟者。工人将学会思考共产党所提出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即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观点。

这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主要問題的資本主义世界中加强共产党的道路。这是走向胜利的道路。修正主义的道路是走向取消共产党的道路，使共产党不能起任何独立作用，或不能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这个問題不仅对于我們新西兰，而且对于我們的整个世界性运动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迄今为止，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工人队伍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各国，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社会民主党的問題。可是当我们参加莫斯科双边会談的代表团提出这个問題的时候，代表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是怎么說的呢？

他說：“为什么責备我們？这是你們的問題。你們必須去解决。”这算是什麼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难道我們对于东南亚爭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能够說这不是我們的問題，因此同我們无关嗎？当然不能。这同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都有关系，因为在所有这些問題上集体地采取正确的政策，意味着我們將实现八十一个党声明所指出的目标，即：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你瞧，在我們的莫斯科会談中看得很清楚，当这些修正主义者不願意討論这个問題的时候，就說这是你們的問題。但是，当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向我們談話快要結束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地說：你們是錯誤的。我們曾經希望你們会改变。如果你们改变，你們将能留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队伍中。但是，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末，当然，你們将被排除在外。

換句話說，社会民主主义是我們的問題，但是誰留在兄弟党的队伍內，这要由他們来决定。

此外，我們談到，他們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对世界其他共产党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他們正在采取一种我們只能归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当我们那样說的时候，他們作不出有力的回答。我們在会談中还說，在我們看来，你們的想法是，你們要靠剝削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办法向共产主义前进。換句話說，他們要騎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共产党的背上走向共产主义。当我们那样說的时候，他們作不出



有力的回答。但是，隔了一会儿，我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回答呢？实际上是說：威尔科克斯同志，我們对于新西兰共产党采取的立場，对于你們领导的立場深感不安。你們是小国沙文主义。

无论如何，說苏共中央领导同制定一項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队伍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共产党政策这件事没有关系，对此沒有責任，那是錯誤的。苏共在我們的世界性运动中过去居于特殊的地位，从一九一七年偉大十月革命以来他們起了特殊的领导作用，正因为如此，苏共领导人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所执行的总政策就意味着他們大大地助长了下面这种修正主义思想：把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群众中进行工作这个策略問題，同实现击败工人队伍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并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代替它这个战略目标混为一談。同其他修正主义者一样，他們是不能逃避这个責任的。

让我再說一遍，在新西兰，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是使共产党作为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繼續存在的斗争。这个根本問題关系到我們的政策的各个方面。

根据我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經驗，如果他們对我說黑的是黑的，我仍然会想一想那也許是白的，并认真地看一看。这是因为他們的确什么事都要撒謊，而且讲的非常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

剛才我談到了关于战胜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問題。这就提出了另一个問題：今天我們的世界性运动的根本战略和策略目标是什么。

新西兰共产党认为，我們的世界性运动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壟断資本、帝国主义，使工人階級取得政权，然后建設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策略集中点是防止帝国主义的世界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我們去年九月在莫斯科进行双边会談时就是这样說的。

但是当我在莫斯科提出这一点的时候，苏斯洛夫是怎样代表苏共中央回答的呢？他說：“你們知道，防止热核战争的問題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世界共产党人所通过的宣言和声明說：‘各国共产党把爭取和平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坦白地說，你們是不是这样想的呢？这同你們的講話差得很远。你們貶低了爭取和平的斗争的作用，但是八十一个党的声明說，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是当代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首先是世界工人階級，担負着防止世界核战争的重大責任。爭取和平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策略問題，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基础之一。”

同志們，我們的態度是經典的馬克思主义态度，尽管去年九月他們在莫斯科讲了那么多的話，我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态度。苏斯洛夫的概念为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打开了通路。我們的目的是，我們的战略目标，不仅从当前的策略來說，而且从战略观点來說，变得不重要了，別的东西代替了它們的地位。下一步就会是不惜一切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全



面妥协并最后投降。

在新西兰，这个问题对我们党具有迫切的重要性。在争取世界和平和推动新西兰人民为此目的作出最大努力的斗争中，以及在促使我国政府在国际事务方面执行和平政策的斗争中，牵涉到什么问题呢？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我们应该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各个方面的活动和影响作为争取和平斗争的基础呢，还是作为一个共产党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活动局限于某些形式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如果我们采取后一条道路，我们就会把争取和平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领袖，我们自己的观点也会变成和平主义的观点。我们会忽视帝国主义的本性（这种本性就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很快我们就会开始谈论某些帝国主义头子的和平意愿，过高估计最高级谈判的重要性，而低估工人阶级的作用，低估群众在争取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将会离开我们党的战略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而不惜任何代价把和平当作我们的目标。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已经这样做。这当然不会导致和平，只会导致战争。帝国主义者是没有和平意愿的，他们不是宽大为怀的。帝国主义者欢迎修正主义者的态度，把这看作是我们的世界性运动中存在弱点的表现。这时，我们就会变成好欺侮的对象，任人宰割的羔羊。帝国主义狮子决不会同社会主义羔羊躺在一起，让社会主义羔羊慢慢地、和平平地通过经济竞赛来消灭帝国主义。不，我们必须把自己建设成更强大、更凶猛的狮子。新西兰共产党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让我来谈谈公开论战的问题。新西兰共产党在早期曾经号召停止公开论战，因为我们认为当时公开进行论战是有害的。当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不肯同意。我们会要求举行一次世界会议，用客观的辩证的态度来讨论争论的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一些党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后来的情况怎样呢？苏共中央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者坚持要公开论战，并继续这样作。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对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苏共一面像鸽子那样同帝国主义头子温言细语，一面却向全世界宣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是变节者和叛徒。他们在公开发射了这些重磅炮弹以后，曾经稍为安静了一个时候。然后，一九六二年底和一九六三年初，在欧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举行了一系列的党代表大会。他们再一次发动了公开攻击，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的代表采取了可耻的、非同志式的态度，其顶点是赫鲁晓夫在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破口大骂，以及欢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代表。

然后出现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呼吁，虽然他们自己还是继续进行公开论战。这种呼吁，他们提了不止一次，他们说，让时间来解决问题和证明谁正确吧。

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不能停止公开论战。现在争论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们这些党的前途，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



現在，只有修正主义者放棄他們的修正主义言行，才可以停止論战。如果他們不这样作，我們將受到大損失。关于“让時間来解决問題”的說法，那算是什么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呢？馬克思主义的整个实质意味着必須积极帮助解决問題。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誕生，我們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我們應該帮助創造这个新世界呢，还是像修正主义者所要求我們的那样袖手旁观呢？

現在談談，他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求停止公开論战。这不过是一种詭計。他們的策略是，瘋狂地发射出所有可能发出的子彈，到处毒害人們的思想，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捍卫者，然后說：請你們不要使用你們的重武器，現在我們大家都停手，让時間来解决問題吧。事实上，各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党员和支持者开始看透了他們的修正主义，看出修正主义將导致失敗，而不会导致胜利，对于这种情况他們并不感到那么高兴。他們害怕答辯。他們害怕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动的攻势。他們要大家对他們繼續搞修正主义保持沉默和等待時間来解决問題。不，我們不能接受这种建議。我們的世界性运动必須对爭論的問題进行探討。必須援助和支持各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前澳共中央書記处書記、一位重要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爱·弗·希尔最近訪問了新西兰。我們該怎么办呢？对他置之不理，而只同修正主义者会谈嗎？不，为了发展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我們要在新西兰和在全世界，在正确的原則基础上同任何人会谈。我們也就是这样做的，尽管有一些修正主义者显然认为他們是得到八十个党声明的保护的；根据他們对声明的解釋，我們不能同別人而只能同他們会谈。

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必須发动攻势，迫使某些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领导让它們的党员不仅能够讀到和研究今天修正主义者是怎样議論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議論那些反对修正主义的人的，同时也能讀到和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怎么說的。新西兰共产党的领导一貫向自己的党员提供一切已知的事实和各种不同的意見。我們党已把去年九月我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就爭論中的意識形态問題进行双边会谈时的发言，即我們党的观点，发給每一个党员去研究。但是我們的作法同修正主义领导人不同，我們不只提供我們自己的观点。我們同时也把参加会谈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所讲的每一个字发給了全体党员。此外我們把我們代表团回到新西兰以后所作的經我党中央通过的一个报告，也发給了全体党员，在这个报告中，我們說明了为什么我們不能接受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所提出的观点。我們还广泛散发了表达各种不同观点的各国党的文件。我們还鼓励人們取得在新西兰惠灵頓市的苏联公使館所散发的关于意識形态問題的材料。我們不禁止自己的党员閱讀和研究修正主义者的言論。为什么有些共产党的修正主义领导不这样作呢？为什么他們不把苏共领导人在一九六〇年羅馬尼亚党代表大会以后召开的布加勒斯特會議的真实情况告訴自己的党员呢？为什么他



們不把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十一個黨會議上不得不進行辯論的問題實實在在地說出來呢？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害怕廣大群眾知道事實。難道這是馬克思主義嗎？馬克思主義者什麼時候抹煞、歪曲或迴避過事實呢？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必須探討和研究全部已知的事實。在考慮了各個方面的意見以後廣泛地進行公開討論，將會迅速地導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所以，修正主義者才採取目前進行的謾罵和封鎖的策略。

我們決不要因為面臨這種情況而感到沮喪。完全用不着這樣。今天，千百萬人正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在研究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中取得勝利以後所出現的問題。他們正在拋棄這種唯心主義的幻想，即以為在社會主義取得勝利以後，階級鬥爭、矛盾、對立面的衝突，必然不再是進步的动力了。他們也正在得出這樣的結論：帝國主義的本性沒有改變；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爭取社會主義和擊敗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的首要因素仍然是階級鬥爭而不是階級合作。

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隊伍激昂慷慨。新的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花朵將要開放，這將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讓修正主義者去大叫大嚷吧！讓他們去玩弄陰謀詭計吧！我們堅定不移，我們知道只要修正主義還在我們的世界性運動的某些重要部分佔據統治地位，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就不能最後擊敗世界帝國主義。

你們都聽到過關於個人迷信的事吧。關於這個問題，我有許多話可以說。農村工作失敗，麵包不足，工業出問題，文學作品低劣，繪畫一團糟，等等，都說是由於個人迷信。什麼問題都是由於個人迷信。當然，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就逝世，此後，長期以來一直是赫魯曉夫當政，而他們却不說明這一點。

同志們，

最後請允許我為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而向他們致敬。這種立場鼓舞了無數的人，鼓勵他們在世界各國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戰鬥。

我們知道，群眾創造歷史。我們過去和現在所處的时代，都表明了這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正確性。但是，在每一個时代，偉大的思想家和領袖都起了他們的作用。在我們的世界性運動中，情況一直是這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後來是列寧和在某種程度上的斯大林，他們的創造性思想和實際活動就是我們的榜樣。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时代，當我們不僅面臨着必須堅守階級鬥爭的基地作為在資本主義世界裡實行變革的动力這個問題，而且也面臨着如何處理社會主義社會裡仍然存在的衝突和階級鬥爭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又有了一位偉大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領袖——你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無產階級的历史將會用金光閃閃的字來記載他的和你們黨的功績，而渺小的現代修正主義領導人將被扔進他們應該去的地方——历史的垃圾箱。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要的地位

本刊评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结政治工作经验的时候，提出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和正确处理这四个关系的“四个第一”的原则。这些原则，无疑地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篇文章准备着重谈一谈思想工作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毛泽东思想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指出：我们的“进步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在于向人们“贯注”“进步的政治精神”^①。“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②

早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即中国工农红军创始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著名决议中，就提出红军的建军路线，必须是首先在思想上政治上建军，必须在军队中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决议使中国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而成为一支政治上坚强的、真正的人民军队。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军队一直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且在这方面不断地有新的创造。他们组织思想工作队伍，人人做思想工作，军事行政干部也不例外，根据各个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不断提高全体人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千百万普通的工农劳动者，许多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人民军队的教育和锻炼，逐渐革命化起来，成为有觉悟的经得起考验的战士，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

人民解放军的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无疑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宝贵财产，它对于我们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十分有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认为，思想、理论在历史发展中有重大的作用。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而人的活动是要受思想支配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旧的、落后的、或者反动的思想，阻碍社会的发展，或者把社会拉向后退。先进的、革命的思想，则促进社会的发展，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00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5页。



促进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新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任务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它们一经产生，就会成为伟大的力量，而在下述的情况下，甚至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这就是：当着社会发展已经提出新任务，而一般群众还没有理解这种新任务的时候，当着如同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这时候，革命思想、理论的创立和宣传就成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了。革命思想的宣传愈深入、广泛，革命运动的规模就能愈迅速地发展壮大。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 列宁也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②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创建任何事业，都要从思想建设着手。也就是说，我们能否做好工作，能否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决定的，要看人们的思想状况如何，要看人们按照什么思想去行动，这种思想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革命工作，要由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来做。而革命思想，又是要由革命政党、先进的革命分子来传播的。

过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首先是通过宣传革命思想，唤起群众觉悟，从而组织群众，为夺取革命胜利而自觉进行斗争。在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不是还需要把宣传革命思想即从事思想工作这一项，列为首要的任务呢？

我们的党已是执政的党，领导着全国政权，运用国家权力进行工作。行政事务和经济工作日益繁重。许多工作，也需要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去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人觉得，似乎只要依靠权力、命令，只要依靠组织上的领导，只要埋头于经济业务，而不必着重做好思想工作，不必过问群众和干部的思想状况如何，也可以完成任务，或者认为，只要在政治运动期间做一些思想工作就够了，不必建立经常的系统的的工作。

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当然是不对的。这里向我们提出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是否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政党仍然必须把宣传革命思想即从事思想工作，列为首要的任务。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继续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继续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使他们自觉地、一心一意地、生气勃勃地干革命，干建设，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60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特别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是很复杂、很尖锐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清除人们头脑中留存的各种旧思想和旧传统，同它们彻底决裂。无产阶级如果不取得思想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

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目的是为了促使群众继续革命化。这就是要使群众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和其他一切旧思想、旧传统，而使他们真正理解到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是否能够不经过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权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就自发地、自然而然地提高觉悟，增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呢？他们能否单凭自身力量，达到自己的不断革命化呢？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社会，单就它的内部情况来说（它的外部还受资本主义的包围），它是刚从旧社会里生长起来的，它在许多方面还保存着旧社会的痕迹。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①特别在思想领域方面是如此。也正如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②。资产阶级思想除了在人们头脑中留存下来以外，还通过各种形式（例如某些文化遗产）精巧地、颇有吸引力地保存下来，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继续散布它的影响。

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为彻底消灭产生旧思想的经济基础，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武装群众，创造了社会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原来的小生产者，一方面，他们从剥削制度的压迫下和私有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觉悟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他们又程度不同地受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他们的精神面貌还带着不少旧社会的残迹。社会主义制度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社会主义是摆脱剥削、贫困、落后和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这是他们看得到、体验得到的。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某些新东西还不大习惯，而几千年的旧东西、他们所习惯的东西，还在不同程度上对他们发生影响。只要一有机遇，幽灵似的旧思想，不仅是资本主义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又会在有些人的头脑中复活起来。这些人有时看一场包含有思想毒素的旧戏，重温这种旧思想，要比接受一种新思想、新观点，觉得习惯得多，自然得多。因此，单以一般群众、特别是原来处于小生产者地位的人们的自身状态来说，在复杂的阶级斗

① 《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3页。

②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354页。



爭环境中，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加強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放松以至放棄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也可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

就是那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长起来的人，也并不天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要把他們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年青一代，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們成长于新社会，一开始就接受新社会的教育，这是他們的优点。但是，正因为他們在新社会成长起来，不懂得旧社会，不真正懂得人如何压迫人、剝削人，也就是不真正懂得階級和階級斗争，这样，他們也不能很快真正了解新社会如何产生，应当如何建設，他們不能从比較中認識新社会。这又是他們的弱点，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在复杂的階級斗争环境中，他們是比較地缺乏免疫力的。因此，如果不注意對他們的教育，他們同样会受旧社会死尸的熏染，会接受旧时代遺留下来的各种东西中所包含的坏思想的影响，甚至錯把它們当作珍貴的东西看待。事情也是同样的，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加強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可以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即在放松以至放棄无产階級思想教育的情况下，也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俘虏。

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要的，决定的，还是无产階級政党和无产階級政权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还是要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万能的精神武器。在一定意义上，这种思想教育，在目前，比过去任何时期显得更加重要。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說过：“問題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階級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沒有中間的思想体系（因为人类沒有創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說来，在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离，都意味着资产階級思想的加強。”^①

列宁的这个科学論断，不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完全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階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

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书中，这样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②

这就是說，不論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着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这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存在着馬克思主义思想和各种非馬克思主义思想、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对立。所不同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階級的思想体系，各种非馬克思主义思想和

^①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1—352頁。

^② 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頁。



反馬克思主义思想，占据統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資产階級思想的活动和傳播、它对馬克思主义的进攻，往往采取公开的、赤裸裸的、明目張胆的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則是无产階級的思想体系，馬克思主义思想，占据着統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資产階級思想的活动和傳播、它对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攻，就往往采取各种隱蔽的、伪装的形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階級思想体系、馬克思主义思想要巩固地保持住統治地位，并不是只需要依靠无产階級的政治統治权力和物质力量就够了，而必須通过不断的思想斗争。无产階級思想体系要承受几乎是整个世界（不仅仅是国内）有史以来各种旧思想的联合压力，受它們的包围。資产階級思想体系虽然退出了統治地位，但它仍然是一种強大的势力，特别是，它采取了各种隱蔽手法，同无产階級思想体系爭夺地盘，为資本主义的复辟开辟道路。这就使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尖銳化。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資产階級則力图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的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要經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真正解决。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即无产階級思想体系和資产階級思想体系的对立，而胡謔什么“全民的”即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思想体系，这不过是有意欺騙。这是企图偷偷地取消无产階級思想体系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統治地位和指导地位，而恢复資产階級思想体系的統治地位，为資本主义的复辟創造条件。

很明显，在社会主义社会，問題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放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傳播，无产階級思想不去占领陣地，資产階級思想就会去占领陣地。哪里无产階級思想占领陣地，压倒了資产階級思想，那里就会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会伸張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气；哪里資产階級思想占领陣地，压倒了无产階級思想，那里就必然死气沉沉，必然会鬧出許多烏烟瘴气的事情来。

向群众宣傳革命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促使群众不断革命化，要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去做，要在当前的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运动中去。关键的問題，在于干部思想的革命化，也就是不断提高干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因为向群众宣傳革命思想，加强思想领导等等，是要通过干部来做的。干部思想的不断革命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导作风的改进，领导工作的加强，是群众不断革命化的一个必要前提。

我們国家有一个广大的干部队伍。他們的思想状况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經過較多的革命鍛炼，有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的則比較缺乏鍛炼；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新手，剛参加工作不久。但是，不論哪一种干部，都需要不断提高，不断革命化。

国内外形势在不断发展。許多新的任务、新的問題摆在我们面前。今天的階級斗争、生产斗争，都不同于过去的階級斗争、生产斗争。問題更多了，斗争更加复杂了。以階級斗争



一項來說，我們中間有些人，總自以為是懂得較多的。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社會的階級關係和各方面階級鬥爭情況究竟是怎樣的，階級鬥爭以什麼形式進行，國際國內階級鬥爭的相互關係又如何，——對於這些問題，有些人口頭上懂得，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或者在道理上懂得，一達到具體問題時就糊塗起來，甚至會迷失方向，過去讀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在這種情況下往往被忘記得一干二淨。經過最近幾年的鬥爭，我們不少同志才逐步加深了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認識；特別經過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更使人們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着階級和階級鬥爭，因而依然存在着產生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但是，應當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中間許多人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這門大學問，還是知之甚少，在這方面還遠遠不能說已經掌握了毛澤東思想。

因此，需要重新鍛煉，重新學習。需要新的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革命實踐中，在同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作鬥爭中，重新鍛煉自己的思想，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中間，也要學習各種反面教員所提供的材料，包括現代修正主義者和老修正主義者的著作，以及帝國主義評價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弄清楚在當代許多重大問題上，現代革命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怎樣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是怎樣搬用老修正主義者的謬論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以便增長思想上政治上的識別力和免疫力。所謂鍛煉思想，也包括改造思想方法在內。這就是要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警戒和克服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使人們看不見事物和形勢的變化、發展，打不開自己的眼界，因而，在思想上往往固步自封，自滿自足，安於現狀。任何人，如果不重新學習、重新鍛煉，就會落后；不繼續革命化，就有可能蛻化，甚至可能接受修正主義。

斯大林說得好：“在國家工作和黨工作任何一個部門中，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結果也愈有效力；反過來說，工作人員底政治水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誤和失敗也愈多，工作人員本身也會愈加變為鼠目寸光的小人，墮落成為一些只圖眼前利益的事務主義者，而他們也就愈容易蛻化變節，——這要算是一個定理。”^①

幹部思想繼續革命化的工作做得有成效，我們領導機關的工作就會有生氣，領導工作也就愈有成效。

各級領導機關，包括國家經濟領導機關，目前主要是領導國家建設。這種領導的主要對

^①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0頁。



象是什么呢？是领导成片成片的土地吗？是领导成堆成堆的机器吗？但是，土地是要人来种的，机器是要人来使用的。没有人，土地和机器都是废物，都不能发挥作用。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首先还是要领导人，做好人的工作。经济领导机关，要正确处理人和土地、机器及其他一切生产手段、劳动对象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经济工作就无法真正做好。所以，各级领导机关都要面向群众，面向实践，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把工作真正迅速、具体、及时地做到群众中去，做到基层去，做到生产第一线去，克服任何形式的事务主义、官僚主义，只满足于发布行政命令而放松思想教育，以及拖拉疲沓等作风。要做到这些，毫无疑问，应当从干部思想继续革命化的工作着手。

我们的国家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来为它服务，促进它的发展和巩固。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思想状况，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这一部分的上层建筑革命化了，才能促使上层建筑其他部分革命化，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充分地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学习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经验，是出于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军队工作，比起其他工作来，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需要强调高度的集中，强调纪律性和服从命令。但是，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因此就认为可以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恰恰相反，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并且把它做深、做好，数十年如一日。这就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尽管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进行政治工作的具体方法、形式、要求等也会有所不同，而且应当有所不同；但是，通过经常、系统的政治工作，向广大群众和干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使干部继续革命化，群众继续革命化，等等，则应当是共同的，各个部门不能例外。所谓经常、系统，就是政治工作不能单单依靠政治运动，不能一劳永逸，不能是即兴式的，也不能只是由少数政治工作人员去做，行政领导人员可以不做，而必须是找寻比较系统的办法，人人负责，在一整套办法中，又要紧紧抓住思想工作这个中心环节。

做好思想工作，一句话，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人的威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威力，归根到底，要建筑在发挥人的威力的基础上，建筑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基础上。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地发挥人的威力，充分地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做好工业企业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

· 李野 ·

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党支部，三年来，以阶级教育为纲，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一系列的使人不断革命化的思想工作。白云石车间的工人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大大提高了革命觉悟，正在逐步地锻炼成为一支具有革命觉悟、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的工人队伍，一支像解放军那样，能够吃大苦、耐大劳，能够打硬仗的队伍。这个车间党支部，是一个与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战斗堡垒，是北京市工业企业基层单位思想工作的一面旗帜。

工业企业车间党支部应该做什么工作和怎样做工作？对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还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只抓住了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天天忙忙碌碌，但工作效果不大。另有一些同志，虽然抓了思想工作，但是，抓得很肤浅，所以也不解决多少问题。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工作的

特点在于，他们紧紧抓住了思想工作，并且紧紧抓住了阶级教育，因此一抓就灵。他们抓的内容正确，方法对头，效果就大。

阶级教育，是使工人群众革命化的根本工作，是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阶级教育是需要长期进行的。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斗争，就有进行阶级教育的必要。有些单位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忆苦思甜和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有些单位组织老工人向青年工人讲了厂史、家史，激起了青年工人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这些都是阶级教育，无疑是必需的。但是，如果阶级教育只做到这里为止，那就远远不够了。阶级教育需要不断地抓下去，绝不能一抓就停，或者是抓抓停停。党支部应当把阶级教育当作思想工作的长期任务和主要内容，抓准，抓狠，抓透，坚韧不拔，一贯到底。要把阶级教育工作抓深抓透，在进行阶级教育的过程中，还需要组织工人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把工人群众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样，才能使阶级教育步步深化，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政治思想好，能够用革命者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使自己更加革命化，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

要有效地进行阶级教育，就必须把这一工作深入地、广泛地做到人们的生活中去，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抓活的思想、活的材料，要善于引导工人群众通过具体事例去认识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人群众具体地懂得，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正确的行动，什么是错误的行动。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采用这种



方法，就能够使工人群众便于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的精神，便于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能够更好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有效地提高阶级觉悟。

白云石车间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还在于他们不仅从政治上关心群众，而且从生活上关心群众。他们把从生活上关心群众：当作是做人的工作、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做好每个工人本人的和家属的工作。这对做好车间思想政治工作有重大意义。

有的同志往往把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同关心群众的生活分开，特别是当群众的生产情绪高涨的时候，更容易这样。这是不正确的。党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群众的革命干劲越大，就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党越关心群众的生活，群众的革命干劲就越大。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工作经验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几年来，这个车间的干部，遍访工人家庭，问寒问暖，又经常住工人集体宿舍，跟工人们谈心，给工人解决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残、婚丧嫁娶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个车间党支部的同志说得好：“群众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关心群众提出的任何细小事情，群众也就把自己的一切问题，包括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心里的话，告诉了他们。正因为这样，白云石车间的工人深深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加了革命干劲。

白云石车间进行阶级教育，从开始到逐

步深化的经验，雄辩地说明，阶级教育工作做得越深入，工人的阶级觉悟就越高，革命意志就越旺盛，不断革命、自觉革命的精神就越得到发扬；阶级教育工作做得越深入，工人队伍就越能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认清是非，站稳立场，经得住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①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做的这一切，就是使群众齐心的工作，就是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它奋斗的工作。经验证明，只要群众团结起来，并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那就会产生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巨大力量。

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工作做得好，不仅是因为他们正确地抓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对头，而且还因为他们有着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

首先，这个车间党支部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党委的指示上，有着雷厉风行、抓深抓透、一贯到底的劲头和韧性。他们善于结合自己车间工人的思想实际，主动迅速地开展工作，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把党委布置的各项工作，归结到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归结到使人革命化这个最根本的政治任务上来。善于把最主要的工作狠抓不放，一抓到底，做不彻底决不罢休，不论上级党委检查或是不检查，都能够照样坚持下去。这就是白云石车间党支部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7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对车间党支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从白云石车间可以看出，干部参加劳动，是能否做好工人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有些同志在谈到参加劳动时，总是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白云石车间的干部却克服了困难。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们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通过跟工人同劳动、同生活，他们和工人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亲密关系，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情况和生产情况了如指掌。正是由于依靠对实际情况的深入细致的了解，他们才能够认清矛盾，找到方向，掌握主动，解决问题。也正是由

于他们同工人群众建立了血肉般的关系，车间党支部在群众中才享有了很高的威信，能够在工作中一呼百应，上下齐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的作用。

解放军的基层战斗单位是连队，工业企业的基层生产单位是车间。每个工业企业做好车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生产的根本保证。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的工作经验是可贵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工业企业的党组织，都能把工作的根子扎到基层，使每一个车间党支部的工作都能做得像白云石车间党支部那样，或是比他们做得更好，我们的工人群众，必将锻炼得更为革命化，生产积极性更高，我们的工业企业必将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车间党支部

张 高

北京石景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车间，是一九五八年成立的新车间。几年以来，这个车间被连续评为厂和公司的先进单位，最近又被评为“五好”车间。这个车间的生产之所以搞得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车间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他们坚决贯彻执行了上级党委的指示，积极参加劳动，关心群众生活，抓紧做人的工作，抓活的思想，特别是坚持地反复地进行阶级教育，不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白云石车间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炼钢转

炉用的炉衬砖。车间刚成立的头两三年，设备比较简陋，拌料等重活都靠工人用铁锹干。车间的通风设备也不好，烟雾腾腾。并且，工人又绝大部分是从农村或商业部门新来厂的，有些人在这种劳动条件下干活不习惯，个别人甚至不安心工作。当时，车间领导一面千方百计保证完成了紧张的生产任务，不断提高了产品质量，一面发动大家改善劳动条件。厂党委和车间党支部也不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大家认清打砖的重要性，为这个先进集体打下了基础。但是，有



些人的情緒总沒有完全稳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把人的工作做好，是摆

在当时厂党委和車間党支部面前的一个迫切問題。

一 从参加劳动入手，干部跟工人打成一片

一九六一年，新来的党支部书记刘瑞田，按照厂党委的指示，从参加劳动入手，跟工人同劳动，同生活，了解情况，发现矛盾，解决問題。

刘瑞田第一次参加劳动是在供料組。当时，車間工人还不知道他是新来的党支部书记。供料組长要考驗考驗这个新伙伴，就叫他跟自己一块儿提料。刘瑞田一天运了七吨多料，比組长干的一点不少。組长和其他工人都說：“这个新伙伴干得不軟。”

第二天，刘瑞田仍去找供料組长要活儿干。就这样，他經常同工人一起劳动。

几天以后，当工人们知道刘瑞田是党支部书记的时候，都觉得这位書記不简单，真干，是个好劳动者，是个好干部。

由工长提拔上来的車間主任、党支部委員高升，是出名的生产能手。他和刘瑞田一起，哪里活儿累、活儿难，哪里生产上有問題，就到那里去干。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原来那些不安心工作的人也逐步安心了。他們說：“書記、主任跟咱們一样挨熏流汗，沒說的！”

通过同劳动，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工人把干部看作自己的知心人。工人对生产上的建議，对干部作風的批評，都

可以无顧忌地提出来。有一个时期，高升修訂操作規程，坐办公室的时间多了，参加劳动的时间少了，但規程修訂得并不順利。有的工人就对他說：“怎么，高升变成高官了！”另一个工人摸摸他的脑壳說：“老高，你的烏紗帽呢？”高升这才警觉起来，并且問自己：“怎么，我要把老战友全丢了，要跳光杆舞嗎？”他馬上提个小兜子，带着記錄紙，到了生产第一綫，跟工人一块儿干活，一同研究操作規程，結果，規程修訂得更加切合实际，工作进行得更順利了。

几年来，刘瑞田、高升等克服了各种困难，一直坚持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在白云石車間已經成为习惯。他們通过同劳动，跟工人打成一片，摸清工人的思想，了解事情的底細，商議解决問題的办法。他們把同劳动、同商量当作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刘瑞田和高升都感到，不参加劳动，不接近群众，不了解群众的具体思想問題，就不能調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他們依靠群众的智慧，解决了生产上的不少难题。拌料工人五次改进拌料机，使放置两三年的所謂“廢物”投入了生产。反射炉工人連續采取九項措施，把煤耗降低一半以上。一九六二年秋天，車間领导正为打磚工序搞两班生



产人力不足而发愁的时候，老工人史继仁在回家的路上，向刘瑞田提出一个两班改一班的办法。車間领导研究了這個建議，觉得很好，实行之后，不但完成了生产任务，而且节约出十六个劳动力来。

近两年来，白云石車間不断接受新的生产任务。前年增加了白云石炉和白灰炉，去年增加了矽铁炉。任务新，工人新，就会有新的問題。矽铁炉的生产开始很不稳定，刘瑞田、高升和車間副主任宋根旺，冒着炉前的高温，分头跟班劳动，从中发现工人的思想問題和设备問題，并加以解决，結果降低了炉前温度，减少了事故，提高了产量。

白云石車間的干部，不只跟工人同甘共苦，而且积极主动地跟工人一起改善劳动条件。厂部批准拆除厂房和休息室之間的墙，扩大厂房，流通空气。刘瑞田就拿着锹，高升就拿着镐，同工人一起把墙拆掉。接着，干部又和工人一起修盖机械化料仓。大家奋战了二十一天，一个容量一百吨的料仓建成了。过去倒运白云石，每班七个棒小伙子忙不过来；现在，一个工人一开料仓閘門，白云石就嘩啦啦地落在皮带运输机上运走了。后来，厂房又安装了新的通风排尘等设备，劳动条件不断改善，工人搞好生产的信心更加提高了。

二 关心工人生活，把思想工作做到家屬身上

当工人生产情緒越来越高漲、干劲越来越大的时候，上級党委一再囑咐白云石車間的干部：工人越是鼓足了勁搞生产，领导越要关心工人的生活。炼鋼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等干部，多次到集体宿舍，跟工人談心，帮助工人打扫卫生。党委书记銀重华，是个女同志，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当白云石車間的工人到采石場去支援修路工程的时候，她騎車跑了三十里路，到現場去看望大家。在上級领导干部的带动下，白云石車間的干部認識到，不能只管生产，不管生活；要想彻底了解工人的思想情緒，在同劳动之外，还必须跟工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当单身工人住在一个条件較差的宿舍的时候，党支部决

定干部尽量搬进这个宿舍，帮助工人改善住宿条件。

有一天，工人王仲回到宿舍就嚷了起来：“誰搬到我的鋪上来啦！”原来他发现自己的鋪盖变了样。可是，仔細一看，被子床单还是自己的，只不过洗得干干净净的，跟早晨上班时不一样了。原来是高升拿回家去，让自己的爱人洗干净，中午拿回来鋪上了。

白云石車間党支部的同志，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心着工人的生活。工人生活方面有了困难，干部和党员們都积极主动地帮助解决。打磚工单文斌，在結婚前几天忽然愁眉不展。党员李树仁一問，原来是新房漏雨，



他怕来不及修理，耽誤了婚期。李树仁等十几个同志，就利用星期天的時間幫他把房抹好了。工人史继仁的父亲死了，車間知道这件事后，高升跟工会主席宋海南、工长王凤元、工人王春生等人，在夜晚十点多钟，用板車把棺材幫他运到家里；第二天，刘瑞田又跟王凤元等同志用板車把灵柩送到墓地安葬。

一九六一年，公司党委号召做好工人家屬工作，訪問工人家庭。白云石車間党支部认真貫徹执行了这个指示，有計劃地安排了这一工作。这个車間的工人住家在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有六、七十人，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人去訪問过几次。在規定的家庭訪問日，車間党支部、行政、工会、团支部的干部，全体出动，分片包干，不管酷暑严寒，風雨无阻。上級党委檢查这件工作的时候，他們是这样做的；上級党委不檢查的时候，他們仍然坚持这样做。訪問工人家庭的工作一直坚

持进行，已經形成了制度。工人家里如果发生了夫妻鬧气或婆媳不和等糾紛，干部們也前去劝解，帮助解决。工人家屬从外地到厂子来看望，干部們就热情招待，介紹工人的生产情况和工作意义。有一次，打磚工武志祥的父亲从涿县来看他，当时老武正在班上，离不开，高升馬上到厂門去，把老大爷接到宿舍，介紹了武志祥的进步情况。第二天刘瑞田又陪着老大爷参观了工厂。老大爷原来不願意老武当打磚工，这次来是想把老武找回去的，但是，当老大爷知道了工厂的不少事情以后，原来的想法改变了，不提叫老武回家的事了，反而鼓励老武好好地干。車間干部从老大爷嘴里，知道老武的爱人也不願意老武当打磚工，因此就給她去封信，請她到工厂来看看。她来厂以后，刘瑞田、高升給她介紹了老武的情况，說明了打磚的重要性，她的看法也转变了，不再瞧不起打磚这种工作了。

三 由忆苦思甜到树立革命人生观，階級教育坚持不懈

白云石車間的干部在跟工人同劳动、同生活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工人、特别是有些青年工人思想上还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一些青年工人既不完全了解旧社会的苦根，也不真正理解新社会的甜源。因此，車間党支部十分重视階級教育，并且把这一工作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这个車間，系統的忆苦思甜的階級教育，

是从一九六一年春天开始的。党支部請那些解放前受苦最深的老工人和老貧农，讲家史，談身世，在全体工人中用自我教育的方法，提高階級觉悟。

工人藍斌朋首先讲了解放前人間地獄的“煤黑子”生活。接着刘瑞田讲述了幼年在唐山当童工、受尽日寇摧殘的种种慘痛經歷。藍斌朋身上被把头毒打留下的伤疤，刘瑞田



冒充大人上班的悲惨模样，以及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情景，激发了大家的阶级感情。于是，在小组会上，在宿舍里，工人纷纷谈家史，讲身世，互相启发，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歌颂今天的幸福生活。党支部又请参加过部队的几位同志，向大家讲述解放军吃大苦、耐大劳、英勇顽强、战胜强敌的革命斗争故事，用解放军的英雄气概鼓舞大家的革命精神。

青年拌料工刘华明，小时候他的父亲给地主当过长工，自己跟姐姐卖唱乞讨过活。解放后，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而他却把过去的苦丢到脑后去了。他进厂后，嫌工作不如意，干活吊儿郎当，被称为“调皮大王”。这时他听了老工人的诉苦，想起了过去的苦生活，思想开始有了一些转变。为了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党支部又请他姐姐来帮助他。他的姐姐把他带到从前要过饭的农村，讲述他们当时给老乡们卖唱的凄凉情景，使他痛切地回忆起幼年的悲惨生活。刘华明从许多人的诉苦中，知道车间里有好几个人过去也都要过饭，更多的人受过同他类似的苦难。他从回忆个人的苦进而认识到阶级的苦，终于醒悟过来，进步很快，并且被评为“五好”青年。

青年打砖工石速贵，原来嫌工作条件差，不安心工作。可是，他听了转业老战士们的报告以后，思想起了变化。解放军那种舍己为人的光辉形象不断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禁问自己：“解放军有这种舍己为人、移山倒海的壮志，难道我就被这点困难吓跑？解

放军用小米加步枪能战胜强敌，难道我就不能同大家用双手改造白云石车间的劳动条件”？他下定决心，留下来，和大伙儿一齐改造这个车间。他还向大家表示决心说：“瀝青烟熏得黑我的脸，可熏不黑我的一片红心！”以后，他干活儿一直很起劲，被评为“五好”青年和先进生产者。

但是，什么事情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阶级教育需要不断进行。白云石车间有些工人，在进行阶级教育时，阶级观念比较明确，但教育过后，时间一久，他们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又慢慢淡薄下去，忆苦思甜激发起来的劳动热情，在有些人身上开始减退；同时，车间里的老工人不断输送出去，新工人不断补充进来，这些新来的人也并不都理解新社会的甜和旧社会的苦。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在工人群众中经常地、反复地进行了阶级教育。他们抓住车间里的活人活事活思想，用新旧社会对比的办法，举办各种小型报告会。每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前，工会主席就给大家讲“五一”节的来历，讲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事迹。车间里安装了抽风机，改善了劳动条件，车间主任和老工人就对比新旧社会，给大家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工人赵守荣的子女多，车间工会给他发了困难补助金，他同“老伴”和四个孩子开个家庭会，讨论这笔钱是怎样来的，全家都体会到党的关怀和新社会的温暖，孩子们学习更加努力。党支部了解到这个情况，就请赵守荣向大家讲为什么举行家庭会，从而使更多的工人



受到教育。

许多党员、团员和老工人体会到阶级教育的好处后，积极启发新来的工人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这是做好车间阶级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环。新来的青年工人张龙，一到车间就嫌活又脏又累，心里不自在，干活懒洋洋，休息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他却溜边，一声不吭。老工人、党员郭来看出了这小子有心事，就不断跟他聊天。两人越聊越接近，张龙讲到，他父亲过去打过短工，还参加过打日本鬼子。郭来跟他说：“张龙啊，你爸爸打短工，我扛过长活，我还要过饭。咱们过去都是受苦的人。有些罪你没摊上，可是过去的苦日子不能忘。你爸爸当年打日本鬼子是闹革命，咱们现在搞生产也是闹革命。你得想想，咱们怎样才能保住无产阶级的江山？怎样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郭来的话，深深打动了年轻人的心。张龙到郭师傅家去谈了好几次，有一次一直谈了三个钟头。在郭师傅的帮助下，张龙逐渐转变，干活积极起来了。

经过一年多比较深入的阶级教育，白云石车间工人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初不安心工作的人，也不走了。

为了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入一步，把工人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白云石车间党支部特别重视组织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的头脑。在车间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车间的干部、党员、团员和工人，在不长的时间内，积极地、自愿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在学习中，人们联系车间的真人真事，互问互答，开展讨论。因此，学习成绩显著。通过对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学习和讨论，大家进一步懂得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在树立革命人生观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许多同志说，只知道新社会好，只有报恩思想还是不够的，眼光还必须远大，还必须要进行不断的革命斗争。这样，才能够建设好我们的社会主义。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白云石车间工人的阶级觉悟越来越高，革命干劲越来越大。党指到哪里，他们就干到哪里。党支部组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职工们积极参加，风雪无阻。党委号召节约，全车间的工人，每个人都带上节约手册，认真地节约原料、材料，捡拾有用物资。白灰炉工人在煤耗已经

完成指标的情况下，还在气温和风力合适的时候，少添一两块煤，节省煤炭。为了提高生产，打砖工勤学苦练，使炉衬砖的质量不断提高。白云石车间的工人，不只是月月出色地完成了生产计划，而且在支援兄弟单位的工作中，也总是拣重担子挑，提前完成任务。



加強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

东方明

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从根本上說来，就是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我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承认只有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才能使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但是，要真正掌握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在历史研究中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需要經過一个认真的艰苦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真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結合历史研究工作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展开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用馬克思主义理論武装我們的史学工作队伍，也是馬克思主义在历史領域占領陣地的一个基本条件。

我們的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成績是很大的。近几年来，历史問題的討論，例如历史人物评价問題的討論，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問題的討論，是相当活跃的。有些同志写出了有价值的历史专著和論文。有些同志在搜集、整理、注釋史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績，为进一步的研究創造了条件。在史学方法論方面，有的同志結合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对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論进行了批判，并且結合我們自己的历

史研究工作的經驗，对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討。但是，就整个情况看来，我們的史学界对于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还是注意不够的。对于曾經在中国史学界有影响的几个資產階級史学流派，还没有作出系統的分析 and 批判。結合我們历史研究工作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系統地研究和闡述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論也做得不够，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著，这方面的論文也很少。关于史学方法論的討論，也是比較少的。看来，加強史学方法論的研究和討論，是提高我們历史研究工作的质量，提高我們史学工作队伍的一个关键。

勤勤恳恳地搜集、整理、注釋史料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受到尊重。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应该加強。有些擅长这一方面工作的专家，分工专搞或着重搞这一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历史研究工作，絕不能限于整理史料。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归根到底，是为了闡明历史发展的規律，从而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如果不是在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搜集和整理史料的工作，也有可能走入迷途。我們的史学工作者应该不断地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武装自



己，逐步学会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利用花費了許多心血搜集、整理和注釋的史料，从而概括出历史发展的規律。

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提出了許多以前未曾提出过的中国历史上的問題，发现了若干以前未被注意的史料，大力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观点，展开了爭辯。这是一个好現象。无疑的，这應該繼續和加強。但是，从爭辯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情形：固然有些具体历史問題的长期爭辯不得解决，主要是由于史料的掌握还不够；但是有更多的問題，却是由于或主要是由于爭論双方在史学方法論上，或者在运用史学方法論上存在着原則分歧，而不得解决。有些具体的历史問題，爭論双方所引用的史料相同，而对史料的解釋、得出的結論却很不相同，甚至相反，正是表明了这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提高到方法論上进行研究和討論，具体的历史問題的爭辯，就不能深入下去。

科学的历史表明，对于方法論問題是不能忽視的。忽視方法論是經驗主义的一种表现。恩格斯在晚年曾經針對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状况，說过这样一段話：

“的确，蔑視辯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論的思惟多么輕視，可是沒有理論的思惟，就会連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就会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唯一的一問題是一个人的思惟正确或不正

确，而輕視理論显然是自然主义思惟的最确实的道路，因而也就是不正确思惟的道路。”^①

恩格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所說的这段話，无疑的，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也是适用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一味埋头于史料，忽視理論思維，忽視方法論問題，对于具体的历史問題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結論，而且会不自觉地陷入资产阶级的思維方法，用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論来观察历史問題。

认为只要从史料出发就能坚持唯物主义，这是不正确的。保存下来的文献史料，大都是地主阶级知識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識分子記載下来的，这些史料未必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在关系到阶级利害的問題上，他們的記載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偏見，以至完全歪曲事实。所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果輕視理論思維，忽視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指导作用，不仅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連两件事“也联系不起来”，而且还会誤信歪曲事实的史料，被剝削阶级的偏見俘虏。这就是說，在阶级性很强的历史科学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論的指导作用更加重要。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之下，对史料做出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引出历史发展固有的規律性，才能把握历史真相，按着历史的本来面目解釋历史，坚持唯物主义。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頁。



没有一定的方法论作指导的史学家，实际上是沒有的。在历史研究工作中，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就是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指导。不过有的是自觉地运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有的是不自觉地陷入这种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所以，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破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

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肃清它在史学研究工作中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在旧中国，梁启超、何炳松等人，曾经大量贩运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我们不能认为，它的影响已经肃清了。最近就有人发表文章宣扬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个别史观，认为历史科学只是研究一个一个的个体，而不能也不应该去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仅此一例，就可看出，批判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论，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彻底摆脱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是何等必要了。

在力图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中间，有时候不自觉地离开唯物史观，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要熟练地把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研究工作中去，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就是把我們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从方法论上进行探讨，带着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弄清何种做法是正确的，何种做法是错误的。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史学界就在历史研究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历史主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几年来关于許

多具体历史问题讨论的继续，特别是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和中国农民革命战争问题讨论的继续；就是说，这是把許多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集中到方法论问题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一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史学界应该把这一讨论深入下去，通过这一讨论，从方法论上总结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用唯物史观进一步武装我们的史学工作队伍。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我们认为，在这一讨论中，需要着重探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列宁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①。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②这是包括历史研究工作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历史研究工作的实际证明：对于历史事件做出科学或比较科学的说明的，都是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历史研究工作中的方向性的错误，则无一不是这样或那样地背离了阶级分析方法。文明社会的历史，是

① 《論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34页。

②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阶级斗争，是历史地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或历史方法，就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中来考察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语），这就是说，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阶级斗争环境，从当时的阶级对立及其演进中进行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绝不是与阶级观点对立的。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是这样或那样地违背了阶级观点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强调了阶级观点。正确地运用阶级观点，不会产生非历史主义倾向。所以，史学界的这次讨论，应该集中地探讨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如何牢牢把握列宁所说的“基本的指导线索”，亦即如何拿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这个基本的指导线索，也应该是这次史学方法论问题讨论的基本的指导线索。否则，讨论就抓不住要领，就会陷入五里雾中。

在讨论中弄清有关的基本概念是必要的；但是，应该防止陷入单纯概念的争辩。我们认为，应该把关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同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密切结合起来；就是说，从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问题，来探讨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历史主义。这种探讨，可以对几年来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问题，做综合的、概括的理论阐明；也可以解剖一只麻雀，把某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提高到方法论上来研究，例

如曹操评价讨论中的方法论问题，关于明末农民战争讨论中的方法论问题。防止陷入空洞的概念之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防止把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运用阶级观点、历史主义的讨论，引向或者变成个别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和史实的争论、考证。无疑的，个别的具体的历史问题和史实的争论、考证，要继续进行，但是决不能用它来代替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例如不能以隋炀帝这个人物的评价之争，来代替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论的讨论。否则，就会引导到忽视方法论。而忽视方法论，就会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陷入史料的汪洋大海，失掉方向。

结合历史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和讨论如何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正确运用阶级观点、历史主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进一步从理论上武装我们的史学工作队伍，克服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非阶级观点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使我们的史学工作者进一步掌握唯物史观，准确掌握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是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一个的问题，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历史研究工作，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之“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

毛泽东同志说：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



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做到这样，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①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是一切理论研究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它的精神对于历史研究工作也是完全适用的。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来说，就是要详细地占有史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这些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引出正确的结论，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来为当前的革命斗争服务。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反对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现象罗列、堆集史料的经验主义。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是一个以“矢”（马克思主义）射“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详细地占有史料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指出占有史料的重要性，绝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史学工作队伍。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在历史领域的大海里航行的指南针，如果没有这个指南针，就不可避免地要迷失方向，花多大力气也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既要努力发掘史料，更

要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分析史料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结论，是从客观材料引出来的事物固有的规律；结论既经得出，如马克思所说，它就变成了指南。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是我们向着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历史领域进行研究的唯一科学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才能正确地分析史料，并且能够具有对于史料的敏感，抓住重要的关键性的东西，而不致使自己淹没在史料文献的汪洋大海之中。

就历史研究工作的现状来看，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我们的史学工作队伍，强调研究史学方法论，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就不能提高。强调这一方面，对于加强史料工作，提高史料工作的质量，也是大有好处的。

我们希望，目前史学界正在进行的关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能够引起更多的史学工作者注意研究史学方法论，系统地探讨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方法论，肃清它的影响。我们希望，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和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方面，出现一批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论文和专著。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领域占领和扩大阵地，肃清资产阶级史学著作和史学观点的影响，为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802页。



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

楊 均

积极地、尽可能地从各个方面支援农业，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革，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充分发挥投资的作用，使技术改革取得最好的效果，必须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

农业生产，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的实施和试验研究成果的应用，都需要注意研究其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主要地是计算分析在一定的经济和自然条件下，采取某种农业生产技术措施，是否在具有技术上的合理性的同时，又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是整个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技术改革，它一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范围，农业生产实践中所提出的技术问题，要由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部门去研究和解决。另一方面，它也是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需要从经济上来考察技术改革的合理性，对实现农业技术改革计划提供有数据的、有科学分析的意见和建议。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要应用于农业生产实际，充分发挥其

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必须通过技术经济的分析研究，提供完整的经济依据。如果仅仅有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而没有对新技术的经济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就不能够正确判断它在经济上的合理性，因而也就不了解在某种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应用和推广这种技术，是否能够获得最好的经济效果。通过经济效果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有助于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而且还有助于对新技术的进一步的研究与改进。

在农业生产上，采用改良的耕作方法，能够使产量提高，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在农业生产实践中，改革任何一项旧技术，采用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是很复杂的，它关系到多种因素。拿选用农业机具来说，目前农业机具的种类，有旧式的手工工具，也有现代化的农业机具。现代化的农业机具又有很多种类和牌号。究竟在某一地区、某一生产单位，选用哪种动力机械及与其相适应的农具，才能够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就要考虑到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如考察当地的地形、地势，土壤的性状；当地土地利用状况，水田还是旱地，地块是大还是小；种植作物的种类，耕作制度；生产单



位的規模和經濟狀況；等等。只有对当地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以及其他有关的因素进行綜合的、全面的經濟分析，对不同的农业机具的經濟效果进行比較，最后才能选出对本单位來說經濟效果最好的农业机具。

在一定时期，一定生产水平的条件下，国家对农业技术改革的投資是有限的。我国的国土广大，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很复杂。根据各个地区具体的自然条件和經濟条件，合理地使用国家分配的资金，是农业技术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各种农业技术措施和实施技术措施計劃的各种方案，因地制宜地进行經濟评价，才能为合理使用投資，充分发挥有限投資的效果提供依据，使技术改革更加切合各地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使我国的农业技术改革在充分合理利用現有有限投資的基础上，取得农业增产的最大的經濟效果。

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还可以促进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本身更快的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从来就是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就可以明确在具体条件下，对农业科学技术的具体需要，这也就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发展方向，从而为农业科学技术更好的发展，創造有利条件。

以上表明，做好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工作，不仅可以考察某一项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經濟效果，还能够为国家的重大

技术措施提供确实可靠的經濟依据，帮助国家确定技术政策，在充分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农业增产的速度，促进农业科学技术更快的发展。可見，加强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在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必須把这一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

要做好农业技术改革經濟效果的研究，根据我們的体会，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必須从我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农业技术改革的經濟效果，为有步驟地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和电气化提供經濟依据。

全国解放以后，农村經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农民已經走上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在农业上，現代化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也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总的來說，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还比較低，最新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还比較少。为了大力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經濟，加速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就成了当前的迫切任务。实现农业技术改革，必須从当前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逐步改革过去小农經濟时代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使之逐漸轉到以現代技术和科学成就为基础的軌道上来。比如拿平整土地來說，过去因为小农是一家一戶进行生产，就形成了很多小块土地。在农村已經实现集体化以后，在进行大面积引水灌溉的新灌区，就会发现，尽管一眼看去是很多块很



好的平地，而实际上在这些地里都是高低不平的，灌水后往往会形成低处积水，高处看不见水的现象。这种现象对提高作物产量和土壤性能自然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说明，新灌区即使堤埝渠系的工程作的很好，如果平整土地的环节跟不上去，不能很好地克服过去小农生产技术措施的影响，仍然会限制新技术的经济效果的充分发挥。

但是，也必须看到，千百年来，我国广大劳动农民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生产经验，形成了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农民的这些传统经验，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有其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和经济上的根据。在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和吸收农民的优良的传统生产经验，提出有效的农业技术改革的措施，而且要不断进行科学总结，发扬和丰富这一优良传统，使之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轻率地否定农民群众多年积累的传统经验，就会给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生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对待任何一项农业技术改革，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既要从科学技术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又要从经济方面进行认真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农业技术改革的顺利发展。

做好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还必须注意农业劳动手段的内在联系。同时，要对新的技术措施进行综合的经济分析，才能正确地评价技术改革的经济效果。

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

物。农业劳动手段是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东西构成的，一方面除了来自太阳的光和热等自然因素以外，有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性质的东西（如农业机具、水利灌溉工程、肥料、农药和生长刺激素等）；另一方面又有生物学性质的东西（如动植物种及其有机体和土壤微生物等），并且后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有许多既是劳动手段，又是劳动对象。作为农业劳动手段的各个因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农业劳动手段复杂错综的内在关系，可以用农业生产中的土为例来说明，它包含着量和质两个方面。在量的方面，它具有不同的形状和面积；在质的方面，它具有不同的性状和肥力。没有一定的面积，作物群体就没有生长的基地；没有一定的肥力，作物个体的发育就没有保证。然而土之所以能成为农业劳动手段，又有赖于机械力学的劳动手段以土为对象实行的加工。采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进行土地加工，能够提高工效，节省人畜力，加深耕层。但是使用机械进行耕作，除了要协调机械与劳畜力的关系外，还要从技术和经济方面要求土地在形状和面积上，具有最小的坡度和长宽适当的作业区，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机械效能，减少耗油量和机械磨损。另一方面，土地要求农业机械，除了加深耕层以外，还必须提高土壤的理化性状和肥力。如果一方面不能适应另一方面，或双方面不能相适应，新的技术就会造成新的矛盾。例如，北京市郊区的某些土壤就不适宜用重型犁耕作。因为这类地区春



夏两季都需要浅耕，如用重型五铧犁进行耕作，不仅机体重，拉力大，耕垡块大，而且在浅耕时犁沟深浅不一，不适合水浇地的农业生产要求，必须用轻型犁耕作，才能适应土壤特性。在土与农业机械的关系上，如何适应土壤的特性，相应地进行农业机具的选型配套，是农业技术改革中值得认真加以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实行机耕的条件下，土与肥的关系也必然发生新的变化。为了适应机械作业和电力排灌的要求，土地必须进行平整，而土地平整，耕层加深之后，新翻上来的下层生土还有待进一步的熟化，在生土未熟化以前，因肥力不均，作物的生长发育就会受到影响。为了加速熟化和培肥加深了的耕土层，达到连续稳定增产，相应地增施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就成为同农业机械化密切相连的重要措施。同时，即使新的耕层熟化以后，连续增施肥料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就要求在实行机械化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增加肥料（包括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的施用量，使机械化与增施肥料两者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的增产潜力，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这也说明，考察农业技术改革的经济效益，不能孤立地去进行，必须把各种农业劳动手段有机地联系起来，综合地进行考察，才能够较确切地看出农业技术改革的增产效果。

在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益的研究中，还必须统一考虑当前效果和长远效果、货币效果和实物效果。由于看到某些农业技术改革

当前效果较小，或者从货币计算上看经济效益较小的现象，就得出农业技术改革“不合算”的结论，是错误的。

应当看到，农业技术改革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它不是在顷刻之间就可以实现的，只能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逐步实现。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前，机力和人畜力并存，新旧农具结合，传统耕作栽培经验和适应现代化条件的耕作栽培措施相互交错采用。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于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因此，在实施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要使机力和人畜力、传统耕作经验和新的耕作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它们之间有时候也可能产生矛盾。有的技术措施可能有利于当前的生产，但从长远的经济效益来看，未必有利。也有的技术措施从长远来看，经济效益很大，当前效果并不显著。例如，以种植业的机械化情况来说，在东北的某些地区，由于尚没有与耕作制度相适应的耕作机具，不少作业不得不用“洋头土尾”的方法进行，即人扶土犁，拖拉机牵引。很显然，“洋头土尾”的耕作，当然没有完全机械化的耕作效果好，甚至还存在某些使用人力较多，经济效益较小的情形。孤立地来看，这似乎是不合算的。但是应该看到，使用半机械化农具和改良农具，它有助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就是在当前，只要加强对新旧农具的合理调配和劳动力的合理组织工作，就能提高工效，为适时地进行耕、耙、播、收和为增产提供有利的条件。只有把当前效果和长远效果统一考虑，进行全面



地考察和研究分析，才能够对采用机械耕作的经济效益作出正确的判断。

实行农业技术改革，是为了保证不违农时、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使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的提高。这就要求在实行农业技术改革时，既要注意增产，又要注意降低成本；既要注意实物效果，又要注意货币效果。在农业技术改革的实践中，也有这种情形，由于某项新技术的使用和投资的增加，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提高了，与此同时，农作物的生产成本也提高了，甚至增产部分的收入，还不能补偿成本增加部分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是在继续稳定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新技术呢？或者是因此就得出农业技术改革“不合算”的结论，从而拒绝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呢？严肃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应该是善于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找出新技术还不完备的地方，改进它，使它更加完备，而不是因为它有某些缺点就否定它。就拿旱改水、平整土地实行水利化来说，无疑这是促进农业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平整土地，进行水利建设，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和资金，投资需要经过一定时期，才能逐步收回。平整土地也必然会翻上来部分生土，这对当年或近期的产量，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根据一些人民公社近年来平整土地的经验，在菜田水肥充足的条件下，生土在第二年末或在第三年就可以基本赶上熟土的产量水平，旱田在第四年末或第五年也能赶上熟土的产量。虽然在平

整土地的最初一、二年里，农作物的产量会受到一些影响，成本也会高一些。从长远来看，货币效果和实物效果又是统一的，因为经过平整以后实现了水利化的土地，无疑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它能在长时期里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保证农作物持续的高产稳产。所以，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化，以为只要是技术改革就能够立刻以新的技术体系代替旧的技术体系，或者简单地从一时一地的效果出发，就作出某项农业技术改革“合算”或“不合算”的结论，这样都不会对农业技术改革的经济效果作出正确的评价。应该根据对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技术改革过程中技术结构的特点和农作物实物增产的意义的深刻认识，勤奋地进行研究工作。

农业技术改革经济效果的研究，虽然在性质上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但是它同有关的自然科学部门关系很密切。因此，农业经济科学工作者，除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外，还要深入洞察农业生产过程的基本情况，特别是掌握其中各种不同的技术环节，不同技术因素之间的经济关系，认真地占有大量的实际材料。掌握了大量的材料，经过分析研究，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以促进我国农业技术改革的迅速实现，使我国农业转到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来。

（作者附志：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何桂林、艾云航、杨福慧、范远谋、王松鹤等同志的帮助）



南斯拉夫有着怎样的“创作自由”？

· 牧 惠 ·

资产阶级历来总是拿缺乏“自由”作为攻击和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借口。面对着这种攻击，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亦即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绝不因资产阶级的攻击和诽谤而放棄这个原则，绝不允许反动的阶级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现代修正主义者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竭力鼓吹和提倡“自由化”的政策。在文艺领域中，他们崇拜西方的“自由”艺术，主张同各种资产阶级的艺术流派“和平共处”，疯狂地攻击那些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人。

在这当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叫得最早，嚷得最响。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文艺领域中，一直标榜着所谓“创作自由”，来同社会主义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相抗衡。臭名昭著的南共纲领这样写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张使科学和艺术有真正的创作自由。……我国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思想作用不要成为对科学艺术的各种流派、学派和风格进行武断裁判的作用。”

在其他的许多著作中，他们又都不厌重复地一再宣传这些滥调。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就是对“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实用主义的歪曲”，就是把“艺术变成日常政治利益的手段”；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批判在文艺领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就是对“艺术的各种流派、学派和风格进行武断裁判”；要求无产阶级作家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出于幼稚的手段所产生的”“荒谬指示”。他们断言，只有南斯拉夫的“创作自由”，才是发展和繁荣文艺创作的良好药方；而坚持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就是“教条主义”，就是对文艺创作施加“官僚主义的限制”。

同现代修正主义者辩论什么叫做自由，究竟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在文艺创作中有真正的自由，是徒费唇舌的。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看看在南斯拉夫这个挂着“创作自由”的幌子的国家里，到底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有创作的自由，这种“创作自由”到底对哪一个阶级有利吧！

铁托集团所标榜的“创作自由”，是现代修正主义“自由化”政策的内容之一。这种



“自由化”政策，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套腐朽的、反动的文化开放的政策。

在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领域里，确实有着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没有见过的“自由”。

而最“自由”莫过的，是美帝国主义文化，西方腐朽文艺泛滥的自由。它们在南斯拉夫实际上占着统治地位。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南斯拉夫的自由，充分暴露了铁托集团所吹嘘的“创作自由”的实质。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一贯执行着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文化上，美国新闻处和它在贝尔格莱德的阅览室可以对外开放；美国的书籍和报刊，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南斯拉夫发行；南斯拉夫的广播、报纸以及其他宣传工具，有向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亲美宣传的义务。一九六〇年十月，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又通过了《报刊和其他新闻报道形式法》，规定南斯拉夫“新闻自由”和“外国报刊自由进口”。

这些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自由化”的政策，正是美帝国主义“文明”得以“自由”推销、“自由”泛滥的基础。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英国《观察家报》报道的，“西方文明”在南斯拉夫“极受欢迎的”盛况：“书店里陈列着西方的著名作家和受欢迎的作家的几乎所有的作品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译本。这些作品通常在西方出版后一年内就翻译出来了。剧院的保留剧目中有着大批西方剧本。电影院上映的多半是

西方影片，最受欢迎的是‘西部片’，往往满座。”

翻翻南斯拉夫的报刊和出版物，人们就会知道，这些所谓西方的著名作家和受欢迎的作家所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些“西部片”宣传的是怎样一种美国生活方式。在南斯拉夫的报纸中，有不少经常连载一本或两本翻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侦探、犯罪和色情小说。西方各种各样腐朽堕落的书刊，在南斯拉夫市面上到处可以买到。至于西方电影的泛滥，只需要举一两个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南斯拉夫共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了影片一千零三十九部，占进口影片的百分之七十八，其中美国影片占进口影片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六。

这种情况，叛徒铁托也直认不讳。铁托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南斯拉夫青年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承认，南斯拉夫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翻译和出版过如此多的各种腐朽的西方作品。二月六日，铁托在另一次讲话里又承认：“在我们这里翻译各种黄色文学。大量地翻译并且出版它。”

如果以为铁托说了这番话，是表示他准备对这种“自由”施加某种限制，那就是对铁托推行“自由化”的政策决心估价过低了。铁托在一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一方面固然不得不装模作样地批评了一下文艺领域中的奇形怪状的现象，一方面就同时表示：“当然，在这里不能谈论某种行政干预”。即使如此，这些不着痛痒的批评，仍然引起那些尝到



“自由化”甜头的人不满。铁托可以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意見，可以将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党人关进监狱、集中营；但是，他却不能不考虑这些要求“自由”的呼声。铁托所执行的政策，就是代表这样一种要求、为这种要求鳴鑼开道的政策。他不可能反对这种要求。同时，他更不能不考虑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因此，铁托在二月六日的讲话中就急忙声明：“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应该进行某种反对西方的圍攻。在西方不应该认为，这是旨在反对西方文化，因为我们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

事情非常清楚，在南斯拉夫，不保证西方文化——具体点說，即美帝国主义腐朽沒落反动的文学艺术有横行无阻的自由，那是不可想像的。它既不符合美帝国主义的要求，也不符合铁托集团的利益。虽然他們有时候也反对那些对他們用处不大的抽象派、过分黄色的东西，那不过是裝飾門面罢了！

“我們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铁托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地、最好不过地透露了南斯拉夫在“創作自由”旗号下到底贩卖了些什么貨色。

南斯拉夫的文学艺术創作，的确有着那些在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沒有的“自由”。在南斯拉夫，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頹廢派的創作观点是非常自由的，形形色色的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等的“創作自由”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这种“創作自由”，同南斯拉夫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资本主义复辟是相适应的。它是资产阶级所要

求的意識形态“自由化”的組成部分，也即是资本主义“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的組成部分。

人們可以看到，资本主义要在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复辟，总是要从意識形态入手的。它千方百计地使用“自由化”的手法，包括“創作自由”的手法，破坏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意識形态，建立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意識形态，用这种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意識形态来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經濟服务。

从南斯拉夫的报刊出版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从内容到形式都拚命地向沒落的西方文化学习，向腐朽的西方文化看齐。他們不仅翻譯而且創作了許多色情小說，大量地在报刊上連載，在出版社里印行。爵士音乐已經取代了南斯拉夫的民族音乐而居統治地位。抽象派更成为南斯拉夫美术的主要流派并得到官方的奖励和支持。誨淫誨盜的电影也得到充分的“創作自由”，以至于《战斗报》、《世界报》都不得不承认，“在报刊上，在电影院的銀幕上，在小店鋪的櫥窗里，在剧院的广告栏里，都有性的泛濫”。

为了适应他的修正主义政策的需要，铁托还给艺术家們在宣傳修正主义謬論方面以充分的自由。例如，他們有在文艺作品中大肆宣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人幸福”的自由，宣傳那种为了“个人幸福”，可以不惜背叛革命的所謂思想，也即是南共綱領那种所謂“个人幸福”不能服从于任何最高目的的观点。他們有反对一切正义战争，包括



反法西斯战争的自由。他们有诽谤革命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自由。他们有宣传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厌世思想的自由……。在他们那里，端的是没有“指令式的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也没有“对悲观主义眼光狭小的迫害”；“没有个人主义责难的威胁，也没有因为形式主义而受到指责”。总之，他们有宣扬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宣扬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自由。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他们怎样描写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士吧！

先看拉里奇的《决裂》。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杜塞里契，是反法西斯的一名游击战士。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去宣扬主人公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信心，他怀着一种阴暗的绝望心情去思索他目击的一切。他觉得斗争没有目标，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因此，他在游击队处于困难的关头，向敌人缴了械，带着一支人马做了俘虏。后来，他从集中营跑了出来，到了希腊游击队那里，却仍然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作家笔下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作者写出了这样的人物，并不是为了批判他，而是企图说明，杜塞里契之所以向德国法西斯投降，那罪过全在于一次曾经为了什么事批评他的党内会议，在于游击队员不照顾杜塞里契的病态的自尊心……。这样，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和叛徒，倒是值得同情的人了。

又是这个拉里奇，他在另一部反映反法

西斯战争的小说《莱列伊斯克山》中，描写了另外一些游击队员，他们仍然是仇恨一切人的孤独者。这本书出头叙述一切的人不时地叫嚷：“我们互相厌倦，我们变粗野了，像树木、像石头一样麻木不仁了”，“孤独是事物的自然状态”，“生活中充满了孤独”。为什么他那么孤独呢？《战斗报》一篇关于拉里奇的文章替他作了切合作品实际的注解：主人公的孤独感“是来自战争造成并带来的特殊情况。面临着在森林和山洞里的追捕，对乡村和山谷——死神在其中窥视着他——的疑虑，他越来越被恐惧、猜疑、对自己的力量的不信任所笼罩。”据说这就是表明“拉里奇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最尖锐的控诉，反对把人动物化，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在战争中都成了豺狼或猛兽。”

在他们的作品里，同革命热情格格不入，连谈一下斗争的崇高目标也使他们觉得好笑的人，全是正确的，全是好人。相反，他们总是把共产党人、革命战士描绘成不惜任何代价拼命取得极权的凶手。在他们的笔下，这些“凶手”只不过是狡猾地运用一种神圣的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危害自己的人民。这些“凶手”参加革命决不是为了人民，为了什么伟大的理想。这些“凶手”什么人也不爱，什么东西也不珍惜，他们只爱自己。这些“凶手”渺小而虚荣，怯懦和愚蠢，只不过是可笑到极点的简单死板的狂信者，无情的暴虐者。在别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在极力



誹謗革命者，他們对无产階級专政有着何等刻骨的仇恨！

以上这些作品，又都同时散发着那种沒落的资产階級的悲观主义、厌世思想的臭味。但是，在无产階級看来是臭的东西，在現代修正主义者看来却是香的。例如，他們承认，在他們“自己时代的詩人”馬代·保尔的詩中，充滿了“生命和生活的悲劇”，“失望情緒”，“黑色”的、“一种无言的悲观主义和消逝的东西”，“无能的悲哀和把握不住的內心的呻吟”，“是死亡和恐惧、人的絕望的清晰的幻影”。評論家在对馬代·保尔的詩作出这样的結論，并且认为这种暗淡的东西“一般來說它也存在於我国（南斯拉夫）現今的詩歌中”，之后，他竟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不对头的，不好的东西，因为“对为自己挖掘坟墓的人來說，这便是他的哀歌的基調”，而詩人写出这样調子的詩歌，倒是在“提醒人、警告人”呢！

.....

要了解南斯拉夫在文艺方面有着怎样的一种“創作自由”，只要看看这几个方面，也可以从一斑而窺全豹了。

这些“自由”，在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确沒有。但是，一个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能稀罕这种“自由”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允許这种“自由”嗎！

毒草有自由，香花就沒有自由。有为修正主义服务的自由，当然也就沒有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服务的自由；有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自由，当然也就沒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由。南共綱領早就伏下这样一笔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时也反对这样的‘理論’，即以抽象的自由观念为名在实际上取消科学艺术創作的真正自由，使它从屬於反动的政治傾向。”話說得含糊其詞，閃閃爍爍，但那意思是明白的：“創作自由”只能从屬於叛徒铁托的修正主义政治傾向，“創作自由”必須受叛徒铁托的反动政治的控制。一句話，只准有宣傳资本主义、宣傳修正主义的自由，不准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自由。如此而已！

一九六三年在南斯拉夫出版的小說《娜嘉》所引起的一場風波，多少透露出这所謂“創作自由”到底是怎麼样的行市。

《娜嘉》这部小說，通过主人公娜嘉（記者）和編輯、詩人、軍官、經理等人物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黑暗墮落。小說通过人物的語言和活动告訴讀者，在南斯拉夫，“金錢和追求地位代替了許多理想”，“真誠受到压抑、束縛，甚至还是有害的”；在南斯拉夫，正直的作家受到打击和迫害。书中的詩人把南斯拉夫作协俱乐部称为“鸡窝”，“因为在那里原則被烤肉片所代替”，虽然批評家是“別人的书中的常見的寄生虫”，可是他們却想主宰南斯拉夫文化的命运。小說中的一个失业青年更憤怒地說：“我們的消遣音乐……确实与光荣的无产階級毫无联系。这是可耻的。这是我們的殖民地精神和农奴气质的一幅可憐的景象”。小說还通过



少校軍官的口說，南斯拉夫的經理是“首要的工作者，也是头号的罪犯。一部分人得奖，另一部分人却在担負盜用公款的責任”，南斯拉夫的世界基础是“經理”。娜嘉通过南共負責机关被介紹到報館工作，她虽然是有夫之妇，但为了便于工作，却隱瞞了这一点，因为在南斯拉夫“出嫁了的女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而姑娘却处处受人欢迎”。尽管報社編輯、軍官、經理等人知道娜嘉是有夫之妇，但是他們却仍然千方百計地追求娜嘉。報社編輯甚至无耻地說：“我知道，搞到漂亮女人，正如得到自由一样，往往也是踩过死尸的。”

《娜嘉》这本书写出南斯拉夫的某些社会問題和文化界的丑事，多少透露出铁托集团修正主义政策的恶果和真面目，因此，官方报刊和御用評論家馬上就向它发动攻击。《战斗报》、《政治报》和《共产主义者周报》都发表文章，攻击作者“想以文学作品的外衣来掩飾自己非文学的意图”，用的是“阴謀家的措詞和潜在語”，称它为“誹謗书”。由《娜嘉》这样一部小說所引起的一場風波是如此，至于那些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文艺家，“創作自由”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么，就是不难想見的了。

事实是对現代修正主义者吹嘘的所謂“創作自由”最有力的嘲笑。資產階級一向吹嘘資本主义世界是最“自由”的国土。可是，人們都知道，在那里是怎样一种黑暗的殘暴的統治。同时，人們也知道，在那里，即使資產階級自己，也并不是很自由的。历史发

展的規律老是同他們鬧别扭，现实生活总是从各方面同他們的“自由”鬧别扭。在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統治下，文艺好像不再服从什么“官僚主义的限制”了，可是，人們都知道，他們的所謂“自由”的文艺，不但必須服从現代修正主义的要求，而且还得服从資本主义經濟法則的支配。

甚至铁托自己也承认，“商业主义”是目前南斯拉夫文化事业面临重重困难的原因。

在反动政治控制下的“自由”，在資本主义經濟法則支配下的“自由”，这就是南斯拉夫“創作自由”的真实写照。

为了保证“創作自由”，铁托集团反对无产階級对文化出版事业的政治領導，主張“在教育、科学和其他文化机关、研究机构中建立和发展社会自治制度，使教育、科学、艺术和一切文化生活摆脱国家的行政压力和对于文化生活、文化創作的国家极权主义实用主义的观点”（《南共綱領》）。根据这个原則，一切文化单位都“既是經濟机构，又是文化机构”。这一切似乎都非常美妙，“創作自由”非常有保证了。但是，由于铁托实行了这样一种实质是資本主义性质的反动政策，賺錢就必然成为出版企业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标。既然出版西方的黄色作品比出版南斯拉夫的作品更能賺錢，又沒有誰對他們进行“官僚主义”的干預，那么，出版商当然不願意“冒險”。于是，有的出版社許多年都不出版一本南斯拉夫的作品，而一些資本主义的所謂旺銷书刊又竞相出版，不厌重复。

既然資本主义已經在南斯拉夫复辟，那



么，文化当然也成为一种“必需的罪恶”，图书馆的经费少得可怜，文化经费又用在大量购买抽象派、现代派的艺术品上。于是，在南斯拉夫那里，香肠比莎士比亚更受人欢迎，爵士乐演奏者、资本主义流行歌曲演唱者等等所谓“实用艺术家”比一个作家还要赚钱，模仿西方的广告画、商标图案的设计更能比艺术作品获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现象了。

在这个“靠笔杆生活”已经成为一种痛苦的“光荣”的国度里，为了适应“商业主义”的原则，作家艺术家们或者靠亲友关系出版自己的作品，或者以标新立异来互相竞争，或者更进一步迎合西方出版商的口味，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自己的著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即使如此，南斯拉夫的专业作家艺术家也仍然一年比一年少。

列宁早就说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所说的绝对自由都是假的。在以金钱的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劳动群众做乞丐而一小撮富人做寄生虫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春宫

画、描写卖淫来‘充实’‘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观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①

铁托自己也承认的“商业主义”，恰好说明南斯拉夫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所作所为，都不外乎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而且是最反动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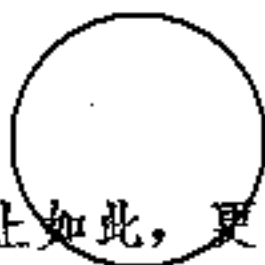
铁托集团和他们的御用文艺家老在那里为他们有着什么“创作自由”而沾沾自喜，老在那里吹嘘“创作自由”给他们带来文学艺术的繁荣，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自由”，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繁荣”！现在，他们早已经在那里无可奈何地谈论着文艺的危机了，这倒的确是对他们的“创作自由”的绝妙注脚。

^①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页。



不可救药的“肌肉僵化”症

洪 谷



“超等国家似乎已经变成了超等无能为力国家”，这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三日美国资产阶级杂志《斯通双周刊》一篇评论美国的困境的文章中的断语。这种对于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衰落的哀鸣，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

一九六三年五月，正是美帝国主义企图扑灭老挝人民爱国正义斗争，在老挝大肆捣乱的时候，这家杂志看到了，老挝人民毫不在于美国的“最可怕的火力”，而同样，在南越、在古巴等等地方，那里的人民也都不把这个“拥有如此多的武装”的凶恶敌人放在眼下。原因何在？因为美帝国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肌肉僵化的巨人”。

现在，据说这个“巨人”又“突然发现自己在全世界各地受到打击”，而“小不点的国家都可以踢美国一脚”，（《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甚至叫它“卷铺盖滚蛋”（《芝加哥太阳时报》）。

“小小的加纳正在闹着反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小小的巴拿马……感到强大和重要到足以攻击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小小的塞浦路斯不要美国派兵”干涉它的事务（《芝加哥太阳时报》）；

不止如此，更为“小小的”桑给巴尔，也居然敢把“美国的最后一位外交官……从那个岛屿上赶了出来”；（美联社）

而在“我们牵连很深的南越，正在成为一个我们愈来愈没法解决的问题”（《芝加哥太阳时报》）。

几十年前，老罗斯福敢于自夸：“我拿过来了巴拿马”，而今，“金陵王气黯然收”，美帝国主义的这股“威风”，已经被扫荡得一千二净了。

压迫要引起反抗，反抗会遭到新的压迫，新的压迫又必然要引起更大的反抗和斗争。这不是周而复始的圆形循环。在这种来回往返的斗争中，暂时貌似强大的腐朽力量同暂时似乎弱小的新生力量，总是不断在向自己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加纳人民和巴拿马人民的斗争，塞浦路斯人民和桑给巴尔人民的斗争，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美联合斗争，越来越迅速地促进这种情况的变化，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正在猛烈地向前发展。用美国《华盛顿明星晚报》的话来说，现在，“这种情况远不止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流动的潮流”。

肯尼迪曾经鼓吹：“美国不应该是带着但



是的第一，或者带着如果的第一，或者带着时间的第一，而应该是一个干脆就是第一的美国。”肯尼迪在一九六〇年夸下这样的海口，为时不过三年多，世界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小不点的国家都可以踢美国一脚”，这又一次生动地

证明了美国统治集团的“美国第一”的帝国主义思想的彻底破产。多行不义必自毙。“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历史属于充满革命活力的世界人民，什么样的“主义”、“计划”或“战略”，都无法医治美帝国主义的“肌肉僵化”症。

爬不出死胡同

秋 阳

美国的宣传机器最近显得特别繁忙而紧张，它们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严重挫败，连续不断地进行报道、预测和评论。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李普曼最近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题为《今天和明天，这个难办的世界》的文章，就是这场哀歌大联唱中的一支曲子。

李普曼无可奈何地承认，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遇到巨大困难”。他开列的“麻烦的单子”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到处都有使美国统治集团“头痛”的事，到处都有“折磨着”它的问题。

惨重的失败，险恶的处境，加剧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内部的矛盾。他们互相抱怨，互相攻击，闹得乌烟瘴气，一团混乱。他们中的一些人，责难约翰逊“举棋不定”，不是“强有力的总统”，把失败的原因说得好像只是约翰逊的无能。

李普曼站出来为约翰逊开脱和辩解。他

特别把美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务院，说什么美国今天“对外政策的基本麻烦是国务院拟订出那么多以未加研究的前提为根据的政策”，说美国国务院“窒息着”对美国政策进行“任何彻底的重新检查”。

且不讲美国国务院是在总统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就拿“重新检查”来说，战后美国的历届政府是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过，什么“计划”、“战略”也是一个又一个地提出了的。为什么这些“计划”和“战略”没有能够挽救得了美帝国主义日益衰落的命运呢？李普曼的这句话倒是说得有点道理的：美国的许多政策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这些政策是“建立在没有根据的前提之上”，“其中主要的是认为美国像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五年战后时期一样，仍然垄断全球军事力量和可以处置的金融力量”。

但是，李普曼永远不可能懂得，帝国主义制度，早就把美国统治集团牵进了死胡同。



美帝国主义不仅是在失去称霸的“前提”而硬要当世界霸主的今天捉襟见肘，走投无路，就是战后初期，它自认为可以一统天下的时候，它所疯狂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就已经不断地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了许多绞索，坐上了一座随时可以爆发的火山。美帝国主义今天的失败，正是它四面树敌和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寄生性、腐朽性进一步加深的必然结果。

李普曼这个人，是美国新闻界的“权威”，

在美国政界也有很大影响，素有美国政论家中的“首脑”和华尔街的智囊之称。在他三十多年的谋士生涯中，写了大量的文章和几十本书，为美国统治阶级出了不少主意。而今，却提不出什么使美国统治集团摆脱困境的办法了。他鼓吹要“修订前提”，以“适应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如何“修订”？又怎样“适应”？没有下文。其实，不但李普曼开不出药方，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又何尝不是如此。约翰逊上台后，就连肯尼迪

“我们并不想要控制任何人，我们并不是想要收买朋友……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得到愈来愈大的独立和自由。”这是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最近在一篇关于“美援”的演讲中说的一番话。

腊斯克这一段话是针对美国统治集团中有人非难“美援”计划的失败而发的。这种批评意见说：“有些得到我们援助的国家批评我们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他们之间的争吵，使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最近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有钱难买到朋友的抱怨。例如：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美国在战后的岁月中付出了大量的美元，企图在非共产主义世界收买朋友，但是，经验证明，收买来的朋友靠不住。

《芝加哥太阳时报》说，“美援”政策已经

使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多少朋友，并且使我们可靠的盟国越来越少。

一个说有钱难买到朋友，一个说我们并不想收买朋友，看来这并不矛盾。朋友本来就不是用美元能够买得到的，而美元也根本不是送给朋友的礼物。

为了应付对“美援”计划失败的责难，腊斯克在同一篇演说里自己揭露了自己：

“国际开发署的经济援助基金现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购买美国产品。如果你把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用于和平的粮食和军事装备包括在内，那末百分比还会高些，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就是说，“美援”

为美国垄断资本输出商品开辟了道路，用腊斯克的话来说，就是“援助能刺激贸易”。

“联邦政府鼓励美国私人资金更多地流向不发达国家。”——利用“美援”为美国垄断

美元·链条·朋友

综
林



的“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劲头也没有了，他除了叫嚷要把破产了的肯尼迪的“总战略”“化为行动”外，别无良策。而在连遭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严重的内讧时，他只能出来说些不要“惊恐不安”、“报纸标题的风向计并不是历史的路标”之类强作镇静的话。美国《纽约时报》以低沉的笔调哀叹：今天“华盛顿的富有创造力的政策考虑陷于一种近乎瘫痪的状态之中，除了应付眼前的紧急事件的需要之外无暇他顾。”美国统治集团除

了继续在死胡同里东撞西碰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病入膏肓，矛盾重重，妙手也难回春。当今的美国，很有点像《红楼梦》里冷子兴口中的贾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一个美国刊物十分恰当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一棵被虫蛀空了的树，随时可能被推倒。挣扎总是要挣扎的，形势比人强，李普曼之流只能徒唤奈何。

资本侵入受“援”国家创造条件，这是“美援”的另一妙用。

“对外援助……帮助我们保护和加强自由世界的实力，而不用我们派人去作战。”——在美国统治集团看来，用美元换取廉价的炮灰，这确实是一桩便宜的买卖。

应当指出，腊斯克抱住琵琶半遮面，他对“美援”的真正目的“坦白”得是很有限的。例如他就不像杜勒斯说的那样“直率”：“我们是不是交了朋友，我是不在乎的。在许多这样的情况中，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做这些事情（按：指美国对外“援助”）是因为将对美国的利益有好处。”

美国《哈泼斯杂志》主编约翰·费希尔在给美国前国际开发署署长汉密尔顿的一封信中说：“美国在援外上每做一件事（或每拒绝做一件事）都是为了干涉别人的内部事务。所以我相信，你会在每一角银币上都系上一根链条。如果这个银币不是为清楚地规定好的美国利益花用，你就会死劲勒紧这根链条。”

一角银币，一根链条，这真是赤裸裸的

自我暴露。

《加纳时报》指责，“美国‘援助’总是被用来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工具”和对受“援”国“进行粗暴的讹诈”的工具。

伊朗一个议会成员揭露：美国“给我们贷款，可是每一笔贷款都附加了成百个条件”，“我们收入的一半回到美国的口袋中去了”。

据统计，一九六二年，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只有四十多亿美元，而同年通过“美援”、私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等办法从国外榨取的利润，竟高达一百四十亿美元左右。这的确很像一句谚语中所描绘的那样，他给我们一些骨头，他却拿走了我们的肉。

经济掠夺、政治奴役、军事控制，这就是腊斯克所谓“帮助这些国家得到愈来愈大的独立和自由”的真实内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在谈到柬埔寨为什么拒绝“美援”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声称他们是我们的真诚的朋友时是不真诚的。他们只能是假朋友，这样的假朋友不可能对我国有好意”。



红旗

HONGQI

6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六期 ★

目 录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2)
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2)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5)
我們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6)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9)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12)
駁所謂“议会道路”		(15)
駁所謂“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17)
两条路綫，两种結果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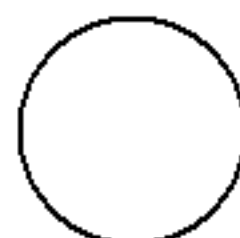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22)

我們的希望 (26)

附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見提綱 (28)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

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提綱)



破产了的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經濟

“理論” 郑天倫 宛 樵 (30)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綫 本刊評論員 (40)

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阔步前进

——談話剧《千万不要忘記》 賈 霽 (46)

劇
評
·
影
評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

——談話剧《年青的一代》 姚文元 (48)

贊勇敢的山鷹

——談話剧《远方青年》 張 穎 (51)

在建设新农村的理想下团结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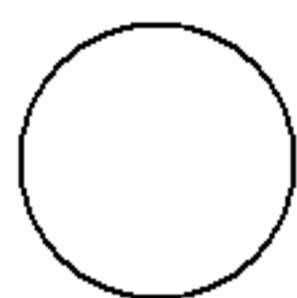
——談影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續集) 袁文殊 (53)

劳动熔炉铸新人

——談豫剧《朝阳沟》 艾克恩 (55)

☆ 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





无产阶级革命和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紅旗杂志編輯部

本文想討論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这就是所謂“和平过渡”問題。这个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彈这个老調。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們背叛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張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問題上，赫魯曉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門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現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現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現过“結構改革”論。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問題。到了赫魯曉夫修正主义出現，并且在苏共領導中占据統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問題，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問題了。

为此原故，我們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語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魯曉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謂“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議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①

① 赫魯曉夫1956年2月14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①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②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③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④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⑤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⑥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斯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⑦“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⑧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⑨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

① 赫鲁晓夫 1956 年 2 月 14 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 赫鲁晓夫 1961 年 1 月 6 日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党组织全体大会上的报告。

③ 《苏联共产党纲领》（1961 年 10 月 31 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④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⑤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擋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①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斯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斯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斯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② 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③ 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④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居于政府之上的主宰。”^⑤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⑥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

① 伯恩斯坦：《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状况》。

② 考茨基：《唯物史观》。

③ 考茨基：《社会民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④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

⑤ 考茨基：《新策略》。

⑥ 考茨基给梅林的信（1893年7月15日）。



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門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



力革命，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說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頁、第三百八十八頁。）

斯大林也說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資本統治的国家轉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論我們党內的社会民主主义傾向”报告的結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頁。）

沒有暴力革命，沒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說，“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統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圍內，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錯乱、神經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論列宁主义的几个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頁。）

毛澤东同志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經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論断。

毛澤东同志說：“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統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澤东：《矛盾論》，《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頁。）

毛澤东同志說：“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問題。这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論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澤东：《战争和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頁。）

毛澤东同志說：“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們可以說，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頁。）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規律，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魯曉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

我們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謂“議會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錯誤，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論战，因此，我們在一段时間內，对于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的錯誤，沒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評。但是，我們针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在我們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間的內部会談和會議中，我們也对赫魯曉夫的錯誤論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們通过总结中国



革命的經驗明确地提出：

“我們党在爭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棄警惕，沒有放棄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綫。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綫，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綫，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問題。我們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綫，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問題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針鋒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們又在《再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中，正面闡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魯曉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謂“議會道路”。

在同苏共領導人的多次内部会談中，中共中央領導同志严肃地批評了赫魯曉夫的錯誤观点。我們滿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錯誤。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期間，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銳的爭論。

在这次会議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沒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議会的道路，根本沒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議會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錯誤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綱領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評意見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詞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錯誤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統地說明了我們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觀點，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綱。

我們的书面提綱的主要論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強調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襲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



的问题是關於国家机器的問題，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問題。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会党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們的这些論点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論点，但是他們一再要求我們照顾他們內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們已經批駁了苏共领导的錯誤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見提綱。为了共同对敌，我們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願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問題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們本来希望，經過这场爭論，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們的錯誤。但是，同我們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們的錯誤。

在一九六〇年的兄弟党會議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爭論，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會議期間，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場，不能达成協議。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會議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願望，才在这个問題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們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問題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〇年声明上。同时，我們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問題的意見提綱，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現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評我們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錯誤的，我們乐于接受这种批評。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問題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錯誤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統治階級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說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經過內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議會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說有可能取得議會中的稳定多数，使議會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強調暴力革命是普遍規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錯誤，作为推销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須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問題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見的。我們絕不隱蔽自己的观点。我們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綱領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問題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通



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解释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①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① 库西宁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僕，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說，列宁不是“在原則上允許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嗎？^①这更是十足的詭辯。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經設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頁。）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問題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頁。）到了七月間，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鮮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頁。）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經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頁。）这样，苏維埃国家又經過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說：“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頁。）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揚說，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②“几乎是和平完成的”。^③这是完全違背历史事实的。你們这样說，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締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辯說“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經驗是有的”。他們閉着眼睛說，“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徑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④

事情果真是如此嗎？不，不是。讓我們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貝拉·庫恩是怎样記述事情經過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維埃政权”。（貝拉·庫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訓》。）匈牙利共产党积极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員軍人中进行了組織工作，組織武装示威，組織工人驅逐厂长占領企业，組織农业工人占領大地产，解除反动軍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結合起来，等等。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和当代现实》，1960年第13期。

②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和現时代》，1960年第5期。

③ 米高揚 1956年2月16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④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文章：《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1963年第15期。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貝拉·庫恩說：“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許多次起义。”（貝拉·庫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說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說，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願地辞职”的，^①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說得很清楚。他說：“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轉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轉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貝拉·庫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轉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虛伪的“神話”。（貝拉·庫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訓》。）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經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訓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錯誤，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說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說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②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陣綫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顛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調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

① 《苏維埃俄罗斯报》文章：《世界革命进程如何发展》，1963年8月1日。

② 勃列日涅夫1962年12月4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詞。



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



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頁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頁。）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根据战后历史条件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根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不会改变的規律，得出革命的結論，认为必須充分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势，按照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积极促进革命斗争的发展，准备夺取革命的胜利。

赫魯曉夫則借口战后历史条件的变化，得出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結論，认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本性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規律改变了，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过时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过时了。

赫魯曉夫等人散布一种天方夜譚式的神話。他們說，“現在，对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來說，正在形成以和平形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①

他們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的这一期間，欧洲許多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和改进自己的警察官僚机器，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因此沒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們认为，这种情况現在已經改变了。^②

他們說，現在“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国际反动派对于实行革命的国家的内政干涉趋于瘫痪”，^③“这就减少了资产阶级发动国内战争的潜在可能性”。^④

但是，赫魯曉夫等人的謊言，掩盖不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个突出的事实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普遍增强暴力机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到处进行反革命武装干涉。

美国今天已經更加軍国主义化，它的军队扩大到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比一九三四年增加了十倍，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了八倍。它的警察特务机关之多，就連美国一些大资本家自己也承认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希特勒德国。

英国的常备軍从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五万多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四十二万多人，警察从一九三四年的六万七千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八万七千人。

法国的常备軍从一九三四年的六十五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七十四万多人，警察和保安部队从一九三四年的八万人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十二万人。

在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以至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大量增强军队和警察力量的情形，也都沒有什么例外。

赫魯曉夫最热心用全面彻底裁軍的口号来麻痹群众。这种咒語念了好几年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全面彻底裁軍的影子一点儿也沒有。人們看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里，到处都是全面彻底扩軍，到处都是扩大和加强暴力镇压的机器。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战争与革命》，1961年第4期。

② 康西宁主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

③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和当代现实》，1960年第13期。



资产阶级在和平时期这样拼命地增强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为了什么呢？难道不是为了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倒是为了保证劳动人民能够和平取得政权吗？战后十九年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使用军队和警察镇压罢工工人，镇压要求民主权利的人民群众的暴行，难道发生的还嫌少吗？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同四十多个国家组织了各种军事集团和签订了各种军事条约。它在海外设立了二千二百多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它派驻在海外的兵力，达一百多万人。它的“进击司令部”统辖着一支由陆、空军联合组成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各地镇压人民革命。

十九年来，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世界各国反动派，帮助他们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而且还直接策划和发动了多次的反革命的武装侵略和干涉，也就是输出反革命。拿美帝国主义来说，它曾经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直接出兵并且指挥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区，在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派遣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威胁伊拉克革命，支持和援助老撾反动派扩大内战，组织和指挥所谓联合国部队镇压刚果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古巴进行反革命入侵。它现在仍然在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它最近还武装镇压巴拿马人民维护主权的正义斗争，并且参加对塞浦路斯的武装干涉。

美帝国主义不但对一切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坚决进行镇压和干涉，而且对凡是稍微表现了一些民族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也要想办法把他们搞掉。十九年来，美国政府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策划了多次反革命军事政变，甚至对于它自己扶植起来的走狗，例如吴庭艳之流，只要一且不再合乎它的心意，马上卸磨杀驴，也采取暴力手段除掉。

事实说明：今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进行革命，要争取解放，不但必须对付本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而且必须充分准备对付来自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这种准备，不坚决在必要的时候用革命的暴力回击反革命的暴力，就根本谈不上革命，更谈不到革命的胜利。

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如果不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不做好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干涉的准备，不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方针，就不能维护民族独立，更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质问苏共领导，你们口口声声大谈战后形势的新特点，为什么偏偏要抹煞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到处镇压革命这个极其重要的、极其明显的特点呢？你们开口和平过渡，闭口和平过渡，却绝口不谈怎样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庞大的暴力镇压机器，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公然掩饰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血淋淋的现实，散布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能够和平取得胜利的幻想，这岂不明明在麻痹各国人民的警惕性，用空洞的美好前景来安抚怒气冲天的群众，反对他们革命，实际上充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帮凶吗？



在这个問題上，我們让已經死去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来充当一次反面教員，还是很有益处的。

杜勒斯在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一次演說中說，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通过使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他接着說：“苏联統治者現在說，他們将放棄使用暴力。”杜勒斯表示：“我們欢迎并且将鼓励这些事态发展。”^①

显然，杜勒斯作为資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維護者，深深懂得暴力在階級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杜勒斯一方面欢迎赫魯曉夫放棄暴力革命的主張，一方面极力強調資產階級必須加强反革命暴力，来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在另一次的演說中說，“在政府的所有任务中，最基本的一項是要保护它的公民〔应讀作反动統治階級〕免遭暴力。”“因此，在一切文明的社会中，社会成員都出力維持一支警察部队，作为法治的武器。”^②

杜勒斯在这里說的是老实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統治的政治基础，不是任何別的东西，而是“一支警察部队”。只要不触动这个基础，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是动摇不了他們的統治的。苏共領導越是掩盖資產階級依靠暴力統治的事实，越是宣傳他們那种受到杜勒斯欢迎的和平过渡的神話，就越是暴露出了他們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革命的真面目。

駁所謂“議會道路”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議會道路”的主張，早已为列宁所彻底批判，早已宣告破产了。但是，在赫魯曉夫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謂“議會道路”似乎突然变得灵驗起来了。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嗎？当然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說明，資產階級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是武力，而不是議會。議會只是資產階級統治的裝飾品和屏風。資產階級实行議會制还是取消議會制，賦予議會較大的权力还是賦予較小的权力，采取这种选举法还是采取那种选举法，总是按照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和利益来决定的。在資產階級掌握軍事官僚机器的条件下，无产階級要通过选举取得“議會中的稳定多数”，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靠的。通过“議會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完全是不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

在資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中，現在仍有半数左右处于非法地位。对于这些連合法地位都没有的党，当然談不上什么取得議會中的多数。

例如，西班牙共产党就是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中，連参加选举也不可能。可是，像伊巴露丽这样的西班牙共产党領導人，也跟着赫魯曉夫鼓吹西班牙实行“和平过渡”。这是十分荒唐

① 杜勒斯 1956 年 6 月 21 日在基瓦尼斯国际第四十一年会上的演說。

② 杜勒斯 1957 年 4 月 22 日在紐約美联社午餐会上的演說。



和可悲的。

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虽然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在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平的限制之下，共产党很难获得多数选票。就是获得多数的选票，资产阶级还可以利用修改选举法等等手段，使共产党人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

例如，战后以来，法国壟断资产阶级就曾经两次修改选举法，使法共在议会中的议席两次大量减少。在一九四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八十二席，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议会选举时，壟断资产阶级修改了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一百零三席，即少了七十九席。在一九五六年议会选举中，法共曾经取得一百五十席，但是在一九五八年议会选举时，壟断资产阶级再次修改选举法，结果使法共的议席陡然减为十席，即少了一百四十席。

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议席，或者通过选举的胜利参加了政府，这也绝不等于改变了议会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等于摧毁了旧国家机器和建立了新国家机器。要依靠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来实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是绝对不可能的。掌握国家机器的反动资产阶级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可以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宣布共产党非法，采取野蛮的暴力手段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

例如，一九四六年，智利共产党曾经支持资产阶级的激进党取得选举的胜利，组织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当时，智共领导人竟然把这个资产阶级掌握和政府称为“人民民主政府”。但是，不到一年，资产阶级就迫使共产党人退出政府，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并且在一九四八年宣布共产党非法。

当工人政党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御用政党的时候，资产阶级可以允许这样的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的议席，也可以允许他们组织政府。例如，若干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但是，这只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专政，丝毫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这样的事实，只是进一步证实“议会道路”的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明，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信奉所谓“议会道路”，害了“议会迷”的不治之症，那就不仅只会落得一塌空，而且必然陷于修正主义泥坑，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参加议会斗争，利用议会的讲坛，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教育人民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在应当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的时候不去利用，是错误的。但是，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用议会斗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绝不能幻想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斗争上。



列宁說：“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議會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资产阶级的議會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議會斗争，或者认为議會斗争是最高的、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列宁：《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四十一頁。）

列宁曾經斥責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中于議會制度的幻想，拋棄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議會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現在，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鼓吹“議會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复轍。

駁所謂“反对左傾机会主义”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讲到无产阶级革命問題的时候，凭空捏造了一大堆謊言，說中国共产党主張沒有革命形势也要“提出立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主張放棄“争取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的斗争”，^①把武装斗争“绝对化”，^②等等。他們經常給中国共产党乱扣什么“左傾机会主义”、“左傾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帽子。

其实，苏共领导这样叫嚷，不过是想給他們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綫打掩护。他們攻击的所謂“左傾机会主义”，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

我們一向认为，革命是不能随意制造的，沒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有革命。但是，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胜利，不仅仅要有革命的客观形势，还必须要有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准备和行动。

如果不正确地估計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因素，在革命形势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就輕率地发动革命，那就是“左”傾冒险主义。如果在革命形势沒有到来的时候，不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工作的，或者在革命形势已經到来，革命条件已經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不敢去领导革命，不敢夺取政权，那就是右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机沒有到来之前，最根本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方面。积极领导日常的斗争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通过日常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来提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悟，訓練自己的阶级队伍，鍛炼自己的战斗力，做好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組織上的、軍事上的革命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形势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革命的胜利。否則，即使有了革命的客观形势，也会白白地错过革命时机。

① 1963年7月14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給苏联各級党組織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②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編輯部文章：《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1963年第15期。



苏共领导避而不谈在革命形势没有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怎样进行日常的革命斗争，积蓄革命力量，而只是开口闭口都强调没有革命形势就不能革命。他们实际上是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根本取消积蓄革命力量、准备革命的任务。

列宁曾经很精彩地描绘了叛徒考茨基对待革命形势的态度。列宁指出，对考茨基来说，革命形势“如果来到了，那他也愿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混蛋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列宁指出，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市侩，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市侩的地方，就在于他有本领“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一页至第二百七十二页。）人们可以比较一下，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像不像列宁所斥责的考茨基式的市侩。

我们一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积极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保卫民主权利的斗争，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并且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在一切受到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把群众斗争的主要打击针对美帝国主义，也针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内其他反动势力。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近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对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打击，而且是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持，也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有力支持。对此，我们从来是给予充分估计的。

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应当把当前斗争同长远的和全局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应当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教育群众，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以便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的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相反，苏共领导鼓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交织得这样紧密，以致在这里很少有可能划定什么分界线”。^①这也就是用当前的斗争代替长远的斗争，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说过，“任何改良如果没有群众斗争的革命方法的支持，都不可能是巩固的、真正的、认真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把这种争取改良的斗争同工人运动的革命方法结合起来，就可能变成一个宗派，就可能脱离群众，而这对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来说，

^①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文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当代现实》，1960年第13期。



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列宁：《给“社会主义宣传联盟”书记的信》，《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零五页。)

列宁还说过，“在觉悟的工人看来，任何民主要求都是服从社会主义的最高利益。”(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列宁批评考茨基“赞扬改良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考茨基“则是在服从帝国主义的条件下，用改良主义手段‘改善’帝国主义，适应帝国主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六十五页、第二百六十四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正好是今天苏共领导的写照。

我们一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善于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善于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迅速地用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一切斗争形式，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合法的，议会的与群众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等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熟练地全面地掌握了各种斗争形式的结果。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是，如果没有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中国革命也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了右倾合法主义，又反对了“左”倾非法主义，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又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合法可能，同时严格执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各项规定。中国革命创造了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情况的、极其复杂而丰富的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十分懂得，拒绝一切合法斗争，把党的工作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使党脱离群众，这是错误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修正主义者推销的合法主义。修正主义者拒绝武装斗争和一切非法斗争，只进行合法斗争和合法活动，把党的活动和群众的斗争限制在统治阶级所允许的范围以内。他们降低甚至放弃党的基本纲领，放弃革命，迁就反动派的法律。

正如列宁所批评的，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者被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弄得腐败不堪和神智不清。“他们为了保存现行治安法所允许的組織，为了占这点小便宜，而出卖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八页。)

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口头上讲要利用各种斗争形式，实际上主张合法主义，并且借口斗



爭形式的改变而拋棄无产階級革命的目标，这又是用考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

苏共领导还常常利用列宁的偉大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为他們的錯誤路綫辯护，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根据”。

这当然是徒劳的。列宁的这本书，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只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武器，而絕不能成为修正主义者为自己辯护的工具。

当时，列宁批評“左派”幼稚病，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建立了第三国际之后，要求无产階級政党善于巧妙地运用革命的策略，更好地准备革命。

就在这本书里，列宁指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考茨基式的机会主义。列宁反复地說过，必須首先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然后才談得上怎样学会掌握革命的策略。

列宁所批評的那些犯“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还是要革命的，而今天的修正主义者赫魯曉夫則是反对革命的，他只能归入考茨基一类，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反对“左派”幼稚病的問題。

苏共领导給中国共产党扣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更是荒謬絕倫。事实上，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鉢，同今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站在一起的，不是別人，恰巧是赫魯曉夫。

托洛茨基主义在各种問題上表現不一，而且經常戴上“极端左傾”的假面具，但是它的本质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

在反对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这个最基本的問題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实质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斯大林曾經一再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变相的孟什維主义，是考茨基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階級的先鋒队。

今天的赫魯曉夫修正主义的实质，也是反对革命，取消革命。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赫魯曉夫修正主义不仅同考茨基主义如出一轍，而且同托洛茨基主义殊途同归。“托洛茨基主义”这頂帽子，还是赫魯曉夫自己戴起来吧。

两条路綫，两种結果

历史是最好的見证人。战后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败的經驗。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从这些历史經驗中，得出正确的結論。

战后以来，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是遵循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綫，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取得的。現在，除了有十月革命的經驗，还有中国革命的經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的經驗，朝鮮革命的經驗，越南革命的經驗，古巴革命的經驗，等等。这些国家的革命胜利，又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和发展了十月革命的經驗。

从中国到古巴，毫无例外地都是經過武装斗爭，經過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



才取得革命胜利的。

中国人民经过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在最后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彻底打败了得到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援的蒋介石反动派，才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从三十年代开始，进行了十五年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终于在苏军的援助下，取得了胜利。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历了三年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

越南人民经过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接着又进行了八年的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且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才在越南北方取得了胜利。现在，越南南方人民还正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英勇的斗争。

古巴人民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武装起义，后来又经过两年多的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入侵，保卫了革命的果实。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都是经过武装斗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中国到古巴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成功的最主要的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二，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必须紧紧依靠农民，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第三，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必须高举反美的民族旗帜，敢于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走狗，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同盟军。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须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必须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第五，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对反动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是不可能的。

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不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头等重要的，而且对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头等重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战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历史告诉人们，凡是实行革命路线，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积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就会把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胜利，并且使党的力量得到生气勃勃的发展。反之，凡采取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接受赫鲁晓夫的“和不过



渡”路线的，就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并且使自己的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改良主义的党，甚至完全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曾经充满着革命朝气的伊拉克共产党的同志们，由于外来的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反革命的警惕。在反革命武装政变中，一部分党的领导同志英勇牺牲，成千上万的伊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强大的伊拉克共产党被打散，伊拉克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惨痛的血的教训。

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领导，完全跟着赫鲁晓夫和法共领导的指挥棒打转，全盘接受反对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听这一套，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经历了七年多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迫使法国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追随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中丧失了信任，在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在古巴革命中，当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是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不是主张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而是追随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和平过渡”，反对暴力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以卡斯特罗同志为代表的古巴党外的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的领导人撇在一边，同革命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走向革命，进行革命，终于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以多列士为代表的某些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鼓吹“议会道路”，把共产党实际上降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积极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抛弃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旗帜。他们实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使一个曾经在人民群众中有很大影响的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衰落下去。

以丹吉为代表的某些印共领导人，长期以来就实行修正主义路线，放弃了革命的旗帜，不去领导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滑下去，堕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政策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事实很清楚，两条根本不同的路线，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这些经验教训，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从白劳德、铁托到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带着时代的特点。正如列宁所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的产物，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在它的内部产生了自



己的对立物，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的集中代表者，首先是白劳德，其后是铁托，现在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是别的，正是白劳德修正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

早在一九三五年前后，白劳德的修正主义就开始暴露。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必要的批判，把资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他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美利坚主义”。^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和国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更使他对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进步”、“明智”着了迷，从而完全拜倒在资产阶级的脚下，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者。

白劳德散布了一整套的美化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取消革命的修正主义言论：

他宣扬《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使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长期的信任和合作”的时代，能够保证“世世代代的持久和平”。^②

他宣扬苏美英达成的国际协议，“毫无例外地代表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每一国人民的最高利益”，^③“国内发生混乱局面的前景同国际秩序的前景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反对“国内爆发阶级冲突”，“尽量减少”和“明确限制”国内的阶级斗争。^③

他散布新的战争将使“世界大部分地区真正毁灭”，“投入野蛮时代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论调，宣扬要消除战争灾难，就得“强调超于一切阶级分野的一致”。^④

他宣扬“完全依靠民主说服和信念”来实现社会主义，^⑤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⑥

他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说什么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实际政治目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在所有一切主要之点上，将和人数要多得多的非共产主义者的目的一致”。^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解散了美国共产党。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一度把美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引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并且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感染了取消主义的毒素。

白劳德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以福斯特同志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并且为很多兄弟党所抵制和批判。但是，就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对于以白劳德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在战后新的形势下，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队伍中，修正主义思潮又有了新的发展。

① 见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

② 白劳德：《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

③ 白劳德：《德黑兰与美国》。

④ 白劳德：《共产党人和全国团结》。

⑤ 白劳德：《胜利的道路》。

⑥ 白劳德：《世界共产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某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而宣布采取所谓“和平过渡”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突出代表，就是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也就是主张通过资产阶级民主合法途径，实现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通过为垄断资本服务的“国有化”、“计划化”等等，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实际上使共产主义蜕化成为社会民主主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修正主义思潮首先在南斯拉夫出现。铁托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铁托集团完全投靠了美帝国主义，他们不仅使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复辟，而且使自己成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扮演着美帝国主义破坏世界革命的别动队的角色。

为了替美帝国主义效劳，取消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铁托集团直截了当地说：暴力革命“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愈益变成多余的了”；^①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演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事实了”。^②他们甚至把资本主义简直就是看作是社会主义，说什么现今的世界“总的说来已经深深地‘长入’社会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了”。^③又说：“今天，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④

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到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所谓“和不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这套货色当作自己的“新创造”到处兜售。可是，这些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只不过是集白劳德修正主义、“结构改革”论、铁托修正主义之大成，加以改头换面，修飾装扮一下而已。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国际上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实行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鼓励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

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曾经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也是一脉相承，一家兄弟。

白劳德早就说出了这一点。他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赫鲁晓夫现在采纳了我在一九四五年

① 伊·科桑诺维奇：《历史唯物主义》。

② 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实践》。

③ 米·托多罗维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宣言》。

④ 米·貝洛维奇：《政治经济学》。



为之而被踢出共产党的那个‘異端’。”他說，赫魯曉夫的新政策，“同我十五年前所倡导的路綫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相同。因此，至少在目前，我的罪恶已变成为新的正統了”。^①

赫魯曉夫自己也承认，他同铁托集团“屬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論为指南”。^②

赫魯曉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陣营中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締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魯曉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路綫。

他把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綫，說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綫，用偉大列宁和偉大布尔什維克党的威信来迷惑人和欺騙人。

他利用苏共的历史威望，利用大党大国的地位，揮舞指揮棒，采取各种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手段，强制別人接受修正主义路綫。

他配合帝国主义收买工人貴族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收买资产階級化了的、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共产党人，为苏共领导反对革命的路綫搖旗呐喊，尽忠效劳。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和当代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比起赫魯曉夫来，都成了小巫見大巫了。

現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如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說，对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对内是接受本国资产階級的影响。

現代修正主义者，同老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像列宁所說的，“客观上是资产階級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階級影响的傳播者，是资产階級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百二十三頁。）

現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經濟基础，也同老修正主义一样，都是列宁所說的“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这一小得可怜的阶层”。（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四百二十二頁。）

現代修正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国际壟断资产階級政策的产物。現代修正主义者被核訛詐政策吓破了胆，又被收买政策迷了窍，充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对革命的馬前卒。

修正主义者赫魯曉夫，也正是被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歇斯底里的喧嚷吓得丧魂落魄，以为地球这个“諾亚方舟”时时刻刻有毁灭的危險，对人类的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首先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生怕被压迫階級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会給自己惹麻煩，因而千方百计地反对

① 白劳德：《斯大林是怎样毁灭了美国共产党的》。

② 赫魯曉夫1963年8月28日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島对外国記者的談話。



一切革命，甚至像在刚果那样，不惜同美帝国主义联合行动，去扑灭人民革命。他以为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不担任何风险，一方面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一起，进行在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这样岂不是一箭双雕。其实，这只能表明，赫鲁晓夫是历史上最大的投降主义者。实行赫鲁晓夫的这种害人政策，结果必然给伟大的苏联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为什么在苏联这样一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还会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呢？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都需要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势力，还存在着阶级，那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

赫鲁晓夫说，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这些都是骗人的。

事实上，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统治，由于公开宣布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由于实行一系列的对内的和对外的错误政策，苏联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政治领域内，在经济领域内，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在其他领域内，猖狂地泛滥起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在苏联日益泛滥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就是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并且为它服务的。因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绝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现在，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也正在把苏联引向这条道路。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至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大教训。

我们的希望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现在，时光才过去八年。在这个短短的历史的瞬间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给苏联，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却是够大的了，够严重的了。

是时候了，是批判和清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时候了！

在这里，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在这里，我們也希望其他犯修正主义錯誤的兄弟党的領導同志們认真地思索一下，跟着苏共領導的修正主义路綫走，究竟得到了什么結果？我們知道，除了那些深深陷入修正主义泥坑的人以外，不少同志是受迷惑的，被欺騙的，或者是被强制走上錯誤道路的。我們相信，只要是无产階級革命者，終將选择革命的路綫，拒絕反对革命的路綫，終將选择馬克思列宁主义，拒絕修正主义。对于这一点，我們抱着很大的期望。

修正主义絕不能阻擋革命的历史車輪的前进。修正主义的領袖們自己不革命，絕對阻擋不了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人民起来革命。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曾經写道，当考茨基已經变成叛徒的时候，德国的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內西，只能这样地来表达自己的对工人階級的号召：“推开这些領袖，摆脱他們那种使人愚鈍、使人庸俗的說教，不管他們，不理會他們，越过他們，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七十三頁。）

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在欧洲許多党内占据統治地位的时候，列宁十分重視法国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保尔·果雷的意見。

果雷說，“我們的敌人大叫社会主义已經完蛋。他們太性急了。但是，誰能够說他們完全不对呢？現在死亡的不是一般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主义，这是帶有甜味、沒有理想、沒有热情、有官僚架子和家长威風的社会主义，这是沒有勇敢精神、沒有大胆行动、爱好統計、一心一意要同資本主义达成极友好的協議的社会主义，这是只知道改良的、为一点油水而出让自己的长子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于資产階級來說，是人民憤慨情緒的摧殘者，是无产階級的勇敢行动的自动制动机。”（《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二十八頁至第三百二十九頁。）

这真是一段絕妙的描述！列宁說这是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正直呼声。現在，人們会发现，現代修正主义不也正是一种“死亡了的社会主义”嗎？人們也会发现，在那些修正主义占統治地位的党内，无数的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呼声是多么响亮啊。

“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迈进。有生命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和阻撓，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一直到贏得整个世界。

讓我們用《共产党宣言》的結語来做本文的結束吧！

“共产党人认为隱瞞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們公开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統治階級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顛抖吧。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附件：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提纲)

(一) 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提一种可能性，这就比较灵活些，使我们在政治上随时处于主动的地位。

1、提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孤立资产阶级有好处。

2、在将来，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及时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3、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二) 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因为：

1、可能与现实，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是两回事情。我们应该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但不应该把自己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上面，因而不要过分地强调这个方面。

2、如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过多地强调经过争取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可能，容易松懈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在思想上解除自己的武装。

3、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即使有个别国家比较多一点显示了这种可能，但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合乎实际的，也不宜过分强调这个可能。当某一国家果然出现了这种可能的时候，共产党也必须一面争取这种可能，一面准备随时迎击资产阶级的武力进攻。



4、强调这种可能性并不能起到减弱资产阶级反动性的作用，也不能起到麻痹资产阶级的作用。

5、对社会党说来，也不能因此使它革命一些。

6、也不会使各国共产党因此更发达一些。反之，如果有些共产党因此模糊自己的革命面貌，在群众的心目中把它同社会党混同起来，那只会使共产党削弱。

7、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

(三) 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根据需要修改宪法，以利于巩固自己的专政），或者是靠不住的（例如宣布选举无效，宣布共产党非法，解散议会等等）。

(四) 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在英国有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因为英国“是当时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的国家”。列宁在二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希望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使革命经过和平的发展得到胜利，因为当时“武器在人民的手中”。马克思和列宁的提法都不是意味着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实现和平过渡。列宁反复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下面的名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五)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

(六)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种种考虑，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现在因为要发表共同宣言，所以不能不说明我们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的地方提出修正。



破产了的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

郑天伦 宛樵

爱德华·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的祖师。他最先以最完整的形式和最嚣张的态度，全面地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中心之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在工人运动中散布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思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作了系统的修正。他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说成和资产阶级的边际效用论没有区别，都纯粹是想像中的事实，是一种假设。他根本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把它也说成是一种假设，借以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基础。他根据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材料，否认大生产排

挤小生产的过程，鼓吹股份资本的“民主化”，修正马克思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学说。他宣称资本主义已经有了防止经济危机的手段，而且越来越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断言阶级矛盾有缓和并有削弱下去的趋势，攻击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为了证明：时代变了，资本主义变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以便散播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伯恩斯坦对于贩卖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特别卖力气。一八九六年——一八九八年期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公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一八九八年，他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以及随后根据这个声明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接着，他又写了《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等一大堆文章和小册子，继续宣扬阶级合作，鼓吹通过议会道路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恶毒地攻击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反对伯恩斯坦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



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第一次大论战。经过这次论战，把马克思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推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指出：“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①

我们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批判伯恩斯坦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只是就伯恩斯坦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理论基础进行一些批判。

二

伯恩斯坦为了给他的社会改良主义制造“理论”根据，故意捏造出一些毫无根据的统计材料，并且从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里抄来形形色色的辩护论调，企图证明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本性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说什么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注定要走向崩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断过时了。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挑战。

马克思根据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分析，发现资本积累的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必然通过大生产排挤小生产以及组织股份公司等途径，使资本迅速积聚和集中起来，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巨大资本家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造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引起工人阶级日益相

对和绝对的贫困化。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对抗性质，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激发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之点。这种外壳会被破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②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革命结论，宣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死刑，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惧和不安。于是，伯恩斯坦便赶忙出来辩护，说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由于出现了许多相反的因素，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已经不适用了。

伯恩斯坦宣称，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由于小生产的“顽强性”，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工业和商业中进行得很慢，在农业中就更加缓慢了。按照他的说法，小生产者由于关心自己的生产，能够吃苦耐劳，就完全有能力抵抗大生产的排挤，从而阻止生产的集中。他企图用小生产者仍然存在的事实，来证明资本集中的程度不是不断提高，而是不断降低了。

伯恩斯坦认为，随着股份公司的大量兴起，有可能使已经集中起来的资本广泛地分散，凡是持有股票的人都成为有产者，因此，资本不是集中，而是分散，有产者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同时，他声称，股份公司实现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1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64页。



了“民主化”，是一种非个人的所有制，在股份公司里，大资本家已经不能再把工业企业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伯恩斯坦断言，随着资本的分散和有产者的增加，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大大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虽然增长较慢，但是，也得到普遍改善，从而使社会收入分配起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他还诡辩说，随着生产力的增长，社会财富也跟着增长，而资本家的消费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增加的财富全部消费，因此，增加的财富还是要用在工人的福利上。于是，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接近起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鸿沟日益缩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学说过时了。他说：“如果说，工人阶级所处的状况，还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法律方面的状况，比马克思写《资本论》那几行时，要好得多了”^①。又说：“随着资本家人数不断相对地减少，无产阶级幸福的不断增长或中产阶级的人数增加，就成为不断发展生产的唯一而不可避免的结果。”^②

总之，在伯恩斯坦看来，由于小生产的“顽强性”和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实现了“民主化”；无产阶级不是日趋贫困，而是日益成为有产者，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这样，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就消除了，阶级矛盾已经缓和，自然就谈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伯恩斯坦用所谓小生产的“顽强性”来否

定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过程，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知道，由于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它可以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来排挤小生产者，这必然促进资本的集中和中小生产者的破产。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这个过程不是缓和，而是大大加速了。垄断本身就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结果，就是生产集中的结果。当然，资本的集中并不意味着小生产者的消灭，而是和众多苟延残喘的小生产者的存在交织在一起的。列宁指出，小生产者依靠饮食无限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时间等手段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

历史事实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而引起的资本集中的过程，是非常迅速的。拿德国来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每千个工业企业中，雇佣工人五十个以上的大企业，一八八二年有三个，一八九五年有六个，一九〇七年增为九个，即二十五年间增加了两倍。在上述年间，这些企业所雇佣的工人总数占全德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十七。不仅如此，由于大企业劳动生产率高，生产集中的程度比工人集中的程度要高得多。根据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统计，当时占企业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大企业，占有总数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和电力，而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九十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一的小企业，仅占百分之七的汽力和电力。几万个巨大企业拥有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几乎一无所有。在农业中，资本集中的过程也是很迅速的。一方面，容克地主和富农实行了机械化、化学化和其他技术改良措施，沿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广大小生产由于无力竞争而纷纷破产，引起了农村的深刻分化。正是工农业生产集中的发展，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即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股份公司的发展，不但不能证明资本的分散和实现所谓资本“民主化”，相反，股份公司本身就是资本集中的一种形式，是大资本家加强剥削的一种手段。尽管这些公司在名义上有几万、甚至几十万股东，但是，公司的实权，只是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垄断资本家手中。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不可能参加股东大会，在当时，大资本家只要拥有百分之四十甚至更少的股票，就能够操纵整个公司的业务。工人和普通居民手中虽然持有小额股票，并不能使这些人成为资本家，相反，却是大资本家收集闲散资金和搜刮广大劳动者财富的一种手段。列宁指出：“所谓股票占有权的‘民主化’，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希望（或者硬要别人也希望）它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财政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①

至于伯恩斯坦声称随着资本的日益分散，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甚至日益成为有产者，更是公开地替资本主义

制度作辩护。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的目地，就是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如果不剥削工人阶级，也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只能是越来越残酷，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和贫困，必然越来越深重。

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统治的加强，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压榨空前地加重，贫富两极的距离不是缩短，而是扩大了。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一文中指出，根据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家从官方得来的材料，德国工人的工资，在最近三十年间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至少上升了百分之四十，食品、衣服、燃料和房租都涨价了。工人的生活不仅同百万富翁的财富增长情况相比，相对贫困化了，而且是绝对贫困化了。工人们简直愈来愈穷，生活更坏，吃得更差，更吃不饱，更挤在地窖和阁楼里。

可见，无论是小生产的“顽强性”、股份资本的“民主化”，还是收入分配的“转变”，都不可能证明资本的分散和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都不可能否定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

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否定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伯恩斯坦还断言，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提高了“适应性”，能够无危机地向前发展。他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0页。



妄图用这种资本主义有着无限生命力的論断，来进一步与馬克思关于經濟危机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潰的学說相对抗。

伯恩施坦硬說，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崩潰看作是一种純粹的經濟現象，即随着經濟危机愈来愈严重，直到最后爆发一次大危机，资本主义就会在危机中自动地崩潰下去。他写道：“当人們說到現社会的崩潰时，心目中多半有一个比过去更加剧烈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矛盾引起的总崩潰”。但是，“由于社会的前进的发展，現有的生产制度看来不是更有可能而是更不可能发生一个几乎同时的全面的崩潰”^①。他以为，这样就能够打倒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結論了。

其实，这是对馬克思的歪曲。馬克思认为，經濟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和爆发。它使资本主义矛盾得到暫时的强制的解决，同时又促进资本主义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尖锐化。經濟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已經不能容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并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所代替。但是，馬克思从来没有說过，资本主义会通过經濟危机而自动地走向崩潰。相反，馬克思指出，只有經過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

伯恩施坦用各种各样的借口，詭称在帝国主义阶段，經濟危机已經可以避免和克服，妄图从根本上否定經濟危机的必然性。他宣称，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交通工具的

完善和世界市場的扩大、资本主义信用的发展以及卡特尔、托拉斯等壟断組織的出現，提高了资本主义經濟的“适应性”。他說，完善的交通工具，縮短了各国之間的距离，扩大了世界市場的范围，从而能够使生产过多的商品在国外找到銷路，消除生产和交換的矛盾；信用发展了，通过信用的伸縮作用，就能够定期地調节生产和交換間的缺口，进一步消除生产和交換的矛盾；卡特尔等壟断組織已經能够进行“有組織”的生产，在市場过剩时限制生产，使生产适应市場的需要，并且廢除激烈的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总之，在伯恩施坦看来，由于出現了上述新的經濟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已經变得可以“調节”，經濟危机已經易于“克服”，甚至可以“防止”了。他說：“世界市場范围的非常扩大，随着通訊运输所需時間的大大縮短，是否使混乱調节的可能性大大增进了；同时，由于欧洲各工业国财富的惊人增加，随着近代信用制度的伸縮性和工业卡特尔的兴盛，地方或特殊部門的混乱影响一般产业界的力量大大减弱，至少在今后較长時間內，不是可以认为像过去产业上一般性經濟危机大概不会到来了嗎？”“地方的不景气 and 局部的不景气虽然难以避免，但是一般的停滯，……决不是难以避免的。”^②

伯恩施坦所鼓吹的新的經濟“因素”，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消除产生經

①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理論和历史》。

②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济危机的根源。

完善的交通工具，固然能够促进世界市场范围的扩大，从而暂时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但是，也会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使生产无政府状态加剧。同时，世界市场范围的扩大，也会使得参加世界市场各国间的竞争更为激烈，一旦爆发危机，就会把更多的国家卷进来。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固然能够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加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但是，信用也会使生产能力盲目扩张，加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同时，在危机期间，由于信用的突然破坏，又势必加剧危机的破坏作用。所以说，信用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加速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

至于卡特尔能够调节生产、消灭危机的说法，就更加荒谬绝伦了。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动机，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更加尖锐。虽然，卡特尔把生产统一起来了，但是，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而是使竞争更加激烈和扩大。列宁写道：“所谓用卡特尔消灭危机，这完全是拚命替资本主义粉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谎话。其实恰巧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紧张，更加剧烈。”①

伯恩斯坦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无危机的“理论”，是在一八九六到一八九九年，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经过一八七三年危机以后的工

业高涨的时期。他把几年的暂时高涨，描绘成资本主义的永久繁荣；把经济危机周期形式的某些变化，说成是危机必然性的消除。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涨只是暂时的，一九〇〇年，资本主义就又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列宁指出：“在危机论和崩溃论的问题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个别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②

伯恩斯坦鼓吹资本的分散和有产者人数的增加，宣扬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和“无危机发展”，否认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都是为了歪曲帝国主义的本质，美化资本主义，调和阶级矛盾，以便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三

伯恩斯坦在否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上，提出了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社会改良主义的纲领。他认为，不需要经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而只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作点滴的改良，就可以使资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00页。

②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页。



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 and 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插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①

伯恩斯坦宣称，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已经产生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在逐渐改变其自身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进化。只要通过立法的途径采取若干改革措施，就能够使这些萌芽成长起来，使资本主义完全进化到社会主义。

伯恩斯坦所说的“新的经济制度的萌芽”是什么呢？

首先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合作社。他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工人合作社，尤其是组织工人消费合作社，看做是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捷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消费合作社，能够排除商人的中间剥削，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萌芽。他还攻击马克思只看到资本的

剥削，没有对合作社采取公平的态度，忽视合作社的作用。

其次，伯恩斯坦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社会的公僕，国家可以为了社会的利益把私人企业变为公共企业，这种公共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照他的说法，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巨型垄断组织本身已经向着公有化前进，只要由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一定立法手续，就能够把这些企业征用过来，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他说：“这样一来，联合起来的生产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不再为股东进行，而是为整体，为社会继续进行”，而“为社会的生产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②

伯恩斯坦还把地方市政自治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所拥有的地方公用事业，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断言，通过地方市政自治机构的立法途径，在城市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城市交通政策”、“城市住宅政策”、“市政工人政策”等等，对城市的交通、卫生、住宅、劳动立法等实行一些改革，并且经营一些“地方公有”的事业，其本身就是直接向社会主义前进了。他说：“这就是市政的社会主义。这样，在我们的城市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和力求上升的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不断加强的压力下，新的社会主义的萌芽就继续不断地发展”^③。

最后，伯恩斯坦把工人争取到的某些劳动立法，例如劳动保险、劳资合同，甚至资

^①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② 伯恩斯坦：《经济生活的各种形式》。



本家欺騙工人的所謂由工人參與“監督”經濟生活，也當作是社會主義的措施。他說，在政府的影响下成立了僱主組織和工人之間的勞動友誼社，使企業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有了一種共同的利益。甚至說，工會制訂的勞資合同，可以看作是在工業中勞資雙方的合股，“它本身包含有工人階級獲得真正社會解放的可能性”^①。

總之，在伯恩施坦看來，上面所說的一切，都是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主義萌芽，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漸漸產生社會主義的新制度。他說：“由於我們現代化生活所引起，一方面漸漸產生了需要和推動力，另一方面漸漸產生了一個新的經濟制度的形式和組織，這種新的經濟制度在一切方面都把大眾的巨大的社會利益置於個人和集團的利益之上，因此，我們稱這種經濟制度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至於它最後將組成何種樣的形式，我們不知道，並且今天也不須知道。我們只要看見這個萌芽，看見這個經濟怎樣成長為這種制度以及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的利益在推動它，這就夠了”^②。

顯然，伯恩施坦是在公然宣揚資本主義制度永恒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根本對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為社會主義準備了物質條件，但是，在資本主義內部，根本不可能產生什麼社會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不同於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革命。過去的革命，是以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

有制，以一種剝削形式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因而，新的生產關係的萌芽，能夠在舊社會內部產生和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要徹底消滅剝削和壓迫，作為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的無產階級，只有剝奪資產階級手中的生產資料，才有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合作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對於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有一定作用，但是，它在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只是從屬的、輔助的手段，不可能通過合作社導致工人階級的解放。合作社的性質任何時候都是由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合作社一般是集體的資本主義企業。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由於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主要生產資料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合作社的性質才是社會主義的。

列寧在第二國際哥本哈根代表大會上分析在合作社問題上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綫時說：“一條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路綫，承認合作社對這個鬥爭的意義，認為它是進行這個鬥爭的工具，是進行這種鬥爭的輔助手段之一，並且確定了在什麼條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這種作用而不會成為純粹的商業企業。另一條是小資產階級的路綫。它模糊了合作社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的作用問題，脫離這個鬥爭來談合作社的意義，……用籠統的詞句規定合作社的目的，這些籠統的詞句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即進步業主和小業

① 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過去和現在》。

② 伯恩施坦：《經濟生活的各種形式》。



主的思想家都是可以接受的。”^① 伯恩斯坦所鼓吹的，正是列宁所批判的那条改良主义的路綫。

资产阶级国家干預經濟生活和实行企业的国有化，根本不会产生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干預經濟生活，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从国家产生的时候起，各种性质的国家，如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都采取过各种干預經濟生活的措施，只是方法和形式不同罢了。国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各种措施，都是为統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资产阶级統治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代表全社会利益的超阶级的机构。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家干預經濟生活，只是表明少数大壟断资本家利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加紧压榨劳动人民，加紧吞并中小企业，加剧壟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兼并，并且加强壟断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和扩张，以便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恩格斯在談到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性质时写道：“无论轉入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手中，无论变为国有财产，都没有消灭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性质。……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地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益完全地轉成为集体的资本家，愈益剝削更多的国民。工人还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极点，达到了頂点。”^②

伯恩斯坦所鼓吹的“市政社会主义”，是

从英国资产阶级费边派那里抄来的。

资产阶级的市政机构，只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市政当局某些极其有限的改革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资产阶级統治的政治基础和經濟基础。他們所举办的若干公用事业和慈善事业，不过是资产阶级从他們所榨取的剩余价值中拿出一点来“施舍”給劳动人民，到头来，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列宁早就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市僧改良主义。他說：“西方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如英国费边社分子，所以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别的‘流派’，正是因为它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調和，企图使社会忽视全部經濟制度和整个国家結構的根本問題，而去注意地方自治的細小問題。”^③

伯恩斯坦对于劳資合同的頌揚，則是资产阶级庸俗經濟学的阶级利益調和論的翻版。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总是要剝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总是要反抗这种剝削和压迫。这种矛盾，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得到解决。伯恩斯坦把资本家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间的劳資合同和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劳动条件的某些劳动立法，也說成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是在給资产阶级脸上貼金。姑且不說劳資合同和劳动立

①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問題的討論》。《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5頁。

②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2頁。

③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5頁。



法一类的东西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欺骗劳动人民的手段，即使工人经过斗争取得了一些劳动权利，也根本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实际不过表示劳动者为自己锻造的金链，已经有这样长这样重，略微放松一点也无妨而已。”①

伯恩斯坦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鼓吹通过议会选举和立法等合法途径，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范围内实行一定改革，就能够使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发展起来，从而最终使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按照他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与生产力大大提高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也发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愈来愈采取“温和的”、“文明的”和“人道的”形态，依靠资产阶级的普选制和民主制，已经能够消灭一切资本主义垄断，改变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他借口资本主义制度比之封建制度有更大的“伸缩能力”、“变形能力”和“进化能力”，认为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进化。在他看来，不必进行革命，不必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要在议会中获得多数选票和席位，就能使议会从人民的主人变为人民的僕人，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实现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革了。他说：“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则只需要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②他狂妄地宣布：“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③。

伯恩斯坦还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时候，是把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当作典型的实例的，而在今天，这个名词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并且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恐怖的独裁统治”。

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分水岭。尽管伯恩斯坦在表面上还披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外衣，然而，他所贩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实质上却是企图把工人阶级的斗争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借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时指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④。列宁的这一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本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77页。

②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③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④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本刊评论员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四个第一”的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就是在处理军队工作中各项工作（政治工作，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时候，必须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做好政治工作，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保证。

中国革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主要从事军事斗争，党的一切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于军事斗争。因此，处理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治领导军事，还是军事领导政治？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方向，也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远在创建工农红军的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就规定了把军队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的总原则。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妨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单纯军事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领导政治，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因而主张在组织上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这种观点的危害性，他说：“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①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反复地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②

在军队工作中，所以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强调党的政治领导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无产阶级的军队。这个军队需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人员，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政府的法律、法令，培养军队自觉的纪律和“三八”作风，严格执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原则，增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军队

①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88页。

②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5页。



同外部的团结，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军队具有无产阶级觉悟和坚强的战斗力，紧紧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不怕任何艰难困苦，能够战胜一切敌人。而所有这一切，只有依靠党在军队中的系统的政治工作，才可能做到；离开了政治工作，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了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实现政治领导军事、党指挥军队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团以上单位建立了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作为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这项制度也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军队中的具体运用。部队中的一切重大问题，除了在紧急情况下，得由首长机断处理外，都先经过党委员会的充分讨论，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在军队中还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政治机关就是党的工作机关。与此同时，还实行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以取得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

这样的制度，就保证我们的军队有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经常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我们的军队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真正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成为党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人民解放军成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毫无疑问，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实现军队的不断革命化和现代化，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和必要条件之一。

政治统率一切，把政治工作看做其他工作的灵魂，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项普遍原则，它当然不仅适用于军事领域，也适用于其他各个方面。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变革和经济建设的任务。过去，我们主要是打仗，遇到的是政治和军事的关系问题。现在，主要是建设，遇到的是政治和经济、技术等的关系问题。同过去一样，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攸关经济建设的根本方向，攸关无产阶级专政存亡以及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

有人以为，政治和军事相比占首位，军事斗争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争本身就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但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政治和经济相比，就不能说政治占首位，因为这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政治要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经济就应该统率政治，而不能是政治统率经济。

这种观点正确不正确呢？当然是不正确的。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毫无疑问，主要任务是从事经济变革和经济建设，我们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经济工作方面，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但是，仅仅指出我们的



主要任务这一点是完全不够的。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如何完成任务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应当怎样进行，按照什么方向、路线、政策进行，我们用什么态度、什么观点来对待这一工作，这个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如果解决得不好，经济任务就无法完成，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这就是说，也如过去军事斗争的胜利首先取决于党的政治领导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取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取决于我们能否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在这里，政治仍然是统帅，是完成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和前提。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曾经专门作过论述。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当苏维埃政权已经能够不把重心放在军事斗争上，而可以抽出力量来从事对内斗争，从事经济建设的时候，列宁就指出：“我们需要具体指出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宣传工作都应该建立在从政治上说明经济建设的基础上”^①。

当着托洛茨基等在工会问题上挑起争论，对列宁的上述观点进行攻击的时候，列宁又重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并且再次肯定了它，认为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毫不例外。他说：“我在自己的发言里曾经重复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我在以前就听到过这种对我‘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非难，听到过这种非常荒谬的、完全不应当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讲出来的话。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②

列宁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③。

问题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有社会主义政治这种上层建筑来为自己服务。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系统的政治工作来保证。

在社会主义时期，政治对于经济，政治工作对于经济工作，起着一种新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的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不同，它不是自发地产生、自发地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在旧社会内部缺乏任何现成的萌芽，这个经济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创造出来；就是在有了社会主义经济以后，这个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转变为共产主义经济，也不可能是自发的，无计划的，而必须通过共产党

① 《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37页。

②③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1—72、72页。



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政权的统一的有计划的管理和调节。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和领导，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才能自觉地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运用它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各个方面从事经济工作的人，或者各个经济部门、单位的管理者，都应当把党的路线、政策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并且服从国家统一的计划，也就是局部服从全局。这种全局观点就是政治观点。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如果没有这种自觉态度和全局观点，没有系统的政治工作来保证这一点，经济工作是做不好的。这里，任何自发行动，各行其是，本位主义等，都会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能在不断同各种旧势力、旧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各种旧势力和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不会轻易地退走。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曲折的。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是要保证完成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铲除一切剥削，消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能够从单纯的经济观点或单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出发，而必须从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出发，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自己的环境、经济发展形势和经济工作中的各种倾向，找出有利于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正确方法。资产阶级及一切内外敌人则力图进行反抗，力图扭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为此，就要尽量利用一切自发势力，利用各种形式的脱离政治的单纯经济观点，或者经济主义观点，利用任何削弱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的倾向，以便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渐变质，并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①。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各个经济部门，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只重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只知追逐“物质刺激”的倾向、甚至修正主义的倾向滋长起来，不加以制止，便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应当坚持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本国劳动人民和本国资源，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脱离国际政治，脱离国际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也是国际的事业。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义务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同时，它们自己的建设也需要取得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因此，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坚持社会

^①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22页。



主义方向，又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担负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使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工作者，都能够关心世界政治全局，关心世界革命的形势，懂得我们的建设事业，不能离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帮助，我们也要以我们的成就来援助世界各国革命人民，而反对一切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倾向，例如，大国主义的倾向等。这种政治教育必须普遍地长期地进行。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①很明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如果不根据政治统率经济的原则，加强革命的政治工作，我们的建设工作就无法做好。

同过去创立人民军队时一开始就着重从政治上建军一样，当我们的国家组织一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样着重地指出，必须从政治上建设和整顿这支最广大的队伍。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我们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商业部门，必须学习解放军的办法，建立和加强政治工作，才能振起整个经济战线上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曾经论述过应当怎样进行政治动员工作。他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

^①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①

现在，中国的情况和抗日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了，任务也不同了。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就其一般原则和方法说来，对于我们各个方面的政治工作，仍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那时说的是如何动员人民和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现在我们的政治工作是要动员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政治工作，就是要将我们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的政治目的告诉干部和群众，使每一个人都能充分了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政治意义，鼓舞他们的革命热情，并使他们懂得从事工作的政策和步骤，把他们的革命热情引到实行党的政策的轨道上来。在各个时期、各种新的任务面前，这种工作要适合新的情况，联系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经常地、反复地进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向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事实证明，哪里学习了解放军的办法，建立了系统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实现了党的充分领导，那里就会有真正的群众运动（而不是少数行政领导人冷冷清清地办事），那里的领导和群众就会有高度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官僚主义莠草一大堆，或者只知道追求“物质刺激”）。

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也必须学习他们的落实精神，这就是政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并且做到实际中去，做到基层去，渗透到当前各项实际行动中去。政治工作之所以能够在各项工作中发挥巨大的威力，也是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许多先进单位的政治工作经验证明，把政治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业务工作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做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去，才是生动活泼，具有生命力的，才能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统一起来。这样去做政治工作，就能够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行动，化成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工作迅速向前发展。

总之，目前时期，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学习解放军，也要像解放军那样，在处理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的时候，要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着重从政治上建设和整顿我们的队伍。我们的各项建设工作要搞好，必须依靠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建设大军。这支大军将是不可战胜的。在它的面前，一切敌人，不论是阶级敌人，还是自然界敌人，都是要倒下去的，而人世间的奇迹将会不断被创造出来。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0—471页。



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阔步前进

——談話劇《千万不要忘記》

賈 霽

《千万不要忘記》(又名《祝你健康》),是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等許多优秀話劇之后,又一出革命精神焕发、艺术強烈感人的好戏。

舞台上展示的是一幅幅工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图景,却生动地反映出当前的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間的一場斗争,提出了值得人們深思的一个問題: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青年們应当如何沿着革命化的道路阔步前进?应当如何来教育青年一代?

一个青年想穿一套毛料子衣裳,乍看起来,这本来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件事发生在戏剧主角丁少純身上,却出了問題。这个青年工人,和他的父亲、妹妹、同伴一样,既在进行生产斗争,又参加了科学实验,然而,他無論是在生产中,在生活中,都出了不少的漏子。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和他的父亲、妹妹、同伴这些人比起来,缺少了一些什么呢?剧本令人信服地表明,那不是别的,正是革命的理想——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正如他的父亲、老工人出身的車間主任丁海寬所說:

問題不在于你們穿什么,……在于你們想什么,追求什么,你們的奋斗目标是什么!毛料子是

好东西,从前的劳动人民連想都不敢想它,現在你們不但敢想它,還有很多人能够穿上它,这是革命和建設带来的成果,是好事情!我們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要是你們光想着自己的料子服,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鴨子,光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那你們就会忘記开电門,忘記上班,忘記我們正在奋发图强的国家,忘記世界革命!

这段話說得好!事情正是这样。由于党的教育,在我国广大青年中,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是大大地扩展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是大大地縮小了。全国各地涌现出了千百万自觉地走革命道路的青年,他們在阶级斗争中,立場坚定,爱憎分明;在生产斗争中,奋发图强,不断創造出新成績;在日常生活中,也充滿革命朝气,使身心健康地发展。最可贵的是,他們有着要彻底改造自己的強烈要求;因而,不論是在火热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以及在普通的日常的生活里,他們能摆脱和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們的社会里,也还有像丁少純这样的青年。他們生长在新社会,受着党的培养、教育,受着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熏陶、感召,本来是应该而且可以成为革命的下一



代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头脑没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加之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他们不知道或渐渐忘记了阶级，不知道或忘记了阶级斗争，不知道或忘记了我们还要革命。这是真正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关系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大事！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戏绝不仅仅对青年，而且对所有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在有些场合，一个人的思想、立场，表现得更明显一些；而在有些场合，似乎并不那样明显——但考验并没有过去！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通过劳动锻炼和思想锻炼，来促进自己的革命化，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里，重要的是自觉，不但要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自觉地锻炼，也要在日常劳动、日常学习、日常生活中自觉地锻炼。只有用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彻底武装起来的人，才能彻底克服和摆脱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包括那件毛料子衣裳的影响；而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去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包括丁海宽所说的“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这样的理想，并为这些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不用说，客观环境是错综复杂的。不仅有不甘心灭亡的阶级敌人总是企图复辟，而且在我们身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些社会力量，就跟混在空气里的病菌一样，随时侵袭着我们。丁少纯的岳母姚母这样的人，正是这种社会力量

的一个代表。他们人数不多，可是要战胜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正如列宁所深刻地指出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①姚母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正在这里。她并不是明目张胆地拿枪拿炮来进攻社会主义的敌人，但她却本着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生活的态度，无时无刻不在散播着资产阶级的思想、生活方式和旧的习惯势力的毒素；她顽强地在影响着、腐蚀着周围的人，实质上就是在争夺青年，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腐蚀，并不是一开始就从政治上，而是从生活上、从人们思想防御最薄弱的地方打开缺口的。

这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这是一种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阶级斗争，……一种容易被人们忘记的阶级斗争，……。

戏的结尾，丁海宽语重心长地要人们学会看清楚、千万不要忘记的这种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曲折的、艰巨的。这也正好说明：为什么当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们每个革命者应当对自己的各个方面（包括日常生活方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否是苛求呢？雷锋、好八连等等我们时代无数先进人物的代表的事迹，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像《千万不要忘记》这样的作品，也正是为了促进人们的革命化，为了加速新人的诞生和成长而斗争的。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6页。



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

——談話劇《年青的一代》

姚文元

《年青的一代》是青年人生活道路的一面鏡子，是社会主义社会青年走向革命化的一面鏡子。

經過集体的多次加工，精益求精，华东話劇观摩演出中出現在舞台上的《年青的一代》，無論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在表現无产階級革命精神的強烈、深刻程度上，都有了很显著的提高。它所深刻地提出和正确地回答了的青年人的生活道路問題，是一个階級斗争問題，是一个关系到共产主义未来的問題。正因为問題本身具有普遍的、深远的意义，在林坚、蕭继业、林嵐和林育生、李荣生等人物形象中所展开的两种幸福观、两种世界观、两条生活道路

的鮮明对比，才那样強烈地激动了千万人的心灵，激励青年人树立无产階級世界观，拋棄資产階級世界观。

无产階級夺取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終結，而仅仅是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階級要把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有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做共产主义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把无产階級革命傳統世代

地傳下去。因此，无产階級一定要用自己的世界观教育下一代成为革命的一代，繼續按照无产階級方向改造世界；資产階級和地主、富农等等被打倒的反动階級，妄图使資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使紅色的中国变成黑色的中国，使光明世界倒退到黑暗世界，也正在用自己的世界观腐蝕青少年一代，使他們政治上变质，以便照資产階級的方向改变世界。这种尖銳复杂的斗争，随着時間的推移，更加广泛地在青年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展开了。这个斗争誰胜誰負，关系着教育什么样的后代，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关系着社会風气，关系着共产主义的事业。《年青的一代》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斗争的历史意义，用鮮明的对比显示出培养革命的青年一代的重要性。而且通过塑造蕭继业、林嵐这样的青年一代先进人物的英雄形象，通过李荣生、林育生在革命前輩和同志們教育下的提高和轉变，对这个問題作了满怀信心的回答。

舞台上充满了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正面人物的光輝形象始終占着主导地位。不是“批判的典型”压倒一切，而是先进人物的形象及其精神力量节节胜利。批判了資产階級世界观的危害，又表現了犯錯誤的青年如何在集体的帮助下走向进步，是这个戏的重要特色。

在蕭继业、林嵐身上，我們清晰地看到了在毛澤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精神面貌的特色。他們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接受无产階級革命傳統和革命前途的教育，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因此具有鮮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自觉性。自觉性是同自发性对立的。自觉性，就是自觉地



意識到自己作为一个无产階級革命事业接班人所担負的历史使命，把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当作自己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快乐，自觉地同一切違反这个事业的錯誤思想和錯誤傾向作斗争。他們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同革命前輩一样干革命，用参加革命的精神对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他們的精神世界也就革命化了。

蕭继业回答林育生“你总不至于要我們都去过山沟里的日子吧！”这个问题时，激动地说：“山沟里！？没有革命前輩在山沟里的斗争，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全国广大山沟和农村的支援，我們大城市、大工业就失去了生命綫；没有艰苦的劳动，哪儿来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全国人民的幸福，更何况我們地质工作者的战斗崗位就在山沟里？”这段话揭示出蕭继业内心对待自己工作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只有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干革命的人，才能对“山沟里”的偉大作用、偉大意义說得这样透彻。

林嵐在回答她父亲“你会碰到許多困难”这个问题时，斬釘截铁地说：“我想，现在困难再大，总比不上你們当初搞革命的时候吧！既然我們的父輩都是硬汉子，我們也不該是胆小鬼！”这是把革命責任放在自己双肩的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蕭继业和林嵐这样的青年人，把林坚、蕭奶奶这样的革命前輩当作自己的榜样，用他們的精神要求自己。他們有一个自觉的革命的头脑，有一颗火热的革命的紅心，因此他們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五四时代以来的革命青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立下了推翻反动的黑暗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建立光明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样宏偉的抱負，就能不怕一切，向着当时压在人民头上的剝削階級及其上层建筑的种种龐然大物发出勇敢的挑战。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青年一代，正在毛澤东思想的教育下继承着这种无畏的革命傳統，立下了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改造世界的宏偉志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妖魔鬼怪，不怕歪風邪气，不怕威胁利誘，不怕做最平凡、最瑣細的“螺絲釘”，一定要完成党交給自己的任务！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搞到底！蕭继业和林嵐，就是这样的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青年正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条战綫上的斗争的風雨中成长起来。我們希望戏剧和其他文艺創作，更多地塑造这些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英雄人物。

幸福观是两条生活道路、两种世界观斗争的焦点。林育生是在資产階級幸福观的腐蝕下走到邪路上去的。为什么斗争的焦点会在“个人幸福”的問題上？因为无产階級的事业是階級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广大人民得到幸福，个人才能有幸福。自觉地意識到这一点，为階級的、人民的利益而不屈不撓地奋斗，这是无产階級觉悟的根本标志，这是无产階級区别于其他一切階級的根本之点。而資产階級的“个人幸福第一”論，則恰恰是使人只看到个人鼻子尖享受。革命青年接受了这种思想影响，就会拋棄階級和人民的解放，拋棄階級和人民的幸福，也就拋棄了无产階級的觉悟性。社会主义青年最宝贵的是革命的觉悟。有了觉悟，才能自觉地按照社会发展的規律去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



从盲目的生活变成自由的生活。“个人幸福第一”则正是资产阶级用以瓦解、腐蚀、麻痹人们的毒药。资产阶级企图从这儿打开缺口，使青年人蜕化变质。林育生口口声声向人說：“你是不是还承认有个人幸福？”他梦想着沉醉在个人小家庭中的“甜蜜”生活，还以“一样工作，一样劳动，既没有去偷去抢，也没有去剥削”为借口，正说明了：从幸福观的缺口上灌进资产阶级世界观，可以使青年人已经中毒还不觉察其危害性，还觉得很“舒服”。这个教训，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和平的环境下，在阶级敌人用个人享受作为瓦解人们革命意志的进攻手段的情况下，警惕资产阶级幸福观的侵蚀，是何等重要。

对立着的双方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人的精神面貌也是这样。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刻划出客观的社会条件和主观的精神条件，人物性格的变化就会缺少必然性，就会不够真实。经过加工后的剧本，对林育生的两个转化的条件都作了更精细的刻划，使之更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第一个转化的条件，即林育生由好变坏的条件，更突出了小吴等资产阶级青年的引诱腐蚀以至出坏主意；夏淑娟因他是牺牲了的老同志的后代而溺爱迁就；林育生自己的追求个人舒适、个人名望。第二个转化的条件，即林育生由坏变好的条件，是烈士遗书的强烈撼动；萧继业等同志有原则而温暖、耐心、反复的教育；原单位的同志热情欢迎他归队；同时也更多地显示了他心中革命的思想并未丧失干净，

还在起作用（如毅然把假证明给夏倩如），在同志们的多次启发下，这种革命思想终于成长起来，压倒个人主义思想，使他重新走进战斗的行列。形而上学地刻划这类革命队伍内部有缺点的人物，采取先是刻划他绝对的坏、一直坏到底，后来又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的方法，是不行的。刻划出人物思想发展的辩证过程，才能使形象真实、典型而有说服力。

再一次看了《年青的一代》，重温毛泽东同志十五年前的話：“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体会得就更加深刻了。毛泽东同志这段話，照耀着我们今后长时期的战斗道路，而这条路是要由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去走到底的。历史舞台上，还有许多有声有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将要由未来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演出。创造出更多更好针对青年人思想状况、思想问题的文艺作品，促使青年一代更快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成长，帮助更多的青年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走向团结和进步，走向无产阶级化、革命化，是文艺工作一项迫切而长远的历史任务。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40页。



贊 勇 敢 的 山 鷹

——談話劇《远方青年》

張 穎

近来，出現了不少反映青年生活的优秀戏剧創作；它們从各个方面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青年們朝气蓬勃、丰富多采又充滿着斗争的生活面貌，并且通过舞台艺术的感染力量，对广大观众进行了生动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远方青年》就是其中之一。剧作者武玉笑同志多年来經常在新疆地区和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对边疆兄弟民族的生活比較了解，也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在《远方青年》中表现出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濃厚的生活气息，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評。

我們时代的知識青年是富于理想的，而且有政治觉悟，勇敢热情。《远方青年》的作者像写美丽的抒情詩一般，描写了一群把青春献给边疆畜牧事业的青年兽医。他們在专业学校毕业以后来到牧馬場，和牧民一起为祖国的畜牧事业而辛勤劳动着。尽管他們刚到牧場的时候仅带着一点书本知識，曾經对着患有疑难病症的馬匹束手无策，对着难产的小馬駒焦急落泪，但祖国共产主义建設的崇高理想鼓舞着他們，沸騰的生活吸引着他們，牧民們对馬群的深情热爱也感动了他們。慢慢地，这群青年人一个个都克服了各

种各样的困难和自己思想上的缺点，逐渐茁壮地成长起来，成为自由飞翔在这片广阔天地上的山鷹，为繁荣国家的畜牧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青年們生活着的时代环境是健康向上的，社会发展引导他們走上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然而社会生活并不是完全洗滌干净的真空，我們周围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青年一代身上仍然有可能起着腐蝕和溶化作用。在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中，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艾利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也和同學們一样对畜牧事业抱着理想与热情，但当他投身到生活的熔炉来的时候，不是把自己的劳动和智慧献给国家和集体的事业，而是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包袱，要寻找一些材料准备回学校去写他的“科学論文”。他在学校讀書的时候显得很有聪明才气，但在实际工作中他成了思想上的逃兵。他給馬治病打針出差錯，勘察新的牧場完全不符合科学要求，以至发生怀胎母馬流产的严重事故。从艾利身上，人們会感受到深刻的教訓：在我們的生活环境中，带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



包袱，那将会处处碰壁，一事无成的，而且也必然会被时代的激流所抛棄。年輕的艾利吸取了教訓，只有重新起步了。

知識青年从学校出来，应该投身到火热的生产斗争中去，这已經逐渐成为我们的社会風尚了。而这仅仅是开始，还必需首先学习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知識，然后才有可能把书本知識和生产实践結合起来，把科学輸送给劳动人民。对于这样的道理，不是所有的知識青年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的。女兽医阿米娜就是这样。她积极热情地参加了牧馬場的許多工作；但是她不相信牧民們多年的实践經驗，沒有首先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沒有認識到应该把书本知識和实践經驗結合起来。所以，尽管她按照书本上的方法为难产的母馬接生，但小馬駒却没有救活。她苦苦用功进行的科学研究也因为脱离实践經驗，而沒有得到应有的进展。最后，从沙特克的正确行动中得到启示，她才猛然醒悟，看清楚在生活和科学研究上也存在着两条絕然不同的道路。她立刻和资产阶级思想决裂，以至毅然和滿脑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爱人艾利分手，坚决走上社会主义的紅专大道。这时候，她轻松愉快地向前迈了一大步。

沙特克是这群青年中的先进者，牧民們

把他看成是勇敢的山鷹。他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赤胆忠心来到牧馬場，所以能够勇敢地克服困难。他到处摸医道、拜师傅，哪个小队里都有他的名，哪个山头都有他的馬蹄印。有着这么一股硬干劲儿，他就能从生活实践中鍛炼出来，掌握了牧馬場中馬大夫的工作規律，成为群众生活和生产中的有力助手。

沙特克絕不像艾利說的那样是个眼光短淺的人，而是有理想、有干劲的科学工作者。他研究医治馬的腸阻塞病是因为现实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幻想中的世界科学高峰。他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地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积累經驗，进行研究，他不畏艰难，甚至感染了危险的病症也毫不退縮。他终于以勤劳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取得了胜利。剧作者以銳利的眼光，观察、了解了青年們在现实生活和斗争中經常遇到和普遍存在的問題，通过塑造沙特克这个先进人物形象做出了使人信服的解答，給青年們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老养馬英雄卡生拜克說，知識青年中有勇敢的山鷹，有飞不高的班鳩，也有沉了水底的鴨子。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話。作者以时代歌手的热情贊美勇敢的山鷹，也鼓舞青年們要作勇敢的山鷹。

朱



在建設新农村的理想下團結前进

——談影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續集)

袁文殊

影片《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續集),是继初集中孔家庄人民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之后,进一步建設水力发电站的故事。作者馬烽同志在这里繼續發揮了我国人民敢想敢干、不断革命、积极建設新农村的主题思想。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农民,并不以把水引来之后,能够供得上村里飲食和灌溉农田的需要为滿足。他們还要进一步利用这条水渠发电,使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场建設水电站的斗争,和以前的修筑水渠是完全不同的。掌握电气的科学技术,比劈山引水要复杂得多(这里不但有思想上的矛盾,还有科学技术上的困难)。我們在初集中看到的以孔淑貞为中心的年輕人,仍然是这场斗争中的中坚人物;而积极支持这一新任务的也还是带头劈山引水的英雄高占武;老社长在这一新任务面前又成了和先进思想对立的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影片的矛盾冲突就是在这三方面的人們对待这一新任务的不同态度上展开的。经过上级党组织的教育,同志式的辯論和批評,以及现实生活的教訓,最后终于使意見得到統一,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作者选择了这一角度来表现我国农村当前的斗争生活,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在我国,現在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复員軍人和知識青年回到农村中去。他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血液。因此,同广大农民群众結合在一起的,我們的农村干部、复員軍人、新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識青年,就是当前我国农村建設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种骨干力量。如果能够做好这三方面的團結工作,使他們彼此虛心学习,互相帮助,充分發揮积极性,就可以團結广大农民,产生无穷的力量,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設就一定能够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过来,如果團結工作做得不好,势必互相抵銷,甚至会妨碍工作的順利进行。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沒有矛盾和斗争的。即如为了建設水电站的事情,孔淑貞和李克明的計劃一开始就和老社长要集中使用劳动力的計劃发生矛盾;老社长的計劃和高占武的意見又发生矛盾;高占武要支援周村的意見和孔淑貞又发生冲突等等。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沒有矛盾便沒有运动。不经过斗争,事业便不会前进。目前我国农村正在經歷着急剧的变革,这三方面的人物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認識水平,怎么能够設想他們之間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呢?

像高占武这样的复員軍人,是带着人民



解放军的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回来的。为了改变村里的自然面貌，他曾奋不顾身，带头劈山引水。现在党又号召要建设水电站的时候，他积极支持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由于他长期过着部队的集体生活，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任何事情，一经决定，他是说干就干的。遇到像老社长那样具有保守思想的农村干部，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再加上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冲突就更难免了。像孔淑贞、李克明那样的知识青年，他们积极热情，富于理想，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在农村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和具体目标，完全有可能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毕竟比较缺乏生产知识和劳动习惯，甚至缺乏一般的社会经验。他们同劳动农民相结合，还得有一个通过实际斗争改造思想的过程。因此，他们在农村建设工作中也就难免会由于思想认识上的缺点而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李克明无疑是一个好青年。为了做电站的设计工作，他可以通宵不眠，把眼睛熬得通红；但他却把职工宿舍设计得富丽堂皇，像个展览馆，这就必然要和实际需要发生矛盾。作为农民出身的干部老社长，的确是诚诚恳恳要把生产搞好的。农民干部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对本地情况很熟悉，处理事情比较谨慎。老社长也是这样的农村干部。但是，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对于新生事物接受起来不够敏锐，对于一些新的生活作风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习惯的。所以他和高占武

或孔淑贞之间，每逢一桩新事物到来的时候，都会有许多意见上的分歧，都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然后才能统一起来。这是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思想性格的逻辑的。因此，如何细致地了解这些情况，善于调动这三方面的积极因素，使他们在共同工作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克服他们的缺点，进一步发扬他们的优点，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在这方面虽然不是都已经表现得很好了，但它通过具体的形象体现了这个问题在目前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对这三种骨干力量之间有团结有斗争的方式作了比较妥善的描写，这是十分有益的。与此同时，它还写出了我国农民在党的教育下，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改变着农村的面貌，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精神面貌，显示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这对观众说来是有鼓舞作用的。

其次，影片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高占武在自己村里的水电站还没建成的时候，就慷慨地抽出最好的人力去支援周村，尽管孔淑贞等人反对，他仍没有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这种大公无私的风格，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风格，是值得人们仿效的榜样。要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是不可想像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觉悟水平正在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的新风格、新风尚正在到处涌现。影片反映了这些新事物，必将反过来推动这些新事物进一步地发展。



劳动熔炉铸新人

——谈豫剧《朝阳沟》

艾克恩

豫剧《朝阳沟》(杨兰春作),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剧中的主人公银环是作者既热情肯定她积极方面,而又严肃批判她落后方面,从而使观众得到警惕、取得教训的人物。

剧本写出了银环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全部思想变化。这变化,再次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知识青年要在农村中安家落户,生根开花,必须同旧思想旧意识进行彻底的决裂,加强自觉的思想改造,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过程。

剧本有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充满了对生活的喜悦。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到农村中去,银环就是这样的知识青年。

作为刚刚走出校门、刚刚走进社会的知识青年,银环是很有代表性的。她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受过革命的教育和党的培养。所以在她身上,有着一般革命青年的特点:单纯,热情,求上进,有干劲,能够听党的话,服从革命的需要,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正因为这样,银环在高中毕业以后,便能够毅然地走上农业第一线,到了婆家所在地朝阳沟安家落户。

可是,剧本并没有回避这中间的斗争。正像实际生活所显示的那样,银环发展的道路不是平坦的、一帆风顺的,而是曲折的、有斗争的。尽管银环是在新社会长大,受着革命的教育,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意识和旧的传统习惯势力,不能不对她产生影响。因此,在她下乡和参加劳动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矛盾现象:她有革命理想,但又常常计较个人得失;她有扎根在农村的宏愿,但又处处留恋城市生活;她想作一个又红又专的新型农民,但又缺少艰苦奋斗和战胜困难的决心;她立志要在农村火热的斗争中锻炼和改造自己,但又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正像毛泽东同志分析的:“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①银环在自我改造的道路上,就恰恰表现了这种“空虚”和“动摇”的特点。银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6页。



环究竟能不能做到“人在农村，心在农村”、“红在农村，专在农村”，这就成为摆在观众面前并为观众所十分关切的问题，成为戏剧矛盾冲突的焦点。剧本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富有情趣的情节，揭示了各种人物特别是主人公银环的精神面貌。

银环落户到朝阳沟经过了几道关口。每道关口，对她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看来，她过“家庭关”还较顺利，不过也有波折。银环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脑子里装了不少旧思想。她认为，银环去农村，一无前途，二不光采。银环面对着母亲的阻拦，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一会留恋家庭，舍不得母亲；一会又想下乡，为农业奉献力量。“去也难来不去也难”。最后，她终于下决心去了，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了；但是，她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软弱性，使她虽然下乡了，但总是有些勉强。剧本一开头就这样描写，不仅有助于表现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弱点，同时，也有助于为人物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根据。

过“劳动关”，比起过“家庭关”来，无疑是一个更加难过的关口。人常说，社会主义劳动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是一种艰巨的事业。认识不到它的伟大性，就会丧失前进的信心，缺少足够的勇气；认识不到它的艰巨性，也会挫伤情绪、半途而废。由于银环对劳动的伟大性认识非常肤浅，对劳动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意义理解不深，自然矛盾不能不有，钉子不能不碰。譬如，银环出现在地头，首先欣赏的是农村的山光景色，拿爽朗乐观的二大娘的话来形容，

就是：“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的了了的。拾个石头蛋也装起来，见个黄蒿叶也夹在本子里，说，这个可以送朋友，那个可以作纪念。”银环所唱的那段抒情诗：山美，树美，空气新鲜，野花好看，等等，固然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知识青年刚下乡的新鲜感觉和兴奋心情，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把艰苦的劳动和游山逛景多少是等同了起来。因此，尽管她嘴上说：“我不怕苦不怕累”，“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都使上”，而到握起锄头真正劳动的时候，心情就起了变化：“看起来庄稼活非常简单，谁知道干起来这样难。”再加上知识分子的虚荣心，使她自己把自己弄到十分危险的地位：明明由于劳动不熟练锄掉了麦苗，却偏要怪“这个锄不好使”；明明是初次上埧挑不了水，却故意计较别人的玩笑，赌气把水桶摔了个底朝天。由“委屈”，到埋怨，到悔恨，最后连同潜藏在灵魂深处的错误思想也一起翻腾出来，对农业劳动发出了根本的动摇：“一辈子当农民有点屈材。”表面看来，母亲来信（装称病重）是促使她离开朝阳沟的原因之一，但观众看得明白，银环离开农村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对劳动畏惧，所谓“这样难”；对劳动轻视，所谓“有点屈材”。银环的退缩正是她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银环这个人物所以写得比较深刻，批判得比较准确，是由于作者写出了知识青年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的长期性和反复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

懲



要求是能够达到的。”^①

如果把銀环比作是一颗种子或一株幼苗，那么劳动人民就可以说是培育它的最好的土壤和园丁。剧本始终将銀环的思想转变放在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过程中来描写，而且写得比较细腻、深刻和入情入理。尽管銀环到朝阳沟不几天，但她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了她很大的教育。比如，銀环刚到朝阳沟，拴保娘、拴保爹、老支书、二大娘等人，是那么热情地来接待她，甚至连城里人好喝开水也想到了。拴保爹不惜糟踏自留地的青苗，让拴保一锄一锄地教她锄地。拴保娘更是喜欢銀环，这种喜欢不光出于一般婆婆对儿媳的爱，更主要地是出于山区农民对知识青年的真切关怀，出于看到知识青年能够勇于参加农业生产、建设新山区的喜悦。老支书是那样关心銀环的成长，他一方面鼓励銀环，充分发挥她的长处，另一方面也严格要求銀环，不断向她进行说服教育。心直口快的二大娘，一看到銀环来，高兴得眉开眼笑，像对自己的闺女一样。同时她对銀环又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她敢于批评，而且批评得很，批评得准。所有这一切，都在銀环的自我斗争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剧本的描写并没有止于此。銀环能不能转变，根本问题还在于她最后有没有决心，先进思想能不能占上风。銀环在下乡前也下过“决心”，但由于她没有和实际接触，没有同群众结合，因此，这种决心是不巩固的。思想反复的现象势必难免。銀环的真正转变，决心真正下定，还是在群众斗争中，即经过一番“痛苦”的“磨擦”的过程之后。人们看到，当她真要离开曾经生活和劳动过一

段时间的朝阳沟时，一切往事，重现眼前，引起了一番内心的激烈斗争。她在返回县城的路上，看到一片茂盛的庄稼，其中有自己流汗种植的妻子，有未婚夫拴保教她锄地的足迹，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实在有点依依难舍。拴保娘和老支书热情诚恳地耐心规劝，拴保娘一片真心地拿着现烙的油饼赶来送行，等等，又不能不使她最后终于热泪滚滚地扑到了拴保娘怀里。这里，剧本虽然没有写銀环整个的改造过程（改造肯定是长期的，甚至还会有反复），但经过这场波折和“痛苦”的“磨擦”，人们相信，銀环是会重新下定决心，在朝阳沟里扎下根来，干出一番事业的。作者描写銀环的时候，既严肃地批判了她，又热情地写出了她的转变和进步；既表现了对青年自我改造的深厚关切，又令人相信青年经过教育和参加实际锻炼是可以逐步改造的。

《朝阳沟》是一出好戏。自一九五八年演出以来，深受群众欢迎。它提出并较好地解决了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即如何教育知识青年立志到农村中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知识青年在农村究竟应当怎样发挥他们的力量，施展他们的才能，《朝阳沟》还没有来得及表现。这与剧本所要描写的题材有关，我们是不能额外要求的。

现在，现实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可能，要求在舞台上进一步反映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如何大有作为，如何进一步地锻炼和改造自己。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这样的好戏。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8页。



红旗

HONGQI

7-8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七、八期合刊 ★

目 录

从实际出发，进行思想工作本刊评论员 (1)

评比是正确处理先进和落后矛盾的方法郭力军 (7)

根本问题在于“思想变样”张 凜 (12)

改旧创新李智威 (15)

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刘克林 (17)

杂 美帝国主义者的蠢语黄范章 (27)

评 美帝国主义者的又一堆蠢语龙 经 (34)

美国“调解人”的真面目丁 岱 (61)

伯恩斯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无聊伎俩长 贵 宝 钧 (40)

科学技术的中間試驗楊朝俶 (45)

試論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途径和步骤陶鼎来 (50)

☆ 四月二十日出版 ☆



从实际出发，进行思想工作

本刊评论员

从书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我们思想工作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四个第一”的原则，指出在处理思想工作中书本教育和活的思想教育的关系到时，要把进行活的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这里所说明的就是上述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从现实问题出发，不能从书本出发，不是从抽象的原理原则出发。

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十分丰富的。为了让大家便于具体了解解放军是怎样进行思想工作的，这里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解放军连队思想教育的十项经验。这些经验简单说来就是：

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这作为全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学习的根本方法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

二、从阶级教育入手，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作为一切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进行我党我军的传统教育。

三、从实际出发，抓好两头。这就是，一方面要及时传达和深入学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和上级的指示；另一方面，又要经常了解、调查部队各个单位在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和思想动态，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把领导和群众很好地结合起来，贯彻执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方针。

四、抓住苗头，把工作做在前面。这就是对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动向和可能发生的问题要有预见，善于抓住思想的苗头，及时进行工作。

五、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干部和战士的思想问题，一般说来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必须坚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用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方法，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

六、逐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人们的思想水平和觉悟程度是不可能一致的，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的差别。进行思想教育，要照顾多数，用使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办法，逐步引导他们达到先进的水平。

七、政治思想运动和经常性的教育相结合。既要重视一定时期进行的政治思想运动，又要抓紧日常的思想教育工作。

八、发动群众，人人做思想工作。使好人好事得到及时的反映和表扬，不良的倾向得到



及时揭露和纠正，发生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九、思想领先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要重视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又要注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在生活上关心他们。

十、运用活教材、活方法。这就是通过群众自己的切身经验，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实，表扬好人好事等等，来进行教育。

以上十项经验，集中地体现了一种精神，即从实际出发进行思想工作的精神。这些经验看起来平凡，但是，有的人却不会这样做。它们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思想工作中的具体化。部队的思想工作之所以进行得生动活泼、成效显著，是同这些经验的创造和系统运用分不开的。

我们思想工作的总的任务，是向干部和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①列宁曾经说过：我们“需要的不是没有生命的骨骼，而是活的生命。”^②列宁这里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是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又不断从实际中得到证明的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的。只是在把它同实际隔离开来的时候，才阻碍了它的应用和发展。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去宣传和学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使人掌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经描写过，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资产阶级的活动家、思想家如何面向现实，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他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许多人则两者并用。……书斋里的学者只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便是生怕烧坏了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③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尚且如此，尚且懂得自己的思想工作不能脱离实际。我们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作者、思想理论工作者，并且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真正科学的科学，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怎么能够抱理论脱离实际的庸人态度呢？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过两种互相对立的学习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④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60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85页。

③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页。



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結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从它找立場，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①

为了坚持思想工作的正确方向，毛澤东同志曾經同党内主观主义的不良学風——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的思想作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我們党内曾經出现过生搬硬套一些外国經驗的教条主义者，他們也提倡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他們看来，只要能够简单地背誦或者照抄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某些詞句，哪怕是对于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也可以解决一切問題。教条主义者也在口头上讲理論和实际联系，但是，他們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們并不去联系。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当前中国的实际缺乏兴趣，专门去作空洞的“理論”研究。为了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傾向，毛澤东同志提出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要注重研究現狀，注重研究历史，注重理論的应用。对于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問題为中心，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反对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于群众的宣傳工作，強調要言之有物，尊重事实，要采取为群众所喜聞乐見的形式；对宣傳的对象要作深入的調查研究，反对那种对于自己的宣傳对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乱讲一頓的作法。

同时，毛澤东同志还反对了党内經驗主义的傾向。有这种傾向的人，輕視理論学习，不懂得把实际問題提高到理論水平上，不注意从实际工作中找出規律性。他們往往被个别的現象所迷惑，或者只满足于自己的局部經驗。这是从另一方面犯了把理論同实际隔离的毛病。毛澤东同志指出，医治这种病症的办法，是要求这些同志认真学会用馬克思主义理論总结自己的經驗，使之带有条理性、綜合性，使自己具有比較完全的知識。

大家知道，上述两种主观主义的錯誤傾向，曾經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給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当着毛澤东同志領導我們党克服上述两种錯誤傾向，学会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去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問題，找出中国革命的規律性，按照中国社会的特点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且用来动员和组织中国人民的时候，我們的胜利就一个接着一个，終于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建立人民的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論滿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澤东同志的指导下，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結合起来，适应中国人民的需要，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中得到广泛的傳播，这无疑地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解放軍提倡的“带着問題学”，针对现实問題进行思想教育——这正是我党思想理論工作的光荣傳統。这种傳統，是我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我們处在一个新的

①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801頁。

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頁。



大变动的历史时代，处在一个新的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正是这种情况，使我们更有必要注意这一点，更有必要继续发扬这种传统。

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其所以说前无古人，这是由于我们奋斗的目标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崇高的，也是由于达到这个目标所要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革命运动，与过去的所有革命运动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能够给我们指出正确认识的方向，因而必须认真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寻求思想指南，但是，许多现实具体问题的具体结论，还是要靠我们进行独立的探讨。列宁说得好：“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有哪些阶级的力量；至于具体情况，实际情况，那只有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才能表明。”^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斗争把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迫使我们去思索，去寻求解答。例如：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什么特点？如何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势力的滋长和复辟？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进行分配？怎样处理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关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术和艺术？怎样促使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革命化？等等。

除了国内问题，大家知道，在世界范围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论战。现代修正主义者肆意歪曲世界现实，借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新条件”和“新特点”，企图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公然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究竟战后国际形势的新条件和新特点是什么？现代帝国主义有什么新特点，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否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是否像现代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能够决定世界命运？历史的一切经验证明究竟谁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在当代，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关系？世界革命的现状和前途是什么？应当怎样估计和对待当前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无数事实，是在继续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无比正确呢，还是证明它们已经过时了呢？现代修正主义的本质和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次大论战的性质和前途怎样？如此等等。

所有上述这些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都是每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接触到，并且同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密切有关的。各个部门的工作和斗争，群众的思想动态，有许多是围绕这些问题的展开，并且以这些问题为转移。对于这些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问题，我们的思想工作自然应当给予科学的回答。

^① 《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73页。



毛澤东同志說：“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規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問題。……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們要时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絶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①

我們必須在國內国际的实际斗争中，不断注意发展中提出的新課題，研究这些新課題，找出运动和各項工作的規律性，据以正确地制定指导斗争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各項具体的工作路綫和具体的政策。我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具体路綫和具体政策，就是行动中的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我們的思想工作的任务，就在善于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用毛澤东思想，用党的路綫和党的政策，来教育群众，說明当前各項重大問題，有步驟地开展实际斗争，引导群众前进。

当着我們用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去教育群众，并且貫徹执行的时候，是否可以不問具体情况，机械地宣讀和推行呢？不可以。这是因为，党的路綫和政策是从总结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群众实践經驗中产生的，它們同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比較起来，又是一般的东西。从群众中概括起来的東西，回到群众中去的时候，又必須从群众的实际情况出发，就是說，必須把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同各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的动态很好地結合起来，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群众的现实思想問題，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

社会大变动时期，实际生活是異常丰富、異常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到发生剧烈的变化，各种社会力量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組合。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群众不断地有新的創造，但也有些东西是許多人还不熟悉、不习惯的。不同阶级的人，对于党的路綫、方針、政策，有不同的反映，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問題。不仅是群众，干部也是这样。革命的干部队伍越来越广大，吸收进来的“新兵”越来越多，他們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也經常产生各种問題，甚至会发生某种动摇。而原有的“老兵”在新的形势下也会产生許多新的問題。我們的思想工作首先就是要面向这些实际問題，区别不同性质，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說明或者解决这些实际問題。解放軍連队的思想教育，在这方面提供了許多好的經驗。

实践总是走在前头的。正确的政策为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又会有新的問題产生，又需要我們到群众中去集中新的經驗，做出新的結論。以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为例。我們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規定的各項政策，正确地处理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在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方面又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逐步地深入地去認識。消灭剝削阶级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在改变生产資料所有制之后馬上結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村，在集体化以后的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必須組織貧农和下中农的队伍，作为我們在农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3頁。



村的依靠力量。所有这些实践經驗，毫无疑问，使我們党在各个方面的階級政策有了新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內容。而對於這些新內容的理論說明，當然會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在這方面有一個發展。如果我們不去注意實踐所提出的各種新的現實問題，不對這些問題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那末，我們的政策和理論就會落后，因而就會貽誤或者嚴重損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

毛澤東同志說過：“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①

所謂進行活的思想教育，就是說，我們的思想工作必須做到、滲透到這種反復進行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中去。這樣的思想工作，才是真正生動、活潑，並且富有成效的。

為了回答現實鬥爭提出的各種問題，總結實踐經驗，我們自然需要不斷地，隨時隨地向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請教，向毛澤東同志請教。所謂活學活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說，要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中，並且為着回答或解決這個過程中發生的具體問題，去學習和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樣地活學活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我們的許多同志已經有了習慣。在工作會議上，或者在平時，許多同志為了解決工作中所遇到的問題，總結工作經驗，常常有目的地閱讀或者反復地查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有關著作，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樣的閱讀，雖然每次讀的數量不算多，但是學得比較深透、有成績，能夠很快生效。因為這是為了應用而去學的，同時，通過應用能夠使體會加深。這種方法現在已經逐漸地被推廣到群眾中，特別是大量積極分子中間。他們為了更好地領會黨的政策，為了在工作中開動自己的腦筋，把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列為自己的重要任務。這無疑將進一步促進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發展。

解放軍的經驗證明，抓活的思想，帶着問題學，並不是就不能、或者不必要系統地學習理論。帶着問題學，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學習，只要有心，並且持之以恆，日積月累，就能夠逐漸達到有系統地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養成好學深思、鑽研理論的習慣。

提倡帶着問題學，並不排除系統地讀書。特別是負領導責任的高級幹部和做思想理論工作的同志，不但應當系統地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而且應當努力多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我們黨在歷史上各個關鍵時期，曾經不止一次地選定一批（幾本、十幾

①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1頁。



本)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組織干部比較系統地学习。最近, 又选定了几十本經典著作, 督促高級干部重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次的学习, 也是首先从解放军中的高級干部开始的。但是, 所有这些比較系統的学习, 都是为了适应国内国际现实斗争的需要, 在目前, 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 特别是为了适应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需要。这是在战斗中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有的放矢的学习。这种在战斗中学习的方法, 是理論和实际相联系的最好的方法。

上面所說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 本来是大家所知道的。解放军进行活的思想教育的經驗, 总的精神就是說明这一条。像这样为大家所熟知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来特別加以提倡呢?

問題在于, 为一般人熟知的原則, 也要不断提醒人們注意。理論脱离实际的习气, 在一定气候下是会滋长的。我們要求把思想工作摆在首要的地位, 但是, 如果思想工作不从实际出发, 犯脱离实际的毛病, 那么, 思想工作将不会有真正的切实的成效, 这也就是在实际上剝夺思想工作的重要地位。因此, 在这个問題上, 我們必須經常扫除灰尘, 經常洗臉, 以使我們的思想工作能够进一步适应人民的需要, 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评比是正确处理先进和落后矛盾的方法

· 郭力軍 ·

目前, 全国工业交通战綫和其他各个战綫正在广泛深入开展一个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落后的群众性运动。这是一个偉大的生产竞赛运动, 也是一个偉大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

评比是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首要环节。沒有评比, 便不能突出先进, 看出差距, 找出矛盾; 学就沒有榜样, 赶就沒有目标, 帮就无从着手。评比又是促进比学赶帮运动的一种方法和手段, 其目的在于把社会主义

革命事业和建設事业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领导评比活动, 同领导整个比学赶帮运动一样, 首先得以承认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差別性为前提, 以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为前提。世界上的事物, 本来就是极其复杂的, 千差万別的, 充滿着矛盾的。铁板一块、绝对同一的东西, 是不存在的。唯其如此, 事物和事物之間才可以作比較; 事物的特点, 才可以被認識。不但事物与事物之間有差別, 有矛



盾，每一个事物内部也有差别，有矛盾。统一物分裂为二，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例如，成绩和缺点、先进和落后、经验和教训等等的对立统一，不但存在于个人和个人、单位和单位、地区和地区之间，而且存在于每一个人、每一单位、每一地区内部。先进、中间和落后之分，是普遍存在的。而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也不是什么都好，总会有某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反之，后进的个人和单位，也不会光是缺点，一无长处。至于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个人和单位，那就更不用说了，总是成绩与缺点并存。不懂得这些，就不懂得辩证法。我们搞评比活动，就是在承认事物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去主动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承认矛盾的存在，只是找到了评比的基础，评比的根据。但是，到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评比方法，才能更全面、更彻底地揭露矛盾和更有效地解决矛盾呢？根据各地的经验，最好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全面评比，不仅重点地抓少数先进的典型，而且要大力地抓一般群众和一般单位。无论对先进、中间或后进的个人和单位，都需要采取两点论的方法，既看到其成绩的一面、积极的一面，也看到其缺点的一面、消极的一面；但都应当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这种方法之所以好，因为它把成绩和缺点、先进和落后、少数和多数的对立，看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样就大大地有利于开展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有利于化消极为

积极，使积极更积极，有利于矛盾的揭露和解决。

这种发动群众的评比方法，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和“抓两头”的领导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活生生的、创造性的运用。

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工作，承认先进和落后、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等等的对立统一，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仅停留在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上，还不是彻底的辩证法。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与形而上学彻底决裂，还必须看到矛盾的特殊性，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看到矛盾同一的相对性和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看到矛盾转化的可能和转化的条件，等等。

在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工作中，在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指导下，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总是次要的。所以在总结评比的时候，就要大力抓住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以表扬为主，引导群众大摆成绩、大摆进步、大摆经验，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成绩、进步、经验通通都摆出来，把所有的好人好事通通都评比出来，使人们大开眼界，大开心窍，先进的更加先进，后进的不甘落后，奋起直追。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激发广大群众的上进心。

表扬成绩与克服缺点，并不相悖，而是相成的。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既是表扬成绩的方法，也是有助于发现和纠正缺点的方法。成绩和缺点、先进和落后，既是对立的两极，那末，发扬了成绩，表扬了进步，缺点和落后的一面自然也就易于显示出



来了。当然，看到了别人的成绩和优点，还并不等于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所以在发扬别人的成绩和进步时，还必须对照自己的情况，进行认真的自我检查，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缺点，找出自己同别人的差距，并找到产生缺点和造成差距的原因所在。

当然，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大张旗鼓地表扬好人好事，可以启发群众自觉地去认识和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就是说，要让群众进行自我斗争，使每一个人自己鞭策自己，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

发扬和表扬那些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的先进事迹，总结和介绍他们的先进经验，不但可以推动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更加先进，而且更重要地是为了给一般群众和一般单位树立标兵，明确目标，以便向先进看齐，赶上和超过先进水平。

但是，对于一般群众和一般单位的功劳和成绩，也要实事求是的表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关键所在。一般群众和一般单位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把广大群众的零星的、点滴的经验搜集起来，加以总结和提高，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就会得出很多很好的经验。这样作不但对一般群众和一般单位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推动，对于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启发和推动。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也可以而且应当从一般群众和一般单位的成就和经验中学习那些有益

的东西，以之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经验，防止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同时，又可以从中知道应当如何帮助比自己落后的个人和单位，使他们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的经验，从而赶上先进。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群众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我们一切工作中的成绩，都是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来的。先进分子和英雄模范对革命事业有突出的贡献，他们在革命事业中起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他们有许多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成绩总不过是整个革命事业成就的一部分，而且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何况任何英雄模范，都只能从群众中来，只能是群众中的一分子，他们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英雄模范一旦脱离了群众，也就不能再成其为英雄模范了。毛泽东同志教导说：“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①，“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②他又教导那些英雄模范人物说：“你们有许多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页。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页。



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①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都教导我们不要把英雄模范和一般群众对立起来，不要把二者之间的差别、差距、矛盾看成僵死的、不变的东西。所以在开展评比活动中，也要表扬一般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普遍的相互评功表扬活动。

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创造了成绩、赢得了进步、取得了经验。我们只有放手发动群众，进行评比，才能把成绩和经验摆得准、摆得全。这种群众路线的评比方法，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乃是避免工作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有效方法，是具体地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科学的领导方法。所以群众性的评功摆好，对领导干部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它有助于克服领导干部平日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让群众亲自参加到评比活动中去，就能使他们真正地受到教育，受到鼓舞，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并使他们有可能根据亲身经验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正确地理解别人和别单位的经验，把别人和别单位的经验与本人和本单位的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通过评比活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上下之间的团结就会进一步加强。

群众性的评比方法，是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有意识地树立对立面，从而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的方法。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是

树立不起来的。所谓有意识地树立对立面，在评比中，就是把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加以揭露，使它反映到人们的意识中来，以便设法加以正确的解决，促使矛盾向着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方面转化。像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先进和落后、经验和教训这一类矛盾，只有强调发扬成绩、表扬先进、学习先进，才能掀起一个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性的竞赛热潮。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首先就要相互了解对方的长处，了解对方先进的地方。只有相互了解了对方的长处，发现自己的短处，才能找出先进和落后的差距，才能目标明确地赶，才能切切实实地帮。

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可以转化为先进，先进也可以转化为落后。在评比中实行群众性的评功摆好，那些后进的个人和单位，便会痛感有急起直追，向先进的个人和单位学习的必要，并下决心一定要赶上前去。事在人为，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经过主观的努力，他们就一定能够赶上先进，改变原来的落后面貌。而原来的先进人物和单位，如果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那就不但不能继续前进，而且有倒退的危险。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着重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

^①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3页。



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落后向先进转化的首要条件，是人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精神，是人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评比和整个比学赶帮运动，就是创造这种条件的先进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把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精神高度发扬起来，把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中，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并超过先进的，先进的不断进步，达到更加先进的水平，这是革命事业中大多数个人和单位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的一种表现。

先进的个人和单位，开始的时候总是少数。经过群众性的比学赶帮，先进的经验逐渐推广，逐渐为广大群众所掌握，于是大多数群众和单位都达到了先进的水平。在往后的发展中，这个为多数人和多数单位所达到的水平，又由少数个人和少数单位所突破，出现少数人和少数单位的更高的水平。在更进一步的发展中，这个更高的水平逐渐地又将为广大群众和多数单位所赶上。这种由先进的少数到先进的多数，又由更先进的少数到更先进的多数的转化，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每一个循环，都把社会的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一步。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生产部门中，总是有少数比较先进的生产者，他们采用着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定额。

随后，就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者学会了他们的技术，达到了他们的定额，直至最后，原来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生产水平就成为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社会生产就提高了。”^②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大量地存在着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其中，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又经常表现为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非对抗性的。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与解决对抗性的矛盾的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绝不能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而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③。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④。评比竞赛、比学赶帮，是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正确处理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促使先进的个人和单位更加先进，落后的个人和单位在先进的带动和自己的努力下，赶上先进，造成一个你追我赶、你帮我学的群众性的生产竞赛热潮，促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② 1956年4月30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的祝词。

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页。



根本问题在于“思想变样”

· 張 凜 ·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人民公社大寨生产大队，是太行山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变山区面貌的一面红旗。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曾用一句既简单又形象的话概括他们的经验是“三变样”：一是土地变样，一是技术变样，一是思想变样。

土地，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原来石多土薄的坡地，变成了梯田；干河滩，变成了肥沃的良田；零星的地块，变成了大地块；低产，变成了高产。

技术，经过反复摸索、试验，新的逐渐代替了旧的。合理密植，改良品种，施肥，深耕、深刨、深种，间作混作等等新的增产措施，一项一项地被采用了。人们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和掌握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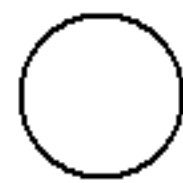
思想，经过党的教育，经过阶级斗争，经过生产实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旺盛的革命精神，充沛的革命干劲，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和社会主义新风尚，逐步代替着小农经济时代留下的落后、保守、涣散和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旧习惯。

总而言之，一个在解放前曾经是入穷、地穷的落后小山庄，如今变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大寨的“三变样”的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

把旧时代落后的农村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确实需要像大寨那样做到“三变样”。不变是绝对不行的。但是，“三变样”说起来似乎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要做到“三变样”，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而实现土地变样、技术变样，根本问题还在于思想变样。正如陈永贵同志所说的：“三变样，首先要思想变。思想变不了，土地、技术都不好变。”“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技术，没有新技术，就没有新产量。”思想是统帅，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没有革命的思想，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大寨提供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

思想变样，是说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的头脑，使农民逐步摆脱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让农民懂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陈永贵同志说得很好，“千为百为，为的是社会主义”。如果农民从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小私有者的狭隘天地里解放出来，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意识，他们就能依靠集体力量，创造出奇迹。



毛泽东同志在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曾经指出：“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①在小农经济过渡到集体经济以后，农村在继续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仍然是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使革命和建设取得新的胜利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陈永贵同志所说的思想变样，实际上就是使农民具有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种社会主义精神，以它为一切实言行动的准则。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们开辟了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但是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人的主观努力。人的积极性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关键在于是否掌握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任何忽视，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阵地的加强。大寨在各方面能够取得出色的成绩，归根到底，是因为那里的党支部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坚持实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原则，做好改造人的思想的工作，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贯穿在劳动中，生活中，斗争中。

就拿使土地变样来说，大寨的社员并不是一开始就都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的。最初，当党支部提出治坡的计划时，有一些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坡地很陡，用工很多，打粮食

又少，粮食价格不高，不如去做买卖。于是，党支部召开了贫农、下中农会议，讨论做买卖对，还是整修土地对的问题。经过讨论和党支部为此进行的一系列的思想工作，人们才一致认识到治坡是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百年大计，而棄农经商，无论对社员、集体和国家都不利。

使技术变样，也是一样。首先要破除保留在农民头脑中的陈旧的观点，让他们了解实行技术改革的重要意义，才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开头，大寨的社员对技术改革这件事并不怎么积极。他们还习惯于用个体经营小块土地的办法来对待集体生产。有人说，“种地没有什么技术”，“种地没巧，上粪就好”。要扭转这种认识，不只要说，而且要做。于是干部带头种试验田。党支部书记有试验田，大队长也有试验田；生产队长有试验田，社员也有试验田。试验田也有多种多样，有坡地的试验田，有沟地的试验田，有梁地的试验田。在这些试验田里，他们作各种各样的试验，试验密植，试验新品种，试验施肥，试验深耕、深刨、深种，试验间作混作，如此等等。总之，凡是采用一种新的增产技术，都要先作试验。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直到成功，才逐步地说服了群众。经过示范、说服、教育，大寨的群众已经了解，要巩固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改变落后面貌，必须实行技术改革的道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寨大队的党组

^① 《严重的教训》一文接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124页。



織無論領導群眾整修土地或改革耕作技術，都貫穿着一个精神，就是通过一件一件具体事例，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农民，使他們懂得他們的所做所为，是为了社員的个人利益，也是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以至全世界的革命利益。一句話，是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有了建設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决心，还要有建設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徑和方法。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偉大的科学事业。它本身具有不为人們主观意志所左右的客观規律。要使建設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实现，必須認識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經濟发展的客观規律。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在这个問題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在社会主义社会經濟发展的客观規律和我們主观認識之間是存在着矛盾的。同时，这个矛盾，也表现为人和人之間的矛盾，即比較正确地反映客观規律的一些人和比較不正確地反映客观規律的一些人之間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原来文化和科学基础薄弱的农村，自然更为突出。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大寨的經驗证明，必須在实践中去解决，必須要有科学的态度，通过不断地学习、試驗、探求，使人們的認識能够逐步地比較正确地反映客观規律。他們做到使土地变样，使技术变样，正是經歷了和繼續在經歷着这一艰巨的体察本地的自然和經濟情况，逐步認識社会主义农业大生产的客观規律的过程。大寨的經驗可貴之处，就在于那里的党組織不光是教育农民要

抱定建設社会主义的决心，还通过不倦的实践，逐步提高农民的認識能力，使他們一步一步地認識和掌握建設社会主义的方法。这說明，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民，使农民的思想变样，除了使他們具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以外，还要使他們具有自觉的而不是盲目的，能够比較正确地反映客观規律的建設社会主义的行动。如果只注意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也难以达到建設社会主义预期的目的。

自然，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改造农民，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特别是长期处于小私有者地位的农民，彻底改变世界观，更需要經過經久不懈的日积月累的思想政治工作，經過具体的階級斗争和向自然界的斗争。因此，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也就是领导农民改造精神世界的过程。然而，在这个漫长的改造农民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怎样做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的問題。大寨提供的成功的經驗，就是党組織坚决执行依靠貧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的階級路綫。在一切日常工作中是这样，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也是这样。貧农、下中农，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依靠他們，就可以带动、影响其他群众。大寨的社員用一个朴素的比喻來說明貧农、下中农在农村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說，集体經濟好比“千里馬”，貧农、下中农好比“千里人”；有了“千里馬”，还要有“千里人”。这句話道出了一条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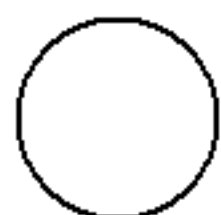


改造农民的思想，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大寨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做到“三变样”，正是他们事事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的结果。

改造思想，是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在解决了思想领域中旧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继续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

又不断解决，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也是思想发展的辩证规律。把农民的旧思想改造为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新思想，从大寨解放十多年的历史来看，不过刚刚走完了一小段路程。随着时代的进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将更高。大寨在已有的基础上，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改 旧 创 新



李 智 盛

设备陈旧的小厂，经过技术革新，在产品品质上，能否赶上设备现代化的大厂？

上海中工交通器材厂的事例做了肯定的答复。

中工交通器材厂是专门生产汽车和拖拉机用的重要配件轴瓦的。他们的设备陈旧，没有加工轴瓦的拉床，轴瓦的质量总是赶不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此，他们曾经想买拉床，用增添新设备的办法来提高产品质量。但是，这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设备陈旧的小厂来说，是不现实，行不通的。

他们选择了另外一种办法：从自己的现有条件出发，进行技术革新。有了这种办法以后，从厂长、技师到工人，经过一段相当紧张艰苦的工作，终于在已经使用过四十多

年的陈旧机床上，制成了独具风格的刮削机。这种刮削机的工本费很低，一台合一千元，只为拉床价值的二十分之一，用它生产的轴瓦，在质量上已经全面赶上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我们可以从中工交通器材厂的成就中，得到许多启发。

发展我国工业，没有疑问是需要建设完全现代化装备的新工厂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同时，也需要像中工交通器材厂那样，改造陈旧设备，使之成为技术先进的工厂。目前我国拥有大量的像中工交通器材厂这样设备陈旧的小厂，工业产品，特别是日用工业品，相当大的一部分，还要靠它们来生产。这类工厂如果能够像中工交通器材厂



一样，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陈旧设备进行技术革新，使之生产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产品，就能够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

其次，通过对设备陈旧的小厂的技术革新，还可以吸引广大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参加技术革新运动，使他们得到更好的技术锻炼。这对增强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革新工业技术，有时候需要设备更新，即用新设备更换旧设备；有时候不需要设备更新，而是把旧设备改造成一种技术更高的设备。两种办法都很重要。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用新工厂代替旧工厂，用新设备把旧设备统统换掉。经常的、主要的、大量的技术革新，还是对陈旧设备的改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目前以至相当长的时期内缺乏技术装备的国家，更是需要加强对陈旧设备的技术改造。

设备陈旧的小厂，经过技术革新，不仅能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而且能够相应地积累起更多的资金，为发展新工厂、增添新设备，从而促进企业的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对设备进行技术革新，不仅像中工交通器材厂这样的小厂是需要的，就是那些拥有现代化设备的大工厂，同样也是需要的。现代化设备的寿命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今天的现代化设备，如果不进行技术革新，明天就会变成陈旧的设备。要使设备能够经常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就必须经常地根据技术发展的需要来进行革新。

再说，很多新技术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对旧设备革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对旧设备进行技术革新，也是发展新技术的一个途径。

对陈旧设备进行技术革新，最主要的是要有勇于革新、勇于创造和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并且将这种精神同扎扎实实的科学分析、科学试验的态度结合起来，用革命精神去掌握科学技术。中工交通器材厂职工的革命干劲是十足的，他们不是无计划无目标地只鼓虚劲，而是把干劲用到生产上，把干劲用在科学分析和科学实验上。例如：他们对本厂生产的轴瓦进行了全面的质量分析，找到了影响质量的三大关键问题和八个其他问题；他们在解决合金浇铸问题时，对厂里原来采用的离心浇铸工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们在进行刨制刮削机以前，对拉床的加工原理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在画制刮削机的草图时，进行了几十次的修改；他们在制造浇铸机的时候，进行了三百五十多次的试验。正因为他们“把好钢使在了刀刃上”，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可见，对设备陈旧的小厂进行技术革新，是大有作为的。问题是既要有革新精神，又要有科学精神。有了革新精神，才能从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出发，敢于改旧创新，为技术革新冲出一条路来；有了科学精神，才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锲而不舍，反复试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一点，也正是中工交通器材厂可贵的和值得学习的地方。



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 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

刘克林

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的一个光辉的典范。

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用所谓“特种战争”奴役越南南方人民的恶毒的计划。现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已经光复了四分之三的国土，解放了二分之一的人民，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则愈来愈深地陷入了越南南方人民的包围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彻底的失败。

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

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参加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并且擅自把越南南方置于东南亚侵略集团的“保护”之下，扶植吴庭艳傀儡政权，镇压越南南方人民，阻挠越南和平统一。

肯尼迪政府大规模地对越南南方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在西贡设立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发动了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

在肯尼迪死后就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南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三年以前，他曾前往越南南方，和吴庭艳集团制定了全面控制和奴役越南南方人民的“八点措施”。他在去年十一月上台以后，加紧策划扩大侵略战争的部署，一再指令盘踞越南南方的美国侵略军继续“执行肯尼迪的既定计划”，“加快军事行动的步伐”；并且多次派出包括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内的军政头目到越南南方“检查局势”，叫嚷“一定要打赢”这场肮脏的战争。

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灭绝人性的“特种战争”，是美帝国主义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

侵略印度支那，阻挠越南统一，对越南人民进行反革命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一贯政策。

杜鲁门政府积极插手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支那发动的殖民战争，企图取法国殖民



的一个重要步骤。肯尼迪在一九六一年公开说，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半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这些正在兴起的国家的人民的国土上”。越南南方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心目中的“大战场”中的一个突出的战线。

美帝国主义疯狂地进行侵略越南南方的战争，主要是为了达到以下的目的：

第一，要把越南南方当做美国的新殖民地，当做美国控制和掠夺整个印度支那的跳板。

对于印度支那的资源和市场，美帝国主义垂涎已久。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在向美国各州州长的讲话中说过，如果美国失去印度支那，也就失去了东南亚，美国“所极为珍视的从那个地区运来的锡和钨将不再来”。美国《纽约时报》也曾赤裸裸地说道：“印度支那是值得大赌一下的对象。北部有可以输出的锡、钨、锌、锰、煤、木材和大米，南部有大米、橡胶、茶叶、胡椒、牲畜、牛羊皮等等。”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一步一步地排挤了法国的势力，建立了一个内容是新型殖民地、形式是假独立的社会，使越南南方沦为美国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

第二，要把越南南方当做美国在亚洲威胁和进攻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基地，当做颠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进而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桥头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军事包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和侵略活动，从东方威胁和准备进攻社会主义阵营，是战后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中

心。自从杜鲁门政府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用武力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加紧对印度支那进行干涉以来，南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就一直是美帝国主义对准中国人民的三个基地。

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摆的仍然是这样一个阵势。一九六二年二月，美帝国主义在西贡设立军事援助司令部，一方面是为了对越南南方人民进行“特种战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同美国驻在南朝鲜、日本、冲绳和台湾的侵略军相呼应，企图构成完整的远东军事侵略体系，加紧威胁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亚洲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要把越南南方当做美国在东南亚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威胁和准备进攻新独立国家的一个战略要地。

美帝国主义向来重视越南南方的战略地位。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越南南方“控制了东南亚冠状动脉的湄公河口，并且构成南中国海的一个海岸，拥有前往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通道”，它不仅是进攻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哨”，而且是守住美国在东南亚的侵略阵地的“关键”。

美国统治集团懂得，如果他们不能在越南南方保持侵略阵地，撑住傀儡政权，势将在整个东南亚产生“连锁作用”，它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就要上崩瓦解。肯尼迪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在南越以及在泰国退却的话，那就可能意味着整个地区陷于崩溃”。约翰逊也一再叫嚷，美国“必须呆在那里”，美国“不退出东南亚”。

第四，要把越南南方当做美国进行“特种战争”的试验场。



为了镇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到处发动“特种战争”。美国统治集团迫不及待地要从他们在越南南方进行的“特种战争”中积累进行反革命战争的经验，以便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去。

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供认，美国侵略军在南越“一方面协助组织和训练当地部队，另一方面获得反游击战的实际经验”。南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团长提姆斯说得更露骨：“我们在这里的军事顾问获得了美国未来需要在其他地方作战的关于这种战争的第一手知识，从他们的经验，我们创立了我们自己的进行常规战争的学说。这是学习渗透、伏击、反伏击和夜间巡逻的技术的实验室”。据美、英报纸透露，美国政府不仅派遣大批人员在越南南方专门负责总结“特种战争”的经验，而且轮番派遣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人员到越南南方“实习”。

但是，所有这一切阴险恶毒的计划，只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历史的进程表明，事态并没有顺着美国侵略者的主观愿望发展，而是日益加速地走向它的反面。

二

列宁一再论述过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真理。他说，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施行残酷的虐待和各式各样的剥削，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①。越南南方人民的

反美爱国武装斗争，又一次证明了这个千真万确的论断。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达成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履行了包括停火、军事部队的转移和集结等条款在内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并且一贯为实现日内瓦协议关于保证越南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而奋斗。日内瓦协议规定，越南应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以前举行全国自由普选，以实现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为了促进全国普选的举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曾经多次发表声明和写信给南越当局，建议双方协商。但是，南越伪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悍然拒绝一切合理建议，并且在一九五六年三月非法举行假选举，从而阻塞了和平统一的道路。

越南南方人民，为了争取实现日内瓦协议、和平统一祖国，也曾经多次开展和平的、合法的斗争。在西贡以及越南南方的许多城镇和乡村，先后爆发过要求南北协商、举行普选和抵制吴庭艳集团玩弄伪选的示威游行、罢工和罢市。但是，这些正义的行动都遭到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

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还打着“反共”的幌子，开展所谓“诉共”、“灭共”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恐怖政策，对数以万计的爱国人民横加逮捕、监禁、拷打和杀戮，甚至以火烧、肢解等酷刑，灭绝人性地折磨和杀害前抗战人员。据不完全的统计，在截至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九年期間，被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杀死的南越和平居民有十五万六千多人，被逮捕和打伤的有六十七万二千人。此外，还

^①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05页。



有一千多个监狱囚禁了三十七万人。

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革命武装镇压、奴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出路何在呢？

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平共处，等待这些现代化的食人生番改变吃人的本性而大发善心吗？期待着联合国或者什么其他的慈善机关通过一纸决议，来解除侵略者的武装吗？越南南方人民懂得，这样做，就是永远忍受水深火热的奴隶生活，永远忍受祖国的分裂。

仅仅把斗争局限在和平的、合法的范围内，继续赤手空拳地在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前争取独立和自由吗？越南南方人民懂得，这样做，根本不可能动摇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不可能驱逐美国侵略者，而只会永远置身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遭受越来越惨痛的牺牲。

越南南方人民从自己切身的血泪经验中深刻地认识到：要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争取全民族的解放，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除了拿起武器坚决斗争，别无任何出路。正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所正确指出的：“我们要拿起武器，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残酷镇压下，忍无可忍的越南南方人民，终于拿起了弓箭和长矛，依托着祖国的高山和密林，从西原山区到湄公河三角洲，到处燃起了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的烽火。越南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壮丽史诗，从此揭开了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这个在斗争烈火中诞生的组织，

是越南南方人民团结战斗的旗帜，它面对着残暴的敌人，肩负着人民的希望，紧紧地团结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的宗教徒和一切爱国的力量，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把越南南方的民族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正确领导下，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节节胜利，越战越强。三年多以来，这支人民武装一共歼灭了包括一千多名美国侵略者在内的敌军十七万多名，缴获各种武器三万多件，击毁击伤敌机八百六十多架，击沉击伤战船五百三十多艘，击毁军用卡车一千多辆。现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已经强大到能够挫败大于自己兵力十倍的敌人的“扫荡”，能够成批地拔除敌人的据点，并且能够在平原地区同敌人作战和主动出击敌人的防御阵地。

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正确领导下，越南南方人民粉碎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战略村的国策”。美国侵略者和吴庭艳集团在越南南方强行建立的“战略村”，已经有百分之七十被捣毁。被解放了的三千九百个“战略村”，大部分已经改建为人民的战斗乡。

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正确领导下，越南南方人民建立了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解放区，迫使敌人龟缩在少数城市和交通沿线，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利形势。

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敌占区的广大人民也风起云涌地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从各个方面打击和削弱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人民武装的斗争，开辟了震撼敌人心脏的强大的



第二战场。

越南南方人民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说明，哪里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侵略和压迫，哪里就一定有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哪里的侵略和压迫越残酷，哪里的反抗和斗争也就越强烈。世界上真正强大和无敌的，并不是外强中干的、腐朽的帝国主义力量，而是觉醒了的、团结起来坚持革命斗争的、新生的人民力量。

现在，越南南方人民在“一切为了杀敌，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战斗口号鼓舞下，正在乘胜前进，为争取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而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三

越南南方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根本原理的无限生命力，大大地丰富了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经验宝库。

美帝国主义是当代最凶恶的侵略者。它在越南南方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在军事上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以最精锐的现代化武器和各种所谓“新战术”来进行的。

在这里，美帝国主义出动了二万多名侵略军，豢养着和装备着五十多万人的反革命雇佣军。

在这里，美帝国主义每天消耗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的战费。

在这里，美帝国主义使用了核武器以外的各种新式武器，甚至对和平居民进行化学战。为了对付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和镇压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陆军当局以三万五千名科学人员、五十三个机关、五百五十所企业和学校，花费十三亿美元，进行四千

五百项研究工作，来发展从直升飞机到“装甲靴”等各种新式武器和装备。

在这里，美帝国主义集中地运用了德、意、日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奴役和残杀各国人民的经验，美、英帝国主义在战后初期扼杀希腊人民革命运动的经验，英帝国主义镇压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镇压菲律宾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及法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争的经验。

在这里，美帝国主义还企图把一千多万越南南方农民关进围绕铁丝网和碉堡的“战略村”，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监狱。

但是，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非但没有吓倒久经考验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反而在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面前清楚地暴露了它自己外强中干的本质。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已看到：

约翰逊——吴庭艳联合公报提出的“八项措施”，并没有能够阻挠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所谓“十八个月平定南越”的“斯特利—泰勒计划”，还不到十八个月就已经宣告彻底破产。

喧嚣一时的“直升飞机空运战术”和“水陆装甲车运进战术”等等，早已成为举世讥讽的笑柄。

僕僕風尘的美国将领，频频举行的美国军政要员檀香山会议，始终不能制订出一个挽回美国在越南南方的败局的有效方案。在美国侵略军直接参战的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歼灭敌军的数字比一九六一年大大增长了。



曾经被宣扬为“游击战专家”和“战略村”的积极鼓吹者的美国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以及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参谋长理查德·威德，由于美国侵略越南南方战争的节节失利，先后被当作替罪羊，一个被撵出国务院，一个被调回华盛顿。

越南南方人民的英勇斗争，打掉了狂妄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的气焰。继肯尼迪、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之后，约翰逊现在也发出了哀鸣：“我们在南越的处境十分困难”。美国的报纸和通讯社干脆宣告：美国在越南南方发动的这场战争的前景“要多糟有多糟”，根本就没有胜利的希望。正如一个法国军事专家所说的，美国人不过是在重蹈法国殖民军悲惨失败的覆辙而已。

泥足的美国巨人，带着他们的各种新式武器，拖着他们的新旧傀儡，正在日深一日地陷入了越南南方人民愤怒的重围之中。

为什么不久以前还在吹嘘“特种战争”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美帝国主义者，今天却忧心忡忡地哀号它在越南南方“走进了死胡同”，“面临着真正的溃败”，并且已经“达到绝望的阶段”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所面对着的，是觉醒了的、站立起来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人民，是得到全体进步人类坚决支持的英雄人民。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侵略者的任何强大的暴力、凶恶的武器和毒辣的阴谋终究是不能得逞的。

越南南方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的反美爱国自卫武装斗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和争取祖国的重新统一，而且是为了打击和削弱

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头号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这对于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争取祖国光明前途的伟大抱负和促进世界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崇高理想，鼓舞着越南南方人民抛头颅，洒热血，排除万难，英勇战斗。

越南南方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着长期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有着抗击美国侵略者的丰富经验。他们清楚地知道，对付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对于反革命的武装镇压，必须还之以革命的武装斗争；面对着手里拿着刀的敌人，自己也必须拿起刀来。越南南方人民自卫武装斗争的胜利，再一次有力地证明，在帝国主义的武装镇压和侵略面前，武装斗争是被压迫民族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可靠的道路。

越南南方人民在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克服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险阻，经历了种种严酷的考验。他们始终坚信，自己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敌人的嚣张也只是暂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在表面上的悬殊，终将朝着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正是因为越南南方人民坚定不移地掌握了这一个斗争规律，他们才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遭受了挫折以后重新投入英勇的战斗，从而不断地取得伟大的胜利，为一切被压迫民族树立了一个永不后退、永不屈服、永远焕发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光辉榜样。

第二，美帝国主义尽管拥有最精锐的杀人武器和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但是它永远也不懂得，决定战争胜负的，归根到底是人，而



不是武器；是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而不是什么直升飞机和水陆装甲车。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而绝不是决定的因素。力量对比不但是军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战争的规律，军事技术发展和使用的规律，只能服从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顺从反动阶级的狂妄幻想。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论述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时曾经指出：“尽管这些民族非常弱小，尽管欧洲压迫者在斗争中运用了最优良的武器和战术，似乎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一旦把千百万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真正唤醒，就会有极大的本领，就能创造奇迹。”^①

列宁的科学论断，在今天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中，再一次得到了光辉的证实。

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最初所依靠的只是大刀、长矛、弓箭和土枪这些极其简陋的武器，但是，他们以坚强的意志、英勇的搏斗和无穷的智慧，在广大人民的支援下，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掌握各种新式武器的敌人，并且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把成千上万件美国武器夺取过来，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就连美国侵略者也不能不承认，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由于“缴获大批美造武器”，“建立起了规模惊人的现代化武器的武器库”，“我们是在向作战双方供应物资”。

武器一旦掌握在革命的人民的手中，它就会发挥出无比强大的威力，人民就会进一步提高作战技术，给予敌人越来越沉重的打击。“直升飞机空运战术”曾经是美帝国主义

大吹大擂的一张王牌，美帝国主义者曾经认为这种战术会“使反共军队对游击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是人民武装“最害怕的东西”。但是，结果又是怎样的呢？美联社早已报道，侵略越南南方的几乎全部美国直升飞机，至少都曾经被地面炮火击中过一次。

美国侵略者一再想从人民武装的战略战术中寻找致胜的秘诀，但是，这同样是痴心妄想。据美联社报道，“美国顾问一直强调游击战的价值”，要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的战略战术来打败对方，但是，“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的努力看来并没有产生效果”。

事情很明白。尽管人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反动派永远不能掌握这些规律。其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经验时所说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②。

精锐的武器和各种各样的所谓“新战术”，帮不了美帝国主义的忙；反动武装在人数上的优势，也同样不能为美帝国主义挽回败局。尽管美帝国主义为傀儡政权训练和装备了数十万人的反革命武装，但是，这批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和“几乎不想使用两条腿”的雇佣军，丝毫也阻挡不了人民武装的节节胜利。成千上万的伪军，因为不愿在这场不得人心和没有希望的战争中为外国侵略者白白送死，成批地开小差或向人民武装投诚。

① 《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31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8页。



三年多以来，向人民武装投诚的伪军就有九万多名，他们还帮助人民武装拔除了五百多个敌军的碉堡和哨所。

一连串的失败宣告了美国侵略者“唯武器论”的彻底破产。《纽约时报》军事评论员鲍德温承认：“直升飞机不能代替人”；“不管武器有多么好，也只能起帮助和辅助的作用而已，不能替代战场上的使用两条腿和手拿步枪的士兵”。《华尔街日报》哀叹：“尽管美国有它的一切军事力量，仍有一些事情无能为力”。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南方战场上的失败，再一次告诉人们，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是完全可以被打败的。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新式武器，只能吓倒那些害了软骨病的凡夫俗子，永远也吓不倒坚决革命的人民。

第三，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卫武装斗争，是一场全民性的伟大斗争。越南南方人民武装自始至终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这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胜极其凶恶残暴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爱国武装斗争，是一场以全民为动力、由人民自己来进行的全民全面长期抗战。在这场斗争中，人民群众充分地利用了自己所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高度地发挥了创造性，采取了丰富多样的斗争形式，从各方面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

由越南南方人民优秀的子弟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是一支来自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的人民子弟兵。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保卫者，人

民群众是他们的支持者。军民之间的关系是相依相存的鱼水关系。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正是从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中汲取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不断地壮大自己，不断地打败敌人。

在已经解放了的大片国土上，越南南方人民已经组织起来，自行管理自己的生活，大大加强了发展生产和支援自卫战争的积极性。由于有了这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武装在和敌人的斗争中，就有了最可靠的依托，他们就能够顺利地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以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目的。

在敌人的后方和敌我战线犬牙交错的地区，人民武装同广大人民密切配合，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从各条战线上打击和削弱敌人。越南南方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但是，一九六一年头十一个月，整个越南南方就有二千七百万人次投入了各种形式的反美爱国群众斗争。一九六二年全年，参加粉碎“战略村”斗争的就达一千万人次。一九六三年，越南南方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人数更大大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的中心西贡，为了反对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和对佛教徒的迫害，就有七十万人举行了大示威，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人民群众的深度和广度，都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这就使越南南方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美帝国主义在“特种战争”的形式下推行的侵略战争。越南南方人民这种以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斗争，是新型游击战争的范例。



美国侵略者已经尝到了深深地陷于越南南方人民重重包围之中的痛苦滋味。许多美国报刊、通讯社和官方的调查报告无可奈何地承认，南越农村大多数人是站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一边的，“南越农村的任何地方，政府的控制只是名义上的”。他们绝望地惊呼，他们在越南南方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非常困难的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对看不见的敌人进行的战争。遍地都是敌人，而同时又哪里都没有敌人”。

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这种越来越孤立的处境，在看不到尽头的地道里找到一条出路，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撤换走狗上面。肯尼迪在去年九月二日说：“如果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变人员，它就能重新得到人民的支持。我认为，如果它不作这种改变，赢得这场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两个月以后，美国就动手来实现它所期望的改变，并且杀掉了不中用的走狗吴庭艳兄弟。

但是，肯尼迪至死也没有懂得，任何反动派及其反革命雇佣军，其特点就是脱离人民，坚决与人民为敌，因此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坚决反对。这是美帝国主义策动任何军事政变、更换任何走狗所绝对不能改变的。事实证明，美帝国主义杀死吴庭艳兄弟，丝毫也没有能够为它增加一点“赢得这场战争的可能性”，反而遭到越南南方人民更沉重的打击。约翰逊继续更换走狗和加紧军事侵略，也同样不能挽救“更加恶化的局势”。情况正如美国《民族》周刊所承认的那样：虽然美国还在“继续追求胜利，而胜利却在以同样的速度离开它们”。

四

越南南方人民的伟大斗争和光辉胜利，对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胡志明主席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越南第一次特别政治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所说：“美国在越南南方正在试验的‘特种战争’遭到失败，那么，它们不论在任何地方都要遭到失败。这是我国南方人民的爱国斗争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意义。”

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永远把越南南方当做新型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迷梦，捍卫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北方——越南革命的基地。

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沉重地打击和有力地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打乱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部署，大大有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鼓舞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特别是东南亚被压迫民族奋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意志，为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正确方向和胜利道路。

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混乱。几个月以来，约翰逊政府的满朝文武一直在为美国的着着失利而争吵不休。但是，所有这些争吵丝毫也不能改变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南方的颓势。

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吴庭艳兄弟死于他们的



美国主子之手，不能不加深一切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美帝国主义的疑惧和不满。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至死不变的逻辑。美帝国主义不会轻易放弃它在越南南方的殖民统治，不会轻易放弃它心目中的这一个“关键”地区，它必然还要进行绝望的挣扎。在越南南方人民面前，还有着长期艰苦的、但是必然胜利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在两次策动了西贡军事政变以后，正在驱使它的新走狗，加紧在越南南方进行反革命战争，并且叫嚷要把侵略战火扩大到越南北部。越南民主共和国外长春水已经向美国侵略者提出警告：“如果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竟轻率地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必须对自己的罪恶行动的严重后果负全部责任。”我国陈毅外长在致春水外长的复电中，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严正立场表示完全支持。

中国人民一贯地、坚决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的神圣斗争，一贯地、坚决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而斗争的严正立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呼吁“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中国人民一贯把越南南方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看做是全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坚决反对对这一斗争采取泼冷水和贬低其世界性意义的消极态度，坚决反对以牺牲越南南方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来同美帝国主义作交易的卑鄙行径。不管世界上出现什么样的乌云和风暴，中国人民永远同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站在一起，同全体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斗争到底。

尽管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越南南方还会进行疯狂的挣扎，尽管在越南南方人民英勇斗争的道路上还会出现这样的或那样的困难，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斗争，胜利地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已经严正宣告：“南方人民始终如一的态度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什么时候这一神圣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南方人民就不会放下枪杆子，抗战就要继续进行”。

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体越南人民是他们的强大后盾。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民站在他们的一边。他们已经得到还将继续得到全体进步人类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完全相信，美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坚持斗争的越南南方人民，从谅山到金甌角的越南大好山河一定能够重新统一，三千万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在独立、统一的祖国的旗帜下重新欢聚。



美帝国主义的囃語

黄范章

美帝国主义正在越来越走下坡路。壟斷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在世界人民革命浪潮面前，恐慌万状，发出种种囃語。

《資本家宣言》一书，就是其中的一种。

写这本书的两个人，一个是資本家，一个是教授。他們在对資本主义提出廉价“責难”的烟幕下，鼓吹什么“資本主义革命”，散布一种所謂“公正的資本主义”的幻想。

什么是他們所謂的“資本主义革命”呢？这就是不廢除“資本私有权”，通过扩大股份占有来“分散資本私有权”，不消灭資產階級，把劳动者变成“資本家”，据說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公正的資本主义”。在这个異想天开的社会里，将实现“經濟公平原則”，“人人都是資本家”，物质生产完全或基本上由自动化机器担任。

这是一本对垂死的資本主义制度进行辯护的书。像这样卑鄙无聊的东西，竟然公之于世，真是黔驴技穷了。

賊喊捉賊

这两个資本主义的辯护士假惺惺地說，无论是十九世紀的英国，或者是現代的美国，都存在着貧困与失业的“根源”，但是，

“苦难的根源不是資本私有权，而是資本私有权的高度集中”。

为什么劳动人民“苦难的根源”在于資本的“高度集中”呢？他們說，这是因为資本（他們所說的資本是指机器）和劳动一样都是财富的生产者，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資本对生产的“貢獻”越来越大，而劳动对生产的貢獻越来越小，因而，在貫徹所謂按“貢獻”領取收入的“公平分配原則”的情形下，只靠劳动謀生的劳动者，自然日益遭到貧困和失业的境遇。据說这是十九世紀的情况。他們还說，正是由于貧困的根源在于資本的“高度集中”，在当今美国，只是仰賴“不公平”的分配办法，“生产不到百分之十的財富”的劳动群众，分得了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劳动群众仰賴資本家的“施舍”已經摆脱貧困。他們胡說什么劳动人民是靠“剝削”資本家过活的。

中国有句俗語：“賊喊捉賊”。資產階級的辯护士們用的，正是这种伎倆。

所謂“苦难的根源”在于資本集中而与資本主义私有制“无关”的謬論，实际上，是把資本家的富有，归功于虛构的“資本生产力”，把貧困和失业，最終归咎于劳动的“日



益无用”，把劳资的对立，歪曲为劳动者和机器的对立。

馬克思早已科学地证明，机器本来不是資本，只是在資本家用它来榨取雇佣劳动时才成为資本；劳动者的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它在創造新价值的同时，保存了旧价值；作为劳动产物的机器，只会轉移它原有的旧价值，决不能創造新价值。因此，貧困和失业的根源不在于机器，而在于机器的資本主义使用，在于以資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剝削关系，正是这种剝削关系，使得資本的剝削，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而越发加重，使得劳动人民随着自己生产得越多，而越发陷于失业和貧困。

美国的现实，也完全证实了馬克思的科学原理的正确，戳穿了《資本家宣言》作者的謊言。据統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技术的推行，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較之战前提高了，但是，劳动人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却縮小了，从一九三〇年的百分之五十五降至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五十和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二；同时，长期慢性的失业問題日益严重，据美国官方統計，目前仍有四百多万工人失业。

明明是劳动者創造了巨大的社会財富，他們却捏造、渲染什么“資本生产力”；明明是資本家剝削劳动者，他們却反誣劳动者剝削資本家；明明劳动人民貧困、失业的根源是資本主义剝削，他們却妄图把它归咎于机器和劳动者自身。

其实，他們的所謂“資本生产力”論，主要是从十九世紀初法国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薩伊那里抄襲来的。薩伊宣揚劳动創造工資，資本創造利潤，土地創造地租的謬論。两个辯護士皈依这种謬論，特別借資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吹嘘“資本生产力”，誹謗劳动“无用”，誣蔑劳动者在进行“剝削”，歪曲貧困的根源。

馬克思早已对薩伊的理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揭露了它的階級根源以及它的“拜物教”的社会根源，一針見血地指出，它不过是把“資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动机”，“翻譯成为教义式的文字”^①。現在，这些人把薩伊的衣鉢冒充作自己的“新发明”，真是荒唐可笑。

为垄断資本家鳴“不平”

这两个資本主义的辯護士宣揚，現代的美国資本主义和十九世紀的資本主义比較起来，有了“本质的变化”，据说由于国家的“調节”和“工会的行动”，提高了工資和“經濟福利”，使劳动群众“享有普遍高度的生活水平”，从而消除了貧困。为此，他們忿忿然鳴“不平”，把这說成似乎是政府“帮助”劳动者“剝削”資本家。

国家，从来都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現代美国的国家机构，随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日益和壟断組織融为一体。美国政府除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18頁。



了政治上疯狂地压迫和奴役工人阶级，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外，为垄断组织服务的最主要的方式，乃是积极推行劫贫济富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一面通过税收、公债和通货膨胀政策搜刮巨额社会财富；一面通过军事订货、补贴和信贷、政府投资等将这些财富输送给垄断组织，充当直接替垄断组织积累资本的重要杠杆。美国报刊也说，“联邦预算已经变成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拿走三百亿美元重新分配给资产阶级的一种工具”。连美国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和格雷也认为，“美国政府是垄断势力的扶植者”，说政府的“征税权力”和“经费开支权力”乃是财政政策“为提高垄断权力服务”的“双边锋刃”^①。

国家的“调节”，决不能使现代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发生“本质的变化”，只是使它成为更加反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决不会改善劳动人民的境遇，只会“给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起天堂”^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也搞了一些“社会福利”设施。这些设施，不过是由于失业人口的增加，政府在劳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采取的“济贫”措施。“济贫”经费十分菲薄，例如，战后的失业救济费一般只及完全失业者的工资损失的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七，杯水车薪，自然无济于贫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用很少一点钱维持一支失业大军，总的算起来，却是十分合算的。例如，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

刊就大谈失业会“给美国带来好处”，说“找工作日益困难，就会使每一个人工作得更好一些。而且，正因为找工作将愈来愈困难，所以工资将不会增加。”可见，美国政府的“济贫”措施，其目的与其说是“济贫”，莫如说是要把劳动人民保持在不危及其政治统治的贫困水平上，供其继续宰割。事实上，近几年来随着失业增加，赋税苛猛，负债加重，以及政治压迫加强，劳动人民的状况更加恶化了。美国前总统首席顾问凯塞林承认，美国现有五分之二的人口，即有七千七百万人，“处于贫穷或最低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困境”。

尽管美国政府不过是假“调节”之名，而行劫贫济富之实，但是，这两个辩护士犹感不足，不仅编造聳人听闻的谎言，说这种“调节”将本来应该分配给资本家的收入大部分“转移”给了劳动人民，叫嚷“它侵犯、削弱或侵蚀了资本的财产权，把愈来愈多的分配份额从应当归属于资本所得中分割出来，为的是增加给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分配份额，而其中大部分并不是他们的勤劳所得。”他们说，这种“转移”收入的办法，可以算是“人道的”，但决不是“公平的”。

我们知道，现代资本主义是随着它的政治、经济的总危机的发展而日益求助于“国家调节”，走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国

① 亚当斯和格雷：《美国政府是垄断势力的扶植者》，纽约1955年版，第96—97页。

②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24页。



家“调节”的事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绝大多数是为了直接保证垄断组织以最大限度的利润。即使有时迫于阶级斗争的形势，不能不对劳动人民的某些要求作些微不足道的“让步”，但是，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垄断组织的政治、经济的统治。

垄断资本家是剥削成性的，他们贪得无厌，只顾自己予取予求。这两名辩护士的“不平之鸣”，便是垄断资本家要求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剥削制度，是他们的反动本性的反映，其目的是为垄断组织及其政府加紧榨取劳动人民制造借口。

所谓“人人都当资本家”

两个辩护士竭力宣扬通过所谓“资本主义革命”，分散资本，建立一个以三项“经济公平原则”为基础的“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使劳动者成为“可以靠资本收入生活”的“资本家”。照他们说，这似乎是解决劳动人民贫困和失业问题的唯一公平的、彻底的“救治办法”。

照他们说，这个“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的一项“经济公平原则”，是所谓“参与原则”，即资本广泛“分散”，使“大部分家庭”都持有“私人资本”并用它参加生产，而实现这一原则的主要“措施”，乃是由公司向职工推销股票，把职工变成“参与”占有企业的“资本家”。

这显然是蛊惑人心的宣传。

资本主义制度下决不可能“分散”资本。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就必然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竞争“会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法则，当作外部的强制法则”^①，驱使资本家不断地积聚和集中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更是这样。据美国《幸福》杂志报道，一九六二年，进入“十亿美元俱乐部”的大垄断公司增加了八家，共有四十九家。五百家最大公司的利润比一九六一年增加百分之十六，获得利润一百三十五亿美元。“分散”资本的谬论，是蓄意把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关系和它所固有的资本集中规律割裂开来，借以制造对资本主义的幻想。

美国早已有不少资本主义企业推行各种“职工股票购买计划”。但是，事实证明：不仅有能力购买股票的职工为数极少，而且，职工即使持有股票，也决不意味着他们参与对企业的占有。第一，股票在职工手中最多只是一种信用的证书，决不是真正企业所有权的证书，决不会使他成为有产者。实际上，“他还是无产者，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去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奴役。”^②危机时照样被赶出企业。第二，职工决不能凭几张小额股票获得对企业的任何控制权，相反地，倒是将菲薄的储蓄变成了公司老板用以压迫自己的资本力量，而且，小股东的增加，更便于公司老板牢固地掌握整个企业的财产和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2页。

② 《俄国经济生活片断》。《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第76页。



力。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从理论上说，股东控制了这些大公司的管理。而事实上，经理、公司负责人，或者一个或几个主要股东往往是老板。”第三，据报道，职工即使持有价值一千美元的股票，一年“红利”约有四十美元，而一个“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一年就为垄断资本创造了六千美元的利润。可见，这个“红利”只是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很小一部分，是福特财团用来使职工忘却其惨重剥削的麻醉剂。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职工很难长期保持股票，他们常在危机和失业的频频袭击下亏损老本。例如，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股票价格猛烈波动中，垄断资本集团在股票价格暴跌时大量收购小股东所持有的股票，在股票价格回升时又大量售出，并且要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范斯顿发表“股东调查”，鼓吹“人民资本主义”，企图劝说那些卖出了股票的小股东重新回到证券市场上去。许多小股东就在股票价格一跌一涨之间惨遭垄断资本集团的洗劫。至于鼓吹用各种贷款方法来“资助”职工购买股票，不过是要把职工变为垄断资本家的债务奴隶。

垄断资本家除了利用这种向职工推销股票的办法，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经济统治以外，还利用它来麻痹他们的革命斗志，有的垄断企业，在推行利诱职工购买股票的“计划”时，竟规定不得“擅自停工”作为职工“分红”的条件。

可见，所谓“公平的”“参与原则”，不

过是垄断财团对劳动人民进行“文明的”掠夺和政治欺骗；所谓“普遍占有”“资本”的“经济民主”，所谓各个人都能当“资本家”的“经济自由”，都不过是用以粉饰垄断资本统治的画皮。

这个“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的另一个“经济公平原则”，是所谓“分配原则”，即各人根据自己的资本、劳动对生产的“贡献”来领取收入。照他们说，一旦劳动人民持有“资本”并分得“资本收入”，则不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实行“公平的”“分配原则”，以消除目前劳动群众在政府帮助下对资本家的“剥削”。事实上，垄断组织一向利用“国家调节”，加紧地在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掠夺劳动人民。要求实现所谓“公平的”“分配原则”的叫嚣，无非是借口工人持有股票，要削减工资，延长工时，取缔“济贫”设施，夺回劳动人民通过艰苦斗争所赢得的全部经济果实。

他们所标榜的第三项“经济公平原则”，是所谓“限制”垄断组织的“限制原则”。其主要方法，据说是由政府“指导”大公司“把绝大部分新形成的资本投向新资本家所有的新企业”，以“增加竞争者的人数”和“促进自由竞争”。其实，这正是资本家要政府直接帮助垄断组织变本加厉地对局外企业实行“参与制度”，扩大它的统治势力。他们还鼓吹采取其他“促进自由竞争”的措施以“限制”垄断，然而，都不过是假名“限制”，实则为垄断组织加紧压垮、吞并其他企业铺平道路。



这两名辯護士在所謂“促進”“公正的資本主義”的幌子下，要政府“給予私有財產以最充分的保護”，“必須保護資本家從他們資本所生產的財富中領受全部報酬的權利”，“取消公司所得稅并調整個人所得稅”，“修改遺產稅和贈獎稅法律”等等。

綜上所述，可見所謂“經濟公平原則”，不過是“狼吃羊”的強盜原則。所謂實現這些“原則”的“資本主義革命”，無非是壟斷資本集團在政治、經濟、思想意識等各方面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發動猖狂進攻，使之更加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決不是像辯護士們所鼓吹的那樣“人人都當資本家”。

是資本主義“永生”的信號， 還是它滅亡的喪鐘？

辯護士們大肆宣揚說，自動化將使絕大多數勞動者變為無用，“工業化的要旨是要儘可能消滅人類的勞役”，自動化預兆着一個“能夠享受空閑的有產者而不是仍然從事勞役的無產者的無階級社會”。

自動化的發展，對美國資本主義來說，真的像他們所臆想的那樣嗎？不。

首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它意味着長期慢性的嚴重失業問題更加尖銳化。近十餘年來，生產自動化在美國初步推行的結果，是直接生產部門的在業人數絕對地減少了。據統計，從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〇年，整個工業生產增長了百分之十九，而製造業的在業工人數卻減少了一百五十萬人，即減少了

百分之九，煤礦和鐵路工人數減少了四分之一。隨着自動化進一步推行（包括服務業部門和其他非直接生產部門採用自動化設置），失業將越發成了勞動人民的浩劫。

其次，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自動化的推行，還將加劇各企業、各財團、各部門之間的競爭和不平衡的發展，加劇勞動人民的貧困化，從而加深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加速現代資本主義的滅亡。

對於美國勞動人民來說，自動化決不預兆着勞動者和勞動將“消滅”。因為，勞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源泉。一切機器都“是由人類的手所創造的人類頭腦底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① 沒有勞動者和勞動，就根本談不上自動化技術以及它的發展，而且社會也不能生存。不過，自動化技術的資本主義運用，卻會使壟斷資本對勞動者的摧殘和壓迫變得無比暴戾，使勞動人民越來越迫切要求執行歷史所賦予的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偉大使命。

在現代資本主義下，生產自動化決不預兆着資本主義制度的“永生”，而是給它緊敲喪鐘。

兩個辯護士倒是從技術的發展中預感到資本主義的滅亡。他們一面胡說由於廣大勞動者目前還未成為“資本家”，因而必需擴大政府支出以保證“充分就業”，為國民經濟軍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第3分冊，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頁。



事化政策辯护；一面又哀叹这样做“不能解决充分就业和未来技术进步之間的矛盾”，“不能解决通貨膨脹問題”，惊呼現代美国資本主义“也包含有它本身毀灭的种子”。但是，他們不甘心死亡，又妄想把他們胡謔的所謂“資本主义革命”，吹嘘为解决就业和技术进步的矛盾的根本方法，把它当作拯救現代資本主义的灵丹妙药。

照他們說，一旦“資本主义革命”使劳动者成为不劳而获的“资本家”，則失业問題似乎将不复存在，自动化等技术进步亦将順利发展。他們說，这时即使还有“少数”仅靠劳动謀生的人遭到失业，也无关紧要，只須政府要求那些兼有“資本收入”的工人把工作让給失业者。其实，所謂“充分就业和未来技术进步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他們所鼓吹的“資本主义革命”以及其他具体措施，只不过是借口工人持有股票而将其强行解雇，以欺騙工人去忍受自动化技术的資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恶果，使現代資本主义制度得以苟延殘喘而已。

明明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預兆着資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預兆着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屬於劳动人民，他們却硬說

它預兆着劳动者和劳动的“消灭”，硬說它預兆着美国和世界的未来屬於資本家。

他們还引用古代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話来为自己的謬論貼金，說自己的“理想社会”是从亚里士多德以下的想法中“設想”出来的：“如果梭子能自行織布，七弦琴不要人来撥动，則工匠就不需要雇工，奴隶主也就不需要奴隶”。他們說，这个消灭了劳动的“社会”，在以前是“几乎不可想像的”，而現在，自动化技术的不断进步，“显然能使这个梦想接近实现”。

我們知道，机器本来是縮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却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奴隶，使机器成了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工具。古代的亚里士多德，由于时代的限制、阶级的限制，“就不知道机器是延长劳动日的最确实的手段。”^①亚里士多德的天真想法，只能成为一种梦想。事越数千年，今天美国壟断資本集团及其辯护士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不仅蓄意散布自动化机器将会解放工人的謊言，而且还妄想用自动化机器来“消灭”劳动、劳动者和革命，岂不是对历史的莫大嘲弄嗎？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495頁。



美帝国主义的又一堆囂語

龙 經

一九五八年，正当严重的經濟政治危机籠罩着美国上空的时候，披着学者外衣的美国反动政客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拿了卡内基公司的錢，休假一年，写成了《經濟成长的阶段》一书。

罗斯托的活动，受到华尔街老板的賞識。接着，他就升官晋爵，当上了肯尼迪的总统副特別助理，后来又当了国务院顧問兼政策計划委员会主席。

罗斯托在这本七拼八凑、拙劣不堪的书里，泄露了美帝国主义心里最害怕而又最焦心的是两件事：一件事，是社会主义陣营的壮大；另一件事，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特别是中国革命在这些地区所发生的偉大影响。

罗斯托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子，口出狂言，說什么要应付“我們时代的主要挑战”，就是說，要阻擋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在这本书里，他蓄意抹煞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間的矛盾，混淆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鼓吹新殖民主义，以“現代大規模毁灭武器的存在”作为訛詐，鼓吹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

这是一本和学术毫不相干的书，它不过

是反映了美国壟断资产阶級在新的世界革命風暴面前，想寻觅出路而又寻不到出路的恐慌心理和苦悶情緒，重复着美国壟断资产阶級进行垂死掙扎、妄想奴役全世界的囂語。

何物“經濟成长阶段”？

为了把人們引入迷宮，罗斯托在这本书里，用大量篇幅，胡謔了五个經濟成长阶段。

他說：“我們可以按照社会的經濟規模，把所有社会列入五类之一。这五类是：傳統社会、为发动創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額群众消費时代。”然后，他就把全世界的国家，一个一个地塞进了他所虛构的各个阶段。

所謂“傳統社会”，罗斯托指的是“中国的各个朝代，中东和地中海文明，以及中古欧洲世界”。这个阶段，已經是历史陈述了。成为这本书的主题的，是“傳統社会”以后的各个阶段。

在給当代世界各国分类的时候，罗斯托把除了日本以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絕大多数国家都划进了所謂“为发动創造前提条件阶段”，或者“发动阶段”。

所謂“为发动創造前提条件阶段”，按照罗斯托的說法，是由“傳統社会”向“发动阶



段”过渡的时期。他说，在历史上除英国以外，其他国家比较普遍的情况是，这个阶段“不是从内部引起的，而是较为先进的社会的外来侵略所引起的”。

所谓“发动阶段”，罗斯托称之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是“一种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上，必须有一个愿意把经济现代化的政治集团取得政权；“有一群准备接受革新创造而活动成功的人”，即要有一个资本家阶级。但是，他又荒唐地把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划在这个阶段。

现代欧洲和美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被罗斯托划进了“成熟阶段”或者“高额群众消费时代”。

所谓“成熟阶段”，据罗斯托说，“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也被列入了“成熟阶段”。

对所谓“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罗斯托作了这样的解释：“在这个时代中，主导部门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方面。”其主要标志是：“不仅使人们有更好的衣食住，而且要使群众能消费二十世纪成熟经济所能提供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他大吹大擂地说，美国是第一个进入“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的国家。他并且别有用心地说，目前，苏联已经可以进入“高额群众消费时代”了。

罗斯托关于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乱七八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他以牛顿作为“传统社会”的“历史分水岭”，其他几个经济阶段的划分，有的是根据投资率，有的是根据消费水平、消费品的品种，唯独躲开了决定社

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过：“不论生产采取何种社会形态，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总是它的因素。……为了要有所生产，它们必须互相结合。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时代，就是由这种结合依以实行的特殊方法和方式来区别。”^①

斯大林指出，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谋得方式，便是社会生活和发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产工具等等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把社会底生产力和人们底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内，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②

这是划分时代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罗斯托把处于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国家~~，拼凑到一块，划了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五个阶段，究竟是玩的什么把戏呢？

第一，是妄想抹煞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罗斯托的嘴里，什么帝国主义，什么殖民地、半殖民地，它们都不过是处在不同成长阶段上的一大堆国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处在所谓“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这些国家的前途，是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走向所谓“发动阶段”和“成熟阶段”。在这里，罗斯托根本否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

①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0页。

②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860、862页。



革命，否认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而瞎编了一套什么“投资率的提高”、“社会对基本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实际态度”、“实行生产技术改革的态度”、“甘冒风险的态度”，等等，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

第二，是妄想混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在罗斯托的嘴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界限的，它们也不过是处在不同成长阶段上的一些国家。他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对立，而把两者之间的差别，归结为汽车、一家一幢房屋、公路、家庭耐用消费品、高级食品的普及程度。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走向所谓“高额群众消费时代”，就可以了。他还胡说什么“进入高额群众消费时代以后，共产主义在实质上可能萎谢”。

总之，他是要抹煞一切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欺骗和麻痹世界革命人民，阻止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使全世界最后“溶解”于统一的、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称王称霸、奴役全世界人民的金元大帝国中。

罗斯托向全世界推荐的美国式的“高额群众消费时代”，是什么样子呢？

在美国，如果说有什么“高额群众消费”，那也只是垄断资本家们的事。少数垄断资本家集中的资本和财富越来越庞大，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在相对的

一极，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则陷于贫困和失业的悲惨境地。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的《国情咨文》中承认，在美国“贫穷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贫穷现象“在城市的贫民窟和小城镇，在分成农的矮屋子里或在移民的工棚，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在白人和黑人中，在青年和老年人中，在繁荣的城镇和萧条的地区”都存在着。咨文还说，美国仍有四百万工人失业，有二百多万工人拿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法的规定。现在美国家庭有五分之一“收入太少以致不能满足基本需要”。当然，约翰逊所说的这些数字，只会大大少于实际情况。

据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发表的两篇文章透露，目前至少有三千六百万美国人，他们的生活水平达不到最低标准，其中约有七百万属于过时的人，即“非熟练工人”，他们洗碟子或在医院等从事简单劳动；约有五十万是印第安人；还有数十万被遗弃在廉价的旅店、酒吧间和职业介绍所徘徊流浪的人，其中包括半永久性失业者。此外，美国有二、三百万流动农业工人，他们生活在最被忽视的贫困状态中。他们全家，包括儿童，都参加劳动，住在最肮脏的地方，生活在最没有希望的苦海里。在经济窒息中喘不过气来的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罗根县，总共才一万零九百家，就有一万家失业。

在美国，黑人更多受一层种族压迫。约占美国总人口百分之十一的黑人，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



們的失业比率最高。美国劳工部的凱斯勒一九六三年七月发表的文章透露，一九六二年黑人的失业率达到白人失业率的两倍半以上。《紐約时报》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报道，紐約市黑人每周的平均收入，比官方公布的能維持四口之家的起碼生活水平的数字还少将近一半。

美国社会实际存在着两个部分，就如列宁当年所說：“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醜陋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綫上掙扎的劳苦大众。”^①

罗斯托之流，妄想用“高额群众消费时代”之类的谎言，来掩盖美国丑恶的现实，是徒劳的。

新殖民主义的騙术

罗斯托的书，字里行間都流露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面前发抖了。他叫喊：“所有国家必須有先見之明，使它們的政策适应于这一主要事实：力量斗争舞台可能扩大而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成为全球性质的。”

但是，美帝国主义并不死心，它的“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还是反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夺取这个地区，使这个地区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之下。

罗斯托說：“不发达国家——现在是共产党希望的主要集中点——能够在民主世界范圍内，顺利地通过創造前提阶段进入巩固的发动阶段，并且不受共产主义的討好和引誘。

我认为在西方的日程上这是最重要的一项。”还說：“我們目前处于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的人的命运，将主要地由远方的国家的創造前提条件和发动的过程的性质来决定。”

罗斯托施放烟幕，說什么“殖民主义实际上几乎已經死亡”，說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并不依賴殖民地，“如果說有什么問題的話，它們的脆弱性在目前是由于它們不願意充分关心不发达国家的世界——和不願意拿出足够的資源給这些国家。”因此，他建議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援助”。这里，我們附带提一下：現代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也喧嚷这种論調，主張同美帝国主义共同行动，在实际上不过是表达美帝国主义的要求。

罗斯托所謂“殖民主义实际上几乎已經死亡”、“成熟的资本主义”并不依賴殖民地，等等，都是拿来騙人的。事实上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棄以武装力量鎮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不是別人，正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帮助蔣介石打內战，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領土台湾。不是別人，正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鮮的战争，支持沙灣拿吉集团挑起老撾的內战，在越南南方不宣而战地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特种战争”，在古巴的吉隆滩登陆，打着联合国的旗帜武装干涉剛果，杀害了剛果的民族英雄卢蒙巴。美帝国主义的罪恶，罄竹难书，賴是賴不了的。

至于“美援”，不过是美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援助”，美

^① 《給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页。



国垄断资产阶级向其他国家，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输出资本和输出商品，并且扶植一些国家的最反动的势力，扼杀那里的人民革命运动，把这些国家置于美国的军事政治奴役之下。一九五五年六月杜勒斯就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援助其他国家的动机，主要不是为了它们的利益，而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否则我们是不会给它们任何援助的。”一九六二年，美国对外“援助”总额为四十多亿美元，而通过“美援”、私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等办法从国外攫取的利润，高达一百四十亿美元左右。美国佬承认：美国每提供一美元的军事“援助”，受“援”国就得为此付出六美元的军事开支。

罗斯托特别害怕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民族革命的力量两大潮流结合起来，因此，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过渡社会是共产主义可能取得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地方。”

为了推行新殖民主义，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罗斯托呼吁美国统治集团同“处于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和发动阶段初期的地区的人民和非共产党政客在一起，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他还说：“过渡社会中的非共产党的有学识的中坚分子对他们的人民的前途负有重大责任。”“他们曾经在人类自由的旗帜下帮助取得独立，并且也曾经利用他们所赞同的西方国家的信念。”

其实，这并不新鲜。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艾奇逊在他的“白皮书”里，就曾经在支持国民党反动派的同时，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艾奇逊的幻想，在中国人民革命面前烟消云散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①

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多数人是要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一些思想糊涂对美国存有幻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经过说服、争取、教育、团结的工作，经过帝国主义反面教员的教育，除了少数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的人以外，也会觉醒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罗斯托的反共叫嚣，除了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反对民族革命，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消灭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用共产主义吓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反共的烟幕下，奴役和夺取西德、意大利、日本这些战败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直接奴役英国、法国、比利时等这些战时的同盟国和它们原来的殖民地、势力范围。

美帝国主义企图建立世界霸权的侵略政策和奴役政策，加深了当代的民族矛盾。首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要反对它。现在，这个广大地区连绵不断的革命烈火，正动摇着帝国主义统治

^①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9页。



的基础。其次，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受它欺侮的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垄断资产阶级，也反对它。现在，美帝国主义者同其他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正在加剧，帝国主义阵营正走向四分五裂。民族矛盾是和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一起存在的。帝国主义还没有死亡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矛盾决不会消失。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地盘越来越窄小的情况下，由于帝国主义要伸手于任何一块土地，这种矛盾必然会加剧起来。

杜勒斯“和平演变”政策的注脚

罗斯托在这本书里，明目张胆地宣扬，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加入“自由世界的大家庭”。

罗斯托一方面主张，“西方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要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应该做出比现在更大的努力”，要努力扩军备战，以使用武力威胁和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他竭力夸大核战争的毁灭性，说什么“科学和技术的毁灭能力加速发展，但是地球的表面面积是固定不变的，可以一扫而光”。另一方面，又玩弄假和平的花招。

罗斯托说：“就新武器和有一些新国家向成熟阶段发展而言，俄国的基本国家利益是防卫性的，在本质上和美国、西欧以及日本的国家利益相同。”“一系列新的国家进入发动阶段会造成力量扩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国家利益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将更加近似。”他宣扬实行一种所谓“军备监督制度”，要苏联社会“对外开放允许视察员视察。这些视察员应该拥有银行视

察员所拥有的特权，即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不必事先通知”。他毫不隐讳地说：“有效的军备监督制度所隐含的开放的社会和高额群众消费将使苏联必须对它的观念和制度进行重大的修改”。

罗斯托说，苏联和美国的成长道路“非常的类似”。并且说：“目前，苏联是一个在技术上已经成熟、可以进入高额群众消费时代的社会；在结构上，从它的劳动大军的教育和技能来讲，也是这样；在心理上，有如苏联的文学、政治、甚至它的经济趋势所表明的，它也已经可以进入并且急于要进入高额群众消费时代。”

罗斯托建议美国“做重大的劝导工作”，诱迫苏联走“一条有意义而又愉快的道路”。他说：“如果西方的工作做得好的话，苏联社会内部几代的活力——特别是在达到成熟阶段的第一代的趋势——和世界舞台上的力量扩散结合起来，迟早会解决和平问题。”

听着，帝国主义反面教员在上课了。

罗斯托所谈的“和平”和所谓“军备监督制度”，并不是什么真的要实行“和平共处”，而是重弹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政策老调，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为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阴谋，应当引起全世界革命的人民的最大警惕。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有觉悟的，是能够识破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的。他们不会上帝国主义的当。即使有一小部分人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把自己的国家引上“和平演变”的道路，它们的面目早晚总要彻底暴露出来，最终遭到革命人民的唾弃。



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无聊伎俩

长 贵 宝 鈞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領伯恩施坦曾經誣蔑马克思主义是布朗基主义。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說，布朗基派的綱領，“就是用暴力剝夺的手段由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在德意志，則马克思、恩格斯以急进的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达到了和布朗基主义完全相同的理論。”他还說：“在过于重視革命暴力对近世社会之社会主义的变革的創造力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未必完全摆脱了布朗基主义的解釋”；“《共产党宣言》之革命的运动綱領，彻头彻尾是布朗基主义的。”

伯恩施坦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論和布朗基主义所主張的暴力革命混同起来，誣蔑马克思主义就是布朗基主义，是为了达到他攻击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目的。

究竟什么是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布朗基主义有什么区别？伯恩施坦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誣蔑为布朗基主义？这里，我們就这几个問題，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

布朗基主义的創始人是法国人路易·奥

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年)。这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其策略特点是冒险主义。

布朗基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地参加了法国的革命运动。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同法国的秘密革命組織燒炭党相接近，参加了反对波旁王朝的斗争。他是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积极战士。后来，他成为秘密的革命密謀組織——“家族社”和“四季社”的一位組織者和領導者。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以布朗基为首的“四季社”在巴黎举行了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沒有得到群众的支持，第二天就被镇压下去，布朗基被捕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布朗基才恢复政治活动，組織“中央共和社”，重新投入革命斗争。一八四八年五月，布朗基再次被捕，直至一八五九年才获釋，但一八六一年又被逮捕。一八六四年他越獄逃走，亡命布魯塞尔。一八七〇年八月十四日，布朗基参加了反对拿破侖第三政府的起义，这次起义也沒有成功。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又参加了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起义，不久又被捕了。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期，布朗基还关在獄里，但被缺席选为公社委員。布朗基在一八七九年出獄后，虽然已經七十四岁，



但是，仍旧积极参加了政治斗争，直到一八八一年一月一日去世为止。

布朗基是旧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坚决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布朗基认为，国家是保护富人对付穷人的宪兵，必须建立新的国家，使国家成为穷人对付富人的宪兵。不进行政治革命，社会主义是不可想像的。^①因此，以布朗基作为领导人的“四季社”等秘密社团，都进行过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活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布朗基在谈到“中央共和社”的宗旨时说，要“消灭最后一种奴隶制——无产阶级遭受奴役的制度。资本的残暴统治同战刀和圣灯的残暴统治一样，是不能容忍的。二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这种残暴势力。这就是‘中央共和社’的宗旨，本社的每一个社员都有责任为此宗旨而奋斗，直到它实现为止”^②。

布朗基主义者虽然主张暴力革命，但是，布朗基主义者所说的革命不是阶级的发动，而是少数革命者的密谋暴动。按照布朗基主义者的主张，如果革命取得胜利，他们所实行的专政也不是革命阶级的专政，而只能是少数革命家的专政。布朗基主义革命策略的特点是密谋暴动。恩格斯在讲到布朗基派时指出：“他们是按阴谋学派精神培养出来，是由这学派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团结起来，他们认为少数坚决和组织严密的分子在顺利的条件下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用极果断坚决的措施来保持政权，直到能够把人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并把他们团聚到少数领袖

周围。”^③

布朗基主义的革命策略是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策略。他们实际上认为，起义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不需要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不需要有发动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的准备时期。起义失败了，他们不仅不总结经验教训，而且还要马上重来。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起义也就屡次遭到失败。

布朗基和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人，他也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阅读过他们的著作，但是，他始终没有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布朗基的革命思想和策略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形成的，后来，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进一步高涨，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或是他屡次组织起义失败的教训，都没有使他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点。恩格斯说：“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也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又指出：“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④。

① 参看《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94页。

② 布朗基手稿，引自莫里尼埃著《布朗基》一书，第42页；转引自《论空想社会主义者》，第380页。

③ 《〈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61页。

④ 《流亡者文献。一一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511、512页。



二

布朗基（及其許多信徒）反抗旧制度的斗争精神是值得贊揚的；但布朗基主义則是必須批判的，因为布朗基主义在理論上完全錯誤，在實踐上对革命极端有害。

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階級整个階級的事业。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綫，不是由少数革命家把解放恩賜給无产階級，而是由无产階級自己解放自己。无产階級革命家应当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同他們打成一片，建立密切的联系，喚起人民群众的觉悟，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組織起来，准备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領導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階級专政。布朗基主义者虽然也希望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但是，他們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无产階級自己能够解放自己。他們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愚昧无知的，是被动的，看作是被解放的对象，只能坐待他們从上面来解放。因此，在革命實踐上，他們不去发动群众、組織群众、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少数革命家首先发动起义，夺取政权，然后再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列宁曾經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認階級斗争的理論。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識分子的阴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① 布朗基主义的这种否認階級斗争、否認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在对待武装起义的問題上，馬克思主义

的革命策略和布朗基主义的冒險主义的策略也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武装起义是階級斗争的高級形式，无产階級要夺取政权，必須举行起义。但是，无产階級政党必須慎重地对待起义。起义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是一种艺术。无产階級政党要組織起义，必須考虑革命的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沒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有革命。一般來說，引起革命的革命形势的特征是：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維持自己的統治；被压迫階級的貧困和災难超乎尋常的加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已經大大提高。在这种革命形势下，无产階級政党應該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在主观上为起义做好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的准备，并且敢于領導人民群众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无产階級政党的任务是通过日常的各种斗争，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輕率地发动起义，这是“左”傾冒險主义；在革命高潮沒有到来时不去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在革命高潮已經到来，革命条件已經成熟时，不敢领导和发动起义，这是右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

布朗基主义者的錯誤，不在于主張暴力革命，而在于他們根本不考虑武装起义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不懂得起义应当依靠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懂得必須艰苦地积蓄革命力量，掌握革命成熟的时

^① 《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61頁。



机，而把起义看作仅仅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在他们主观上认为时机有利就可以发动起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文中曾经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区别，他说：“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阴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①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恩格斯对于布朗基主义的冒险主义策略，曾经严肃地给予批判。当时，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遭到很大的摧残，需要长时间的休养和生息，以便重新聚集力量，同资产阶级进行新的决战。但是，流亡的布朗基主义者看到统治阶级内部有些分裂现象，就认为是统治阶级的崩溃，宣称“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一个大危机”迫近了，需要立刻行动起来“为公社复仇”。恩格斯指出：“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饉，特别是经过了一八七一年五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个长久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见解。”②

布朗基主义是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时期

的产物。在十九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小资产阶级在法国劳动人民中仍然占着很大的比重。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革命家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便根本改变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他们容易产生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布朗基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

布朗基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但布朗基主义者在组织和领导巴黎公社时，却违反了他们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坚持了阶级斗争，这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能不顾错误的理论为自己开拓着道路”③。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而布朗基主义是错误的。

三

什么是布朗基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布朗基主义有什么区别，这是十分清楚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斗争策略。修正主义者企图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这是枉费心机的。

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布朗基主义，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反对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页。

② 《流亡者文献。——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513页。

③ 《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80页。



无产阶级专政，贩卖他的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

伯恩斯坦一方面竭力攻击暴力革命，他说：“党根本不热衷于对无产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实行暴力革命”，对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一般地实行暴力的剥夺”^①。另一方面，他又大肆宣扬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②。他说：“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③正是为了反对暴力革命，宣传议会道路，伯恩斯坦就采取了混淆是非的手法，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已被革命实践推翻了的布朗基主义。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动的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镇压革命人民，通常总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无产阶级要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列宁指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④。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布朗基主义，正是妄图挖掉暴力革命这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对资产阶级毫无损害的偶像。

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布朗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这是背叛无

产阶级利益、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可耻行为。资产阶级是最害怕革命群众的暴力的。资产阶级在使用反革命的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同时，总是大肆诬蔑革命群众为了反抗反革命镇压、争取自身解放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伯恩斯坦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布朗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正是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这就充分暴露了伯恩斯坦和资产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上，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

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布朗基主义，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伯恩斯坦是这样，历史上的其他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列宁在一九一七年说：“机会主义的首领伯恩斯坦由于诬蔑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藉，现时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们一点也没有刷新和‘丰富’伯恩斯坦的贫乏‘思想’。”^⑤人们看到，各种型号的修正主义者的“论据”实质上 and 伯恩斯坦一样：主张暴力革命就是布朗基主义。他们的目的和伯恩斯坦也是一样：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为资产阶级效劳。伯恩斯坦既然早已弄得声名狼藉，一切修正主义者也逃避不了与伯恩斯坦同样的命运。

①③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② 《什么是社会主义？》。

④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8页。

⑤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



科学技术的中間試驗

楊朝傲

科学技术的中間試驗，是科学实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科学研究通向生产的渠道，是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的重要环节。我們需要在开展理論研究和實驗室研究工作的同时，加强中間試驗工作，大力組織工业的扩大試驗和农业的大田試驗。这样，可以縮短从科学研究到生产应用的周期，多快好省地把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中去。通过生产性的扩大試驗，更可以吸引生产綫上的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积极参加科学技术的試驗研究活动，組織他們革新工艺、推广技术、普及科学、探討理論，使科学实验成为一項偉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間試驗是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工业方面的中間試驗是在产业革命之后，主要是在十九世紀后半期才逐渐建立起来的。当时工业生产已經开始采用一些比較复杂的新技术，逐渐进行了一些專門的扩大試驗或者半生产性試驗的研究工作。例如，酸性底吹轉炉炼鋼法（或称貝色麦法），是英国冶金学家貝色麦在一八五六年发明的，又用了几年時間扩大試驗加以改进，才推广应用的。资产阶级为了爭夺市場，攫取更大的利潤，也采用一些科学发明，对于某

些工业技术的扩大試驗工作进行投資，并为此設立一些專門的試驗工厂。例如，美国的烟草托拉斯，在一九〇六年設立了两个分公司，专事收买发明专利权；在勃魯克林的工厂，專門試制紙烟、小雪茄、烟嘴等产品，并就地改进各种发明。^①

二十世紀初特别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来，中間試驗有了广泛的发展。在战后年代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部門，例如，无綫电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工业、合成纖維工业、精密仪器仪表工业等，大多是在實驗室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中間試驗以后，才开始大量生产的。以合成纖維为例，它的主要品种，如聚丙烯腈纖維与聚脂纖維等，多半是在四十年代前后由有些国家进行中間試驗成功之后，在五十年代期間陸續投入生产的。由于合成纖維积累了相当多的中間試驗的經驗，采用了不少的新技术与新工艺，生产上升很快，世界总产量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間，共增长了七点六倍，是现代工业中发展速度比較快的一个部門。

有些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由于沒有找到

^① 參見《关于帝国主义的筆記》。《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2頁。



实际应用的途径，停留在实验室的阶段，进展不快；而一旦通过中间试验这一环节，就既能在生产上大量应用，又能在实践中丰富科学研究的内容。这种事例是很多的。近几年来，不少国家竞相采用中间试验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科学技术史上，有少数研究项目未经中间试验就从实验室的小型试验一跃而进行大量生产的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些国家由于急需橡胶，而将丁二烯（合成橡胶的重要原料）的研制工作，从小小的试管一下子扩大到工厂的规模。又如，生产原子武器的原料钚，也是在从实验室里取得微量样品的情况下，骤然成亿倍地扩大生产的。这些事例的出现，有特殊的客观原因，如当时合成橡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受了战争的刺激，垄断资本家为了在战争中攫取最大的利润，甘冒在科学技术上投资失败的“风险”。也有的工业部门的某些研究项目，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必进行扩大试验，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

目前，由于工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量中间试验的经验积累，已经有许多现成的科学技术资料和各种不同类型的通用设备可供参考，有些研究项目已经有可能不去设置完整的中间试验工厂，只要经过实验室的小型试验、精细的工程计算和必要的关键性设备的中间试验，就可以进入工业生产。这样，还可以在满足原有试验目标的前提下缩短科学实验的时间，节约投资。

各种科学技术的中间试验，在内容上是

有所不同的。例如，在化工、冶金和石油工业方面，有些研究项目侧重于工艺流程的试验；在机械和电机工业方面，有些研究项目侧重于样机试验；在半导体工业方面，有些研究项目侧重于成批生产的设备和操作方法的试验；等等。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和实际需要，选择进行中间试验的内容和方法。为了多快好省地进行中间试验，确定中间试验的项目，必须事先经过严格的科学技术鉴定，必须在技术上是比较成熟的，而且要充分地利用以往的中间试验的经验。

我国科学技术的中间试验的历史不长，但是，进展很快。为了推进生产建设，发展科学技术，当前突出地抓住中间试验这个环节，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间试验是发展现代工业的一个重要步骤。现代工业生产一般先要经过设计和试制工作才能大量进行生产。例如，研究哪一种技术路线和工艺流程比较合理，比较可靠；研究适应成批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的新型专用设备；研究在特定情况下设备结构及材料的选择；研究设备的磨损、腐蚀及催化剂的寿命；研究技术经济指标；等等。这样，通过中间试验取得系统的数据和技术资料，设计新的企业，组织新产品和新设备的生产流水线。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建设中出现的大量科学技术问题。现在，我国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已经从仿造发展到独立设计的阶段。这就向我国的科学技术战线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要



求科学技术人员不但要紧密结合工业建设的发展的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实验室研究方面取得理论上和试验、试制的应有成果，并且要为工业设计提供足够的科学技术依据和成套的技术资料。这就是说，要大大加强中间试验这一环节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进一步解决从实验室试制到工厂生产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中间试验是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结合点。做好农业科学的大田试验的研究工作，就能够把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迅速而有效地推广应用到大面积的生产中去。

农业生产具有很大的综合性和地区特点，影响生产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因此，在实验室里或小块土地上所进行的小样试验取得成效以后，究竟能不能在大面积生产中广泛应用，还必须经过大田试验来作进一步的验证。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获得的科学研究成果，只有通过生产性的扩大试验，才能找出在复杂的自然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技术措施。

在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工作中，任何一种比较成熟的措施，都需要结合各个地区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特点，经过科学试验和典型示范，才能有把握地逐步地推广。如果没有经过中间试验就一下子全面推广，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或者同一种增产措施，例如，某一个优良品种或某一项栽培措施，也往往需要在较大的范围内、较大的

面积上和较多的样板田里进行细致的试验研究工作。

中间试验是实验室研究工作的延长和发展。实验室工作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环节，许多理论假设和学术探讨都要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或者观测活动来加以验证。但是，实验室研究常常因为试验规模的限制而不能获得大量生产所需要的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资料，许多研究成果经过实验室阶段以后，还需要进行扩大试验。这种中间试验虽然是以实验室研究结果为前提，然而同样是一个独立的、包含有大量试验研究工作量的科学实验阶段。以合成纤维为例，实验室里进行了高分子有机合成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试验，研究了有关的化学工程问题，试制出新的合成纤维的品种，这个过程同以后生产过程是不一样的；虽然，两者基本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是相同的，在工艺流程或设备材料上却往往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进行大量生产时，在大设备里所进行的化学反应产生了在实验室里的小型装置和简化了的条件下所不曾发生的问题。因为，生产设备由小而大、原料由少到多，条件由简至繁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数量上和程度上的变化，这里是量变引起了质变。对于试管里化学液体的搅拌动作同在一个几公尺直径的化学反应釜里的搅拌操作是大不相同的；这不仅有搅拌器的大小、形状的差别，以及制造材料、搅拌时间上的差别，并且引起了被搅拌的液体在动量、热量和质量传递方面的新的变化。这种由机械过程和物理过程的变化相应地引起



了化学过程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一些在大生产条件下所出现的有关化学工程学等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中間試驗阶段才能暴露出来并获得解决。

为了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中間試驗是需要加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国以来，我們新建了和扩建了大批科学研究机构，各部門各单位都取得了許多科学研究成果，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项目正在进行扩大試驗或者已經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同时，还有一部分研究项目需要通过中間試驗才能投入生产。因此，我們要积极进行中間試驗工作，广泛开辟这种从科学研究到生产的渠道，切切实实地把科学技术工作开展起来，使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在生产上开花結果。

为了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必須根据我国資源特点和技术、經濟的具体条件，学习外国的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經驗，并把学习和独创正确地結合起来。有些科学研究项目，需要組織有关的中間試驗，直接通过生产性的試驗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在比較短的时间內，为大规模生产应用做好技术上的准备。这样，就必须加强中間試驗工作。

科学技术的中間試驗，对于我們來說，还是一項比較生疏的工作，因此，提高我們对于中間試驗的認識，是必要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实验只包括实验室研究，不包括中間試驗。这是不了解从实验室研究到中間試驗，是人們認識深化的过程。大多数科学研究项目都要应用于生产，因此，科学技术人員不能只是停留在撰写实

驗报告或者发表論文的阶段，而不去繼續研究这些科学研究项目怎样才能应用于生产；否則，科学技术对生产就不会發揮积极的作用，它本身也很难发展。毛澤东同志指出，“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計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都算实现了預想的目的。”但是，人們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实验室研究带有局限性，不但受着設備条件和試驗規模的限制，而且还因为缺乏生产性試驗，使某一项研究成果在生产应用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而在实验室研究阶段还不能充分暴露出来。例如，化工生产过程中，少量有害气体的出現，对于实验室來說，危害不大，在大规模生产时却可能造成災害。中間試驗扩大了試驗的規模，它并不是实验室工作的簡單的重复。它通过生产性試驗来檢驗理論和实验研究的結論，有些往往要反复試驗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获得正确的認識，达到和某些客观規律性相符合。

認識中間試驗同实验室研究具有的共同点，就不应当把中間試驗同一般的小量的生产等同起来。否則，要求中間試驗单位承担过多的生产任务，势必会影响既定的試驗研究工作，对于生产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又要認識中間試驗同实验室研究的差別，两者除了在試驗規模上，实际条件上的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2頁。



差别以外，实验室往往是研究事物的某一个方面，中间试验的研究范围则更为广泛，它同生产的接触更为密切。如果否定实验室研究的必要性，取消单因子的研究，把一些本来可以在小型实验室装置上试验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不适当地放在中型设备上来进行，这样，就会延长试验的周期，对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都是不利的。

根据生产的需要，适当安排实验室和中间试验的研究工作，这样，就可以更有计划地组织科学实验工作，前后衔接，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在生产中进行技术改革就行了，用不着任何中间试验。这是把一般的技术改革同中间试验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科学技术工作都是需要的，是互相补充的。大规模的生产要求有比较稳定的生产秩序，同时又要不断地革新技术，不断地提高生产力。中间试验是解决生产中不断革新和相对稳定这个矛盾的一个好办法。通过中间试验找出生产中的最优技术方案，经过一定时期的试验运转和反复修改，待技术真正过关以后，再把工艺固定下来扩大生产。通过小型装置的频繁变动和多方修改来求得以后大生产中比较稳定的运转。这样看来似乎是慢了，其实是更快了。当第一批中间试验项目已在生产中发挥效能以后，又及时进行第二批项目的研究工作，不断地把新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输送到生产中去。

中间试验带有科学实验和生产的两重性。它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又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一个中间试验项目往往比它在

实验室阶段要耗费更多的研究经费、设备、原料和材料。中间试验需要的设备很多，有不少是非定型设备，需要组织专门的设计和试制工作，试验过程中还要不断地修改，试制和安装以后又要经过试用和一定时期的运转观察。因此，中间试验必须有足够的工作条件的保证，要像安排企业生产那样确保中间试验在人力、经费、原料和设备等方面的供应。但是，中间试验又非正规生产，它是为了解剖生产性试验这样的典型来掌握大规模生产的一般规律，它的形式是和生产相同，它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科学研究。因此，中间试验在管理上要适应试验研究的要求，参照科学研究机构的特点，要有比生产单位更大的灵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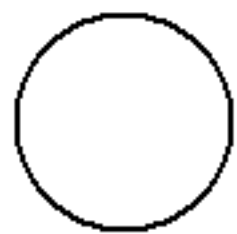
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中间试验是科学实验同生产斗争的结合点，做好了中间试验工作，就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生产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科学实验要实行群众路线，要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要把提高和普及结合起来，把专门研究机构的工作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结合起来。我们要重视科学技术的中间试验工作，组织科学研究机构、生产单位与高等学校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大协作，组织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一起种科学技术试验田，组织广大工人和农民参加生产性试验的工作，组成一个遍布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工作网。我们要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建设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試論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途径和步骤

陶鼎来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分批分期地、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技术改革的任務。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我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事业,必将得到迅速的发展。根据这种形势,及时地研究探讨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应当遵循的途径和步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途径和步骤以前,首先要明确农业机械化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农业机械化的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提高人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能力方面。农业机械化的实质是把以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农业生产,转变为以机械动力为主要动力的农业生产。从根

本上看,农业机械化是从动力和工具方面来提高农业生产的。人能否胜利地进行农业生产,不仅决定于人是否认识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人在怎样的程度上掌握利用了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人类一开始从事耕作、播种、收获等生产实践时,不仅就对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开始有了认识,同时也就开始掌握了同耕作、播种、收获等生产活动相应的工具。在以手工工具进行农业生产时,人们对自然界的利用程度是受到很大限制的。到了近代机器出现以后,机械动力或电力,几倍、几十倍地提高了人的劳动能力。有些过去人力、畜力所不能实现的作业方式,例如旋转耕作、联合收获、大规模地改造地形等各种作业,已经或将要成为可能。这当然会影响到农业技术、农业经营等各个方面,从而有力地推动农业的技术改造,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现代机器的应用,能够有效地加速农田基本建设,抗拒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逐步摆脱不利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使农业产量达到持续稳定的地步。农业机械化不仅一般地使人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由于机械动力的特点,可以日夜工作,不像人力、畜力那样受生理条件限制需要频繁的休息,也不像人力、畜力那样会受疫病的影响,以及需要由农产品供应能源等等,从而使人在向自然作斗争中的地位,变得更为有利和主动。

农业机械化能够大大提高人的劳动效率和劳动能力,这是很少有人怀疑的。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很少有人怀疑



的。但是，农业机械化能不能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有的人认为，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人的劳动效率，但不能或不能显著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看到动力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完成任何一项农事作业，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而要在一定的农时期限内完成这项作业，就还要对配备的劳动力数量有一定的要求，就机械动力来说，就是要配备一定的功率或马力。如果不满足于现有产量水平，希望进一步提高产量，就要采取有效的增产措施，如进行多水、多肥的丰产栽培，或是改良土壤、改造地形和其他自然条件等，那末，所需要的动力，比进行一般生产时所需要的动力更多。动力当然不限于机械动力，人力、畜力向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动力。但不论动力属于哪一种形式，或哪几种形式，在总的数量上要满足要求，才能保证农业生产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我国粮食或经济作物的高产区，都是在人口密集、劳动力充沛的地方；其他农业经营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也都有比较丰富的农业动力。因此，在考虑单位面积产量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农业动力的总的情况如何。如果人力、畜力较多，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又受到其他条件限制，一时得不到较大的发展，机械化的作用就可能不十分显著。如果人力、畜力不足，农事作业不能及时完成，精耕细作措施不能在大面积上贯彻，多种经营不能开展，机械化就能够在生产发展上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提高劳动效率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者并不是截然无关的两件事情；相反，提

高劳动效率正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条件。

要回答农业机械化能不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还要正确理解机械化与农业技术措施的关系。农业技术措施的贯彻离不开动力和工具。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中，各项农业技术措施的贯彻，更是离不开农业机械化。以我国农业生产来说，为了逐步提高生产水平，“农业八字宪法”里的各项增产措施，都应当逐步地在不同程度上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一方面，进行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充分利用有利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这就要做到及时耕翻，及时播种和及时收获。只有具有充足的动力时，才能保证很好地利用自然条件和不违农时地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业上的许多增产条件，实际上是由动力来提供的，如凿井、提水、积制农家肥料、改良土壤和多种田间管理措施，大多只要有了动力和工具便可完成。机械化和人力、畜力相比较，则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把农业技术武装起来，扩大它们的效果。当然，机械化要服从于农业技术，农业技术也要能充分发挥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两者必须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例如，在稳产高产农田的建设中，就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看，应当首先抓水利化措施；但除部分地区能够完全依靠自流灌溉以外，机械和电力排灌就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机械化、电气化是与水利化密切结合的，机械和电力排灌要适应地区的防旱排涝要求，而灌溉排水技术也应当能够充分发挥机械和电力排灌的优越性。应当指出，即使由于技术或经济的原因，某些措施在当前



不能实现机械化,而其他措施实现了机械化,所节省下来的人力、畜力,对这些措施的及时贯彻也有好处,也有利于提高产量。因此,在研究机械化能不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时,不应当把机械化与它所贯彻的农业技术措施分割开来,也不能仅限于考察个别机械化作业的效果,而要由整个生产水平的提高来衡量,才能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

二

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途径和步骤有关的重要因素,是国家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

我国地域辽阔,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在地理上应如何划分,目前尚在继续研究。但大致可以分为八个主要的不同区域,即东北区、黄淮平原区、南方水田区、西南山区、黄土高原区、西北灌溉农区、牧区和热带作物区。东北区已有耕地地势平坦,地块较大,一般土质粘重。雨量比较集中,小麦雨季收获困难。当地农民长期以来采用耩作耕作方法,一般以种植玉米、大豆、谷子、高粱为主,小麦次之。区内地多人少,耕作一般比较粗放。除现有耕地外,还有大面积宜林、宜牧、宜垦土地待开发利用。黄淮平原区地势平坦,土壤大部分为砂壤土、壤土和粘壤土,沿海和低洼地区还有较多的盐碱土。一般是春旱秋涝,普遍要求耙耱保墒、抗旱播种。灌溉的增产作用显著,特别是井灌及相应的精耕细作技术在本区有较高的发展。作物种类多,盛产小麦、玉米、谷子、薯类和棉花,而且是我国花生、芝麻、烟草等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区内人多地少,但在夏、

秋主要作物收获、耕地、播种、田间管理等作业交叠时期,劳动力、畜力十分紧张。南方水田区丘陵山地多,河流湖泊多,田块较小,道路狭窄,但水运条件好。水田面积大,是全国水稻的主要产区。水田靠蓄水或引水灌溉,需要动力提水。旱田作物为便于排水,多采用畦作或厢作。这里除水稻外,也盛产棉、麻、油菜、茶等重要经济作物。区内人口密集,耕作细致,但人力用得很多。西南山区耕地分布在山区和丘陵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分布在平坝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梯田、坡田多,土壤粘重,碎土困难,有的地方需要较高扬程的提水灌溉。山区资源丰富,可以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和利用水力、煤、木炭等地方能源。黄土高原区地形复杂,高山、丘陵与平原交错,水土流失严重,形成高原沟壑和丘陵沟壑,交通运输困难,水土保持是当务之急。西北灌溉农区,雨量稀少,气候干旱,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但如有灌溉条件,加上人力、肥料,就可以保证棉花、水果等作物高产。牧区面积广大,而且畜牧业多年稳定上升,继续发展潜力很大。但是人力特别缺乏,挤奶、剪毛、运输的劳动力十分紧张,每年有大量畜产品不能及时采集运出。热带作物区绝大部分为丘陵山地,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土壤侵蚀严重。粮食有水稻、木薯等,耕作粗放。热带及亚热带作物有橡胶、甘蔗、剑麻、香茅、香蕉、菠萝等,可以大力发展。

从以上分区的特点可以看出,各地之间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很大,因而对机械化的要求也不一样。例如,各地农业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不同,需要实行机械化的



作业项目及其迫切程度也不同；山地的机具应当不同于平原地区的机具；同是平原地区，耕作所用的机具也不同于平作机具；不同作物如小麦、水稻、棉花、玉米等，都对机具有特殊要求；地块大小不同，适应的机具型号也不同，等等。因此，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做到因地制宜。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也具备一些共同点，共主要的有：（一）受到过去物质条件的限制，各地的自然条件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比较明显的是，许多地区都可以找到小面积的高额丰产田，比当地一般田地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高出很多，因此，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或总产量的可能性很大。（二）在农业生产高度发展的地区，虽然一般都有比较丰富的人力资源，但由于复种指数高，精耕细作程度高，在紧张的农忙季节则感到劳动力不足。（三）自然灾害频繁。除特大不可抗拒的灾害外，一般的水灾、旱灾、虫灾等，也都造成农产品的相当损失。（四）各地都存在有不少土地需要改良的低产区，主要是需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工作，如改良盐碱地、洼涝地、红壤土以及防止水土流失等，任务迫切，工程艰巨。（五）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的发展还都不够，而潜力很大。这些都说明，农业机械化对我国各地农业生产的提高，都有其大可作为的地方。

在分析农业机械化与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的关系时，应当注意到，有些自然条件可以或比较容易改变，而有些自然条件如气候、地形、地势等，一般说来是不能或较难改变的。各地农业生产条件，有些是可以或

比较容易改变的，而有些农业生产条件则牵涉到农作物习性、农业技术、作业方法、作业习惯等各个方面，也是不容易很快地就显著改变的。同时，人能够在怎样的程度上改造原有生产条件，最终要决定于经济或生产的发展水平，只有首先根据当前条件积极发展生产，才能从根本上为更好地改造生产条件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首先要强调机械化技术适应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但是，反过来看，人又是在改造自然界、同自然界作斗争中进行农业生产的，农业机械化在改善某些不利条件方面，正应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又不能把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看成绝对不能改变。甚至自然条件中的地形、地势等，在局部或一定范围内也是可以改变的。各地有许多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受到过去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能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因此并不是完全合理的。这些就应当努力加以改变。例如，有了机耕条件就可以适当深耕，实现了水利化就可以改种高产作物，等等。此外，为了机械化的顺利实现，也往往要求对一些田地进行规划和建设工作，要求改变一些生产方法和方式，这些，也应当适应机械化的需要，根据可能积极进行。当然，这些改变的措施，都必须经过慎重的试验，证明确实有利时才能推广。

三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途径和步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这是因为：第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须从发展经济的目的出发；第二，机械化必须从现有经济水平出发，机械



化程度的提高,要与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国农业是由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组成,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早已不同于个体的小农经济,这对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是有力的保证。就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比较,在实现农业机械化方面,国营农场比人民公社具有更大的现实性。这不仅是由于国营农场是全民所有制,能够更好地规划土地、安排生产,有更大的经济力量进行投资和建设,而且因为国营农场大多分布在边远的地区,有大片的新垦土地而又缺乏原有生产基础,人力、畜力少,但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机械化经验。因此,国营农场可以也有必要优先使用农业机器来发展生产。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但是,由于当前人民公社的经济条件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人民公社的农业机械化,只能逐步地实现。而且,由于人民公社原有人力、畜力较多,在应用机器以后,往往发生机器的综合利用与人力、畜力利用之间的矛盾。因此,如果说对国营农场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实现各项作业的机械化,提高机械化的程度;那末,对一般的人民公社生产队来说,则应当首先实现某些个别作业的机械化,应当把人力、畜力、机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生产水平的提高。

目前我国农业动力不足,机械动力(包括拖拉机和排灌动力)所占比重很小,因此,在发展机械动力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人力的利用和畜力的发展。从人民公社生产队来说,丰富的人力资源,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还不能实现机械

化的时候,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只要积极充分地利用现有生产条件,农业的增产潜力还是很大的。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物质经济力量还不十分雄厚,为数有限的农业机器必须用在生产上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如果因为有了一些机械化条件,就不很好地安排使用人力、畜力,则不仅会影响公社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和社员的工分收入,而且也不利于加速国家建设。由此看来,在我国农业向机械化生产过渡的整个时期内,在农业动力上,必然是人力、畜力和机械动力三者相结合的,机械动力的比重只能逐步增加,而如何使三者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便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至于改善人力、畜力的利用,改革人力、畜力农具,发展半机械化农具或小型动力机具,在这整个时期内都会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无论是在国营农场,还是在人民公社,当前发展机械作业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就农业动力条件和农业技术措施的贯彻要求进行分析,一般总可以找到某些作业项目的机械化是提高当地单位面积产量的关键。例如,东北地区的国营农场,如果能够解决玉米收获的机械化问题,就有可能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促进单位面积上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华北地区的人民公社,耕地、播种、收获、脱粒和运输的机械化,对于缓和“三夏”、“三秋”的人力、畜力的紧张状况有很大作用,有利于及时耕种和提高复种指数,从而可以大大地促进生产。特别是发展机械和电力灌溉,对提高粮、棉产量有非常显著的成效。当然,地区条件不



同，机械化的要求和效果也不同，必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具体分析。

如果实行机械作业的项目确是关键性的农业技术措施，就可以预计会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除此以外，随着机械作业的逐步增多，会有更多的人力、畜力从一些机械化了的作业中被代替出来。但在农业机械化的初期阶段，由于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原因，还不能实现全面机械化，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某些紧张季节还不能减少原有的人力、畜力。机器所代替的，只是人力、畜力的一部分工作时间，这些工作时间需要在农村中加以充分利用，这就为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工作，提高农业的精耕细作程度，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方面工作的开展，可以有效地吸收由机器代替出的人工和畜工，反过来又为机械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可见，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须是与农业生产各方面的发展相联系的，而不能满足于原有的农业经营水平。

机器的应用需要对农业进行更多的投资。同时，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现在还处在开始阶段，机械作业项目少，利用率低，技术经验不足，使用成本也比较高。随着国家工业水平的提高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这些情况会逐渐好转。显然，与人力、畜力相比，农业机械化的效果，必须结合它促进生产发展的全面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虽然如此，针对目前投资大，成本高的情况，在现有机具的利用上更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出勤率和利用率，来切实降低使用成本。许多拖拉机站的经验证明，只要采取合理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贯彻勤俭办事业的精

神，在现有条件下，机械作业做到经营有利是完全可能的。机械作业只有做到既提高产量，又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才能充分发挥它的良好作用。如果机械作业只是增加产量，而不能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妨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甚至使农民一时不愿使用机器。因此，在农业机器的投放，机械化作业的选择，机械化程度的确定，以及机具选型和修理、供应等一系列技术与组织工作上，不仅应该重视机械化在提高产量方面的作用，而且应该以经济效果为根据。总之，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必须具备很高的经济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农村多种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实现牲畜饲养、农副产品加工等多方面的技术改革，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农业机械化的一些重要部门，需要的机具设备种类繁多。而这些方面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对提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积累和整个生产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候，发展生产所需要的一些大型技术装备，可以也有必要由国家投资，通过举办农业机器站的方式，来为公社服务。但随着公社经济的发展，农业技术改革的投资，应当逐渐更多地由集体经济负担起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直接掌握各种类型的农业机具，特别是中、小型的农业机具，对于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首先是因为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庞大，不可能完全由国家投资来实现农业机械化；利用集体经济投资，是促进农业机械化较快发展的重要保证。其次，农业生产的内容十分复杂，不



可能设想完全由农业机器站用代耕方式来实现人民公社的农业机械化。因此，从机具类型上看，不仅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需要种类繁多的、大小不一的多种机具，而且根据我国的经济条件，特别是不同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也要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机具。这种农业机具大、中、小型相结合，也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不同类型机具的数量比例和经营管理方式，可能会不断变化。

四

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依靠工业部门生产的农业机器来武装农业，因此，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以及使用机器的技术水平，也是影响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我国广大人民公社必须实行人力、畜力和机力相结合，并且只能逐渐地转变到以机械动力为主，这不仅是由我国农村经济状况决定的，而且也是由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决定的。我国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业等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要供应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所需要的大量装备，还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除了物质条件需要一个较长时期才能逐渐满足农业需要以外，在技术上也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逐渐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我国是一个大国，根据我国这样复杂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来解决农业机械化的种种技术问题，设计制造出适应各地农、林、牧、副、渔多种生产所需要的机具型号，就

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其次，要建立生产拖拉机、内燃机和各种作业机械的工业，进行大批生产，也需要一定的期限。因此，如何经济有效地利用国家的技术力量 and 生产能力，就成为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因素。

解放后，我国从开始试用农业机器，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从已掌握的经验看，不同地区、不同作物实现机械化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在平原旱作区大块土地上的耕作机械化，北方小麦从耕种到收获各项主要作业的机械化和棉花的耕种机械化，华北和南方的排灌机械化、电气化等，都取得了较多的经验。其他如水稻、玉米、薯类、蔬菜、水果等生产和山地耕作、壟作耕作等的机械化，虽然生产上也有迫切要求，科学研究单位也做了不少工作，不少生产单位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的说来水平还比较低，还有不少问题需要从技术上加以解决。

解决农业机具型号问题，十余年来的经验证明，应当走“选、改、创”的道路。选是指对我国原有农具和国外引进的机具的适用部分的继承。改是指根据当前农业生产的具体要求和现代工业技术条件，对原有农具和引进机具加以改进和发展。对于农业生产上迫切需要，而国内外已有机具又不能满足的，则应当进行大胆的创造。我国各地农民长期以来，针对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耕作要求，创造了许许多多具有特点的农具。把这些农具加以改进提高，发展成为机引农具，就能符合当地条件和要求，体现当地长年所积累的丰富的生产经验，并且容易为农民接受。如东北的铧耧机、壟作犁，华北的轻型犁，南方的



軋耙等，都是在保留了当地原有农具特点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机引农具的。至于生产队所有的一些半机械化农具和小型动力机具，更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高。国外农业机具在我国应用，也有不同程度的适应性。由于我国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农业生产条件不同，要找到全国普遍适用的农业机具，当然很困难，但正因为如此，各国的农业机具，在我国要找到适应或基本适应的地区，倒是比较容易的。当然，对农业机具型号的具体选择，必须通过各地的严格试验。经验证明，有一些国外农业机具，如某种类型的排灌机械、加工机械、植保机械等，在我国的适应性更广些，拖拉机和其动力机械的适应性也比较广，而田间作业机具则往往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进，才能完全符合地区要求。即使如此，国外农业机具的使用经验，对加速我国农业机具型号的发展仍然是重要的。特别是经过科学研究，把国外农业机具的设计原理与我国农具的优点结合起来，对新型号的创造更有重要作用。

在农业机具型号的发展上，要依靠工农革新家、农业生产部门、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的共同努力。工农革新家和农业生产部门熟悉地区特点和生产需要，对现有农业机具有丰富的使用经验，因此常常能够进行切合实际的改革或创造出行之有效的新机具。如国营芦台农场，几年来改装现有机具在水稻田进行播种、开沟、平沟、收获等作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这些农业生产部门的成就，如不经过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的进一步努力，就还不能符合工业制造的要求和成为正规的工业产品。同样，由

研究设计部门或制造部门提出的新产品，不经过使用部门的试验鉴定和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改进，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完善的产品。因此，使用方面与设计制造方面的密切结合，是发展农业机具型号的十分重要的条件。

农业机具的地区性试验鉴定，是定型生产前必须经过的一步。但并不是适应于某一地区的型号，就可以定型生产。作为工业产品，还必须考察型号适应范围的大小，要根据在许多点上的试验资料，作出判断。所以，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要求，在有代表性的地方，建立试验点，形成试验网，来获得农业机具适应性的完整资料。就作业来说，也不是能够满足某一项作业要求的任何农业机具就是好机具，还必须考虑前后作业的平衡衔接，作业机与动力机的配套，机组的农业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等一系列问题，才能定出比较经济合理的机具型号。投入大量生产的型号，通过这样广泛、严格的试验和周详的研究，才不致于造成浪费和损失。为了指导型号的发展，应当在总结各地农业机具使用经验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不同地区的农业机器系统，也就是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先进技术的成就，考虑配套的合理性和经济性，制定出全套动力机和作业机所应具备的技术经济特征和指标。正确的农业机器系统，既要考虑当前的条件和需要，又要考虑到将来的发展。按阶段制定系统，对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新技术的引用，确定科学研究方向，提出近期和远期的型号要求，都会起重要作用。

如何选定农业机具产品的技术指标，也是选型和试验研究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毫



无疑問，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先进的技术。但由于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机具数量特別龐大，使用极为分散，駕駛操作的人员为数很多，因此，型号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到我国工业制造水平和农村使用机具的现实条件。我国农业机械工业已經初具基础，还有数量巨大的以支援农业为主要任务的地方工业。必須妥善組織这些工业，特別要注意發揮地方工业的作用，尽快地提供多种产品，才能适应各个地区农业技术改造的迫切需要。应当看到，这些工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一般还是比較低的，應該根据具体条件，实事求是地确定产品的类型和方向，选定产品的技术指标。如果对产品的技术指标选择不合实际，过于落后，固然不利于技术的进步，不利于生产；过于先进，以至制造技术长期过不了关，或者制造质量很差，或者成本过高，也同样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制造业本身的提高。从农村的使用条件看，要把合乎技术规格的机具、零件、燃油以及修理条件、使用技术等，及时地、經濟地提供給广大农村，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此，只有根据当前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地进行型号的选择，才利于推广应用。看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制造容易、少用高級金属材料、少用高級燃料，而且使用可靠、操作和維修都容易，是我国大部分农业机具应当具备的特点。

但是，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部門所具有的技术条件是不平衡的。我国已經有一批由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农业机械工厂，經過一定的努力，完全有条件生产比較先进的产品。在大城市郊区和国营农場，使用机器的

条件比一般农村要好；有的地方具有电源条件，早已实现了排灌和加工作业的气化。这些地方使用先进技术，最終必将证明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有电源的地区，电动机迅速地代替了許多其他种类的动力机械，就是一个证明。因此，应当在特別具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引用先进技术，先一步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以創造經驗；同时积极为一般地区制造和使用具有先进技术指标的农业机具創造条件。为此，要加强农业机械工业的技术組織工作，实行制造的专业化和产品以及零件、部件的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使广大的中小工业能够参加先进产品的制造工作，并且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要組織好零件、工具、油料等的供应工作和修理服务工作，并且加强新机具、新技术的試驗示范和技术培訓工作，使先进技术、先进机具能很快地为农民所掌握。应当指出，这些工作与根据广大地区的当前条件，实事求是地选择机具产品型号，使能較快地制造出来和使用起来，是沒有矛盾的。机器的制造和使用，在照顾到一般地区的条件和要求时，又照顾到先进地区的条件和要求，使先进地区带动一般地区，这是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的。

五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途徑，大致可以归納成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必須有利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要有利于促进农业的精耕細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这就規定了农业机械化必須与各地农业



增产措施密切结合，与农民的耕作经验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结合，为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服务，尤其要适应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要求，首先与各个地区的水利化措施密切结合。此外，农业机械化还要促进农村多种经济的发展。

第二，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必须因地制宜。要适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条件，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和技术上、经济上的可能，确定机械化项目，选择合用的机具型号和制定适当的机械化技术指标，不能千篇一律。

第三，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须与整个生产水平的提高相适应。人力、畜力、机械动力相结合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长时期中的特点，特别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特点。在这整个时期内，人力和畜力，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占有重要地位，机械化程度只能逐步提高。无论机器的投放、机具型号的选择、机具的使用和修理，都要十分重视经济效果。

第四，农业机具型号的发展，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必须是大、中、小型相结合；必须重视继承我国原有农具遗产和国外机具的引进和试验，遵循“选、改、创”的道路。定型生产必须经过严格的试验鉴定。机具技术指标的选择要与国家制造与使用的技术水平相适应。但在有条件的地方要优先采用新技术，并为一般地区应用新技术积极创造条件。为此，要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实现制造的专业化和产品以及零件、部件的系列化、标准化、通用化。要逐步建立起广大农村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

第五，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农业机械化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根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客观规律要求，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贯彻执行集中使用技术经济力量，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机械化的方针；同时要发挥地方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骤，从全国范围来说，必须经过一个由低到高，由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由部分机械化到更高程度机械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长短，决定于国家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在一些生产上有需要，技术上和经济上又有可能的地方，则可较早地或逕直实现机械化，而不一定要长期停留在低级的或半机械化阶段。从作业上看，由于不同地区对机械化作业项目的要求不同，不同作业实现机械化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在不能实现全面机械化的地方，也可能有某些作业先一步实现机械化。这就更需要就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有关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步骤，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所有制看，国营农场应当比人民公社先实现机械化。这是因为，国营农场是全民所有制，可为机械化提供比较雄厚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能够适应机械化的要求对生产进行全面合理的规划；已经具备较多的机械化经验。国营农场当前的任务应当是积极增加机械化作业项目，逐步向全面机械化发展，以进一步大幅度地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粮食、棉花、肉类等农牧产品。这就需要及早解决开荒整地、中耕除草、玉米收获、小麦雨季收获、



饲料收获、棉花收获清理等机械化问题。

第二，从地区上看，大城市郊区、地多人少的商品粮地区和重要的经济作物区，应当比一般地区先实现机械化。这是因为，郊区有必要发展粮食和蔬菜、乳、肉、水果等生产供应城市需要，而多余的劳动力容易在城郊各种副业生产中找到出路。同时，郊区具备较好的技术条件，比较容易解决物资供应、机器的修理和技术指导等问题。因此，郊区在解决粮食作物生产的机械化的同时，还要着重发展蔬菜、饲料生产和运输的机械化，以及农产品加工、畜牧业等的机械化、电气化。

商品粮地区和经济作物区生产队的经济条件一般较好，机械化的增产效果显著。松辽平原和华北地区原来就有一定的农业机械化基础，更应当继续发展。

第三，在一般地区和一般人民公社，首先应当着重解决一些关键作业的机械化。这些作业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机械化对抗拒自然灾害有显著优越性的一些作业，如抗旱、排涝、植物保护等。

二、机械化有显著增产效果，或占用人力、畜力很多而现有人力、畜力不足，因而延误农时，作业粗放，严重影响生产正常进行的一些作业。如：东北地区的铧耧、中耕；华北地区的耕地、排灌、脱粒、运输；南方水田区的排灌、耕作、运肥；牧区的割草、集草、剪毛、挤奶、运输，等等。

三、进行基本建设，从根本上改造生产条件的一些作业。如：西北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所要求的各种土地整理；盐碱地、洼地的土壤改良所要求的平地、筑畦、挖沟、排水；牧

区无水草原的凿井、提水；一般地区的开渠、凿井、提水、平整土地，等等。

如果把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步骤分为个别作业机械化、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全面实现机械化三个阶段，关键作业的机械化当然只是个别作业的机械化。这一阶段投入的机器种类和数量较少，还不能从生产中代替出大批的人力和畜力，而应当把节省出的人力、畜力的工作时间用于加强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应当意味着各项主要作业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时农业机器使用的可靠性和经济性都要有很大的提高，机器的品种应有大量增加，农业动力构成应当发生根本变化，机械动力将成为生产的主要依靠。这样，在农业技术和农业的经营上，也要求有相应的改变。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和降低人的劳动强度，到实现全面机械化时，机器的品种和数量要有进一步的大幅度增加。

我国农业如何实现高度机械化，现在还缺乏经验，但可以看到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路程。为了具体指导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须进行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和科学实验工作。当前除了积极进行各种机具的试验研究外，特别应当迅速地加强各地的农业机械化试点工作，为实现机械化创造全面经验。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农业机械化经济、农业机械化区划和农业机器系统等的工作，为制定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提供科学根据。社会主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系统总结生产实践经验的同时，把这些研究工作提到很高的地位，避免前进中的盲目性，使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在华盛顿，又发出了一种蛊惑人心的论调：美国要在世界上充当“调解人的角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据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今年三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现在这个“吵吵嚷嚷的世界”中，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叫做“他人的争吵”。这种所谓“他人的争吵”，既包括一些“新国家”之间的“边界争执”，也包括“一些国家内部发生暴力行为和政变”，而“争吵”的双方又都希望把美国这个“强有力的朋友”拉进去担当“调解人的角色”。腊斯克宣称：为了建立“一种适宜的世界秩序”，美国“不能规避这种责任”。

提起“调解人的角色”，中国人民并不陌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不就是这个“热心肠”的头号帝国主义以“调解国共冲突”为名，支持蒋介石在中国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吗？当然，对美帝国主义来说，这次“调解”的结果显然是很不愉快的。

美国统治集团知道，形势毕竟不同了。老一套的“调解”方法当然要继续使用，但是，也该变换变换新花样了。现在，腊斯克洋洋自得地提出了几条据说是“另外的、也是更好的”方法：一曰“在有些情况下，一些重要的邻国或其他友国也许是有帮助的”；二曰“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区域性的组织也许是有帮助的”；三曰“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联合国也许是最有效的工具”。

说是新花样，其实并不新鲜。

什么叫做“一些重要的邻国或其他友国也许是有帮助的”呢？举例来说，一九五四年，美国政府利用危地马拉的两个“重要的邻国”——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对采取独立外交政策的阿本斯政府施加压力，并且指使危地马拉人民的叛徒阿马斯，率领由美国豢养和训练的雇佣军从洪都拉斯向危地马拉进犯，同时策动危地马拉的反动军人在国内发动政变，双管齐下，终于迫使阿本斯交出了政权，就是美帝国主义运用这种“调解”术的一个代表作。在东南

亚，美国统治集团也一再玩弄过这种“调解”把戏。不久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向全世界揭露：“在我们（柬埔寨）同泰国和南越接壤的边界上发生的无数次的抢劫行为，都是反对中立主义的美国的专家们策动的”。

“区域性的组织也许是有帮助的”，这意思也很清楚。若干年来，美国政府就是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借口“防止侵略、颠覆”，对拉丁美洲各国进行“审查”、“监督”和“制裁”的。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下，直到今天，革命的古巴，仍然是这个区域性组织的所谓“制裁”的对象。

“联合国也许是最有效的工具”，这更用不着多加注解。腊斯克已经明白地说过，在悬挂美国旗帜被认为是一个冒犯行为的地方，就须要悬挂联合国的旗帜。据说，这样要比美国单独采取行动“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事实正是如此。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在非洲镇压刚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最近干涉塞浦路斯内政的行为，就都是打着联合国旗帜干下的肮脏勾当。

任凭腊斯克如何撇清，明眼人一看就穿，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词，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之类的玩意罢了。腊斯克声称，美国不想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警察和法官”，其实，到处侵略扩张，然后再假“调解”之名，行干涉之实，又岂仅是“警察和法官”而已，道道地地的是一名凶恶的“世界宪兵”。

难道打着“调解人”的幌子，就可以诸事顺遂、万无一失了吗？据说，问题还是不小的。腊斯克自己承认，“调解人的角色通常是得不到感谢的，至少对争执中的方面来说是如此。”腊斯克还从中悟出了一点道理哩，他说，现在世界上出现了“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决不是偶然的”。这总算有一点自知之明。但是，不可为而为之，不正是美国统治集团最大的悲哀吗？

美国「调解人」的真面目

· 丁 岱 ·

